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落叶集

瓦·洛扎诺夫 著
郑体武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原金菊
封面设计：西　里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落叶集
瓦·洛扎诺夫　著　郑体武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94 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222-02285-6/I·615　定价：21.00元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总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发轫于文学和艺术，在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等领域中都有天才的创造。稍后，它又渗透到了其它领域，在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其它人文科学中大放异彩。俄国知识分子以探索人的命运和意义为起点，全面地审视人类的精神史，其思想的触角分别伸向了有关存在、自由、创造、个性、爱和死等问题，并勉力探讨可能的答案，有力地抵御了当时流行于俄国和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的弥漫，成为欧洲文化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嬗递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思想理路和言说方式，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拈出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本世纪文化范畴内的诸多现代主义思潮，都源起于那一时期的俄国。人们称其为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将它与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就整体的影响而言,白银时代的文化似乎还超过了黄金时代,如果说普希金他们这一代人将西方文化引进到俄国,为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嫁接做出了成功的试验,那么,白银时代的一代人则在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继承的同时,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让俄罗斯理念以迥异于传统所理解的东方和西方的模式走向了世界。

二十年代中期，白银时代文化在俄罗斯本土消隐。不过，其影响、其代表人物的活动却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着。如今，在世纪之末，俄国白银时代涉及的许多思想命题，不仅继续受到欧美学者的关注，而且愈来愈多地引起了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就深度还是就广度而言，它都可能是本世纪最大规模、最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相近的国情、相近的文化积淀和相近的民族心理结构，俄国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思想历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界有着极大的参照价值和启迪意义。但是，我国对这一文化现象的介绍和研究，迄今仍基本是一个空白。鉴此，我们决定率先编译这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俾使国内的读书界、学术界得以目睹这一灿烂的文化景观。

本丛书以文学为主，兼及其它人文学科；既有重要作者的别集，也有重要思潮或流派的合集；既有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也有意蕴深刻的思想性著作。它们相互之间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全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的很多作品完成于十月革命以前，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个别作者甚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着误解，以致于在个别行文中出现了某些偏颇之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编译过程中进行了局部性的删节和技术性的处理，但恐怕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我们恳切地提醒读者诸君在阅读时加以细致的甄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地分析和批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中获取真正有益的养分。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目 录

第 一 筐

※ ※ ※

我曾以为，一切都是不死的。所以我唱歌。
而今我知道，一切都有终结。于是歌声止息了。
(已经三年了)

※ ※ ※

一个人的强有力的爱能使许多人的爱变得多余。

※ ※ ※

甚至没有意思……

※ ※ ※

“我死了”意味着什么?
让出大木船街的房子，主人把它交给新的住户。
还有什么?
文献学家将来整理我的书籍。
而我自己呢?
自己? ——没什么。

收款处将收到六十卢布的丧葬费，到三月份的时候这六十卢布将计入“总账”。但我的丧事将同别人的丧事混在一起，没有名字，没有怨尤。

太可怕了！

※ ※ ※

祷告的实质即在于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深刻的局限性。“祷告”在“我不能”处；哪里是“我能”，哪里便没有祷告。

社会，周围的人，只能使灵魂受损，而不能使灵魂受益。

能使灵魂“受益”的只有少见的亲密关系，“心心相印”和“肝胆相照”。这样的人一生中只能碰上一两个。在他们身上，灵魂能得到完美体现。

去寻找这样的朋友吧。而对人群要避而远之或小心绕过他们。

（喝早茶时）

※ ※ ※

人人都在奔跑，奔跑。跑向何处？什么目的？

——你是问，为何我想要世界？

其实不是“我想要”，而是腿在打滑，肚子在哆嗦。这是早冰场，而不是生活。

（在沃尔科沃）

※ ※ ※

是的，死亡也是宗教。是另一种宗教。

从来还没有想过。

…………

这就是北极圈。白茫茫的冰雪。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死亡。

…………

死亡是终结。是两条平行线相交。也就是说，彼此纠缠在了一起，除此别无其他。没有什么“几何定理”。

是的，“死亡”甚至能战胜数学。“二乘二等于零”。

（在花园里仰望天空时）

我五十六岁：乘上一年一度的劳动——等于零。

不，还不止这些：乘上爱情、希望——等于零。

谁需要这“零”？难道是上帝？到底是谁？为什么？

或者难道应该说，死亡比上帝本身更强大？这是否就意味着：死亡本身就是上帝？在上帝的位置上？

可怕的问题。

我害怕死，我不想死，我恐惧死。

※ ※ ※

“外婆”（亚·阿·鲁德涅娃）的去世是否使我的态度有所改

变？没有。怜悯过。痛苦过。为她伤心过。但我丝毫没有改变，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这里恐怕还不只是伤心：她去世时我怎么会依然如故呢？就是说：我不需要她？可怕的怀疑。就是说，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只有活着时才有关系，但没有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关系？这种物的孤独更为可怕。

比方说，我和老伴死去，孩子们在悲痛过后，还是要活下去的。世界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只有相对于我们来说，会发生可怕的变化。“完了。”“结束了。”这“完了”指的不是局部，而是整体，全部。——真可怕。

我完了。我究竟为什么曾经活在世上?!!!

若不是“朋友”的爱和这爱的全部故事，我的生活和个性会多么贫乏啊！一切都将是一个知识分子空洞的意识形态，而且，不错，一切都会很快夭折。

……写什么?

一切早已写成（莱蒙托夫）。

跟“朋友”在一起，命运为我展开了无穷的题目，且一切都投合了我的个人兴趣。

※　※　※

我始终把耳闻目睹别人幸福的情景作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来回忆。老太婆和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波波娃，“朋友”初恋和出嫁的故事（我一生的高潮）。由此我得出结论：我生来就是观察家，而不是行动家。

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看，而不是做。

这是上帝的派遣，我能说什么呢?

说他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

不。

我到底该说什么?

上帝能看见我的哭泣和沉默，我脸上有时露出的微笑。但他从我这里什么也听不见。

※ ※ ※

我是在题目的边缘飞过，而不是飞向题目本身。

这飞就是我的生命。题目——“仿佛在梦中”。

一个，又一个……很多……且全都忘了。在我行将就木时，我会忘掉的。

在那个世界里我将没有题目。

上帝会问我：

——你究竟有什么作为?

—— 一事无成。

※ ※ ※

这是“我”近旁的水晶（坚硬，不易破碎)。而且，说实话，如果所有的“我”都处于水晶之中，那么，就不会有混沌，“国家”从而也就不需要了。“无政府主义”在此有千分之一的正确性：抛弃了“共同的”，个人的（人与历史的主要的美）便会成

长壮大。最好看一看，什么是“各民族的史前存在”：根据德雷伯[1] 等人的看法，这是“原始人”，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普及教育”，也没受到美国佬的“开化”；但根据圣经的说法，这是“天堂”。德雷伯和圣经岂能同日而语？

（校对时）

※ ※ ※

应该认真“编织自己的生命之袜”，其余的不必多想。其余的是“命中注定”的：反正在“那边”我们什么也做不成，而自己的（“袜子”）终会弄坏（由于注意力分散）。

※ ※ ※

睡醒了……

什么声音……已是早晨，屋子里仍很昏暗。我关切地去察看其他房间。

东方已经开始发白。

瓦夏坐在漆布沙发上。他穿着长长的睡衣，蜷起两条赤裸的小腿，头冲着晨曦（窗户朝东），手捧一本书，像是在梦中，反复背诵：

多么清晰——空空荡荡的马路上
沉睡的高楼，多么明亮——
海军部大厦的尖塔。
海－军－部－大－厦－的……

---

① 德雷伯（1811～1882），美国历史学家。

海－军－部－大－厦－的……
海－军－部－大－厦－的……

不会背了……这是《美洲》。马路上怎么会有“尖塔”呢？他总是搞错：

……多么明亮——
海军部大厦的尖塔，
海军部大厦的星，
闪耀的东方之星。

——干什么呢，瓦夏？

他将那双聪明的，永远认真的眼睛转向我。他记性不好，学习吃力，因而也很用功，很认真：

——我在复习功课。

——应该这样念：“海军部大厦的尖塔……”就是尖顶。有几丈长，也就是几丈高。

——尖顶？尖顶是啥？

——就是……房顶。也就是房顶上的东西。都是一回事。只是要注意：尖塔。背吧，背吧，孩子。

我转身走开。家中一切安好。背后传来：

海－军－部－大－厦的明星，
海－军－部－大－厦的尖塔。
…………

※ ※ ※

可怕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灵魂的文学性，生命的文学性。任何体验都能转化为生动形象的语言，但一切也因此而告终结，就是说，体验本身死了，不存在了。人的体温因语言而冻结。语言不再能唤醒什么，啊，不！它只能冻结和阻止什么。我说的是独特的美的语言，而不是“马马虎虎”的语言。正因如此在“黄金时代”之后的文学里才不断出现对整个生命的肢解和冷漠，以及生命本身的萎缩和平庸。梦一般的人民，梦一般的生活。这种情形贺拉斯① 之后的罗马有过，塞万提斯② 之后的西班牙有过。但这里让人信服的不是事例本身，而是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这就是文学实际上并不需要的原因，在这里康·列昂季耶夫是对的。“为什么历数世纪的荣耀时，全部争说哥德和席勒，而不是威灵顿③ 和施瓦尔岑贝格④？”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尼古拉时代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时代”，而不是叶尔莫洛夫⑤，沃龙佐夫⑥ 等人的时代？我们甚至一无所知。我们如此被书籍宠坏，不，是如此被书籍淹没，以致竟不记得统帅们。诗人称统帅为“斯卡罗祖勃”⑦ 和“别特里谢夫”⑧ 是辛辣和有远见的。可要知道，这是片面性和胡说。需要的全然不是“伟大的文学”，而是伟大的，美好的，有益的生命。而文学则“位居其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
②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
③ 威灵顿（1769～1852），公爵，英国元帅。
④ 施瓦尔岑贝格（1800～1852），奥地利公爵，国务活动家，元帅。
⑤ 叶尔莫洛夫（1777～1861），俄国步兵上将。
⑥ 沃龙佐夫（1741～1805），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
⑦ 《聪明误》中的上校。
⑧ 别特里谢夫（1872～1938），作家，政论家。

末”。

因此，这里“一切都将消亡”是否天意呢？不是格里鲍耶陀夫①，而是安德列耶夫②，不是果戈理，而是蒲宁③ 和阿尔志跋绥夫④。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文学的大终结时代。

树叶在动，但没有一丝声响。阳光下，一切被雨水打湿。孩子的妈妈说：

——你看。

我看着并沉思着。她也若有所思地说：

——什么能比大自然更纯洁呢……

她没有说，但我替她说了：

——人和人的生命已不像大自然那么纯洁了……

孩子的妈妈说：

——大自然多么纯洁。它因此而多么崇高……

（大约八年前在花园里）

当我把这一段读给她听，她说：

——这是大约四年前的事了。

这还是在她生病以前，但她忘了：是大约八年前。她补充道：

——你现在不幸福，所以要回忆我们过去的幸福时光。

见我脱下皮靴，并堂而皇之地把它们错放在阳台的栏杆上（“随便乱放”），她一瘸一拐地给我送来布鞋。

---

①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作家和外交家。
② 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
③ 蒲宁（1870～1953），俄罗斯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④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作家。

她一直腿脚不便。

也一直是我的贤内助。

“昨天你不在家，多糟糕啊。又发病了。我甚至还在头上敷了冰块（极罕见的方法）。”

※ ※ ※

走。走。走。走……

何处是我的路的尽头——不知道。

也不感兴趣。一种本能的，非人性的东西控制着我。确切地说，我是被它“拉着走”，而不是自己走。双腿不由自主。只要我一停下，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会被它拉走。

（区法院；关于《隐居》）

※ ※ ※

自打有了出版业，爱便成了天方夜谭。

“跟书在一起”能有什么爱可言？

（准备去参加命名日）

说施佩尔克如今已经完全不在人世——那是不可能的。或许，那里的“灵魂不死”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而且是错误的：但对我的朋友们来说，这个说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错误的。

并不是说“施佩尔克的灵魂不死”，而是说他棕黄色的胡须不会死，他的“贝佐夫”（他的好朋友）正在大门口等他，他会亲自乘坐铁轨马车到巴甫洛夫街来找我。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而他的“灵魂”是否“不死”——我不清楚，也不感兴趣。

万物皆不死。永恒且有生。包括皮靴上的洞，只要它既没“扩大”，也没“补好”。这比枯燥而抽象的“灵魂不死”好多了。

我想带一块手绢去“那个世界”报到。别无其他。

（1912年5月16日）

※ ※ ※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特别不喜欢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拉钦斯基。不喜欢他们的思想，不喜欢他们的生活，不喜欢他们的灵魂。究其原因，我觉得，我之所以对他们如此冷漠和无情，主要在于我们处于不同的“层次”（说来奇怪）。

若说索洛维约夫不是贵族，那也是处于荣誉（过剩的荣誉）的光环中。我很清楚，这不是嫉妒（我无所谓）。然而，在跟拉钦斯基交流思想甚至我们有相同的见解（对教会学校）时，我总感到他讲的一切与我格格不入；跟索洛维约夫和托尔斯泰同样如此。我可以赏识（只是赏识）他们三个人，珍视他们的活动（的确珍视过），但不知为什么，永远不能爱他们，一点儿也不能。一条最近被有轨电车轧死的狗，比起他们的“哲学和政论”（口头的），更能让人心动。这条“被轧死的狗”或许能解释什么。这三个人身上绝对没有任何“压力”，相反，他们倒是非常喜欢给别人施加压力（如对自己的论敌）。托尔斯泰动辄对果戈理吹毛求疵：孤芳自赏。所有这三个人都喜欢孤芳自赏，所以人们才不愿爱他们，不愿跟他们“交往”（相知）。“哎，先生们，这不干你们的事”。我生就一副同情心，可在这三个人身上，我内心的这一主要特点都找不到任何对象，任何“客体”。我爱过斯特拉霍夫和列昂季耶夫，且仍旧爱着他们；更不用说我无限热爱的“生活小事”。我差不多找到了谜底：如欲爱之，必先心痛之。这三个人没有什么可“心痛”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

“不同的层次”：跟拉钦斯基在一起时，我能感到这一点。他说什么我始终无所谓，正如我觉得，拉钦斯基对我心里有什么也无所谓一样。他以一种疏远的爱来对待我的作品（看得出，他喜欢）。可怕的层次差别就在这里；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皮肤”，“另一层外壳”。但如果硬往嫉妒上扯，就会什么也搞不清楚（过于简单化）：这正是一种食而不化意义上的不懂。“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我跟勒齐（贵族）能互相理解，可以说是“一点即通”；可他很穷，像我；“在世界上是多余的”，也像我（我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就是这“多余性”，被世界“遗弃性”，可怕地使人们产生了沟通，“一切立刻变得明明白白”，人与人成为不是说说而已的兄弟。

历史莫不是恶魔的另一张脸，把人当食物吞咽，一点儿也不考虑他们的幸福，对之不感兴趣？我们莫不是“我”中的“我”？

一切设计得如此恐怖和残忍。

（在树林中）

世界上可有怜悯？美是有的，意义是有的。然而怜悯呢？

星星会怜悯吗？母亲会怜悯：所以她高于星星。

怜悯存在于小的事物中。这就是我爱小的东西的原因。

（在树林中）

写作是宿命。写作是天意。写作是不幸。

（1912 年 5 月 3 日）

……也许，只是因此作家才不会受到“末日审判”……但严厉的审判还是应该的。

（1912年5月4日）

※ ※ ※

一卢布五十戈比

——闺女，把枕头给你挪到脚那头吧，不然这炕会热得你头疼。

——好的，爸爸。但要放把椅子（在床头）。

我放了把椅子。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银卢布，丢在椅子上，然后笑眯眯地站起来。

——我要看着它。

我已经明白了：“卢布”是妈妈给的，目的是让她“耐心”躺着。

有病。十一或十二岁。

瓦莉雅在花园里干得很卖力。她拿着一把比她还大的扫帚，把小路上和露台前的树叶，纸屑和各种垃圾扫到一起，以便丢到坑里去。

——干得好，瓦莉雅。

她抬起头。她是那么秀丽。头发像亚麻。灰色的眼睛大大的，含有一丝永恒的疑惑，潜在的顽皮和大胆，看上去特别动人。面颊上泛起一片美妙的红晕（因为干活）。

十三岁。

她这是在挣自己的半个卢布。生病的妈妈躺在床上对我说：

——也好，权当是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了。

总共只花一卢布五十戈比，却带来那么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塔尼雅管瓦莉雅叫“小白驹”，“小白马”（塔尼雅是姐姐，跟妹妹在同一所学校念书）。她也确实像马驹。个头高大，性情开朗，精力旺盛，因为头发白皮肤白而得了个“小白马”的外号。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她们都还很小，都还没上学，我在一家面包店的窗户上看到不少用硬纸板做成的小动物（当时正值受难周），便买了一些下来。我买的是大象，长颈鹿和斑马。我带回家，“偷偷摸摸地”从大衣里掏出来，说：

—— 一人一个，但要挑跟自己长得像的。

她们观察了一会儿，随即各取一只：

胖敦敦和好心肠的维拉，面带可爱的微笑，拿走的是——

大象。

瓦莉雅拿走的是脖子呈弧形，且脖子上的白毛竖立着（就像她刚剪过的头发）的——

斑马。

而塔尼雅拿走的是体态苗态，匀称，身上带浅黄色斑点的——

长颈鹿。

她们选得都很准，她们确实像这些动物——我之所以把它们买回来，就是因为它们和这几个孩子的相像令我吃惊，真可以说是形神兼备，维妙维肖。

很久以前还有一件事：我买了一只长毛狗，狮子狗。回到

家，趁晚上喝茶时，我把它放到了瓦莉雅的枕头下面，什么话也没说。她去睡觉时，我站到与女儿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墙的楼梯旁。我听见：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我溜回自己的房间。什么也没说，无论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是你放的吧？”我的回答粗鲁而冷淡。她至今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 ※ ※

托尔斯泰是天才，但不聪明。而无论怎样的天才，聪明总不是坏事。

※ ※ ※

我们可以假设小市民是聪明的，没有这“第三种成分”你的生活就会维持不下去。

※ ※ ※

要穿干净的皮靴，要有人给做衣服。“预言家伊里亚”还有裁缝给他做的斗篷呢。

（神秘主义者）对聪明人，亦即对小市民的鄙视本身就不乏小市民色彩。“我是高贵的老爷或预言家，怎么能跟这个穿厚呢大褂的人握手呢。”这么说或这么想的人将因此而成为假老爷或假预言家。

真正的优越感应该是深层次的，含而不露的。应该是一种主观的秘密。任凭斯宾塞在帕斯卡面前自高自大去好了。帕斯卡甚至应该不时地称斯宾塞为“阁下”，并对斯宾塞的“深浅”佯装不知。

※ ※ ※

或许，我只是在告别文学，而不是人？跟人告别是可怕的。跟文学告别——没什么大不了的。

※ ※ ※

列文指责我“利己主义”是对的。这当然是存在的。甚至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动笔写《隐居》：渴望以此挣脱离群索居的枷锁。这确实是一种枷锁，一出生我就戴着它。

我戴着枷锁呐喊：如果他们已经看不见，摸不到，无法帮助我，那就让他们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就像一个落井者，在深深的井底，希望能向“那里的”，“地面上的”人发出求助的呐喊。

※ ※ ※

…………

木块。沙子。石头。坑洼。

——这是什么，修理过道？

——不，这是《洛扎诺夫文集》。

一辆有轨电车自信地在铁轨上行驶。

（在涅瓦大街上，维修）

※ ※ ※

俄罗斯有许多好东西，10 月 17 日，宪法，伊万·巴甫洛维奇睡眠如何。但最好的东西是在斋戒的第一天到扎伊采夫那里（花园街和涅瓦大街交接处）买腌菜。腌黄蘑，腌乳菇，一种类似苹果的东西，越桔——摆在盘子上（供人品尝）。还有个头硕大的西班牙圆葱。各种各样的白菜。挂在门框上的成串的蘑菇。

门的上方是一幅很大的救主像，加上一盏闪亮的油灯。十足的东正教。

店不大。全是木头的。俄罗斯风格。顾客都是一些严肃认真，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人。

晚上来了几个决斗证人。总算把他们打发了。

在斋戒的第一天蘑菇店和鱼店是最受欢迎的，甚至在历史上也是最受欢迎的。在斋戒的第一天蘑菇店堪与克留切夫斯基最美的一页相提并论。

（斋戒的第一天）

※ ※ ※

科列茨基二十五岁生日。邀请。没去。他们庆祝了。《新时代》有报道。

有谁知道诗人科列茨基？没有谁。编辑出版家？谁跟他合作？

显然，作家先生们是无处不去“祝贺”的，只要那里的桌子

上有鲑鱼。

可怜的作家们。我担心，政府有朝一日会灵机一动，摆出一桌桌的“白海鲑鱼”来代替“所有的自由”。

“多数票”会有的，“平等的秘密的全体投票”会有的。吃饱喝足。起身道谢。我不知道，在“道谢”之后是否还方便提什么要求。看来，伊洛瓦伊斯基没有料到，在俄罗斯，自由的伟大胜利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小小的因素便是：白海鲑鱼的捕捞情况。

“物美价高……”这里却正好相反：“物不美价不高”。

（1912年3月）

※ ※ ※

嫉妒（男人的）驱使他痛恨“女情敌”。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充满极深的道德苦闷，并从中解释出他出于嫉妒而予以否定的女性的深刻的道德感。他转向基督教，一如那些最先接受基督教的女性（圣女奥尔加，圣女克洛吉尔达，圣女贝尔塔）。

※ ※ ※

我们的伊万·巴甫洛维奇是个天生的神父，却拒不接受教职。要操心的事颇多。目前仍是师范学校的老师。

他总是打瞌睡。如果能让他睡醒，他会兴高采烈。如果中途把他叫醒，他会非常生气。不过不太凶。一会儿就会过去。

他的妻子在结婚八年以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很难为情，预先写信给熟人，让他们不要来。“妻子有病在身，等她好了，我自会通知您。”

她死了。他在信中说："愿她升入天国。她在那里会好过些。"

我们的"神圣故事"到此结束。短得很。

（喝茶时想起来的）

※ ※ ※

死的国度，死的国度，死的国度。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任何思想都无法在此嫁接。

（1912年3月24日，在沃尔科沃公墓买了三块地之后）

※ ※ ※

尼娜·鲁德涅娃（外甥女）有个女友：痴迷历史和天文学，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出众。漂亮。个头适中。我问：

——男人身上什么最美？

她兴奋地抬起头：

——力量！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

※ ※ ※

神父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为"肚子的果实"而高兴。永远不会。

在讲台上永远不会，在私下里也未必会。

不过，有一位古币收藏家B某（他认定自己是叙利亚国王

亚历山大·巴尔的后裔)，我在他那儿见到一块背面也刻有人像的浮士蒂娜铜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两个婴儿，脚边还靠着两个稍大一些的孩子。周围印着这样几个字：

FECVNDITAS AVCVSTAE

意思是：

生儿育女的皇后。

这几个字的含义如此之美，以至我毫不犹豫地当场买了下来。“贸易货币”，流通工具，人人皆有，商人有，妓女有，卖肉的有，花花公子有，提布拉那个地方有，卡庇托林山丘上也有：突然见到浮士蒂娜皇后（马可·奥勒留的妻子），如此清晰，如此威严（铜币正面的头像），好像要把善于怀孕的肚子交给“善良的罗马人民”，说：

“高兴吧，我又生了：现在我有四个孩子了。”

我的喜悦溢于言表，B老头很狡猾，很机灵，马上喊老婆，一位穿着华丽，比他年轻大约二十岁的高个女士走了出来。我把铜币拿给她看，似乎有点忘记了她是位“女士”。但她（希腊人，和他一样）立刻就明白了，并开始同情地听我讲，而当我含蓄地责备她“恐怕没有四个孩子吧”，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谁说的，正好四个：一个是海员，一个是大学生，一个女儿是……

她走进屋子，转眼间领出一个跟她一样漂亮的女儿。我什么也没对这位小姐说，她于是很快走开了。

两年后我来还账（买古币欠的七十卢布）。老头子老了，他妻子也稍微老了一点。我对她说：

——你要说服丈夫，他已经老态龙钟了，希望他在遗嘱中带上一笔，把一枚四德拉克马的马洛涅亚银币（上面有手持两把神杖和一串葡萄的狄奥尼索斯神像，价值二十五卢布），和一枚四德拉克马的特利波里斯银币（上面有狄俄斯库里头像，价值约一

百卢布。前者是色雷斯的，而后者是腓尼基的）送给我。

B某听了吼道：

——好啊，您……我会死在您后面！

——怎么可能呢，您头发都全白了。您家大业大，这两枚古币算个什么，不就是一百二十五卢布嘛，孩子们要它们又没用，因为这是一门专业。而女儿就更不用说了。

——女儿出嫁了!!

——女儿出嫁了?!! 合情合理。至于……

他妻子喜滋滋地在旁边插话说：

——女儿已经有儿子了。

她很漂亮。衣着华丽。很像浮士蒂娜。没有丝毫的衰老迹象。B某虽然头发全白了，却仍跟四十岁的人一样身手矫健。他很自信，是部里最有远见和“有用”的人物。

如此随便，有说有笑，但又充满爱心，绝无半句污言秽语，仿佛是在抚哄婴儿狄奥尼索斯入睡（神话中说的——古币上有所反映）。这样的情景在那些镶嵌着金饰银饰，过于一本正经，以致无法屈尊进入卧室，走近床头和襁褓的制服旁边是找不到的。过去找不到，现在找不到，将来也找不到。

在宗教哲学会上，我曾提议让新人在婚礼仪式过后直接留在举行仪式的地方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安德烈·彼切尔斯基的书中读到过一种极好的仪式，姑娘削发为尼时，要在祈祷室（旧式礼拜堂）度过三天，其间，吃的和喝的会给她送来。“出家人和成家人在名誉上和仪式上应该一视同仁”——这是我的想法。这一想法——关于新人应该在一个神圣的场所住上几天，三天也行，七天亦可——我后来（转述在宗教哲学会上的提议时）在《新时代》报上又做了重申。隐居到祷告的所在，面对忽隐忽现的圣像，面对为数不多的燃烧的蜡烛，没有人，没有旁人，没有外人

的眼睛，没有外人的耳朵……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怎不让人浮想联翩，百感交集呢！这些感想好似一束绵长而宁静的宗教之光，射向正在开始和已经开始的夫妻生活，在这里，在祈祷室开始的夫妻生活。这里会不由自主地出现第一批“预兆”——迹象，特征，就像古代预言家发出的预言。有谁还会这么需要这一切呢，怎能不诚惶诚恐地对待这世上最重要，最宝贵，最甜蜜，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姻缘呢。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的想法与我确系远见卓识的想法完全不同。当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夜，星空下敞开圆顶的半个教堂，教堂中央的地板已被拆除，撒上了黑土，过道两旁栽种着不太高的树和鲜花。就在这里，在花与树中间，在星空下，在大自然中，同时也是在教堂里，青年人过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这似乎是教堂的夏天部分，与“温暖的”（在我们北方）冬天部分不同。当然，这一切主要出现在南方，好在俄罗斯的版图上并非没有南方。还有什么？他们要在教堂里呆到确知妻子怀孕为止。这里也是一个水池。要知道，旧约记载的教堂中是有过水池的，供神职人员和最高主教沐浴用，名叫“石海”，建造在十二头石刻的公牛背上。旧约崇拜的这一细节不知为何没有进入垂挂着“旧约帷幔”，诵读着“旧约语录”的我们的教堂。总的来说，我们这里并未跟旧约圣经断绝联系。就连在新约中……难道我们在那里没读到，难道我们的祈祷仪式不是在大声宣告：“我要对你们说，天国如同新婚的圣殿……”“新婚的圣殿”！这句话指的当然不是来宾的舞会，这种舞会与五花八门的其他晚会没什么区别，与婚姻没什么关系。这句话指的是新人的洞房，指的是他们的寝宫。难道救世主的教诲是低级的，肮脏的，不配我们用绿树、鲜花和水池来装点我们的教堂的一部分，使之合乎救世主的口味?！将洞房纳入我们的教堂——这也是我的想法。不，勒齐的多次指教是正确的（他的笔名与“司祭”不无关系，但他却不

信神，不信奉东正教)："面团还没有发起来（福音书中的寓言)，酵母（引子）还没有主宰放在容器里的全部面粉。"这"放在容器里的面粉"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引子"，福音书的"酵母"，亦即上帝的话，上帝的整个启示，形象，比喻——尚未完全主宰的就是这种日常生活。比如说，安葬大女儿娜佳时，我在斯摩棱斯克公墓教堂见到过一个挂着门帘的房间："办公室"。在福音书中，没有一处是对此类做法表示肯定的。请问当家人安东尼，究竟为什么您要把"办公室"看得比救世主不止一次满怀慈爱和敬意谈到的"洞房"还要高，还要神圣？如果说把"办公室"搬进教堂并没有使教堂受到玷污和破坏，那么，为什么偏要说把救世主讲的"洞房"搬进教堂就会使教堂受到玷污呢?！当然，这样的圣殿只有一个是不够的，需要很多，因为在这个年轻姑娘——假设她叫马利娅——怀孕前的二至三个月里，还会有很多的丽莎和叶卡捷琳娜相继结婚。这样的搬迁只不过是"不习惯"，我们不习惯"见到"而已。但"我们不习惯"与"异端邪说"是两回事。而且，不难理解，即便按我说的做了，也不会像安东尼大主教设想的那样闹出什么乱子来，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以后，这一切只许秘密地，在私下里进行（"四周张挂皮革以为掩蔽")；而且正是为了牢记这一条惊人的律法，个别洞房（在壁龛中？在墙边？在唱诗班后面?）才应该在四周张挂皮革，张挂兽皮，只把棚顶打开，以便连接教堂的空气。我的想法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既然这里的一切全是宗教，那么，当然一切都应该是含蓄的，得体的，不能有伤风化。一切都应该符合夫妻生活习惯：纯洁的家庭和高尚的家庭，比如牧师的家庭，并不会因为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辱没门风，有伤风化，只有女儿出嫁（"招女婿上门")，才会使家族人丁兴旺，生生不息。为什么我们的东正教教堂——里面做祷告的成家者当然多于单身者或守寡者——在形式，在类型，在精神上不朝这样

的家庭靠拢，而是偏要朝孤独的院长大人的住宅靠拢?!

赫拉波维茨基语焉不详。

而我的想法却一清二楚。

※ ※ ※

尘世没有完美……

甚至没有完美的教堂……

(阿尔波夫的来信，就其罪过而言，堪称可怕)

※ ※ ※

难以形容的泪水夺眶而出时，什么都想表达得简单粗俗，也顾不上这有可能贬低对象，尽管从压力的角度来说，比喻是准确的：

痰已经把嘴塞得满满——却不许吐出来。可以加入老年人行列了。

人天天吃，月月吃——却不许去一趟“那个地方”，只能憋在肚子里。

你昨天喝，今天喝——却还是不许去一趟“那个地方”……

这就是处女状态。

——我喘不出气！我撑得慌!

——不行。

这就是出家修行。

它究竟要干什么？你的胃肠，你的内脏已经撑得厉害，你的大脑已经被进入血液的尿毒感染，你的胃已经被尿毒感染，你的整个肌体的组织已经开始坏死，它还在说：“哪儿也不许去!”不

可思议的是，它竟然得到了尘世，国家，法律的认可，而且不是作为个人现象和特殊现象，而是作为某种标准和规则，作为“基督教生活的样板”。

——我坚持不住了!!!

——不行!

——我要死了!!!

——请便!

难道，难道这是真理？难道这是宗教真理？难道这是天国在尘世的真理？

姑娘们啊，姑娘们！站稳自己的脚根吧！把你们送到人世的是肚子，而不是头脑：你们要保护的是生命之树，而不是埋藏在地下的树的化石。

保护生命之树吧——你们是它的“手持宝剑”的天使。不要放下这把宝剑。

（在叶·巴诊所）

七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的头抬不起来，手抬不起来，几乎什么都“抬不起来”，只有咀嚼食物时，才勉强可以看到腮帮子在动——君不见，他们对女人已经没有“企图”，已经乐于独身。

这样，祖国满意，天国高兴。

大家很惊讶：

——他们确实不近女色，无论明处还是暗处。

于是称赞他们。吹捧他们。美化他们。说他们是“人间的活神仙”。

老人们咀嚼着稀粥微笑道：

——我们确实不近女色。我们要为十七岁的少女和二十三岁的少男做一个永久的榜样，鼓舞他们克制情欲，不要放纵自己。

真高兴，地球都要手舞足蹈了。

（在叶·巴诊所）

※ ※ ※

我怎能不像老伴那样死去呢，我怎能不死在老伴死去的地方呢。

我又一次成为东正教徒。

（叶·巴诊所）

※ ※ ※

……你毕竟还是渴求名气，渴求承认，渴求韧性的。这是一条蛆虫，如脚汗，似耳屎。总是发痒。总是有臭味。而耳朵是好的。脚也是好的。需要把这个讨厌的脏东西严格圈起来：唾弃它。

令人惊讶的是，娜杰日达·罗曼诺芙娜，奥尔加·伊万诺芙娜（勒奇的妻子）和“朋友”从来就对名气不感兴趣，哪怕是一丝一毫。“无所谓。”就凭这一品质，就凭她们没有那些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缺点，我对她们刮目相看。

※ ※ ※

爱一个幸福和伟大的祖国并不难。难的是在她弱小，屈辱，愚蠢，甚至有罪的时候，我们依然爱她。难的是在我们的“母亲”喝醉，撒谎，一身罪孽的时候，我们依然不离开她。这样还不够：当她最终死去，被犹太人啃得只剩下骨头，谁能在这堆人人唾弃，没人需要的骨头旁边哭泣，谁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会这样的……

（整理书籍时）

※ ※ ※

蜂蜜与玫瑰……

玫瑰之中—— 一个婴儿。

“上帝派来的”，——世界说。

“不”，——循规蹈矩的长老们说，“他来自恶魔”。

但世界已经不再相信他们。

（在叶莲娜·巴甫洛芙娜诊所）

※ ※ ※

青年人需要快乐，老年人需要安宁，姑娘需要出嫁，已出嫁者需要“第二次青春”……永远是互相碰撞，永远是闹闹哄哄。

生命来源于“不稳定的平衡”。假如平衡到处都是稳定的，也就没有了生命。

但不稳定的平衡是一种惶恐，一种危险，“对我不利”。

世界永远是惶恐的并因此而获得了生命。

※ ※ ※

其实质为永恒幸福的这些“太阳城”和“乌托邦”是怎样的无稽之谈啊。这实际就是彻底的“稳定的平衡”。这不是“未来”，而是死亡。

（送维洛奇卡去里西诺，火车站）

※ ※ ※

任何不和谐都将消亡。

太阳升起并晒干一切。“冰雹敲打着窗户：自由，平等，博爱?”——

“啊是的！这冰雹还击打过多少人啊!”——“令人震惊。奇怪的现象。难以置信。何处能读到它的历史呢?”

※ ※ ※

我何必要一个劲儿地挖苦多布钦斯基家族的人呢。难道他们不愿意做莎士比亚？要知道我，说老实话，气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不做莎士比亚”——我气的不是他们的题材，而是手法，样式，风格。但“何处去寻找莎士比亚呢”?难道因此别人都“不能活了”吗?

我身上有多少扼杀人的东西啊。

又是沙漠。

每个人都要活，多布钦斯基也一样。难道不是我说的：“一根头发也有理念”（据柏拉图），理念——“什么也不是”，甚至不是否定和缺点？上帝的丈量尺度不仅仅有俄里，还有厘米，而且“厘米”跟“俄里”一样需要。人人都活着。“摇摆着肚子”……那么，就由他们去吧。我要做的是欣赏，而不是仇恨。

我在莫斯科的休闲公园里欣赏风景，看着一艘小小的汽轮。一个休闲者把两只手搭在另一个休闲者的肩膀上，说：

——就一个人——谁也没有！

然后又嘟哝一句并高声喊道：

——想像一下吧：一个人——谁也没有！

这是他讲的，显然，“是昨天到的那里”，“自己人”一个也

没碰到。

他在自己的快乐中显得如此有艺术趣味，如此可爱，以致要“找个伙伴同行”，以致我几十年不能忘怀，以致我当时能喜欢他，爱他——这是我身上善的一面。而“文学”——来自魔鬼。

（写作论火灾一文时）

※ ※ ※

人身上的一切都被描绘得清清楚楚，都被划上了句号，除了性器官。它们仿佛其余的东西旁边的省略号或模糊性……与另一肌体的省略号或模糊性相接触，相交融。于是——双双变得清楚明了。它们丑陋不堪的外表（人人都抱怨之）和意犹未尽的瞬间的亢奋（性交体验）莫不是就来自这未完结性？

似乎上帝曾有心创造一次性交：但没有完成自己的动作，而把它的开始给了男人和女人。于是便由他们完成这一原始动作。它的甜蜜性和不可抗拒性随之而来。

在“S”（即Sex，性）中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不言自明的：这就是诸多才能都与“S”有联系的原因。

※ ※ ※

漫不经心的人也是聚精会神的人。但不是针对期待和盼望的东西，而是针对其他和自己的东西。

要执着于自己的志向，不要左顾右盼。这并不是说要当瞎子。眼睛几乎可以无处不看，但心灵则只能专注于一种东西，永远不能旁骛。

※ ※ ※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人（永恒的语言学家）为它找到一个词——“死亡”！难道可以用某种方式称呼之？难道它有名字？名字已是定义，已是“我们知道什么”。可要知道，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在谈话中道出“死亡”时，我们仿佛是在晚餐的杏仁冻里跳舞或是问：“汤碗里有多少个小时？”犬儒主义。无稽之谈。

※ ※ ※

我如何看待青年一代？

没看法。没想过。

只是偶尔想。不过我一直同情他们。孤儿。

※ ※ ※

爱即苦痛。无苦痛者亦无爱。

※ ※ ※

有察言的才能和观色的才能。我们以此洞视人的灵魂。并非每个人都会听别人讲话。有的人能够听其言，揣摩话语之间的联系并有联系地对之作出回答。但他没听出“弦外之音”，“话中有话”，而灵魂的言语就在这里，且仅仅在这里。

阅读时也需要听声音。因此，并非每个“读普希金的人”都跟普希金有什么共通之处，只有谛听说话的普希金的声音，体会

一个活着的人所有的语调，才能与普希金产生共鸣。谁在翻书时听不见“活着的普希金”，谁就等于没读普希金，而只是在读一个代替他，跟他差不多，“有着同样的文化修养和才华，写着同样的题目的人”，但不是他本人。

由此看来，“科学院”版本的普希金是那么隔膜和嘶哑，完全被堆积如山的注释淹没，而温格洛夫① 的版本还加上了粗制滥造的插图和形形色色的学术集市。他们无疑是把抽屉里的灰尘倒在了普希金身上：他全身是灰尘，全身是累赘。他形象和灵魂的主要特征——惊人的简洁和朴实消失在版本的形象和外表中。毫无疑问，最好的，甚至也是唯一让人爱不释手的，是他的旧版本，纸张很厚，每首诗都另起一页（茹科夫斯基版）。还有生前出版的一些单行本。《北方之花》中的他的诗和戏剧评论也不错。我有 1831 年出的《鲍利斯·戈东诺夫》和两本刊有普希金作品的《北方之花》，还有茹科夫斯基的一个版本。再过三十年这些版本会成为无价之宝，而行家们将全盘模仿（当然没有当代新闻检查官的删削）它们的纸张、铅字、版面布局、字体、开本和装帧。

在这样的版本中，我们仿佛能听到普希金的讲话。那些从事“出版”和“研究”普希金并为之编写注释的人，他们的漠不关心导致读者无法通过印刷品聆听到作者的声音。当今的古典文学“出版家”跟被出版的诗人和作家之缺乏亲缘感，已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他们本该出版邦奇－布鲁耶维奇②，可他们却在出版普希金。”博览群书的“同事”穿着民主的衬衫和海獭皮领大衣，戴着法国帽子，抓住“本色的”普希金，把他高高举起（尊重），就像狗熊举起梦中的达吉雅娜，开始胡说八道。

狗熊跟达吉雅娜有多少共通之处，当今的注释者跟普希金就

① 温格洛夫（1855～1920），俄国文学史家，目录学家。
② 邦奇－布鲁耶维奇（1873～1955），历史学家，新闻出版家，布尔什维克活动家。

有多少共通之处。

对神秘而艰难的出版业来说，阿基米德① 的一句话是颇为恰当的：Noli tangere meos circulos。②

有否可能让实证主义者哭起来？

这等于想像“田牛骑在骑兵身上”。

跟他的谈话到此为止。永别了。

实证主义在自己灵魂的秘密中，或确切些，在自己没有灵魂的核心中：

让没有感觉的躯体
处处均匀地腐烂。

实证主义是垂死的人类的哲学陵墓。

我不要它：我不要它！我唾弃它，我憎恨它，我害怕它！！！

（在马车上）

如果让费洛索弗夫不穿套鞋通过湿漉漉的柏油马路，他会咳嗽一个星期；我不明白，他算什么工人的朋友？

反基督徒自称是“基督的朋友”，犹太教徒称基督徒是“基督的朋友”，教皇称反基督徒是“基督的朋友”，而普鲁东③ 称洛希尔④ 是“基督的朋友”。如此下去，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世界将瓦解，将失去界限和联系：因为它失去了碰撞。碰撞是不可

---

①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古希腊学者。
② 拉丁语：别侵犯我的领地。
③ 普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④ 洛希尔，18世纪法国银号老板，创立了洛希尔财团。

或缺的：因为联系是通过碰撞而保持。然而其实，世界什么也没失去，因为他们所有的人，从费洛索弗夫到教皇，恰恰只是“自称”，而实际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教皇还是反基督徒的敌人，而反基督徒还是他的敌人；费洛索弗夫还是平民的敌人，而平民还是费洛索弗夫的敌人。至于流言蜚语——悉听尊便。

流言蜚语，究其实质，乃是“精神寂寞与苦闷”引发的言语。

我们的信念不是我们的舌头，而是我们脚下的靴子。

破旧不堪的鞋，草鞋，擦上油的鞋。请这样将自己归归类。

※ ※ ※

是的，我们的这个历史有点像贫民窟，我们的整个生活也有点像贫民窟。这里既有当局，也有公民。

（在火车上）

为《家庭问题》收集材料（并加“注解”）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啊！这是我的文学“矿石”，我之所以要对这些“矿石”进行挖掘和提炼，目的在于救助家庭。正如《教育的黄昏》——目的在于救助儿童。字里行间充满了恳切的爱意。真不知他们有什么理由说：“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什么都不需要。”

（火车上：想起自己的批评者）

※ ※ ※

文学（出版物）挟住了人的自尊心。人人开始怕它。人人开始指望它。“这些骗子手，竟然还要颁发蒙吉奥诺夫奖。”文学的

影响力就是这样形成的。

只要人们对文学不屑一顾，它的影响力就会顿时化为乌有。只要人们背转身去，把目光投在实际问题上，而不是标有“第六王国”（拿破仑论出版物）字样的地图上，“第六王国”就会立刻变成一棵枯树。

※ ※ ※

人们像花儿一样枯萎，凋零。

※ ※ ※

秋天——什么也没有。这“没有”真奇怪。这秋天真可怕。

（在马车上）

※ ※ ※

上帝用一只沉重的熨斗熨人。

…………

熨平心灵的皱纹。

…………

所以人们说：惧怕上帝吧，不要作孽。

（夜间在马车上）

※ ※ ※

人类的脊背驼得真厉害，人类的脊背驼得真厉害，人类的脊

背驼得真厉害……

一个伟大的古代老人，光着脑袋，背部高高隆起（苦难，忍耐），呼哧带喘地走着，走着。他的皮肤已经变黑，腿上伤痕累累……

年轻人跳舞为啥要弯腰驼背？“我们是最后的舞者”，“我们”就是一切，一切属于“我们”。

那好，跳吧，先生们。

（鉴定古币时）

※ ※ ※

在“那个世界”里，我们将不会说话。

欢愉将洋溢在我们的心中。

欢愉永远不会说话。

※ ※ ※

我一直期待着格利高里·斯皮里多诺维奇·彼得罗夫能写出一本自传。要知道他是一个出色的人。

当然，柯罗连科比他更出色：他出版的那本书其实就是他的自传，只是蒙着一层优雅的面纱：《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格利高里·斯皮里多诺维奇·彼得罗夫为何不写？拥有米哈伊洛夫基－丹尼列夫斯基的不止一个库图佐夫，巴克莱·德·托利也有可能拥有。“我们的同时代人”为何不能将军事统帅和传记作家集于一身，比如说，把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揽在怀里，向他口授？

——我不需要利维乌斯，——“同时代的”亚利山大大帝说，——我有足够的写作能力，自己能够描写自己的东征印度。

坐成一排的牧师们正在吃鲟鱼。一个哲学家走了进来：

——唉，没办法，先生们……也就是神父们……整个世界没有一个暖和的地方……冻死我了……到你们这儿烤烤火……上帝保佑你们：我原谅你们的古板，原谅你们的一切愚蠢，我不看你们的鲟鱼……一切都合乎人的弱点，也许是暂时的弱点。你们是伪君子……在“摩西的宝座”上坐着吧：世界上还没有你们这样的宝座。曾有人看破你们的虚伪，把你们连同“宝座”一起推翻在地……我不然：为了无法取代的“宝座”的意义，我要闭上眼睛不看你们，并把头放在“宝座”的脚下……

※ ※ ※

关于一个叫雷列耶夫的人。他当过副官，据说，“每天早晨都要步行去亚历山大二世陵园，为皇帝祷告——风雨无阻”。他是个平平常常的人，甚至还拥有一个跳芭蕾舞的法国女人，跟她过了一辈子。是什么驱使他去的？是谁强迫他去的？而我们即使是为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娜佳葬在斯摩棱斯克公墓），也没能做到天天祷告，或是每星期祷告一次，甚至每个月祷告一次！在我们的编辑部听了这个故事（马斯洛夫讲的?），我大吃一惊，久久不能忘怀，至今记忆犹新。“死去的皇帝不如一条活着的狗”——这是我读过的一篇阿拉伯故事中说的，意思是说，死去的“救星”已经不能为他（雷列耶夫）带来任何好处。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显然，这是一种依恋，一种记忆，一种感激。我们认为，这一半是跟去祷告的人有关系（他大约在1903年去世，我们在编辑部的话题就由他的去世引起的），但还有一半明显地是跟君主有关系。由此得出结

论：显然，君主不光是一个“身穿制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的人，他还是一种深刻而崇高的人性的化身，只是由于离我们太远，我们对其人性的一面一无所知罢了，因为除了“制服”，没给我们看过任何东西。例如，关于拿破仑三世的所有故事都是令人讨厌的（也就是说，这些故事里的他是令人讨厌的）。但他并不是个“名正言顺的皇帝”——是抓住权力不放的本能使他的威严，魅力和真实荡然无存。他希望安顿好皇后和孩子们。“名正言顺的皇帝”是不需要这些的：他永远“被承认”，完全不容置疑，凡是世上第一个幸福的人亚当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和幸福，他都拥有。他一生下来就看得见天堂的苹果，他甚至用不着动手去摘。这是一种我们完全体会不到的心情。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对他还有什么可祝愿的呢？从自然心理来说，我们祝愿人人幸福，人人快乐。当我们欢庆节日，当我们爱情成功，我们总是希望周围的人能分享我们的幸福，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有多少人。因此，一旦遇到怀疑，“名正言顺者”的好心情自然会顿时化为乌有。因此，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其实质即在于不容置疑。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所有冷酷的皇帝都遇到过“非议”：伊凡雷帝受到过大臣们和王位觊觎者们的非议争论；安娜·约翰诺芙娜受到过最高委员会的非议——起因是各自的权限不明确；叶卡捷琳娜二世受到过非议（其中包括诺维科夫等人）——起因是“登基的理由”不清楚。这些问题至今我们仍不甚了然。因此，在君主制度下，“爱戴皇帝”的确至关重要，这是“公民的头等义务”：不是说非得赞美和崇拜皇帝，而是说，不这样就会“坏事”，“饭就会夹生”，“樱桃就会遭冰雹打”，“田地就会遭霜冻”。这是全世界和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可以证明“反对派”和“推翻派”，亦即那些意欲夺取政权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人为善的。他们已经在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冷静的批评和争论，而嘲笑和挖苦他们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们清除了斯

特拉霍夫（批评家），把涅兹洛宾－季亚科夫骂得狗血喷头，简直等于是对他实行了“文学流放”。“绝不许侮辱反对派的尊严，反对派的真理”——半个世纪的文学命运（在我们这儿）全建立在这上面，文运和赌注也全压在这上面。“凡是对反对派忠心耿耿的人都能得到勋章”，就连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人也能得到勋章。如此忠心，如此热情的人中有皮萨列夫，扎伊采夫，布拉戈斯维特洛夫：后者在文学界简直是个无法形容的奴才，竟然还雇了个黑人跟班，立侍左右，生活奢侈，挥金如土。听说与他关系亲密的人也跟着借了光，在他的杂志上写起文章来总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动不动就口出狂言，甚至不把普希金放在眼里，尽管就文章本身而言，只够培训班的水平。然而，不管是奴才也好，不是奴才也好，既然“行了举手礼”并站到了“阵地前沿”，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忘乎所以，得到嘉奖和提升。这是什么？这是宫廷的一个“直辖省”，已经做好接管期待已久的政权的准备。回过头来，让我们触及一下问题的实质：“别把我们从梦中叫醒。”“只要你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处处正确，永远正确——我们就会给你幸福。”“只要你承认我们，爱我们，说我们是半人半神——我们就会甚至比神还好！”约翰骑士团，所有的约翰骑士团，都在“克隆施塔得的约翰神父”身边，只是这次不是约翰神父，而是热里亚波夫。有一次我撰文说热里亚波夫是个大傻瓜，不料这下竟莫名其妙地把卑躬屈膝的斯特鲁威也给惹恼了，尽管他在维尔格日斯卡雅那里说的有关革命家的话，是我从来都不敢讲的。“你都知道些什么，放在脑子里就够了，要把劲头儿用在广场上”（“乌拉”）。斯特鲁威对我大发雷霆，要求把我从舆论界赶出去，就因为我说热里亚波夫是个大傻瓜。“陛下永远聪明”——指的是路易十四或是人所期待的，呼声很高的，早已受到称颂的克伦威尔。回顾这一切，你会发现，这是全世界的心理，全世界的需要，全世界的焦点；人只有在处于幸福和忘我

状态时才是善良的，“才会表现出真诚和爱心”。既然如此，与其指望明天，崇拜昨天岂不是更好？与其动用刀斧做成一个木偶——对肉眼来说是“木偶”，而对虔诚的心来说是圣像——为何不把我们出生时在自己家里找到的那个放在“贵宾席”上？

尤其是我们这些手中无权也不想有权，只热爱诗歌和星空，显微镜和古币的下层人——很清楚，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为“将来的国王”，“热里亚波夫一号”充当马前卒，去反对“现在的国王”。

“跟我们没关系。”就是说，我们不必操心，只管做自己的事好了。之所以说，原因即在于此。“走错了胡同，没找到要找的房子。”“转回去吧。”“做不成客了。”

※ ※ ※

别以为你们比我“道德”。你们既不道德，也不缺德。你们只不过是成品。成品商店。我要拿一根棍子，把这些成品砸个稀巴烂。

瓷杯道德不道德？可以说它干净，着了色，画了“花”，仅此而已。但我更喜欢狗窝里的“沙利克”。无论它有多脏，我都愿意跟它一起玩。而跟你们——我没那个闲心。

(格尔申逊来信，说斯托普涅停止来我家是因为我“反道德”——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文章里?)

※ ※ ※

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才华的犹太人，但也不要指望在他们中

间找到天才。须知，他们一直赞不绝口的斯宾诺莎是笛卡尔[①]的模仿者。而天才是从不模仿且不能被模仿的。

一种是才华，另一种至多也只是才华而已，它们来源于跟神性的联系。“根据这一联系”任何人都没丧失某些才气，犹如神性或远或近的反光。但从另一方面讲，一切又都属于上帝。犹太人因自己的上帝而强大，也因之而弱小。他们全都摇摆不定：上帝伟大，但犹太人，甚至预言家，甚至摩西，并没表现出非犹太人有时所具有的那种超凡的个性和自由的“我”。在康德[②]、笛卡尔和莱布尼茨[③]面前，所有犹太思想家都只是些“钟表匠”和“修理工”。从海涅[④]到艾兹曼[⑤]，在莎士比亚的光芒面前，犹太作家算什么呢？在他们的自由里永远出不了巴枯宁[⑥]的雄姿。“慷慨大度”和“英勇无畏”与犹太人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全都戴着锁链面对上帝。这锁链保佑了他们，但也束缚了他们。

……他带我参观他的别墅。通过卧室时，我看见一张双人床。我问：

——莫非你们住在这儿？

——直到生命结束！——神父坚定地说。

他女儿出嫁三年了——出嫁时已毕业。

他很喜欢捕鱼（在海边）。有一次遇上暴风雨，而他却在十俄里以外的地方，急得老伴儿在岸边到处求助：

——救救孩子父亲吧！救救孩子父亲吧！

---

① 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
② 康德（1721～1801），德国哲学家，学者。
③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
④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
⑤ 艾兹曼（1869～1922），俄国作家。
⑥ 巴枯宁（1814～1876），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革命民粹派思想家。

那些芬兰佬一动不动，不敢去（还是渔夫呢）。

——我给你们十卢布！

那些人这才上了一只大船。傍晚时把神父带了回来。她给了他们一个卢布，没跟他们讲话。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

她自己喜欢采蘑菇。为了这，她在头上系了一块头巾，打扮成农民模样。早上十点钟时，已带回满满一筐白蘑菇。

你如果问她：

——在哪里采的蘑菇。

——那儿——她会含含糊糊地挥挥手。

她永远不会告诉你在哪里。

有一次海边下雨，我匆忙赶回家。天色已晚。我看见前面有一把伞，伞下站着一个人。那人正望着大海。大雨如幕。“他在这儿看什么？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喝茶时我把这事讲给神父听。他笑了起来：

——这是我父亲。从维亚特卡来做客。从未见过大海。特别喜欢水。一见到大海就流连忘返。也是神父。七十四岁了。

他还“自我安慰”呢。就是这个人。也许，还记得伊洛瓦伊斯基的话，他说：

——我对他们讲：“请你们摘录维克勒夫①。我要继续写我在神学院里没有完成的论文。现在空余时间多了，我要把它写完。”他们摘录好了。九大卷。冬天我要开始读。

他是彼得堡高等（技术）学校的神学教授。没有一个人上他的课。他对学生很宽容，自己索性也不去上课。只要有薪水，名誉和住房。他很喜欢得到女子学校的邀请。他在那儿兼课，就是

① 维克勒夫，14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家、神学家。

说，也能得到薪水。

他的别墅大约值一万，也就是说占地面积很大。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果树林。两处房子，一处自己住，一处出租了。我去过他的浴室。浴室算不上舒适。浴床很短（躺，卧）。这算不上什么设备。

“他要维克勒夫干什么?”我在内心笑道。我想起了恺撒大帝[①]：“宁做乡下第一，不为罗马第二。”尽管如此，神父还是不想改变自己，他依旧愿意做一个有学问的大学教授，一个对英国改良有着特殊兴趣的神学家。

※ ※ ※

根本没情绪同斯宾塞争论：只想揪住他整齐的大胡子，给他扯掉一半。

能在舞台上见到如此众多的“尼古拉时代的旧官僚”（在奥斯特罗夫斯基[②]和其他人的剧中），简直令人惊讶。俄国人没有注意到，斯宾塞跟他们所有的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的《综合哲学》仿佛是一个分成若干“科”和“处”的局，而他就是这个局的局长，而且有革命的要求。

上七年级时，读过他的《论智育和德育》，还有其他什么东西，作者的愚蠢简直让我（还是个中学生）大吃一惊。我不是说他的个别思想愚蠢，而是他的腔调，他的内心愚蠢。从第一页开始，他就摆出一副给一个假想的笨拙的母亲讲课的架势，尽管我确信，随便找一个英国女人都比他聪明得多。他给这位母亲强加了诸多他所虚构的，也就是他本人所具有的，而英国妇女却根本没有的愚蠢品质。他给她上课，高高地挥动着食指。（中学时）

① 恺撒大帝（公元前102～44），古罗马独裁者。
② 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

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他怎么如此大胆！他怎么如此狂妄！"尽管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凭眼睛，最后是凭合理的想法看到，感到，知道：当痛苦不堪和萎靡不振的母亲们还在为自己的孩子吃苦时，这个蠢货还不知道苦为何物；当她们知道并看得见孩子的模样和体形时，斯宾塞（当然是未婚的）还只是见过《不列颠插图》中的孩子，他的整个"智育"全是用他那一点儿也不聪明的头脑凭空杜撰的。例如："不要阻止孩子，因为他们是无法阻止的；不要对他们的错误想法和有害愿望加以干涉；就让他们去碰壁吧：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些想法的错误和由此产生的痛苦的结果，他们会迷途知返的，那时，这将成为最牢靠和最难忘的教育。"他不厌其烦地对假想的愚蠢的母亲阐述着。"比方说，如果孩子要玩火，就让他烫一下自己的手指好了"……比这复杂一点的东西怎么也进不了他的马脑壳。然而，请看，八岁的男孩开始手淫，用手捏或其他方式偶然体验了它的快感：怎么办呢？母亲应该等待，等到他二十岁时再"迷途知返"吗？斯宾塞对孩子的不良习惯一无所知！当然，《不列颠插图》中的孩子不手淫，但母亲是知道的，并为此而苦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六到八岁间，我喜欢做的事是：当火炉烧得正旺，也就是柴禾已烧掉一半，而煤已开始发红时，我走到近前，从腰间撩起衬衫（带花点的粉红色布衬衫），做成一张帆。也就是说，用牙齿咬住上边，用手指牢牢抓住帆的下角，严严地遮住炉孔。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把它立刻吸进去，但也就在这时，它变成一个漂亮的弧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它被烤得滚烫，通红，我躲闪不及，帆在掉下去的时候，碰到了我的胸部和腹部——烫伤了皮肤。通红的颜色和弧形的美吸引着我，我并没想过，它随时可能燃烧起来，我是站在死亡的边缘。我相信，一切都是由火点燃的，而热并不能导致燃烧，除非"擦着火柴去点它"，否则衬衫是不可能起火的："燃烧的方法只有这一种"。当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总是喜欢

这么做。然而，由于忍耐不住，我在妈妈在场时已开始迈出“第一步”了。她始终很累，没有注意到，也就无从给我讲解我的行为的危险性，长此以往，其后果可想而知。而根据斯宾塞的观点，“是根本用不着讲解的”，任凭我被烧死。不过那位母亲是“目不识丁”的，而他可是写了洋洋十大卷。唉，碰上这样的傻瓜让你为之奈何，不揪他的胡子才怪呢！

（早晨读罢报纸以后）

※ ※ ※

“简直俗不可耐！”

关于果戈理的《结婚》，在某人转述的一次谈话中，托尔斯泰作了这样的评价。

这句话在我心里装了一年，我一直在想：多么精辟啊！不仅正确，而且充分，因此只须给它打上一个“句号”，用不着继续发挥。

整个果戈理，除了《塔拉斯》和那些小俄罗斯题材的短篇作品，从认识和内容的角度来看，确实俗不可耐。他是形式方面的天才，即“怎么”说和“怎么”叙述方面的天才。

他幻想着展示“一个庸俗者的庸俗”。让我们做个假设。尽管主题很怪。为什么不做些有意义的事呢？难道世界上找不到有意义的事吗？但占据他的，长期占据他的，他整个成熟时期占据他的，只有一个庸俗。

令人惊奇的志向。

列宾① 讲的一个故事震撼了我。这个故事到了我这里不是二手资料也是三手资料。假设是二手资料吧（即他是从一个认识果戈理并有幸到他家做过客的人那儿听来的），是他原封不动的转述：

“在我们这些尚无任何作为和任何表现的青年人中，果戈理在罗马不但比所有人年长，而且因负有盛名而最受人们推崇。所以我们，几个朋友，每周都要到他家聚会一次（假定是在节日）。但这些聚会，我们的崇敬，是极其难堪的。果戈理接待我们总是居高临下，态度傲慢，虽然他给大家沏茶并吩咐端上一些小吃，但由于他对大家的冷淡、古板和傲慢态度，我们什么也吃不下。结果，这成了一种夸张的，不愉快的喝茶仪式，活像一些小人物面对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而且，他的高傲和冷场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以致我们全都感到下一次（假设是星期三）必须还来，再喝一次这清淡而冰凉的茶，再拜见一次这位智慧和语言的太阳，然后再离开。”

列宾的原话我不记得——大意如此。当列宾说着（在路上，在别墅附近，刮着风）并一个劲儿地拉紧自己的斗篷时，我好像也在惊恐中冻僵了，因为我感到，果戈理的主要秘密似乎破土而出，展现在我的面前。他整个是一个讲究形式，生硬古板，一本正经的人，就像一个手执双枝烛台和三枝烛台的布道者，板着面孔的“大主教”：这样那样地施礼，说着这样那样的技巧高超但内容空乏的“话”。我真不敢保证不说出最后一个词：白痴。他同时也是一个坚定不移，不肯转弯，仿佛内心失去一切理性和一切意义的人。“我写”——仅此而已。好极了。但意义何在？白痴瞪圆眼睛。不懂。“话”是很妙。这样的“话”谁也说不出来。而且他看得很清楚，的确是“谁也说不出来”。于是乎，为一种

① 列宾（1844～193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

毫无意义的陶醉所陶醉，为一种毫无意义的高傲而高傲。

——呸，魔鬼！走开！……

可人体模特眨巴着眼睛。冷冰冰的玻璃的眼睛。他不明白，“说”的后面还应该有点儿什么，“说”的后面应该是“做”，应该是大火或洪水，恐怖或欢乐。这他不懂，他给“说”镶上最后一层花边，把最后一杯该死的冷茶分送给自己的“崇拜者”。在他愚蠢和庸俗的头脑里，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科长”，他们有义务为他这位大局长……说错了，是《死魂灵》的作者……唱赞歌。

——呸，魔鬼！呸，你是个怎样的魔鬼啊！灵魂里带有污点的巫婆，冰冷的死气沉沉的巫婆，玻璃一样透明，身上什么也没有的巫婆！

什么也没有！

虚无主义！

——走开，不干净的！

他的一张老脸在棺材里笑道：

——可我并不存在，从前也不存在！我只是露了一下面……

——该死的千面人！走开！走开！走开！真可怕，用什么来抵御你呢？

“信仰”，——心提示道。

对一个心中埋藏着信仰——对人的灵魂的信仰，对自己的土地的信仰，对其未来的信仰——的种子的人来说，果戈理确实不曾存在。

从来还没有比可怕的人，比人类更可怕的东西进入过我们的土地。

※ ※ ※

多神教是早晨，基督教是夜晚。

每一单个事物的，整个世界的。

莫非早晨不再来临？莫非这是最后一个夜晚？

※ ※ ※

锹是铁的。只有用它才能除掉杂草。

这就是惩罚和监禁的根据。

只有不喜欢人，不怜惜人，不爱护人，才可以丢弃这把铁锹。

所有的宗教中都有对地狱和天堂的设想和期待，就是说，这是全人类的内在声音，宗教声音。“流氓无赖”，“杀人越货”——连上天都不会保护。

只有“新基督徒”和社会民主党人才会保护这些东西，当他们受到惩罚没有饭吃的时候。然而且慢：一旦他们在餐桌旁坐下，他们就会立刻要求将妨碍他们把腿放到桌子上的人送进监狱——不管他是谁。

（工作时）

※ ※ ※

喉管被割除的他以四百万种状态坐在深深的沙发里。

是这样的：我走进去，问瓦西里：“可以吗？”得到他的默许后，我走进书房。不，是走近书桌。不，是扫视了一下桌上的两

三本书和纸，然后转过身，开始慢慢地往外走……

一双眼睛落在我身上：在燃烧着的壁炉侧面，在屏风之间，一张沙发若隐若现，他坐在上面，是那么不显眼……

假如他能说出一句话，一个想法，一个愿望，那么明天，整个俄罗斯就会听到。这句话会让所有的人回过头来，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但他已经三年没说话了。七十八岁高龄。

我吻了他的头，这满头白发，可敬可亲（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头……在他的眼睛里，在他头部的转动中，我看见了十二年来始终如初的那种善良与温和，才华与气质（奇怪!）。他身上有缺点（可以理解），但他身上没有平庸，无论在哪些方面，甚至在脖子的转动中。他全身充满朝气，且始终充满朝气；就是现在，面对死亡，他依旧充满朝气，依旧泰然自若。

他挪动一下笔记本，潦草不清地写道："治病时，我只顾调皮。而我知道，我要死了。"我们都会死的。然而，只要喉管还未被割除，我们就要说话，写字，"衰老"。

他完全是平静的。没有痛苦。如有痛苦，他会喊叫的。啊，那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他的死没有痛苦，他的脸色也是镇定的，安详的。

他又拿来笔记本，写道："要是托尔斯泰在我的位置上，是不会停止写作的，而我不能。"

他问起托尔斯泰最后的作品。我说不好。他写道："甚至哈吉·穆拉特①，反对"上尉的女儿"②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操……"

---

① 哈吉·穆拉特（18世纪末至1852），高加索山民解放斗争的参加者，阿瓦尔汗国统治者之一，多次打败俄国军队，1851年投向俄国人，后企图逃走，被击毙。托尔斯泰著有同名小说。这里指的就是这篇作品。

② 普希金著有同名小说《上尉的女儿》。

这是他喜爱的一句话。他喜欢俄罗斯的粗话，但在温和的时候，他是面带迷人的童稚的微笑说这些话的。“民族宝库”。

他整个是民族主义者；啊，不是今天的党派意义上的！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沃罗涅什，他，一个县立学堂的老师，一个才华横溢、充满喜悦和希望的青年，就是从那里来，从那里走向俄罗斯，走向荣誉，他爱这俄罗斯的荣誉，立志要助俄罗斯一臂之力。他的“未入门”时期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自由主义的鹦鹉学舌者还少吗？当他像个中世纪骑士，将自己的“名气”和别人的“爱戴”系成一个结，送进路边的小礼拜堂，面对圣像祷告一番，然后带着一种全新的感觉走出来的时候，他身上表现出一种感人和美好的东西。“我不应该为自己的名声，而应该为俄罗斯的名声而活着。”他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些断断续续的话，他好像是自言自语，但又当着我的面，这些话鲜明地勾勒出这个人的形象。

（关于阿·谢·苏沃林①，1912年5月；写在一张灰色信封的正面。关于哈吉·穆拉特，根据苏沃林字条原件证明，不含有“俄罗斯的粗话”，但此处仍根据我的印象和谈话三分钟后所做的记录。不过，苏沃林确实喜欢“粗话”。有一次，他对我谈起报纸，很激动，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说：“我爱自己的报纸胜过自己的家庭，（又一次激动起来：）胜过自己的妻子……”由于对金钱，对社会地位的爱不可能胜过对妻子儿女的爱，所以，这句话的含义只能是：“跟俄罗斯共同的办报工作相比家庭和妻子对我来说更宝贵。”这深藏于内心，近乎呐喊的东西，我称之为一个报人的“骑士礼拜堂”。）

---

① 苏沃林（1834～1912），俄国新闻记者和出版家。

※ ※ ※

众所周知，俄国人善变。有一次，他们竟然变成了大仲马。瞧这位先生，带着一个真正法国人的感觉，启程去研究俄罗斯及其奇怪的风俗。当在边境上问及他的姓名时，他谦虚地回答：

——博博雷金①。

博博雷金身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通行无阻……

我无法想像让博博雷金“犯愁”。

所有的人都勉为其难，只有博博雷金总是轻松自如，易如反掌；于是我想：再难消化的东西到了他这里也只是“小菜一碟”。

※ ※ ※

我扛着文学如我的棺椁，我扛着文学如我的哀伤，我扛着文学如我的厌恶。

心里没有一点儿悲剧感……母亲和儿子淹死了。换个人会为此而发疯，会忘记墨水瓶在哪儿。而他只是给普鲁东写了一封“凄惨的信”。

（赫尔岑）

普鲁东对他来说毕竟是个“出身显赫的外国人”。俄罗斯就是这样，没有“外国人”会喘不过气来。

---

① 博博雷金（1836～1921），俄国作家，90年代移居国外，著有中长篇小说百余部。

——罗斯被遮盖得太严实了，太闭塞了。应该在天上划开一条缝。事实上，“对外国人的思念”是不是过于辽阔的地域乃至文明对每个人的弱小心灵长期压抑的结果呢？

——“喂，给一个德国人吧。”

很自然。“外国人”是我们的抗议，是我们的呼吸，是每个人想要保留在一望无际的罗斯中的“自己的脸面”。

——“看上帝份上，巴克尔，快来吧！”

仿佛昏迷中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在铁轨马车上）

※ ※ ※

这是个令人难忘的诗歌创作方面的博博雷金。

是的，他通晓各种语言，掌握所有的节奏，而且，可以说，文笔、思想和想像驾驭自如：论这些品质，他是不可限量的。

但灵魂呢？他没有灵魂：这是个衣架，上面挂着印度、墨西哥、埃及、俄罗斯、西班牙的服饰。最好是吉普赛的，可惜没有。他为读者展示的乃是一次服装大检阅。他自认为：“我多么富有啊！”而实际上，在这一切的下面，只不过是铁匠伊万诺夫打制的一根铁钉，简单，粗糙，没什么高明之处。

他的良心呢？别提这个问题。

（在区法院等书记员时，——关于诗人巴尔蒙特①）

① 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象征派诗人。

※ ※ ※

总而言之，揪作家的头发并没有什么不妥。

他们还是孩子：只是有些自命不凡，而且已四十开外。

牧师在中世纪没少揪他们的头发。活该。

中心是生命，生命的陆地……而作家则是小金鱼和鳊鱼，在它的岸边游来游去。陆地绝对不会因为金鱼摆尾而移动。

（早晨读罢报纸以后）

※ ※ ※

有心栽花，花偏不活。当我们朴素的罗斯以朴素和闪光的爱为《战争与和平》而爱上他的时候，他却说："这还不够。我想成为佛和叔本华。"但事与愿违，他既没成为佛，也没成为叔本华，只得到了四十二张照片：有正面的，侧面的，有肖像照，半身照，全身照。有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有穿短衫，穿长衫或其他什么衣服的，有扶犁和骑马的，有戴帽子的和"随随便便的"……嚯，魔鬼可真会嘲弄把灵魂出卖给他（即荣誉）的人。

"到底选哪一张照片呢"，——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说。结果是买了整整三张，总共花了十五戈比。

Sic transit gloria munei。

荣誉不仅仅不是伟大：荣誉恰恰是伟大之堕落的开始……

眼睛要看着教堂，看着世界，看着国王。

（写在名片上）

※ ※ ※

他天生是个爬行物。像地下的树根那样爬行。

(关于弗罗伦斯基)

空气是离他最远的一种元素。我想，他根本不会跑。他会绊倒。一切都要紧贴地面，或在地下。

(写在乌斯金斯基的来信上)

※ ※ ※

难怪读中学时“带商人”或“带吊车”的习题（三重规则）我不会解。

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越搞越糊涂……“让它们见鬼去吧！”我生气地合上书。

“明天抄同学的”或者“同学会提示我”。他们一直提示我。

好心的中学生。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偌大的俄罗斯，如果让我选一样东西留下的话，我会选中学生。在他们面前，就是“末日审判”也会碰钉子。吸烟——仅此而已，而且是清洁工给买的。世界上最合乎规矩的事。

(对清洁工——我们经常胡说八道，还不时开些小的玩笑，但从来不欺负她们)

※ ※ ※

我只是笑或哭。我是否进行过本来意义上的思考？

——从来没有！

※ ※ ※

忧愁是我永恒的客人。我是那么喜欢这位客人。

她的衣着既不华贵也不寒酸。她面容清瘦。我想，她就像我的妈妈。她没有言语或很少言语。只有外表。这外表既不伤心也不气恼。可我为何要描述她呢，难道找得到合适的语言？她是无穷的。

忧愁就是无穷！

她在晚上到来，在黄昏时到来，听不见她，看不见她。当你以为她不在时，她已经“在这里”。现在她既不反对，也不争吵，只是悄悄地给你的思绪加上一层自己的情调；这“情调”是无穷的。

忧愁是责备，是抱怨，是欠缺。我想，她一定是在那个晚上，即亚当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天堂的那个晚上来到人的身边的。从那时起她始终离他不远。始终“在这里的什么地方”，而当夜幕降临，她便悄然而至。

（区法院，等待书记员时）

※ ※ ※

社会革命党人中间有一些不坏的“女性征服者”，所以他们的日子才会过得很好。

（亲眼见到的两件事）

※ ※ ※

如果丈夫为死去的妻子哭泣，你就会凑近侍者的耳根，问：“他认不认识扎梅斯洛夫斯基?”如果侍者说：“认识，他在别人的陪同下来过我们这儿。”你就会去分局通知警察，这位先生在家里搞的是假葬礼，他实际是在利用夜间网罗暴徒，制定抢劫市长官邸的行动方案。死者其实还“活着”，就跟这伙人在一起。

报刊上的整个“诚实倾向”，或者说我们的“诚实，崇高和理想的”一切，难道不能这样概括其语气和实质?

是的……“别侵犯我的领地”。

（读完加里斯论《隐居》的文章后）

他说话相当规范：原来，他在发字母 E 这个音时，特别标准，也特别讲究，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好像是在“重估价值”。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们都想跟他合作。

※ ※ ※

犹太人问题没完没了。说起它，写起它，要比俄罗斯历史的封侯和市民会议阶段还要长。

怎样的“是”！怎样的“不”！

（区法院；写在别人递过来的一张名片上）

※ ※ ※

当代的实质是：把一切纳入规范、模式和套语中。大丈夫们

津津乐道。有了个叔本华，“悲观主义”便成了套语。有了个尼采，他的“反基督徒”便挂在了成千上万的马嘴上。感谢上帝，幸亏现在没人读福音书，否则它也在劫难逃了。

上了这艘贼船你就别想跳下去。

——您想一鸣惊人吗？

——想啊。

——别着急。我给您提供一个模式。

——可我要的是心。我要的是灵魂。

——对不起。除了套路，什么也没有。

——那就算了……不，我还是走开的好。还是过我的穷日子吧。

（写在马卡列夫斯基的名片上）

※　※　※

为什么人身上有这么多的铁？这是首屈一指的金属。

——为什么人不是用金子做成？

“金子是给天使的”。

但金钱能切割铁。这对金钱来说是一种痛苦。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怎样的快乐啊。

（跟一个牧师谈话之后）

要用指甲捍卫自己的爱，要用牙齿捍卫自己的爱。捍卫它不受理性的侵犯，捍卫它不受权力的侵犯。

只要你对爱坚贞不渝，上帝就会赐福予你。

因为爱是生命之根本。而上帝就是生命。

（去沃尔科沃的路上）

※ ※ ※

所有的女子学校，成功则培养修女，不成功则培养妓女。

“贤妻良母”——那是痴心妄想。

※ ※ ※

还是爱没有欺骗我。欺骗我的是信仰、文明、文学，总之是人。但爱我的那两个人，我却从没有看错，并不是说她们的爱使我心安理得，全然不是；但要求看到理想和真实的东西，则是一个人心里永恒的渴望。正是在这两个人身上，我发现了没有残缺的真实。她们灿烂的脸上没有一丝道德的“皱纹”。

假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的生活就会是完美的，我就会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用不着宪法，用不着文学，用不着漂亮面孔。

目睹人间之美好，并知道它对你依依难舍，这是神才有的福分。我一生中曾经两次——最后一次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拥有这“神一般的生活”。

※ ※ ※

有可能，我们的人民并不好，但他们是我们的人民，这是决定一切的。

离开“自己的”能往何处去？“自己的”之外是“别人的”。就是这个词决定了一切。不妨试一试在“别人的国度”生活，不妨试一试跟“外族人”一起生活。“宁要自家的一片面包，不要别人的一块蛋糕”。

※ ※ ※

死我无论如何不能承受。

如此度过一生，似乎死并不存在，不奇怪吗？这是最司空见惯和最平淡无奇的事。然而我却这样对待它，仿佛谁也不应该，什么也不应该死去。仿佛死并不存在。

最司空见惯和最平淡无奇的事，但我总是说："我没有见过。"

我当然见过死，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注意过那些正在死去的人。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不爱他们呢？

这就是我作为坏人的一面，恶劣和可怕的一面。此时此刻，我是那么恨自己，那么讨厌自己。

说实话，我从未直接跟教堂融为一体（无论童年，少年，成年）……我始终是其中的一名观众，一位站立者——想要祷告并未祷告实际已在祷告的人，一个评价者；（成年时期）我对教堂颇多好感……但这并不是，比如，"朋友"身上，她母亲身上的东西："我在祷告"，"这是我的"，"这里是我们大家的"，"这是我们的"。于是，我在这里成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心向往之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在政治方面；遗憾的是，在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可怕的沙漠折磨着我：我永远不是"自己的"，人世间没有一个地方让我感到是"我的"，"上帝赐给我的"，"与生俱来的"。

我的整个生命乃是寻觅："何处是我的？"只有在"朋友"身上我才发现了"我的"。相见与结合，这是"命运的安排"，"上天的旨意"。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东西，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的东西，而不是"由于充满活力（因为喜欢）而被理想化的东西"。

这种场合是命中注定的。这是上帝的指引。

（写作关于救火大会一文时）

※ ※ ※

人只对自己真诚。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上，就连非社会主义者也有些虚伪。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对他来说是客体。只有在主体和客体合而为一的时候，虚伪才会消失。

在这方面，利己主义可以说是一颗遥远的星星，尽管很暗淡：“我”为“我”，我的“我”为“我”。实在伤心，实在枯燥，实在可怕。但这是真理。

※ ※ ※

犹太人的力量来源于异常古老的血液。

这不是衰朽的血液，而是相反，越老越纯正，越富有光泽和活力（艰苦奋斗，随机应变）。你永远不会听到犹太人说“我累了”或“想休息一会儿”。

※ ※ ※

俄罗斯的生活肮脏，虚弱，然而，不知何故，就是可爱。

就怕失去后者，否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就怕失去这种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东西。

你可以得到更好的，但不是这样的。而你想要的就是“这样

的”……

（在沃尔科沃公墓）

※ ※ ※

“当代生活”刺痛的只是空洞无物的人。所以对当代生活的抱怨也是空洞无物的。

※ ※ ※

不，我的罪过不是反对教会反对上帝——别高兴得太早，牧师们。

我的罪过是反对人。

我不是对“道德”苦恼。这都是小事。我不是十二岁。我使你们头疼了吗？

※ ※ ※

“——我马上好！我马上好！”——她开始穿大衣，像放进口袋一样，把生病的一只胳膊放进袖筒，脸上挂着孩子般的欢喜。

叶甫盖尼娅·伊万诺芙娜进来时，她已经穿好了灰色的英国套装。

我们动身去利·埃家。我搀扶她下楼梯：离第一出口很远（到乌杰尔街）。她很着急，像是参加最好的舞会，尽管一瘸一拐。“这么远啊！”——她保证说病能治好……

唉……

回来时已经没精打采（筋疲力尽）

（1912年4月21日）

※ ※ ※

多些爱吧，多些爱吧，给我爱吧。我冷得喘不过气来。

唉，怎么到处都这么冷啊！

※ ※ ※

我的厨房里放着一本《屠格涅夫致维亚尔多书信集》。这不是一般的书信，这是世界的轴心，也是最美的诗篇。

用心良苦！如履薄冰！害怕“出格”！当大家相安无事时，又是多么满足啊！

※ ※ ※

每当神父个人的暴躁同“教规”连在一起，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假仁假义，托尔克马达）。只有“粗枝大叶”时，才能说好。何以如此？何以是在此时此地？

※ ※ ※

我多余得罪库斯科娃……一切是那么美好……

她只不过是在给人家当枪使。难道我就没有给人家当枪使？

（灭蚊时）

※ ※ ※

狡猾和羞涩（天真）的结合，粗心大意，不计眼前与高瞻远瞩，精明老练的结合——是我的惊人的特点。

我是把《一棵颤抖的树》作为《一张黑脸》的第一章来写的。而早在《一张黑脸》出版好多年以前，它就发表了，当时谁也没有看透这篇文章的含义和趋向。

而在《一张黑脸》的序言中，已经隐含了整个《隐居》。

（在厕所里）

※ ※ ※

我并不仇视道德性，只是“不挂在嘴上”。或者说，当我把它作为题目（根据别人的要求），它总是滑脱。“行为准则”跟我的灵魂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我对此也无可奈何。再者，我始终讨厌“有行为准则”的人：他们矫揉造作，呆头呆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递给你一张纸条，读完你会对他了如指掌”。然而请看：当你遇见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跟你一样，从不把道德性挂在嘴上，他生来如此，是上帝、父母和永恒造就了他，他不阳奉阴违，他不别有用心，他不对别人怀有恶意——当你遇见这样一个人，难道你没有“一见如故”之感？难道你还用得着处心积虑地算计别人，伪装自己？难道你还用得着搬出“纯粹理性批判”？不，你会悄悄地躲到一边，以免他看见你，你会注视他，把他当作人世间最崇高的人。

一个美的人，即“善良的人”，“美好的人”，是人世间最宝贵的财富。世界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能看见他。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论断呢？请看例子。天黑了。人人都像筋疲力尽的狗一样干家务活儿。我在门口揩拭书上的灰尘，而娜嘉（一位消瘦、苍白的侍女，有丈夫和孩子）在擦窗户。我的瓦利娅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窗前，用那只还听使唤的右手搂住娜嘉的脖子，伸过头去像吻自己的孩子一样吻了她。娜嘉吓了一跳："你怎么了，夫人？"她哭着答道："这是上帝派你来的。你身体很虚弱，家庭又不幸（丈夫生病，躺在乡下没工作，孩子得了疝气），可你一直不怕辛苦，不抛弃我们。"说完就走开了。娜嘉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有分工的不同，却没有先生和下人，主人和奴隶的区别，人人都应各司其职，创造和谐，因为我们需要它。箱子、钉子和东西：没有箱子东西会丢失，没有钉子箱子会散架；不过钉子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东西"；而从另一方面讲，"箱子容纳一切"，且"大于一切"。普希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把自己置于米罗诺夫上尉（白山要塞）之上，这样一来，上尉在普希金身边感到很愉快，而普希金跟上尉在一起同样很愉快。

可现在，当世风日下的时候，人们反倒糊涂起来。

※ ※ ※

性中有力量，性即力量。犹太人同这力量结合，而基督徒同这力量分离。这便是犹太人能战胜基督徒的原因。

这里的斗争在于根本，而不在于表面——而且如此深刻，以致你头晕目眩。

基督教对性的继续拒绝将扩大犹太人的战果。正因如此，我才开始不失时机地为性鸣锣开道。基督教应该哪怕是部分地成为生殖器崇拜的宗教（孩子、离异，亦即调整家庭，增加家庭岩层

的厚度，扩大家庭的数量)。

可惜，有文化的犹太人不通此道，而有文化的基督徒对此漠不关心。

※ ※ ※

当生活已不再美好，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你将大逆不道，如果你自己去死。

——岂有此理，你们可曾知道我的痛苦?要教训我，为时晚矣。再说，我跟你们有何相干?你们跟我有何相干?我死不死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有一点儿关系。

你们应该在人活着时说。可你们当时一声不吭。而对死者大惊小怪，你们不是多此一举吗?

※ ※ ※

死是这么一回事：在它之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但它会为一切而来临。

难道非要说，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吗?

也许，屠格涅夫的资料索引现在对他有意义?恶心……

※ ※ ※

“托尔斯泰的宗教”莫不是一个养尊处优、声名远扬和无忧无虑的土拉地主的“东跑西颠”?

缺少切肤之痛——这是托尔斯泰不可饶恕的一面。

（读佩尔卓夫编《托尔斯泰纪念集》）

※ ※ ※

我如何看待自己对1900……不，是1897～1906年的“近乎革命性的”痴迷？

——它不无道理。

人的可恶始于自鸣得意。

当时自鸣得意的是那些为官者。

后来成了革命者。于是我开始恨他们。

※ ※ ※

重读了自己关于列昂季耶夫的文章（在纪念他的集子里）。不喜欢。里面有一种潜在的庸俗，表现在：说到自己喜爱的另一个人时，我应该谈他，不应该把自己也加上，而我加了。这是如此浅薄，如此唐突，好像我不爱死者，其实我当时是那么爱他，至今仍在爱他。然而，就像一个寡妇，“毕竟还是照了一下镜子”。

上帝啊，保留我身上作家的这一点纯贞吧：不照镜子。

大作家与小作家的区别几乎只有一个：照镜子和不照镜子。

索洛维约夫没有力量推开这面镜子，列昂季耶夫没有看见它。

※ ※ ※

作家必须克服自身中的作家（作家气、文学气）。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作家；不是“做过而已”，而是“成就事业”。

生活中，一生中，最使我震惊的是什么？

不高尚。

和高尚。

还有：高尚总是处于屈辱之中。

卑鄙差不多永远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侮辱性的卑鄙。

※ ※ ※

……总而言之，既然有人（列文，其他人）指责我，就说明我身上有可指责的东西（尽管听来逆耳）。只是别指责我犬儒主义：承认它固然容易，可我身上一点儿也没有。一个温和的人身上，一个几乎总在忧伤的人身上，能有什么犬儒主义呢？不，是别的东西。

我身上缺少明确性，真正的积极的仁慈和开放性。我的内心是一团乱麻，我不能自拔……

我严重的苍白无力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一切，即混乱不清，在我的风格中多少有所表现。）

※ ※ ※

爱即渴望。是灵魂对肉体的渴望（也就是说，肉体是灵魂的

表现)。爱永远是对我特别缺乏和特别需要的东西的爱。

爱即苦恼。一旦不被满足，它便折磨你，苦恼你。

因此，爱得到满足时，则使人再生。爱即再生。

爱是互相容纳，彼此吸收。爱永远是交换，灵魂与肉体的交换。所以，当没什么可交换时，爱便泯灭。而且它永远由于一个原因而泯灭：交换材料的枯竭，交换的停止，彼此的饱和，曾经相爱而且相异的人变得相似乃至雷同。

齿轮互有参差，才能配合默契，一旦磨光，便会彼此脱扣。“转轴”停了，“工作”也就停了：因为作为对立两极的匀称与和谐的机器消失了。

这显然是死了的爱，永远不会复活……

于是，在它（彻底）完结之前，作为爱的最后一丝希望，变化应运而生。没有什么能像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变化那样拉开爱人之间的距离（制造差别)。齿轮上最后一个还没有磨平的齿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齿咬在一起。运动又一次成为可能，成为一定程度的现实。由此看来，变化乃是爱的自我疗救，爱的“自我修理”，给破旧的衣服打的“补丁”。不少有裂痕的爱由于变化的出现还能迸发出相应的火花并创造出未必勉强的白头偕老的幸福。但假如没有变化，情人们或家庭就只能破裂、离异、解体；爱也就彻底泯灭了。

※ ※ ※

偷看私人信件的邮政局长（《钦差大臣》）是个有着良好文学趣味的人。

有一次，二十五年前，我偶然登上一间阁楼。一只旧箱子，盖子敞开着，里面满满登登地装着一些旧信。下去后，我问：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寄给我的）旧信——那位女医生，六十年代的著名女活动家回答。

整整一箱子！

间或读到仆人的信，我常被大众语言、大众灵魂、大众生活和世界观的绚丽多彩所震撼。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这就是文学啊，最美的文学。”

作家的信总是很枯燥乏味。他们好像吝啬鬼，把“鲜花”留着去发表，轮到写信总是没精打采，“无话可说”。这些东西并无发表的价值。不过，私人通信确实精彩。

每个时代（在私人信件中）都说自己的语言。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同样如此。

真恨不得把那些“胡编乱造的小说”，所谓的新式美文及其替代品统统清除出去……用科学、学术、哲学取而代之。

不过有时还是需要，最好是独立成书，把这一箱子旧信复制出来。茨维特科夫[1] 和格尔申逊会从中获益非浅的。别的读者，少数严肃认真的人，也会读得津津有味的。

① 茨维特科夫（1888～1964），文学家，洛扎诺夫的朋友。

※ ※ ※

把自己置于道德之上，并像拿破仑一样，对讨债者大手一挥，盛气凌人地回答："我就是不还钱"，这当然容易。但罪该万死的是，有人欠我钱的同时，还欠着别人的钱。左等右盼，度日如年。都是一笔一笔的小账，真让你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方便找警察，尽管我不是没想过。

（尼采的哲学）

※ ※ ※

不错，我阴险狡诈，就像切萨雷·博尔贾[1]：关于自己的朋友，鬼才知道我会说什么。我爱这居心叵测的背叛，其中闪烁着魔鬼的眼睛。但让人极不舒服的是，我的女房东满楼梯散播我的谣言，说什么我跟女佣人同居，还有守门人，这么不客气地看着我，似乎我已不是主人。

我是主人。而且我希望别人像尊重主人一样尊重我。

只有"先当主人"，才能达到"尼采的自由"。可让我如何"先当主人"呢，当人们欠我的钱不还，在楼梯上对我恶语中伤，甚至当我在马路上被人打了脸，想要叫巡警，那人竟醉醺醺地冲我大声吼叫：

——瘪三，你不懂，这是新道德，现在打别人耳光不但不是犯罪，还是大发慈悲呢。

我明白，是这么回事，如果我打别人。然而，要是别人打我

① 切萨雷·博尔贾，源自西班牙的贵族，其家族在15世纪至16世纪初的意大利起了很大作用。

呢?

(也是哲学)

※ ※ ※

勒齐好像没有手没有脚，只有脑袋和肚子。

看啊，想啊，吃啊。

他不得不去“服役”了。可怜的人。在稽查处里，他向我显示藏在衣服下摆里的上等“香烟”:

——西班牙货。朋友送的。走私品。

后来我再没见过这种香烟。

有一次跟沙拉波夫① 和一个船员共进午餐时，我听到他的一句妙语:“味阶”(先吃什么后吃什么)。

不过，坐着不动时，他总是深思熟虑，精心策划，万无一失。他是个天生的杰出的校长和教育家，有三四个“助手”，政法学校，法学，随便什么，他得心应手，驾驭自如。就是这样一个人，曾被迫在铁路局里“审核报表”，身不由己地倒卖香烟。

我从他那儿听到过许多妙语。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他专心致志地用手指在空中做着击打的动作，然后热情地对我说:“节拍乃是心智。”多么微妙，多么含蓄啊。

还有:“是的，他不会讲课。他什么也不会。在我们这儿，这样的人早给赶跑了。牛津则会把他留下。他会钻书本。他寻找，发现，嗅味道。他是个天生的学者，凭灵感而不是凭文凭吃

① 沙拉波夫(1855~1911)，作家。

饭的学者。初级学校的青年人即便是在马路上碰到这个老在啃书本的人也会受益非浅，他能教给他们的东西要远远多于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青年教师的讲座。”

这对大学来说，可谓金玉良言。没有一个俄罗斯的教育部长会有这等见识。

※ ※ ※

有些话说出来未必合乎时宜。诺维科夫和拉吉舍夫就属此类。他们讲的是真话，是崇高的人的真话。然而，假如这“真话”变成数万数十万张传单、小册子、书和杂志在俄罗斯大陆上四处传播，传到奔萨，坦波夫，土拉，传到莫斯科和彼得堡，那么，奔萨人和土拉人，斯摩棱斯克人和普斯科夫人就不会有击退拿破仑的雄心壮志。

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号召“有本事的外国人”来占领俄罗斯，就像已有此打算的斯麦尔佳科夫① 和在思想上已有此呼吁的《现代人》那样；卡拉姆津的《历史》也就无从下笔了。这就是拉吉舍夫和诺维科夫虽然说了“真话”，但却不被接受，在当时不被接受的原因。说实在的，他们受到排斥，他们的言论没能找到市场。这并不是反对他们的思想，而是反对传播他们的思想。古滕贝格发明打字机固然没受到什么约束，但“限制思想自由”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其实，所谓的“思想自由”，无非是“我们不想听”罢了。

民族性对每个民族来说，乃是宿命，命运；它甚至可能是阴暗的。命运在它的力量中。

① 《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仆人，私生子。

“你逃避不了命运之神”；也逃避不了“民族的枷锁”。

——坐一会吧，费奥多·爱德华多维奇。

——不行。贝佐夫[1] 正等着我。

——哪个“贝佐夫”?

——同学。大学同学。也退学了。

——是吗?

——我到您这儿来。是顺便到他那儿去了一趟：“一起走，不然我会寂寞的”。他这会儿正在大门口等我呢。

至今我无法想像施佩尔克没有贝佐夫会怎样。施佩尔克总是跟贝佐夫在一起。贝佐夫是何许人也，长得什么样，我从未见过。但我大概知道，假如施佩尔克不跟他在一起，也不一个劲儿地拉他，他是不会跟施佩尔克这么难分难舍的。

施佩尔克还习惯了去找一位哲学家……忘了姓名。他（用笔名）出版了一部厚得让人头脑发昏，或许，还深奥得让人头脑发昏的著作——《人类精神的水晶》。拉德洛夫[2] 和魏金斯基[3] 当然没读过。忘了姓名。列德涅夫（笔名）……他住在奥赫塔郊外，他在那儿有自己的房子，带个小花园，而他本人则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哲学家兼经纪人。他有一个女儿，已出嫁，也就是说，他年纪已经不轻。

我妻子（“朋友”）和这个经纪人是施佩尔克转向东正教的原因。施佩尔克令人惊讶地，“像狗一样”朴实而高尚地追随着他。在施佩尔克眼里，经纪人是俄罗斯最聪明的人，“魏金斯基和拉德洛夫怎能望其项背”。他的确是一个出色的俄罗斯人。他责备

① 贝佐夫（1880~1934），化学家。
② 拉德洛夫（1854~1928），俄国哲学家，通讯院士。
③ 魏金斯基（1856~1925），俄国哲学家，俄国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

施佩尔克尽出些小册子，“把精力浪费在鸡毛蒜皮上”。

观察施佩尔克对他的爱是一件令人惊奇和感动的事。

这位哲学家的名字我想起来了：斯维奇金。

——老爷，您太狠心啦！

——怎么了，奶妈？

——您竟睡着了。

“上帝啊，上帝！我竟睡着了！”

而施佩尔克还在用他那抑扬顿挫、字斟句酌的嗓音朗诵《我的灵魂》(一部自由体长诗)。

——您读吧，费奥多·爱德华多维奇，我稍躺一会儿——我说。经他一读什么都清楚明白，可当你自己去读铅字时，反倒不知所云了。

我站了起来。他微微一笑。他对我的失礼从不耿耿于怀，因为他知道，我永远不会有意伤害他。我们去喝茶。

请看看植物。这里有“细胞中的细胞”、“原生质”和诸如此类。不言而喻，既合乎理性，又合乎生理。

“绝对科学”。

但它在植物里是如何生长的，则是一门艺术。在蘑菇里一个样，在白桦树里另一个样：但在蘑菇里是艺术，在白桦树里也是艺术。

难道山坡上的云杉不是艺术作品？难道它在被画进图画之前就不是图画？这奇迹从何而来？

上帝啊，从何而来？

上帝啊，是你造就。

多神教，经过锻压，锻压到“极限”，到失去一切形态，成

为铸造品，这便是犹太教。然后再继续锻压，锻压到只有气味，没有物质，变成“0”，这便是基督教。如此，可以把全部宗教看成“同一发展过程”，没有矛盾，没有对立的运动，就像对物质的逐级锻压，锻压到“金属的密度”，到“只有一团气体”。

可以吗?

加手仪式之后，披上了“不朽的袈裟”的他开始左顾右盼，动脑筋增加收入。

（俄罗斯高级僧正的命运）

他是个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与妻子分居。她跟别人生活在一起。起初是个书记员，后来是一个朋友的儿子，再后来则是来者不拒。他哭过。

有一次我们乘坐马车到哪去或从哪来。他说：

——要过好日子，用不着有钱。

——您说什么?

——您需要钱吗?

——不错。

——好极了。我们拿一张期票，我和勒齐签上名，您去到银行贴现……

——怎么个“贴现”?

——就这么“贴现”呗。银行付给您的不是全部数目，而是要扣除一点儿。期票存在银行里。当然，当您有钱的时候，再把它赎回来。所以，如今根本不需要有钱，只要自信您以后会得到就够了，就是要靠“以后会得到”这份自信心生活。

美妙之至的“如今”。

——这简直是神话。

——对！再然后——照例还是抄写期票，留待“将来”。我就是这样生活的。这么多年，从不缺钱。

（世俗的海洋）

——我何必去找“好空气”，既然“好空气”不请自来？还可以吹吹风嘛，免得让人心绪不宁。

（写在一张字条上：“去散步吧，好空气。”）

※ ※ ※

我要嫁给整个世界：所以激动不已。

奥罗拉要嫁给耶和华。而我要嫁给大自然。这就是全部区别。

凡是他见识过的，我都知道。

※ ※ ※

在“社会结构”中，一人走运，九人偷懒。

于是我想：“社会问题”莫不就是关于十个中的九个好吃懒做的问题，而绝非从少数人那里抢来大家分的问题？因为分过之后，一个劳动者的脖子上将骑上十四个人，会把他彻底压垮。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游手好闲”的生活，甚至强迫他们工作都不行，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且拳头比谁都硬。

※ ※ ※

对我的“不想”的任何攻击都会被粉碎。

我几乎丧失了情欲。我很少“想”。但我的“不想”是真正的情欲。

我缘何受到牵连，成了世界的“同谋”？

好像是脚下一滑，掉到了沟里。我从沟里往外看——只有好奇，没有“我想”。

（夜里在床上）

※ ※ ※

我永远不会相信也不可能相信的事在生活中确实存在：我们在童年，少年时期有过的一切错误，罪过，丑恶的念头，丑恶的关系，在中年以后，特别是老年时期都会相应地反映出来。生活（我们的生平）是个有机体，而绝不是“个别行为”。

生活（生平）是有机的：谁会相信这一点呢?！我们始终认为，它是“由个别行为构成的链条”，我“想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即生活就是这样的）。

我对亲人感情如何？没什么感情。没见过父亲，所以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也从来不想他（“记忆”中没有的东西我当然是无法“回忆”的）。就连妈妈在她“一切都结束了”（死了）的时候，我也只是感觉到某种苦痛而已，她在世时我对她没感情，不喜欢她。我们这些当儿女的荒唐之至，什么也不懂，有一次竟然打算（我们坐在从附近砍来的原木上商量过这件事）到警察局去告她。直到她去世，而我也渐渐长大了，主要是对痛苦有了初步的亲身体验（生平），我这才“从坟墓中唤回她的影子”并可怕地同她建立起联系。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出身贵族家庭”，娘家姓希什金（很自豪），总是发脾气，总是愁眉苦脸，痛苦不堪（我后来才明白），实际上，她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最后两年还得了病。确实，她从来不跟我们说什么，也从不跟我们一起玩，但这不能怪她，她太忙，顾不上，这是其一。其二，她见我们疏远她甚至恨她，很自然便打消了跟“这些傻瓜谈话”的念头。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从给科利亚的信中），或者最好说是得知，她一

直在惦记我们，关心我们，只不过没和“这些傻瓜”说起过，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懂”。我们当然是“什么也不懂”，包括“警察局”。后来则记住了她拿着一本带黄褐色斑点的赞美诗，在夜间祷告（没有灯），以及我（七到八岁，甚至五岁的时候）给她念《笃信宗教的学校》的情景。我就是在那时记住《古利亚，萨蒙（?）和阿维夫的故事》的。我喜欢那些故事，短小，明白。妈妈也喜欢。

多希望能有一盏油灯照亮我们的“不算太平的家”。可我们没有（既没钱买油，也没钱买灯）。

我们的家是那么阴暗，那么恶毒（说到这儿，我直想哭）。我们是那么不幸。不过这“不幸”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那时只是“看谁都不顺眼”。

（鉴定古币时）

※ ※ ※

认识“外婆”（她的女儿成了我的第二个妻子）一家人以前，我在生活中根本没见过和谐，优雅，善良。世界对我来说不是宇宙（可以让我来装点），而是丑陋，在绝望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窟窿。我一点也搞不明白，大家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活着，什么是生活，为什么生活如此可恶，如此愚蠢，没有任何人需要。思考，思考，思考（思辨，《论理解》）——这是我一直想要的，这是“飞”，但在行动领域或生活领域——见到的尽是混沌，痛苦和诅咒。

突然，在维金礼拜堂（叶列茨）的后面，我见到一间有四扇窗户的小屋，那里的一切是那么高贵。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高贵的人们和高贵的生活。

贫穷的生活，贫穷的人们。却没有丝毫的烦恼，懊丧，乃至

抱怨。在这间地处“松林外”（城市的一部分），木墙，窗前绿荫如盖的小屋里，有的只是美满。就连又胖又笨的马利娅（佣人）都觉得满足，尽管她很笨，但大家都能宽容她，谁也不欺负她。

在这个美满的家庭里，谁也不欺负谁。这里根本不知道“生气”二字为何物，这样的家庭在俄罗斯恐怕很难找到第二家。这里也不知道“嫉妒”二字为何物，“为什么别人生活得比我们好”，“为什么他比我们幸福”——这些在随便哪个俄罗斯家庭里都能听到的问题，在这里绝对听不到。

我很惊讶。我的新“哲学”——不是“理解”的哲学，而是“生活”的哲学——就开始于一个伟大的惊讶……

“综合判断何以会是非理性的?”——康德哲学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确切地说，我的新“哲学”，生活的“哲学”，不是始于问题，而是始于视觉和惊讶：生活何以会是高贵的并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它是幸福的？人们何以在捉襟见肘，午餐“食无鱼”，月末“烧无柴”的情况下，仍能高贵而幸福地生活，带着沉重，忧伤，无比忧伤的回忆生活，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且仅仅因为他们从不触犯（嫉妒）任何人，从不愧对任何人?

“萨纽莎”，七岁的外孙女如此，她的母亲，二十七岁的年轻妇女如此，母亲的母亲——五十五岁的外婆也是如此。

于是我喜欢上了她们。我厌倦了写作。却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鉴定古币时）

※ ※ ※

也许，本来并不存在灵魂不死的思想。只是存在灵魂不死的情感，且这种情感来源于爱。正因我不太喜欢自己的母亲，我才否定灵魂不死，或者说是对之“不感兴趣”。我可怜她，但这跟

爱是两回事，或者说不完全是爱。假如我对她的爱能更清新，更热烈一些，假如“她不在了”能使我感到更痛苦，更可怕一些，那么，这才叫“灵魂不死”，这才叫“永生”，活在阴间。然而，或许这只是“爱的假说”吧？这算什么“假说”呢，如果说，我要“吃”面包，不“吃”就会死去？这不过是“食物”，同“地球围绕太阳转”之类的宇宙现象没什么两样。恰是由于一种强烈的宇宙学意义上的怀念（因为这怀念是宇宙学的），人们在告别死者时，才认为“我们将在阴间相见”。正如“水能流淌”，“火能燃烧”，“面包能填饱肚子”——肉体死亡时“灵魂不会死”，它只不过是脱离肉体而已。为何应该如此——无法证明，我们只能看见和知道存在的一切。在世界赖以支撑的这些永恒的“存在”中，也包括了永恒的“我”，我的“痛苦”，我的“欢乐”。这种思想，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把我们所有活着的人联系起来的情感，是那么高尚，崇高，温柔，以至在它面前，“国家杜马”或“勒拿大罢工”，或愚蠢的“请大家起立”（噩耗传来时）——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我们的世界却拒不接受这种思想和情感。不愿意接受它，也不了解它，反倒嘲笑它。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世界”（及其概念）不过是一种昙花一现，难以捉摸，无人需要——就连我们的下一代也不需要——到了不敢想像程度的东西？不过是一些撑腰架？

——女人过去用撑腰架。

——啊？什么？

——我说的是撑腰架。

——那又怎么样？我们再也看不见了。

——问题就在这“看不见”上。等到明天，“当代”的一切都将“看不见”；包括议会，达尔文和罢工。或许，正因为这微不足道，它（当代）才不需要“灵魂不死”。

一个温柔的思想，其寿命要比许多钢铁的思想长久。铁轨会

断。火车会翻。而人在受到“永别”的威胁时发出的哭泣，却永远不会断绝。

人们啊，相信温柔的思想吧。丢掉钢铁：它是一张蛛网。真正的钢铁是眼泪，叹息和思念。真正的，永远不灭的东西只有高尚。

活得高尚吧。

（4 月 21 日）

※ ※ ※

我的文体中有一种可恶的成分。任何东西，只要掺杂了这种成分，都不会长久。也就是说，我不过是昙花一现？

这可恶表现在我的自鸣得意中。有时甚至在我的孤芳自赏中。好像我有一副油光锃亮的肚皮，而且是我自己给它抹的油。真的，因为这，我好像是在飞，这当然也是一种品质。但这飞翔不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那样会更好些。

我的理想是宁静，高尚，纯洁。可我距离它有多么遥远啊。

当你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你就会想：文学太难了！确实，只有心灵纯洁并一生纯洁的人才是真正的作家。作家不能后天造就。作家乃是天赐。唯其如此，作家才有“不朽的生平”。

纯洁的人——普希金就是一个。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的文章，不由得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才过去十七年，这篇文章就已经显得相当陈旧，尽管当时曾赢得一片喝彩。它是可笑的，丑陋的，夸张的。如果事先能再读一遍，我就不会发表它，但已经付梓，木已成舟。《上尉的女儿》中没有一句话是陈旧的，过时的，虽然它已经八十岁了！

秘密究竟何在？在于普希金心灵的非凡的完美。而我的心灵

却全然不是完美的。

我是多么浮躁和可卑啊！披头散发，衣衫褴褛：

暴风雨残留的
最后一片被撕碎的云……

我是勉为其难，自讨苦吃。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即自己的微不足道），你会感到自己是那么不幸。

看一看过去的文章总是有所收益的（我却从来不看）。你会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局限。“现在——切都是令人陶醉的”，而且有可能，这已经是天意。但光阴荏苒，蓦然回首，你会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令人伤心，令人后怕。

（校订刊登在 1896 年《俄罗斯导报》上的
《论君主制》一文时）

就这样，一旦你感觉到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平庸无能，你会突然开始尊重文学：“这太难！我不行！”这里的“我不行”——先是惊叹，然后是赞叹（别人行）。

这对我来说是稀客，稀客中的稀客。

※ ※ ※

人只有行将就木时才会达到真正的严肃。

…………

难道整个一生都是轻浮的？

不错。

※ ※ ※

我曾将约翰·穆勒[①] 的头像同波果金[②] 的头像加以比较。后者的脸是那么耐人寻味，而前者的脸是那么暗淡贫乏。

相对而言，还是俄罗斯文学更绚丽多彩。怎样的性格，怎样的怪异，怎样的荒诞啊！有朝一日我是否会重新爱上文学？现在我恨它。

（整理大学时代积累的图片时）

※ ※ ※

老实说，我痛恨的是文学中的什么？

跟人身上的一样——自鸣得意。

自鸣得意的赫尔岑对我来说，跟斯卡洛祖勃上校一样讨厌。在文学方面、婚姻方面、公职方面一帆风顺的格里鲍耶陀夫，在我看来，还是那个斯卡洛祖勃上校。斯卡洛祖勃上校之所以让我们反感并不是因为他是军人（雷列耶夫[③] 也是军人），而是因为他“自鸣得意”。就这一主要特点来说，斯卡洛祖勃上校，格里鲍耶陀夫和赫尔岑这三个人，可谓臭味相投。

※ ※ ※

法国人不擅长共和制，同样也不擅长君主制。他们既没有正常的共和制感觉，也没有正常的君主制感觉。他们不懂爱慕，依

① 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
② 波果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通讯院士。
③ 雷列耶夫（1795～1826），俄国十二月党人，诗人。

恋，信仰，崇拜，怎么可能有什么君主制呢？而共和……他们算什么共和党人——这些扒手，这些钱夹，自诩为公民的账房先生和贴身保镖侍立左右？这纯粹是自己口袋的警卫。

她（法兰西）依靠什么支撑？最少依靠的就是“共和制”。从街区到街区，从城市到城市，从省到省。为什么这一切不能“依靠”呢？要知道，并没有什么破坏它们，并没有什么敲打它们，也没有什么挖它们墙角。枯死的树林还能支撑一阵呢。

怎样的污秽啊……不，是怎样的恐怖啊，他们的小说……去年夏天读过一篇，讽刺作品，在《俄罗斯之晨》里。仿佛一场虚构。

※ ※ ※

在俄罗斯搞不成纪念碑（为果戈理等人），因为唯一正常的纪念碑是礼拜堂，以及里面为“上帝的奴仆尼古拉”（果戈理）而点燃的不灭的油灯。

可爱的娜杰日达·罗曼诺芙娜（谢尔波娃）在去世前很久便对丈夫说：“我只要一个木十字架。”甚至不是石头的。同时为母亲买了一件白色丝绸衬里的棉大衣。由于家庭不幸，母亲得了轻度精神病，脾气很怪：生活很困难，却喜欢看戏，穿漂亮衣服。买大衣的钱是女儿上图画课挣来的。

她在路上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胜过我们所有的宗教“著作”。

她整个是多么可爱啊！她知道我的“倾向”（否定的），但从来不曾指责我。

（顺便说说，她还特别喜爱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常带丈夫“到国外观光”。）你们大概不知道吧，她娘家的姓是米勒（她父亲是贴现银行的部门经理）。她的姐姐出家当了尼姑。

而我们俄罗斯人，却在抛弃信仰和修道院。

※ ※ ※

是的，这将一个单元同相邻的单元隔离起来的奇怪的帘子——不是墙壁，不是栅栏，而是五颜六色的，带褶的帘子。严禁随便出入，一年只能进去一次，不能带照明用具，当然也就不能带蜡烛或火炬，尽管为了避免碰撞和做一些需要做的事，这些东西是需要的——是不是特像五颜六色的："当然不许任何人提起下摆"的百褶裙？

其余的一切布局和物品摆设是不是与此相符合？

（摩西的游动神庙）

※ ※ ※

要有一个让你为之心痛的人。这是够奇怪的，可不这样生活就会空虚。

（在厕所里）

※ ※ ※

我生来就不爱读福音书。不感兴趣。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读过，但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那些奇迹（所有对大自然的"胜利"）并不使我惊奇。甚至不能吸引我。我并不认为里面说的话非同寻常，除了一些神秘的人物，未来的知识（神殿和耶路撒冷被毁）和预言性的东西。相反，我读起旧约来却如饥似渴：我觉得它说的全是真理，让我感到异常温馨，仿佛字里行间流淌着热

血，而且是母亲的热血。在我看来，西顿的萨列普塔的寡妇的故事“比整个基督教更基督教”。

这里有一种天生的，并非先入之见的好感：它可能来源于我早年对生育的好感。在基督教和“张开的子宫”（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容的东西。

（可一听到做弥撒时唱的“祝福我们吧，以主的名义”，我的泪水就会抑制不住夺眶而出。我觉得这是呼唤，是对另一种东西的呼唤。对未来同时也是对过去的呼唤）

陪伴一个病人：是我年轻时（二十六岁以后）有过这样的预感呢，还是有过这样的愿望？天刚麻麻亮，我已辗转于写字台和她的床之间。直到天黑。

结果就是这样。

※ ※ ※

“正直的烟草”毕竟还是烟草。我不否认它是有害的。我也不否认它有吸引人和“可以原谅”之处。可问题在于，它毕竟是烟草。因此，在我们这里“丝毫不加掩饰”的俄罗斯的流放，根本不能为我们的精神和生活的金矿提供见证。不管是过去的烟草，现在的烟草，还是将来的烟草，加起来，我们得到的毕竟仍然只是烟草，它能使你窒息而死。

（茨维特科夫说我们的宗教界人士表里如一，此话令我吃惊，引起了我的兴趣）

※ ※ ※

我怎么能在一个病人身边说（《隐居》）自己伟大，自己杰出呢？

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胆量！轻浮啊！

※ ※ ※

她的全部欢乐都蕴藏在别人的欢乐之中。

（为了"舒罗奇卡似乎很满意"这句话——
为了我的下一个梦。我们共同的妈妈）

※ ※ ※

对旧的东西的尊重应该是虔诚的，而非疯狂的。

（致旧教徒和教条者）

——究竟什么是"教条"?

——对尊重教会并热爱教会的人来说，现在倾向教会的虔诚，教会的真实，教会的美，教会的公益事业，教会的真理的东西，就是教条。但对恶人，不诚实和没良心的人，不热爱和不维护教会的人来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说的，跟我们级别相同地位相当的人说的"，就是"教条"。对他们而言：

——这不是教会，而是我们。

应该给这些有罪的不信神者套上笼头，让他们循规蹈矩。

（致赫尔摩根们和赫拉波维茨基们。1912
年7月26日）

会更加科学，更讲究文法，甚至更合乎规矩，但不会有时代的镀金。

也不会有灵感。

因为只有植根于旧的土壤，才能长出参天大树。

（思考俄国改良派时）

※ ※ ※

她的嗓音很尖很细，很弱很轻，仿佛被挟住的鸟儿。刚发出几个音，唱出一两句歌词，她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好像对她来说，唱歌完全是一桩不可能的事。

（我在窗前写文章时，听到老伴在吊床上唱歌）

※ ※ ※

我在思维的过程中，总是免不了发呆。

我从来不会推测，不会探寻，不会观察，不会考虑。这些平常而又平常的能力在我身上一点也找不到。

但我会突然感到惊讶。对一个想法或物体感到惊讶。或是为“柳暗花明”感到惊讶。“感到惊讶”的我会瞪大眼睛，盯着这个想法，物体或“柳暗花明”之处，有时甚至会连续几年盯着不放。

我对这些物体，想法和“柳暗花明”达到了迷狂的程度。如果说，我的一生是在迷狂状态下度过的，那么，这句话并没有说错。

她很幸福，也很忧愁。

实际上，自迁居科斯特罗马（十三岁）以来，我丝毫没变。依旧对“好”与“坏”漠不关心。依旧凭好奇心和“想当然”行事。对周围的一切大概依旧冷淡，或者确切一些说，是无动于衷。依旧经常伤感，惆怅，而且这惆怅和伤感随时可能转化为可怕的内心痛苦，催人泪下。依旧温柔，寻找依托。

我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大概就是温柔和感伤。

它从何而来，又是由什么构成?

一切都不完美，这让我感到苦恼，但这绝不等于说，事物不遵守某条戒律，不会兑现对它们的期待（这一点连想都没想），而是说，事物本身觉得不舒服，它们没有得到满足，它们感到痛苦。说到事物“感到痛苦”——这是我一生的苦恼所在。只有通过这“痛苦”才能得到温柔。看上去，事物似乎满腹委屈，孤独无助，好像有人不太喜欢它们，不太重视它们。所有的事物都在最高程度上值得我们“温柔”地对待之，我认为，世界上绝对没有一样东西是坏的。我真想触摸一切，“顺着毛”（绝不会“逆着毛”）抚摸一切。因此，通过“培养”（适应，习惯），即便是丑陋不堪或令人厌恶的东西，我也会钟爱，只要它们能让我觉得它们还有那么一点“可爱之处”，“可取之处”。有时我觉得，我和人们永远是在“偷上帝的”……不知是偷金苹果呢，还是偷幸福，反正结果是忧愁减少了，痛苦减少了，知道了可怕的“人皆有一死，皆有终点”，万物“有始也有终”，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个不同于肉眼所见的真理是我从上帝那儿“偷”来的，但这“偷”绝不等于反对上帝。这里云雾（心灵的和世界的）缭绕，这使我觉得“我和人们的偷窃”是得到上帝的秘密保护的，似乎上帝自己也希望“世界被偷个精光”，只是法律（命运）无情。这种与命运的斗争经常发生在我心灵深处：说实话，我为何

而痛苦为何而哭泣，都是命运使然。

※ ※ ※

老伴和她母亲（“外婆”亚·亚·鲁德涅娃）之间的区别，就像伊奥尼亚式圆柱与多利斯式圆柱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我认为，老伴比较有人情味，比较脆弱，比较热情。比较多姿多彩，富有洞察力。外婆比较坚强，比较冷静，比较大度，比较关心社会。外婆的心里总是装着“街道”，“周边地区”，“我们的教区”，她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兴趣，都想知道个“所以然”。对老伴来说“街道”是根本不存在的，只存在“自己的家”：孩子，丈夫。甚至几乎不存在“朋友”和“熟人”。但这个“自己的家”能发出很强的光和热。只要能关心别人，没有个人的爱情外婆也能过一辈子。老伴却完全做不到，十四岁的时候她就有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且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动摇不了她（才十四岁！）的信念。这一点外婆是做不到的，也不想这样做。对她来说“街道”和“街道”的威信才是有意义的（对老伴来说没有丝毫意义）。

结果是：从朴素的，永恒的“多利斯式圆柱”中生长出的是自己激动不安，也让别人激动不安的“伊奥尼亚式圆柱”。我没有看错她们娘俩（1890 年，从预备的角度说是 1886 ~ 1890 年）。

※ ※ ※

塔尼娅穿着衬衫，裹着一件灰色（深灰色）的睡衣，急急忙忙走到写字台前。我还没把头从稿纸上抬起来，她的两只手臂已经搂住了我的脖子，吻我的头，和我道别：

——再见，爸爸……我就愿意在隔壁听你翻弄稿纸的声音，

活像一只老鼠……

她笑盈盈的，眼睛里永远闪烁着激动的泪花。跟她妈妈一样，她的眼泪总是在眼圈上转悠，随时会流出来。

她的心地，她的脸庞，她的体形都像妈妈，只是更小巧一些。

我抬起头，吻了一下她笑盈盈的脸颊。她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是介于微笑与泪水之间。

她是那么纯洁，就像天使，没有半点瑕疵。甚至没有半点顽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和她妈妈都知道，她对自己要求很严，限制很多，非常注意自己的教育和修养，以致经常偷偷地哭。只是没告诉任何人。

三年（四年？五年?）前，我们和科诺普良采夫在海岸的高崖上散步。脚下是一片松树林，将平原和海岸本身隔开。这是在丘尔谢沃附近，捷里奥基那边。我对他说，别林斯基直到去世前不久才意识到普希金最优秀的诗篇是《当喧闹的白昼为凡人而沉寂》，这令我感到惊讶。科诺普良采夫能背诵这首诗，我虽然不会背，但也想说出哪怕是那么两三行。一直闷声走路的塔尼娅悄悄对我说：

——爸爸，我记得。

——你？——我半信半疑地回过头来。

——对。我也喜欢这首诗。

于是，在我的“让我们听听！让我们听听!”的催促下，她小声地，略微有些腼腆地背诵起来：

当喧闹的白昼为凡人而沉寂，
在城市万籁俱静的广场上
降下一片朦胧的夜晚的幽暗

和梦幻——白天劳动的奖赏，
这时那使人痛苦万分的失眠时刻
却在静谧中久驻在我的头上……

我觉得，诸如“广场”（普希金用的是旧词）和“失眠”这类词，可怜的小姑娘是不会明白的：既然在一种难以理解的惶恐不安中她记住了这些就长度而言是相当难的诗句，那就说明，她是被埋藏在诗句里的一种隐秘的痛苦吸引住了，她在通过这些诗句怜悯某个人，她在通过这些诗句与某个人进行沟通。我听着，激动不已。科诺普良采夫沉默不语。塔尼娅继续背诵：

在空闲的夜里，内心谴责的毒蛇
在我胸中更猛烈地把我咬伤；
我浮想联翩……

她停了一下，低着头，声音变得更小：

在那愁思郁结的胸中
各种痛苦的思绪一起涌来；
往事的回忆像是一幅长长的画卷，
在我面前默默地展开……

她胆怯地，以孩子固有的音调继续道：

我痛心疾首地回顾我的一生，
我不由得颤栗并诅咒自己，
我沉痛地怨诉，悲伤地落泪，但泪水
并不能洗掉悲哀的诗句。

她又停了一下。

我在清闲中，在欢宴中，
在毁灭的自由的疯狂中，
在束缚中，在贫困中，在别人的草原中，
看到了我的失去的光阴。
我又听到朋友们背叛的问候，
在巴克斯和卡普里达的游戏中……

她说到“卡普里达”……我觉得，很多词她不懂……

寒冷的光又为心灵带来
不可抗拒的委屈。
我感觉不到欢乐……

现在她几乎是在耳语。我勉强听得清楚：

——我的面前
悄然出现两个年轻的幽灵，
两个可爱的影子——在以往的日子里
命运赐给我的两个天使！

她的声音变得响亮起来，冷酷起来，简直判若两人：

但两个长着翅膀和握着燃烧的宝剑的
天使在监视……双双向我复仇。

她的声音又带着同情：

他们俩用死的语言
告诉我永恒与坟墓的秘密。

聆听着“成天在我跟前跑来跑去”的塔尼娅背诵的这首令我惊叹（多年）的诗，我体验到了我在整个家庭生活（二十年）中从未有过的激动。是的，但这是对我而言。而对她呢？她还知道叶甫盖尼娅·图尔的《地下陵墓》——就这些？为何说“就这些”？实际上，她远比我和她妈妈预料的跑得远。而且从来不露声色。只是在回答偶然问题时，她才会甩出一句诗来（那样子就像是做“作业”，但真做“作业”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从而突然暴露了远非“作业”的秘密。啊，她的知识已远远超出了课堂，班级，老师。

——太好了，塔尼娅，你是怎么记住的？

——我很喜欢这首诗。

——加上《卡普里达》!?

我把这段文字（校样）念给老伴听。

——我就是不喜欢你把这些都记下来。这些事应该只有你我知道。搞得尽人皆知不好。你最好写一写你是如何揪她耳朵的。

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是在游览伊马特拉瀑布的时候。换个时间再说吧。

※ ※ ※

内心喧嚣不止。

（我的心情）

奇怪，如果我在夜间睡醒，有时即使是在白天，我还会继续做梦（大约有三次，当天和前几天遇到的疑惑在梦中得到“解答”）。

※ ※ ※

当了丈夫不照看——当了父亲看不住。

（姑娘们的命运）

※ ※ ※

“加急”——把娜佳的信送到厨房（邮递员从那儿把信取走）时，我读了写在地址上方的两个字。这个普切克（外号）总是写“加急”信。从前总是喊：“爸爸，给我挂号。”（也就是寄挂号信。）我嫌花钱太多，生气地说：“你干嘛要挂号?”“走得快!”“正好相反，挂号信走得更慢，只不过比较保险罢了。”

从此以后她不再写“挂号”，而是改成了“加急”。加急信一封封地寄出，她也在一年年地长大——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

能收到来信，架子于是便大得不得了。千万不能碰她的明信片。她会两眼冒火，嘴唇发抖，唾沫星四溅，大吼大叫，不知是冲父亲呢，还是母亲：

——看别人的信不道德!

——亲爱的，明信片写来就是给人看的嘛。

——根本不是!!! 这是信!!!! 要知道，这不是写给你的!!!!!

她浑身发抖。

——亲爱的，你要知道，上面有些地方写得不够妥当。什么

叫“‘你’的卓娅”？或者还有：“我知道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但要等到秋天我们开学时才告诉你。”不错，信里是写了“奶奶得了肺炎”，可这句话却是在末尾，在边边角角上，而且涂得乱七八糟，这不明摆着是说“秘密”比奶奶的病还重要吗？

有一次我们一封信也没收到，而娜佳却收到两张明信片：她立刻抓在手上，跳到花园里，在林荫道上跑了很远才停下来看地址和寄信人——那明信片上还带图画呢。喜悦，更主要的是自豪，旋风一般把她卷走，就像把一片清新的树叶卷进暴风雨中。

一个女儿的主要朋友是“卓娅”和一个叫“古扎尔契克”的女孩，另一个女儿的朋友是永远不变的“娜塔莎·波列瓦雅。”

（1912年6月12日）

※ ※ ※

有些人就像桥，他们活着只是为了给别人提供方便。桥上的人行色匆匆，没谁会回过头来，没谁会看一看脚下。而桥却在默默地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服务。

在叶列茨，我们的“外婆”亚历山德拉·亚德里安诺芙娜就是这样。

※ ※ ※

有时“有法律根据”——双腿反而会发抖；有时“违反法律”——心中倒有鸟儿欢唱。

※ ※ ※

以狡猾使灵魂复杂化——这就是拜占廷。

这就是拜占廷——从混乱的宫廷生活，到正统的教规，到手稿上的眉批。

（在林中散步时）

※ ※ ※

……何来这没完没了的怨恨？
在整个自然界中
他什么也不想赞美。

（关于果戈理）

……惊恐地抓住十字架的恶魔。

（临死时的果戈理）

※ ※ ※

——孩子们，你们读夏洛克·福尔摩斯① 是有害的。

自己却推开纸笔，悄悄地读上了瘾。

每本书四十八页。现在，就是在梦里也能看见“西维亚耶尔斯卡雅－彼得堡”的列车。可我还要“开夜车”，有时甚至开到早晨四点钟。可怕的经历。

① 此处指的是俄国一无名作者的仿作，而非英国柯南道尔的系列侦探小说。洛扎诺夫多次谈到这些作品。

※ ※ ※

歌儿来自鲜花盛开的地方。

※ ※ ※

读了《俄罗斯信息报》上的一篇文章，话题是由在赫尔辛基附近触礁的一艘驱逐舰引起的，作者高兴得简直忘乎所以了。何止是驱逐舰：当我们在对马岛，沙河，奉天被打得丢盔卸甲时，难道整个社会和舆论界没有拍手称快？记得三年前克修宁说过："日本大使在掌握了俄罗斯左派报刊上的反日文章之后（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其他什么场合）公开表示：'他们的现在的口气令我吃惊：三年前（战争期间）俄罗斯政治激进派的刊物说起我国时态度还是友好的。'""您知道吗，"克修宁笑着补充道，"那时激进派说日本好，是因为日本需要他们（目的是要瓦解与之交战的国家的士气），付给他们钱。"从日本大使的语气来看，他确实是这件事的主谋。是的，政府是得罪不起俄罗斯舆论和社会的，一旦惹恼了它们，它们会把俄罗斯撕成碎片，分给左邻右舍，甚至不要钱，只要"一小杯"表扬就够了。正因如此，才需要毅然决然地，毫不犹豫地站在"无能的政府"一边，毕竟只有它在捍卫和维护俄罗斯的一切。毕竟在俄罗斯只有它尚未失去廉耻之心，没有被喝掉。

※ ※ ※

狠毒啊，狠毒啊，狠毒啊，活活把一对有情人拆散。巫婆。巫婆。巫婆。你竟然敢为婚姻祝福。

（关于英国教会，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

《蓝色纹身》和《地下维也纳》中的家庭
故事。“新娘”必须回到流氓身边，尽管
这个流氓是他的仇家：此人用刀刺伤了她
的丈夫，同时占有了他的结婚证书，逼得
他离开妻子，逃到美国，好多年有家不能
回；不凑巧，这个流氓又长得酷像她的丈
夫，他便来个偷梁换柱；根据教会法律，
这位贵族小姐应该是他的妻子。)

※ ※ ※

那里有玩具鞋，洋娃娃，那里有圣母像（石膏的，从喀山带回来的），皱皱巴巴，残缺不全的安徒生童话，装叶夫图舍夫斯基编的“习题集”的空壳子，但最多的还是瓦夏的画：每次看到孩子的这堆东西，我总是特别高兴。

（离开别墅前整理书籍和其他物品时）

※ ※ ※

老伴总以为我没有手，没有脚，最主要的是没有脑袋。瞧，她又在收拾和整理我的纸头，手稿（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书籍。回到家：

——瓦莉雅，毛巾！

——毛巾？

——是，快点！你把脏的藏起来了，可干净的在哪儿呢？

不吭声。

——说话呀！

——等等。毛巾。我放到箱子底下了。因为很需要。

凡是“很需要”的东西，她永远放在箱子底下。

——我马上拿来！马上！稍微等一会儿（一副紧张，抱歉，害怕的样子）。

可怜而柔弱的人，把整个箱子翻个底朝天。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这样。

毛巾总算是找到了。巧得很，每次都只有毛巾能顺利找到。然而，比如说，钢笔和鹅毛笔就不同了。或者还有——羊毛衫，天冷的时候。有一次，见她东翻西找怪可怜的，我便索性穿了件棉衣，当时正值九月份最热的几天（“倒三伏”），热得我直冒汗，浑身无力，难受极了，“因为夏天的衣服全都收起来了”，不用说，是“放在了箱子底下”。

（消夏结束准备回城时）

※ ※ ※

……是的，但要知道，问题在于未婚夫，同学或朋友要比我们当父母的更关心我们的孩子。

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孩子对朋友比对父母“更坦诚”，跟朋友的关系比跟父母更亲密？

成长的过程就是脱离的过程。要脱离的正是父母。孩子好比树干上的树枝，难道树枝不是每天都在逐渐远离树干——就它的“绿叶”，它的“枝头”而言？这“绿叶”和“枝头”中，蕴含着它的思想，它的心灵。人，孩子，家庭也是这样。命运。与生俱来的命运。你流泪也好，不流泪也罢，这些都无法改变。

让宗教界人士来解释一下女孩子的乳房是为什么而长大的吧。

——为了喂养孩子。

——那么，“然后”又是为了什么呢？

再也说不出什么，除了：

——为了生孩子。

这等于将整个禁欲主义一笔勾销。

究竟是什么人竟敢鼓吹禁欲主义？是除了赫拉波维茨基，赫尔莫根和拉钦斯基，谁也不需要的苏兹达利修道院。

※ ※ ※

从《隐居》出版的那天起，舆论界便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是别列多诺夫或斯麦尔佳科夫。谢谢抬举。

（一系列反响）

※ ※ ※

既然如此，我就跟老伴在一起吧，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人。

她一向很重视我写得如何（凭自己的感觉），却从来不在乎别人如何写我。并不是说她漠不关心，而是……读完就去泡茶。碰上我哪篇文章写得好（根据她的评价）——她会高兴一天，有时甚至会高兴到第二天早上。

（1912年7月16日）

※ ※ ※

我的整个生活，尤其是我的个性，其实要粗俗得多。

我抽烟，她读赞美诗，这就是各自一贯的态度。

（赖在床上不起来）

※ ※ ※

洗完澡，来一支烟，一份马林果加牛奶，再来一根六月底腌的，不太咸的，边上系着莳萝的黄瓜——这就是我的“十月十七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个“十月党人”。

（在浴室里）

※ ※ ※

……始终不渝地跟上帝在一起的绝对不是我，而是她；只不过见她始终不渝地跟上帝在一起，我也就投入了上帝的怀抱。

但话又说回来，从上大学（一年级）时起，我就始终不渝地爱上帝了。从上大学时起，我已经离不开他，忘不了他。

（我和老伴：7月21日）

※ ※ ※

教会非凡的力量（其实）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是在自己灵魂和生命的最佳时刻——受苦受难的时刻，心痛欲裂的时刻，诚惶诚恐的时刻，失去依托的时刻——投靠教会的。“某某人死了”，“我自己要死了”。谁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判若两人。正是这“判若两人”和“最佳时候”把叫喊，呻吟，眼泪，祈求带到了教会。既然这个地方“来者不拒”，它自然也就成为最佳和最强大的所在。它抓住了“所有人的心尖”，所以，再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它这里更强大了。

（7月23日喝早茶时）

※ ※ ※

……毕竟存在这样一种阴暗的，连上帝都要征服的东西。

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并非上帝为我们造福”。但这一点，人的灵魂已经彻底无法承受。任何人的灵魂都会因这一想法而死去。不是人死去，而是他的灵魂死去，窒息，毁灭。

由此可见，宇宙万物中，真正可怜的是我们——人。

（深夜）

※ ※ ※

每天早晨，一头疼便问：“为什么你不叫卡尔平斯基来?”“为什么你不叫卡尔平斯基来?”“为什么你不叫卡尔平斯基来?”

（1912 年整个夏天）

※ ※ ※

……而我认为，只应该像写《隐居》那样写：完全不必考虑读者的“口味”。

※ ※ ※

你们没有灵魂，先生们：所以产生不了文学。

（吃晚饭时；关于出版物）

※ ※ ※

从远处传来：

——妈妈！妈妈！

——傻丫头：母亲有病，你应该到她跟前来，而不是叫她到你那儿去。

几个男人把三十个箱子搬到马车上。

——好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文具盒拿走了？我要用。

十五岁。个头跟母亲一样高。一所“运用最佳教学方法的新学校”的学生。

旅游回来。见到了基辅，也就是开往基辅的火车。所有的手绢都丢了，还有一件新上衣——也没了影。

（搬入新居）

※ ※ ※

我的意思是通过“朋友”得到领会的。一切都注入了人性，我得到言语，得到升腾，得到力量。一切既充满“尘世气息”，又充满天国气息。

※ ※ ※

说实话，我们了解较深的——只有自己。对其余的一切，我们只能推测，询问。然而，既然唯一“不掩饰自己的现实”是“我”，那么很显然，你就应该讲述“我”（如果你能够，你擅

长)。《隐居》的诞生很简单。

※ ※ ※

最实在的东西就是现实。

(整理书籍和考虑我为何出版《隐居》时)

※ ※ ※

报纸来了。还有信。我瞥了一眼:

——这是瓦莉雅的来信(从皇村,从学校寄来的)。她说……

——不,给我眼镜……娜佳(佣人),给我眼镜!我自己念……

而信上只有这么一段:

"亲爱的妈妈!吻你,深深地吻你,你身体好吗?问全家人好。我很好,这个星期六回来。非常想家,没有塔尼娅真无聊。再见。

你的瓦莉雅·洛扎诺娃

※ ※ ※

我不要真理,我要安宁。

(看过医生之后)

※ ※ ※

我在一步一步走向坟墓。只有一个念头——死。

而在一年前,我竟然还在写"文学的重要性"。真讨厌。真愚蠢。

（看过医生之后："过程正在皮囊中进行"）

※　※　※

别赫捷列夫在1898年的一次误诊把一切都毁了（或许是漫不经心？或许是"安慰病人"?）。可怎么能说是漫不经心呢，既然在我写了一封长信之后，他们同意请"名医确诊"?

我和老伴怎能不相信，不放心？院士嘛。俄罗斯神经科和脑科方面的头号权威。

他说（关于哈尔科夫的安菲莫夫教授的诊断——我在信中向他做了陈述）："我向您保证，她没有这个病！"（他说得很肯定，肯定！太令人高兴了！）"安菲莫夫教授没有采用这种最新的膝盖反应研究方法，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将两肘大幅度向后拉并将它们捆绑起来，然后用小锤敲打膝盖"（这叫肌腱反射，能确定出神经组织的完好或破坏程度）。

尽管我和老伴一窍不通，但听了这番话，我们还是高兴不已。老实说，那天听了安菲莫夫的诊断，我们吓得"腿都抬不起来了"。

真是"死里逃生"，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根据卡尔平斯基的解释，她恰好没有安菲莫夫说的那种病，也就是说，安菲莫夫的诊断是错误的，她的病完全是可以医治的，相对来说是可以治好的（当然，不能耽搁）。

别赫捷列夫，头号权威的结论被推翻了。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安菲莫夫在1898年说了，从高加索"回到彼得堡后，你们再找一下当地的名医，首先要找别赫捷列夫，检验一下我的诊断是否正确"。）

随即我们又请教了两位医生：别赫捷列夫说"没什么，这是先天性异常，双眼的瞳孔不平衡。"

纳乌克则给开了五年的溴剂和樟脑，对神经系统组织遭到破坏的病人的神经进行“安慰性治疗”。“请注意她的头疼，”我说，“总是夜间，总是脑袋里边疼（像是受到压迫）。”听了我的话，他没吭声。既然他听见了，既然他没吭声也没询问（没当回事），那我也就放心了，只当一切都是因为一直贫血（全身贫血，自然大脑也就会贫血），这个毛病以前的医生早就说过了（从生第一个孩子没奶时起）。

但直到现在才搞明白为什么“没奶”。

卡尔平斯基的诊断完全相反：“对不起，不管是不是别赫捷列夫说的，既然这里和那里（瞳孔和肌腱）的反应消失了，那就说明，大脑中央受到破坏，动力（主管收缩）的神经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就是说，它们不起作用了，生病了；就是说，现在只需要寻找：这是怎么造成的？”

入情入理，令人信服。别赫捷列夫的诊断是错误的，一切都清楚了。

“假如没有早期的动脉硬化，假如能及时治疗，既不会发生心瓣退化，也不会因而导致中风”（卡尔平斯基说的）。

本来一切都是可以挽回的。现在晚了。

“让我们通过治疗来证明。”卡尔平斯基说。刚开始特殊治疗，病情就有了全面的好转：胸闷消失了，头不疼了，月经也正常了——这是所有妇科医生（也是大师——不看瞳孔）都没能做到的。

但这已经说明问题，我们得再接再励。心脏坏了，血管坏了。

就症状的确凿而言，瞳孔之于医学正如“伦敦在英国”之于地理学：遗憾的是，梅尔热耶夫斯基（阿伦斯堡的），纳乌克，罗森布留姆（卢加的），以及其他人竟然不知道。

记得从前我向亚·阿·斯托雷平谈起老伴的病时，他问道：

——谁是你们的医生（常规的）?

——纳乌克。

——听他的没错。

确实，他在彼得堡治好过许多人。斯托雷平不容置疑的语气无疑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给读者的忠告：根据书来检验医生。因为他们“经常不知道伦敦”。安菲莫夫，别赫捷列夫和纳乌克的荒唐错误毁了我们十五年的生活，夺走了孩子的母亲和“家庭的支柱”。

※ ※ ※

…………

——有什么办法，你也有老的一天，也会孤独。

无聊，孤独。

呻吟不止，却没人听见。

用拐杖敲别人的门，门却不为你打开。

（命运的轮回；一代又一代）.

※ ※ ※

是的，他们很可爱。但他们总躺着。

（俄罗斯人概言之）

※ ※ ※

十七岁之前她学过十字军东征，后来又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拜伦的《恰尔得·哈罗尔德游记》。

十七岁以后她进入第十一邮政分局工作，收寄挂号信。盖

章，开收据。

（在俄国革命史上）

※ ※ ※

满腔热忱地：

——假如给俄罗斯的气候中丢一颗炸弹，那么，俄罗斯的气候当然会变暖，跟在克里米亚南岸没什么两样！

宪兵：

——得了吧，小姐：只要长官不下命令，气候是不会变的。

（我们的革命）

※ ※ ※

人生亦尘土，死亦尘土。

※ ※ ※

梅列日科夫斯基有句妙语："俗气进入俗世"。任何时候都无法想像把这句妙语套在他身上。但命运摧残了他。作家没有读者意味着什么？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戈伦菲尔德（克拉尼菲尔德?），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这些先生们，以及文学爪牙们数十年的讽刺挖苦意味着什么？于是他自觉自愿地变得"俗气"了，为了"进入俗世"……

他确实是"进入俗世"了……请看，他已经在屈尊媚俗，哗众取宠，说什么亚历山大一世有"第二个家庭"……这对一个颓

废派作家，一个尼采信徒，一个“白衣魔女”的歌手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不错，“允许我们”有情妇，女演员，但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上面”应该给老百姓做出表率，成为家庭美德的楷模。我想，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也不明白他的那些哗众取宠的话是否表达了巴黎俄侨们的恶毒，或许他只是在抱怨亚历山大一世在自己的一生中竟然多次放任偏离《宗教法庭条例》。

他的“俗气”就是这样“进入俗世”的。如今他成了谢德林的罗斯的著名自由主义作家，连皇帝的“有失检点”都敢“揭露”。

然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尽管面孔和蔼可亲，却不曾是一个聪明人；确实不聪明，“笨手笨脚”。

不知为什么，跟他握手时我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多年以来，我很少从谁那儿见到过这样难以言喻的友谊（对我而言），似乎，具有爱的性质。愿上帝原谅他的罪过，也愿上帝原谅我的罪过（反对他）。这些罪过确实存在。他是我无法说清为什么不能喜欢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身上有很多忧伤，但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忧伤是冰冷的。忧伤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温暖的，但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它却背叛了自己的本质。

我想，在俄罗斯写作的作家（不能说是“俄罗斯作家”）当中，很少有人在心中，埋藏了这么多的忧伤。

※ ※ ※

俄罗斯说客到处游说。“俄罗斯说客”是一股尚未被政治家们注意到的力量。但又是国家历史中的主要力量。

你奈何不了他，谁也奈何不了。他会发动革命，筹划反叛。

他会召集工人，把立宪党人派进第一届杜马。俄罗斯突然变成非教会的，非沙皇的，非农民的，非酒徒的，亦非豪放的俄罗斯，戴上一副白手套，腋下夹着一本《欧洲信使》。这异乎寻常的奇迹，差不多是宇宙性的奇迹，全是那个俄罗斯说客所为。

罗斯是沉默寡言的，生性腼腆的，几乎不会讲话，这便给俄罗斯说客提供了用武之地，使他通行无阻。

※ ※ ※

粗野的人们，粗野得可怕。甚至仅仅因为这一点，或者主要是因为这一点，生活中才有了痛苦，这么多的痛苦……

（写在斯拉夫学会的请柬上；“胜利”）

※ ※ ※

灵魂在为自己痛苦，为世界痛苦，为过去痛苦，至于未来——“我看都不敢看它一眼”。

（同上）

※ ※ ※

基督教自身向世界表达和揭示了非受精的内容，一如犹太教和旧约揭示了受精的内容。

那里处处赞美精子，一切都源于精子，归于精子，精子本身就是无声的祝福。

这里处处讨厌精子，好像自身丧失了它。“再没有男性和女性”，只有“人”。也就是没有“希腊人和犹太教人”，没有部族，民族。

假如维纳维尔不来，这一切都应该是好好的：

——我早就说过，摩西和基督实际上是在给一个律师干活，他拍拍这些老古董的肩膀，把他们推到边上，开始谈论“全人类的文化价值”。

（写在文稿的背面）

※ ※ ※

似乎，文学的本质是虚假的：不是说现在的文学家不好，是整个文学领域不好，而且，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根本。

“只要我写出来，人人都会先睹为快……”

为什么是“我”写？为什么是“他们”要读？这里有这样的成分：“我比别人聪明，别人比我愚蠢。”这真是罪过。

人们根本没有发现，《隐居》中有新的东西。人们把它同卢梭的《忏悔录》加以对比，其实我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忏悔。

所谓新的东西，就是它的格调，带有手书性质的格调，就像是在古滕贝格时代以前，是写给自己的。要知道，在中世纪，人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版一说。尽管如此，中世纪文学在许多方面都是出色的，感人的，有力的，硕果累累的，虽然并不引人注目。新文学则明显地在过于招摇中毁灭了自己；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还不曾有人能抵挡得住古滕贝格的诱惑。

我的近乎神秘的真正的隐居却做到了这一点。斯特拉霍夫曾对我说：“要始终为读者着想，要写得让他们明白。”可我无论怎么为读者着想，到头来还是想不到他们。我想像不出一张读者的脸，也想像不出一个能对我作出评判的人。我始终一个人写作，其实是为自己写作。甚至当我写一些“应景之作”时，我仍然仿佛是与世隔绝，对周围的一切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喜欢在我们报社的接待室里写“社论”：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报社成员同

他们的谈话，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和喧哗声，再加上正在撰写《从国家议会中的最后一个发言谈起》的我。有时也在公共大厅里写。有一次我对同事们说："先生们，安静点儿，我在写黑帮文章（跳棋声，说话声，笑声）。"笑声更响了。可我反倒觉得更加安静了。

对已经发表的东西，我的感受是惊人的："这不是我的。"因此，谁若是骂那些发表的东西，我从不感到耻辱，而且，我有时还要笑着说："洛扎诺夫这个傻瓜总是胡说八道。"可有一次施佩尔克和阿丰卡来找我，要我读一遍已经写好的文章，我却紧张起来，害怕起来，生怕他们不肯放过我。还好，正在这时有人端上茶炊，叫我们喝茶（是好心的瓦利娅）。这才给我解了围。还有一次，在《艺术世界》编辑部，在场的有梅列日科夫斯基，费洛索弗夫，加吉列夫①，普罗捷克，努威尔② ……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我们读一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论普希金的随笔吧（校样）。"我顿时吓坏了，惊慌失措地请求他们别读。每当宗教哲学协会里有人念我的报告（念手稿并当着听众的面），我总是如坐针毡，以致什么也没听见（由于羞怯）。

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我对印刷品却处之泰然，不管里面说了什么，是好还是坏，是可笑还是可耻；也不管人们怎么骂。给人的印象是："好像这根本不是骂我，而是骂别人。"

灵魂的"手书性"就是这样赋予了我《隐居》的格调。这是与生俱来和挥之不去的，绝不是一意孤行和后天得到的。我认为，自有出版业以来，这是一种全新的格调。可以讲述自己的丢人现眼——可讲出来的东西还是要成为"印刷品"，可以虚构关于自己的"恐怖"——可最后还是要成为"出版物"。只有取消发表这一条路可走。于是，已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我，又向

① 加吉列夫（1872～1929），俄国戏剧活动家，《艺术世界》创始人之一。
② 努威尔（1871～1919），音乐评论家，《艺术世界》成员。

内迈出了一步，又朝背离自己常用的“刊物”（睡衣，内裤）的方向下滑了一级。我仿佛赤身裸体进了澡堂，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难。而且只有我一个人不觉得难。再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除非那个人跟我一模一样。不过我想，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世界上找不到绝对相同的两张面孔，就像找不到绝对相同的两种笔迹一样。

这不是品质问题，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才华问题，而是遗传问题。

归根结底是那个（近乎疯狂的）秘密，即我自己跟自己说话：这么恒久，这么专注，这么狂热，以致除此之外什么都听不见。我身上和我身边冒着浓烟，“四下里烟雾腾腾”，没人能看得见什么，没人能看得见我，“我们不认识这个世界”。确实，我很像一块冒着浓烟的木头（小时候我常从炉子里取出来玩）：你根本看不见它，看不见用来夹它的那把钳子。

上帝也是用一把钳子夹着我。“上帝用我给世界施放烟幕”。

有这可能。

※ ※ ※

姑娘们，奉劝你们别嫁给作家，别嫁给学者。

创作也好，学术也罢，全都是利己主义。

你们不会得到“朋友”，尽管他会自称是朋友。

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吧，嫁给一个官员，办事员，商人吧。最理想的是嫁给一个手艺人。没有什么能比手艺更神圣。

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你们的朋友。

※ ※ ※

生儿育女莫不也是一种对世界的倾诉?

默然无语和不通文墨的人们，除了孩子，再没有什么可对世界诉说了。

抱起初生的婴儿，年轻的母亲有权利说：“这就是我的预言。”

※ ※ ※

就连我身上的污垢也是美好的，因为这是我。

（一组恶毒攻击《隐居》的文章）

※ ※ ※

一直是老伴儿带我去领“养老金”……一年两次，这是她唯一坐马车的时候。无法表达我的兴奋。我抢先上车，她刚上来，我就迫不及待地对前面讲：

——走啦，走啦，车夫!

——走吧。——老伴儿说。

只有她发话车夫才会动地方。

这些日子是幸福的，可以把当铺的东西赎回来了，还可以买上大大的一整块糖（“将来用”)。养老金一次有一百五十卢布(一年三百卢布)。那些人可真是考虑不周，或更确切地说，是粗心大意：如果我们按月领，每月领二十五卢布，那么，住在自家

的房子里，加上一头奶牛，还是可以生活的。然而我们有时却到了这种境地，只能吃些烤洋葱（自己种的）和干面包。经常是一百五十卢布一下子用掉，于是一连三四个月身无分文。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家里只剩一个戈比。客人们对我说："去，瓦夏，买半磅面包。"我拿着一个戈比难堪极了，我没吭声，不想去，但最后还是去了。走进面包店，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一个伙计（大约十七岁）说："买一戈比面包。"他好像并没有说什么（他完全可以发笑），我太高兴了。

亚·安·鲁德涅娃作为教堂执事的妻子，也领养老金，好像每年六十卢布，每季度领一次。数目虽小，但我记得，每到那个时候，她的心情总是很愉快。他们家的开支每星期控制在三到八个卢布，这笔养老金算是帮了大忙！

我认为，老的养老金，这少得可怜的养老金，比现在"涨过的"，增加了近四倍的养老金更有意义。人，从根本上说，应该永远工作，应该永远是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一直到死。养老金绝不应该给他们完全的保障，不能让他们"无所事事"。养老金不是利息，可以凭它"无忧无虑地生活"，而是一种资助。

这笔小小的养老金，假设每人每年一百二十卢布，应该用得恰到好处。一年一百二十卢布，或者还要一年三百卢布，乘以十就是三千，乘以一百就是三万，乘以一千就是三十万，……俄罗斯每年偿还"债务"大约三亿；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用来支付养老金，那么，俄罗斯便会有五十万人，也许是最优秀的人得到接济！

如果是我，我愿本着圣经精神，用这笔钱创建一个"西顿寡妇基金会"。我还愿为之推荐救济对象：一半是神职人员，一半是医生。

※ ※ ※

我跟M.[1] 的关系一波三折，可谓一部完整的“历史”，而且是不明不白的。不知为什么（的确不清楚为什么）他始终爱我，甚至当我在刊物上公开对他进行恶毒攻击和肆意侮辱的时候(虽然我不无理由)。换一个人早拍案而起，暴跳如雷了，即便是我也会耿耿于怀，可他却以惊人的方式一如既往地爱我。有一次参加宗教哲学大会，我背对观众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根据会员的职位)。人差不多都到齐了。“昨天”刚有一篇文章攻击他，不用说，人人都读了。忽然，M. 和自己的济娜[2] 走了进来。我赶紧把头埋下，尴尬极了。我想：“还是让我们装作谁也没看见吧。”但他却出人意外地坐在了我的左边，还平静，谦虚但又大声地跟我寒暄，握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改争辩的口气，当场为我讲了一番并非吹捧，而是实实在在的好话，对我的文章给予了最高程度的肯定。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样的举动勃洛克[3]也曾有过：听了一篇关于他的侮辱性文章之后，他竟远远地朝作者点头，然后还走过去，跟作者握手。这是怎么回事，我百思不得其解。M. 一直爱着瓦利娅，尊重她并在内心和精神上关心她(我能感觉得到)。而我却给他们所有的人都制造过可怕的痛苦和烦恼（我总克制不住冲动)。正是因此，虽然是后来的事，M. 和ф.[4] 才去了《俄罗斯语言》，要求：“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他(瓦尔瓦林)[5] 主持报纸工作”，亦即要求开除我，值得庆幸的是，这并没能动摇我的地位，因为我已在资金上立稳脚跟（三万

① 指梅列日科夫斯基。
② 即梅氏夫人吉皮写斯。
③ 勃洛克（1880～1931)，俄国象征派诗人。
④ 指费洛索弗夫。
⑤ 洛扎诺夫的笔名。

五千卢布）——这只说明我的“作风的坚定性”（今天还要加上“公益心”），跟灵魂并没有什么瓜葛。在生活中，很少能碰到这样的爱，这样的休戚与共，难分彼此：愿上帝赐福给他的名字，他的精神，他的命运；愿上帝保佑他的济娜身体安康（这是他最最需要的）。

这是什么，难道我将拥有读者（《隐居》的成功）？

这只不过是跟我在一起的斯特拉霍夫、列昂季耶夫、哥沃鲁哈－奥特罗克①（尚未出过书）会有读者，会留下印象，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也许是无用的成功）：也可能是弗罗伦斯基和勒齐。

对“自己”来说——不需要，或许也不应该。

不过，我想对什么产生影响呢？

对人的心理，对人的灵魂，对他们（读者）的个人灵魂的零碎性和松散性。对思维方式我一点儿也不希求有什么影响；对“信仰”——甚至连想也不想。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我自己曾像更换手套一样更换过信仰，而且对套鞋（是否结实）远比对信仰（自己的和别人的）更有兴趣。

如果是我受到影响，好不好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在我心目中，“理解我的人”就是最优秀最有意思的人，难道这是异想天开？我深知，这并非出于自尊。看见他们满腔热忱地感受着人的灵魂，世界，母牛，星辰，一切，我不能不把自己的赞同，自己的爱倾注在他们身上。我读过茨维特科夫不少关于受苦的鸟儿和生病的狗的故事，还有一篇关于一个西伯利亚神父的故事：妻子得了麻疯病，他照料她，服侍她，最后同她死在一起。读了

① 洛扎诺夫的论敌。

这样的东西怎能无动于衷呢？这样的人才是我的好兄弟，我自叹不如的好兄弟啊。尽管斯特鲁威① 一个劲儿地给我灌输什么“党”啊，“没有党派就没有政治”啊，诸如此类，我仍然“顽固不化”，一如他在我眼里也是顽固不化。有鉴于此，如果我能产生影响，我希望“我的影响”能表现在拓宽人的灵魂方面，使之“呼吸一切”，“吸收一切”。但愿人的灵魂能更加温柔，但愿我的耳朵能更大一些，鼻孔能更粗一些。但愿人们能“闻到所有鲜花的芳香”……

此外我别无他求：

整个王国将被她毁灭，
整个宇宙也受到她的威胁（指死亡）。

既然如此，一个人，一个可怜的人，除了闻一闻田野里的花香，还能剩下什么呢？

闻了。死了。随即是——坟墓。

※ ※ ※

我固然很重视智慧（没有它会很无聊），但无论如何不欣赏它。

有智慧，就会有意思，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不知为什么，它不能使人赞叹使人倾倒（完全是另一范畴）。

上帝何以让我们心向往之？

显然不是凭借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那么究竟是什么？

① 斯特鲁威（1870～1944），俄国哲学家、政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我的欣赏点始终在灵魂，正是它让我神迷，让我陶醉（像听音乐）……灵魂是魅力无穷的（完全是另一范畴）。那么，上帝是否凭“魅力”使世界心向往之？至少他是凭灵魂，而不是凭智慧。上帝是世界的灵魂，而非世界的理性（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 ※ ※

有多少游手好闲的知识分子在夸夸其谈啊，而有远见的犹太人却占据了药店（平均每条街上有两家），且没有一个俄罗斯人被录用，哪怕是当伙计。今天我在一家药店里大声叫喊：“犹太人，你们把一切都握在自己手里了。”一个年轻的犹太女人在收款台旁回答：“让俄罗斯人跟我们合伙吧。”

——这可是利润百分之百的生意！——我说，借用一位搞园艺的俄罗斯人的话（在澡堂里碰上的）。

——不对，只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 ※ ※

一个俄罗斯懒汉嗅着空气，看有没有“反对派”的气味。发现有以后，马上尾随之，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仿佛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存在的理由，找到了自己的意义，找到了“天国”。俄罗斯怎能没有反对派呢，既然它能这样安慰所有的人并能解决成千上万的个人问题？

“这样”生存是颇为尴尬的，但“这样”对待反对派则是世

俗的 comme il faut[1]。

来了一个浑身臭烘烘的平民知识分子。他带着自己的仇恨而来，带着自己的妒忌而来，带着自己的肮脏而来。仇恨，妒忌，肮脏，不过，却有自己的力量，且这一点给他罩上一圈“否定的恶魔”之光环；但恶魔的后面隐藏的不过是一副奴才相。他不是黑，而是脏。他毁了从杰尔查文到普希金的贵族文化。文化和文学……

（文学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
米哈伊洛夫斯基对他们的陶醉）

※ ※ ※

我是否喜欢女人的身体？

除了神秘因素……具体的？就是旁边的“这位”和“那位”？

不错，正是旁边，但仅此而已，一直想触摸一下（却从未碰过）。从小时候起。总是在欣赏，脸颊、脖子，特别是乳房。

可是，一回过头，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能够刻骨铭心的始终是灵魂和其中的苦痛（瞬间的印象会成为我长久的记忆）。

凶恶的东西（“凶恶的女人”）甚至不会使我产生兴趣。在肉体中，我喜欢的是它的善良，它的善良的品质。

我觉得，“旁边”的女人们感觉到了这一点。那是在索洛古勃晚会上，大概是《十二个幽灵》的演出吧。人黑压压的。我坐

① 拉丁语，头脑发昏。

在十六排，见第三排有个空座，我便在最后一幕开始前坐了过去。旁边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士。由于一切根本不是由“幽灵”，而是由袒胸露乳的女演员组成，我便在幕间休息时既像是对这位女士，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人们对这一切加以嘲笑，把这一切视同儿戏。而其实，这一切对健康是多么重要啊！要对这一切进行保护，使之不受束缚，不被否定，要让与此相关的一切能够得到及时，自然和良好的体现。

这位女士抬起眼睛严肃地说：

——啊，是的！

——年轻的母亲多么妩媚动人啊！她们的性格、灵魂得到再造。出嫁是第二次诞生，是对第一次诞生的修正。父亲没有完成的东西，由丈夫来完成。他能让姑娘走向完美，只因为他是丈夫。

——啊对！对！对！——她兴奋地说，她的声音里好像掺杂着个人感受。

沉默片刻，她又说：

——我有个女儿，出嫁了……

——有孩子吗？

——有。几个月了。但早在生孩子之前，刚成为妻子时，就开始变了，变得丰满、红润。从前面黄肌瘦，成天生病，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出嫁以后，这一切全都不见了。她变得妩媚、娇艳了。

——孩子呢？她自己喂养吗？

——对，是的！是的！自己喂养。

我是她的什么人？坐在第三排她右侧的“邻居”，周围尽是些古板的人。但对“肚子”的兴趣在瞬间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距离，使人们“一见如故”，成为朋友。“肚子”所具有的这

种巨大的凝聚作用，社会作用是惊人的，感人的，高尚的，崇高的。产生于“肚子”的思想并不比产生于（相当空洞的）头脑的少。而且这是最崇高最热烈的思想，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同样的东西托尔斯泰也有。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① 不是很满意我们来访（因为未经她同意；她权力欲很强）。但当我们聊起来(就她致安德列耶夫的一封公开信)，才认识半小时，她就已经不把我们当外人了。她给我们讲生了几个孩子，怀了几次孕，如何用母乳喂养，等等。她是个从里到外都很出众的人，我很喜欢她。她讲话很坦诚，很直率，很大方。

她是个举止高雅、仪态端庄的人。

我对女人（和姑娘）的态度是这样的：永远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的命运，永远好像无形中我牵着她们的手（谈话的线索），把她们引向怀孕、生产和喂养孩子，由此发现她们的存在的最高理想。

有一次（也是在剧院里）碰到诗人 C. 和他的妻子——他们俩变得那么漂亮，气色那么好看，简直认不出来了——我说：

——你们从前走路“两脚朝天”(两个都是颓废派)，而今走上“洛扎诺夫道路”了……

——走上什么“道路”?

——最最普通的道路。很快你们俩将青春焕发。从前他脸色多难看啊，还有您——骨瘦如柴，一副病态！现在他是容光焕发，而您的乳房也增高了。

他们俩坐在椅子上，略显笨重。不过“完全是正常的”。

他们俩有说有笑，始终很快活。

——您知道吗，当文学界不再哄传你们快要结婚了，很多人都表示担心。要知道，他的诗是那么残酷和肉麻，到处是鬼影晃

① 即托尔斯泰夫人。

动。

我永远忘不了她那无比温馨的回答。令人振奋：

——比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更善良的人世上没有，没有！您是那么善良、体贴、关心别人！

她整个光彩照人。是经验和知识使然。

这真是奇迹，且创造奇迹的竟是一条“普通的道路”。有点头脑的女人都有能力矫正丈夫的不足，在夫妻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把他引向理想，使他变得更加美好。她在夜间用窃窃私语和柔情万种给他以强有力的引导。“好吧！好吧！”——凡事不能操之过急，要在潜移默化中使他日臻理想，日臻完善。

性是一座山，一座高山，一座光明之山，它的光芒能照亮整个大地，赋予大地以新的，无比崇高的含义。

相信这座山吧。它就屹立在四条木制的腿上（这里不允许有铁或其他硬金属，“扎人”的钉子也是一样）。

我见过这座山。我可以作证。并将誓死捍卫它。

※ ※ ※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以自身结束了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到他们自己这一灿烂时期。

论创作技巧的高超托尔斯泰仅稍逊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他没有莱蒙托夫的精雕细刻，如《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也没有普希金的多姿多彩，如《回声》；更没有果戈理的淋漓尽致，如《死魂灵》……就连普希金的片断，小作品和删掉的诗句中也没有平庸和败笔……但托尔斯泰的平庸之处很多……

不过，托尔斯泰也有超过他们三位的地方：这便是整个生命的高尚和严肃；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想做什么”。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并没想做什么特别的事”。尽管对这样

的天才来说是很奇怪的，但事实的确如此。他们所做的恰恰是结束一切。他们恰恰是整个文明的落日和黄昏。一般说来，晚上是“不想”的，只有早晨才“想”。

俄罗斯的海洋——光滑如镜。一切都是“倒影”和“回声”。记忆的“回声”……富丽堂皇的“拉斯特列利[1]风格”随处可见：在宫殿中，在事件中，在节日中，在悲伤中……爱尔米达日[2]，杰尔查文和茹科夫斯基，公共图书馆和卡拉姆辛……在“拉斯特列利风格”中甚至有反对派，这便是十二月党人。

寂静的，安宁的深夜。
空气透明，天空闪烁……

突然有个魔鬼用棍子搅动海底，于是从海底升起一股股浊流，沼泽的气泡……这是果戈理来了。果戈理身后：一切都完结了。苦闷。困惑。仇恨，很多仇恨。“多余人”。苦闷的人。糟糕的人。

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把我们的君主制朝不同的方面拉”。——“哎，万卡，你怎么站着不动，拉！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戈利尔卡[3]。特列帕克舞[4]。快速蹲踏动作。不错，这已不是“宫廷盛景”，而是“遗失街的风习”了……

托尔斯泰从这迷雾中抬起头：“去找理想！”

作为一个作家，他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之下；但作为一个人，一个高尚的人，他在他们所有人之上。他甚至可能不

① 拉斯特列利（1700～1771），俄国建筑师，巴洛克风格的代表。
② 爱尔米达日，即国家美术馆。
③ 戈利尔卡，乌克兰的伏特加。
④ 特列帕克舞，乌克兰的一种民间舞蹈。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执着于崇高伟大的理想。

这就是他胜过所有作家的地方。

应当承认，他的天性并不像普希金那么高尚。天性是一回事，而愿望，“梦寐以求的东西”，则是另外一回事。托尔斯泰“梦寐以求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崇高。

※ ※ ※

对旧的东西的尊重应该是虔诚的，而不是疯狂的。

（致旧教徒和教条者）

※ ※ ※

生命像表面的颜色一样消失。这是多么可怕的“消失”啊。可怕的恰恰是时间范畴。可怕的是与时间的联系。

人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过客。有谁能承受得住这个想法呢……

哦，我多么渴望永恒。“时间的奴隶”，绵延的世纪和短暂的瞬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哦，我不要这“时间的奴隶”！

（1912 年 7 月 11 日）

※ ※ ※

只有痛苦能为我们展示伟大和神圣。

痛苦之前是美，是善，甚至是大；但永远不是伟大，不是神圣。

（1912年7月1日）

※ ※ ※

我们为爱而生。

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煎熬。

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那个世界里受到惩罚。

（1912年7月1日）

※ ※ ※

我没有把老伴儿从病魔手中解救出来。而我是能够做到的。只须对她多一分关心，对钱币学，对金钱，对文学少一些兴趣。

这就是我唯一的和全部的痛苦。不是“基督”，绝对不是。“基督”没有我照样是“基督”。他什么也不缺少。而老伴儿却只有我。

我曾经守护她。却没能保住她。这就是我的痛苦。

生活要求有准确的眼睛和坚强的手。生活不是眼泪，不是叹息，而是挣扎，可怕的挣扎。眼泪——“留在家里”，“咽在肚子里”。外表——是铁。只有包着铁的房子才是结实的、坚固的。

我身上的铁太少了，正因如此老伴儿才会这么艰难。她一个人拉着一辆大车，气喘吁吁，苦苦挣扎。她是为我而挣扎啊。

如今拉车人倒下了。而我能做的却只有哭。

（1912年7月2日）

※　※　※

神父们——是基督身旁青铜铸就的军队。

基督的眼泪和痛苦在他们身上一点儿也没有。自打生下来我就没见过一个会哭的神父。甚至“没功夫哭”：总是没完没了的“职责”和“公务”。

作为军人，他们要保卫基督，但同时又在扼杀他身上的秘密和主要的东西。

（也许，只是“我们的神父们”？而且，显然不是全部）（半年后，亦即这个想法产生并记录下来的半年后）

顺便说一句，我从未见过有谁像神父那样，对死亡无动于衷。“这个形而上学对我们算不了什么”。

（对，这——不是全部）
（想法产生半年后）

然而，抨击归抨击，没有神父我们又会害怕。他们始终有流泪的可能，实证主义就没有可能。

泪水不足，这是神父的缺点，而实证主义者根本没有眼泪，且这绝不是“缺点”。这就是二者的天壤之别。

（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毕竟神父更可爱）（半年后补记）

※ ※ ※

一种模糊和黑暗的东西在挥刀宰割。

怎么回事?

没人知道。

※ ※ ※

犹太人秘而不宣的追求便是做一个体面人。他们总是洗澡，洒香水。犹太人不会挑不漂亮的女人跳舞，他们要挑最漂亮的，而且要一直跳到脚跟发软才肯罢休。让我们再回到“体面”二字上：犹太人极力要洗掉身上的一种世界性的污垢，一种亘古的汗臭。但却总是洗不掉。所以始终战战兢兢，生怕邻居会因为这汗臭避而远之。

(想起了布良斯克的一个晚会，有一些药剂师参加)

※ ※ ※

作家的才华不知不觉地蚕食着他的生命。

蚕食他的幸福，蚕食他的一切。

才华是厄运。一种令人头重脚轻的厄运。

(1912 年 8 月 1 日)

※ ※ ※

有孩子虽苦犹甜。没有孩子——幸福是多余的。

我遗嘱我所有的孩子——一个儿子四个女儿——人人都要有孩子。没有孩子的女人，其命运是可怕的，迷惘的，苦涩的。

没有孩子的女人是罪人。这是洛扎诺夫给整个俄罗斯的“遗训”。

（除了“月亮”人，“我不想！我不想”的自然界）

※　※　※

我们不是因思考而爱，而是因爱而思考。

甚至在思想中，首要的仍是心灵。

（备课时）

※　※　※

有人说，我给自己的书（《隐居》）定价太高，可要知道，我的文章饱含的不是水甚至不是人的血，而是人的精液。

世界是否充满了我们尚不知晓的恐怖？

是否因为人的头脑尤其是心灵会对它不堪忍受，才没有完美的品行？

我们是一群可怜的小鸟……营营苟苟，得过且过。

人人都在想像：灵魂即本质。但它为何不是音乐？

于是便寻找它的属性（“对象的属性”）。但它为何没有形态？

（早晨喝咖啡时）

※ ※ ※

我全然不是“争取”（梅列日科夫斯基），而是抓住了胜利。可当我看见死亡，我的手松开了。

（在马车上）

※ ※ ※

世界的痛苦战胜了世界的欢乐——这就是基督教。

于是幻想回归欢乐。这就是多神教的忧虑。

一切都将消亡，我们将消亡，我们的事业将消亡。
爱呢？
不会。
想要思考。

为什么我这样固执己见，坚持“消亡”一说呢？

将有那么一小块土地，人们在那上面销声匿迹。上帝啊，整个大地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没有自信就成不了强者。但这自信也能助长人身上的不谦虚。

我有时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的那种可恶的东西，是不是由此而来？

（在“城外”村）

※ ※ ※

要学会隐居，要学会隐居，要学会隐居。

隐居是灵魂最好的卫士。是灵魂的庇护天使。

隐居中有一切。隐居中有力量，隐居中有纯真。

隐居是集中精神，是——还我“完整的我”。

（1912年7月31日，早晨喝咖啡时）

※ ※ ※

对人要忠诚，上帝不会以不忠诚来回报你。

对友谊要更忠诚，对爱情要更忠诚：其余的清规戒律可以不去理会。

（7月13日）

时光飞逝，我们要互相亲吻。岁月无情，我们要互相亲吻。

我们不会互相责备。甚至当责备是对的，也不互相责备。

（7月28日，纳乌克① 去世，《新时代》
里的讣告；老伴儿哭了）

※ ※ ※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一个醉醺醺的神经质的婆娘，咬住了俄罗斯的“败类”并成了俄罗斯的预言家。

“明天”的预言家和“久远过去”的歌者。

① 纳乌克，洛扎诺夫的家庭医生。

“今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 ※ ※

我爱茶，我爱给香烟打补丁（在断裂处）。我爱自己的妻子，自己的花园（在别墅）。从不紧张（除非生病在家），从不着急。

愿上帝把如此“太平的居民”赐给所有的国家。罪过呢？那么谁又能无过呢？

我不明白。愤怒，灰尘，垃圾，有时是石头。简直是倚着圆木打盹儿的一条小鱼旁边的一个可怕的“漩涡”。

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学界那么恨我。我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一条小鱼——很分明。还有水，还有空气。他们需要什么？

（一组书评）

※ ※ ※

欧洲文明将毁于恻隐之心。

正如希腊毁于哲人（诡辩家），罗马毁于寄生虫（贵族派桌边的食客）。

欧洲文明的毁灭机制表现在对形形色色的下流和暴行斗争无力；到最后罪恶将摧毁世界。

请注意，一切善良、纯朴、安宁和仁慈的东西现在已经开始受到排斥、嘲笑、歧视和凌辱了。他杀了八十岁的祖母和她八岁的孙女。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不感兴趣”。突然出现——“穿

呢大衣的小市民”（《罪与罚》）举刀刺向那些人的脸。大家全都跳上车，逃之夭夭：“他侮辱了人的尊严”，他“做了不文明的事”。

由此看来，“毁灭”不是因为恻隐之心，而是因为假恻隐之心……现正处于断裂之中……文明将毁灭于是非颠倒，善恶不分，毁灭于对作为道德核心的，“与生俱来”的基本美德的歪曲……在古希腊这是智慧，在古罗马这是君权，在基督徒这是爱。“人道”（社会的和文学的）就是一种冰冷的爱。

请看：冰凌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钻石。

正是这些“钻石”毁灭了一切。

※ ※ ※

我给索洛维约夫（《论自由和信仰》）提的一个老问题不是没有道理：“您要自由干啥?”内容需要自由（以便发展），但没有内容的东西何必要自由？又能有什么样的自由？要知道，俄国社会是没有内容的。

俄国人并非没有内容，但俄国社会的确没有内容。

※ ※ ※

深深的困惑：如何出版“我”？如是“全部著作”，那就会成为赫拉斯科夫① 的“俄罗斯集成”，谁会去读它呢？差不多有三十卷。而三十卷的作者永远等于零。如果加以筛选，择其精华，编成三卷左右，那么，令人感到棘手的是：我整个世界观的若干“利箭”（成就，高峰）只是表述在给别人的文章、给杰尔诺夫、

① 赫拉斯科夫（1733～1807），作家。

福济、西科尔斯基作的注释中……

怎么出版呢？完全的困惑。

真是个没有类型，无从编辑的奇怪作家。

无论如何，我跟出“三十卷”者是不共戴天的：这意味着埋葬一切。

（在别墅吃晚饭时）

※ ※ ※

托尔斯泰根本不是一个信教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灵魂，跟果戈理一样。两个人都害怕宗教，害怕黑暗的，不为人知的，陌生的东西。

（1912年5月27日）

※ ※ ※

文学给我的感觉有如裤子。如此亲近且完全是“自己的”。爱护它，珍惜它，“永远穿着它”（我始终在写作）。但何必要跟它以礼相待呢?!

我的超乎寻常和全部底细在于：我不能设想文学“在自己身外”，比如，“在自己房间之外”。

（清晨起床时）

我对文学的“了解”只是身体上的，接触性的，而且并不及我的“不了解”来得深刻。如果用天平来衡量的话，那么，“虚无”的一边（即空的一边）反倒要重些。正是由于这不均衡造成的波动，才产生了一切。

当然，我知道（看得见）有杂志，有报纸，一切都“按部就班，各得其所”。订阅，邮局。但“仿佛是在梦中”，而且我几乎

“并不相信”。我不要求到这里来，也不在这里报出自己的姓名。“这里”还是“那里”，对我全都一样。

（文学中）宝贵的东西正是裤子。永恒的，温暖的。不拘礼节的。

作家的秘密在于指尖，而演说家的秘密在于舌尖。

这两种本领，写作和演说，永远势不两立。在二者中，智慧起的作用很小；这是参考资料，办公室，写字台等等，诸如此类。但这不是真正的激情，也不是那种独一无二有血有肉的才华。

(11 月 21 日，圣母进堂节。我喜爱的节日——它联系着我记忆中叶利察那座可爱的圣母礼拜堂)

※ ※ ※

野蛮和暴力能带来的“成功”是百分之二，而热情和殷勤能带来的“成功”是百分之二十。

这一点犹太人比谁明白得都早，还是在基督诞生之前。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成功”，而对手永远“失败”。

这就是整个历史，既简单又复杂的历史。

骂娘的犹太人，打人的犹太人，甚至粗鲁的犹太人，我从未见过。但他们的针相当锋利。在生意上，在财富上，在荣誉上——在他们开始把这一切从别人手中夺走之时。

犹太人总是从献殷勤和提供服务开始，而以获得权力和统治地位告终。

因此，在第一个阶段，你抓不住他们的把柄，也无法排除他们。当有人只是为你效劳时，你能怎么办呢？而在第二个阶段，他们已羽翼丰满，所向无敌。“大水淹没了一切”。

于是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劫难逃，纷纷毁灭。

（吸烟时）

※ ※ ※

苏沃林死了，但周围到处是他——他的事业，他的精神，他的“一切”。印刷机依旧在隆隆作响，报纸依旧在发往各地，仿佛还听得见他说：“真想跟校对上去一趟”（去办公室，去“自己那儿”）。

但他毕竟不在了。“不在了”——又好像还“在”。这“不在”与“在”之间的摇摆太可怕了。这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

甚至还会增加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可恶。“人似乎跟我们在一起”：这远比“他永远不在了”更恐怖。在“他永远不在了”中，有的是悲伤，怀念，眼泪；而这里的工作的继续将最大限度地淡化死亡的意义，死亡的“一切”。

“人似乎没死”，这太可怕，太恐怖了，对一个确实死了的人来说，只有一个是重要的，即他永远不在人世了，他已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那里“无论如何不会有报纸”。

离开我们这些忙于世俗的人，他“独自一人”进入了那个可怕的新的世界。

（鉴定古币时）

※ ※ ※

可能，我的一生是在“没有罗斯”的情况下度过的（“思想上的流浪”），但我想跟罗斯死在一起并跟俄罗斯人葬在一起。

除了俄罗斯人，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俄罗斯人，世上再没有什么人让我感到需要、喜欢和兴趣了。

（读罢《钟声》中关于舒瓦洛夫斯基的可怕葬礼——在犹太人墓地，用犹太人仪式。他一生都认为自己是个东正教徒）
（1912年11月2日）

※ ※ ※

文明不在街上，文明在心中。

那里是它的根。

※ ※ ※

犹太人的“效劳”是钉在我手上的钉子，犹太人的热情是焚烧我的火。

因为，接受这效劳，我的民族会灭亡。因为，接受这热情，我的民族会窒息和消失。

因为我们的民族粗野，不文明，冷酷。

人人都对犹太人趋之若骛。再过一百年，“一切都将掌握在犹太人手中”。

※ ※ ※

快到五十七岁时我才得到出版自由。出版自由的意思是：书售出后可以收回成本。《意大利印象》之前全都亏本，出书意味着破产。不用说，那时我是既没有“写作自由”，也没有“精神自由”，什么自由也没有。

但现在不同了，我可以自由地挥舞拳头。我的书——不知通过什么人，什么途径——几百本的印数一出版即告售罄，而且两年内（印刷厂的结算期限，根据条件）可以收回一切。

如今我再也不需要“读者”了，再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了。我愿意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我的灵魂是自由的。

（吸烟时）

※ ※ ※

没有肉体的快感便没有精神的和谐。肉体是精神的源头，是精神的根本。而精神是肉体的气味。

※ ※ ※

不过，毫无疑问，西欧派比斯拉夫派靴子缝得好。对车工和木工，他们更在行。

任何一个普希金都不能否定“靴子”。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本人也穿靴子，而且喜欢穿好靴子。西欧派会给他缝的。会给这位爱好打牌爱好一切的“游手好闲者”雪中送炭的。还会拿走一点儿东西，作为那笔数目不大的诚实的提成的抵押。

作为精神，西欧派理论形同虚设。它没有内容。

但不能忘记实践，不能忘记实际操作，不能忘记生活中的犹太性格和“美国主义”，这些东西差不多应该全部送给西欧派，因为在俄罗斯只有他们精通此道。还有宪法，还有靴子。将建立“储蓄贷款银行”和第一家“俄罗斯银行”的并不是斯拉夫派。而银行也是需要的。

（12 月 13 日）

※ ※ ※

全然不是大学，而是善良的没有文化的奶娘培养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 ※ ※

一切“官方的”东西只是徒有其表。灾难不在于俄罗斯地位“显赫”，而在于这“显赫”是空的。

俄罗斯是一系列的空。

政府是空的——空在思想，空在信念。但不要高兴得太早——大学也是空的。

社会是空的。虚无缥缈。

犹如一棵老橡树：有皮，有枝，但内里是空的，空空的。

外族人，乃至外国人，正是钻的这个空子，乘虚而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能力抵抗，而在于有没有进行抵抗。

※ ※ ※

教会不但是俄国文化的根本——从加拉霍夫编的文选可见一斑——而且是文化的顶峰。这一点霍米亚科夫（还有吉列耶夫斯

基兄弟）意识到了，如今弗罗伦斯基和茨维特科夫正在谈论之。

勒齐也是。

不过，在加拉霍夫[1] 编的文选中霍米亚科夫[2]，吉列耶夫斯基兄弟[3]，奥多耶夫斯基[4] 公爵是何许人，甚至连提也未提。他们的名气要比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5] 和梅列季·斯莫特利茨基[6] 小得多。更不用说同康捷米尔公爵和罗蒙诺索夫相比了。

“因为他们没写诗歌和讽刺作品”。

说真的，加拉霍夫编的《文选》就像冯维辛的《旅长》中的那个混蛋写的。我们的整个教育部也是“出自某个弗拉尔曼[7] 之手”。

迫使国人对整个中学和大学教育避而远之的那种神秘的本能多么容易理解啊。他们很少或根本不进中学和大学的门。

这的确是一种虚无主义，是对俄罗斯的否定和嘲笑。

多好啊，我睡过了大学。在课堂上挖鼻孔，而在考试时“打小抄”。见鬼去吧！

我敬仰布斯拉耶夫和季霍恩拉沃夫的圣名。这不是教授的陈词滥调，而是“自己的我”。

我尊重格里叶[8]、斯托洛仁科[9] 和科尔什[10]。再想不起谁了。剩下的只是些又脏又破的礼服。

---

① 加拉霍夫（1807～1892），文学史家，作家。
② 霍米亚科夫（1804～1806），宗教哲学家，作家，政论家。
③ 吉列耶夫斯基兄弟（1806～1856），兄伊万为宗教哲学家，文艺批评家，政论家；弟彼得为民俗学家，古文献专家，政论家。
④ 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作家，诗人。
⑤ 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国务活动家，作家。
⑥ 斯莫特利茨基（约1572～1630），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家。
⑦ 冯维辛《纨绔子弟》中的教师。
⑧ 格里叶（1837～1919），俄国历史学家，院士。
⑨ 斯托洛仁科（1836～1906），文学史家，教授。
⑩ 科尔什（1843～1915），院士，语文学家。

穿黑色燕尾服、打蝴蝶结的巴·加·维诺格拉多夫① 很讨人喜欢，他就像是去参加舞会，且舞会的中心人物就是他自己。“因为牛津已向他发出邀请”。

可怜的被外国人邀请去跳舞的莫斯科小姐。

※ ※ ※

廉价的书不是文化。书应该是昂贵的。这不是伏特加。

书应该避开每一个对其价钱皱眉头的人。“走开”，它应该对他说，同时，朝角落里的报摊点点头，补充道：“去买报纸吧。”

书应该是高傲的，独立的，自由的。为此，它首先应该是昂贵的。

（早晨读报时）

※ ※ ※

国家会让对之不恭对之不爱者粉身碎骨。

国家就是力量。这是它主要的特征。

因此，国家唯一的罪过就是它的软弱无能。“软弱的国家”——自相矛盾。所以，“软弱的国家”已经不是国家，而只是——名存实亡。

（倚在纳杰日津街一幢房子的墙上）

※ ※ ※

我身旁有很多羽毛飞舞。正因如此“我的整个文学”不雅

① 维诺格拉多夫（1854～1925），历史学家，院士。

观。

我担心，在战斗中
你会永远失去
举止的温柔，
愉悦和羞怯之美。

我的理想是别列多尔斯基和布斯拉耶夫。平静的理性和崇高的人性中的布斯拉耶夫。

(在记下这段话的纸片上，生性浪漫的维伦卡，斯托宁娜学校七年级的学生，附言道)

“不对，不是真的，因为你才是首屈一指的能够如此充分和清晰地表达思想感情的人。你的文学就是你，整个的你，里面有你的心，一颗躁动的，狂热的，疲惫的心。没有人能像你这样通过如此清晰的（形式?）来如此充分地描绘自己的每一个动作。”

有意思，孩子们在研究自己的“爸爸”。《隐居》第一版的校样出来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有人在校样上用铅笔做了一些记号，还提了不少反对意见。我不知道是谁干的。跟维拉已经有一个月没说话了（生气），当我了解到是她干的时，我大吃一惊。这段文字饱含着巨大的爱。总的来说，她是个急性子，不听话，但有爱心。在家里谁也不敢惹她，都要“让她三分”（从十四岁起）。但她很可爱，上帝保佑她“前程似锦”!

※ ※ ※

只有在生命快要结束时，你才会发现，你的整个一生乃是一

个课堂，在这个课堂上，你是一个不专心的学生。

比如说，我没有学好功课，老师让我在课堂上站着。老师出去一会儿。“赶紧收拾好书本开溜”。真希望谁能“惩罚”我，“不让我吃午饭”。可就是没人惩罚我。笼统地说，是没有任何人需要你。明天还要“提问”。然而是提问别人。别人会正常学习。你呢，再也不会有人关心。

※ ※ ※

……而毕竟你无法将“杂货店”从心里掏出来：全是苦恼，愤怒，自尊：它们一分钱不值，一分钟不值；而你又不善于阻止它们吞食你的心灵。

（独自散步时）

※ ※ ※

是大司祭Щ安葬的母亲。他已经很老，而她堪称古老。一百岁。

教堂的领班也来送葬，他还是城市的首脑呢。

他们一边走，一边低声交谈。谈话是关切的，事务性的。一直谈到墓地。

大门开了。抬进去。唱歌。大司祭做安魂祷告。

下葬，撒土，回家。

（回忆）

※ ※ ※

母亲痛苦不堪。

——瓦夏，快去叫亚历山大神父。我想进圣餐，我要忏悔。

我立刻跑去叫。这是在下杰布拉（科斯特罗马）。

到了神父那儿。告诉他来意。他不满地说：

——我两个礼拜前已经接受过她的忏悔，给她进过圣餐了。

我站在门口。两只脚不知该往哪儿放。

——我妈请您务必去一趟，她说她要死了。

——可才两个礼拜呀！——他抬高了嗓门儿，不满地重复道。——她还有什么要求？

我戴上便帽，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母亲什么也没说，很快便离开了人世。

（在 1869 或 1870 年）

※ ※ ※

“即使到了阴间，我还是要干活”。

多么清楚。

刚能站起来，就给我沏了一杯茶——不浓不淡，正合我的口味。

（吃早饭时）

“即使到了阴间，我还是要干活”——这就是她的全部个性。

（11 月 8 日）

※ ※ ※

“心还活着。身体已死。”

（过了两个小时，当她要到塔尼娅房间去，
而我说“你上哪儿去，还是躺着好”时，
她这样回答）

※ ※ ※

一天有四位医生参加会诊：卡尔平斯基，库科维诺夫，谢伦瓦尔，格林伯格。还有对《隐居》的审判。需要同新闻检查机关的处心积虑周旋。需要请高层人士出面说话，以便甩开这些胡搅蛮缠。“我们有权利请求皇上保护每个俄罗斯人”（勒齐的金玉良言）。

（11月10日，星期六）

※ ※ ※

有时我觉得我身上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就是我的耽于沉思。一旦我陷入沉思，什么也休想进入它的范围。

我铁石心肠。

而铁石心肠是可怕的。

因为应该爱，应该燃烧。

我在生活中的不幸（公务员生涯），整个道路的错误（只有在关心“朋友”和她的病时我才会“失态”），我的“罪过”，都起因于这个毛病。

在陷入沉思时我什么也不能做。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什么都能做（“罪过”）。

终于有一天我忧从中来，但为时已晚。它已经把我和我周围的一切吃得一干二净。

（1912 年 12 月 7 日）

※ ※ ※

官僚之所以搞不出什么方案，拿不出什么设想，提不出什么新东西，甚至只会“禁止”一切，是因为他们“以小人物为对象”。

“别指望人能有大的作为。只能指望他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所谓官僚，其实就是一个“要求不高”的群体。

（写在“波隆斯基晚会”的通知上）

※ ※ ※

人不是天才，这是早已注定了的。不仅如此，他还是天然的下流坯，这两种“素质”加在一起，便可造就一个官僚，并催生出到处推行官僚制度的决定。

※ ※ ※

如果国家在“分崩离析”，如果教会“并不神圣”，如果人“不足为信”，那么，你便会不由自主地为之派一个官僚。

（写在“波隆斯基晚会”的通知上）

※ ※ ※

凌驾于俄罗斯的贫困和苦难之上的党派的利己主义——这就是杜马和刊物政策。

※ ※ ※

当然，我还是要死在教会的怀抱里，当然，我需要教会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文学，而且，对我来说，还是宗教界人士比所有的人（阶层）更可亲。然而，即便死在他们中间，我还是无法摆脱他们给我造成的痛苦。

伊万·巴甫洛维奇会抚摸一下我的脸颊，微微一笑，说："就这样吧，没什么……"弗罗伦斯基会朝我看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德罗兹多夫会说："让我接受你的忏悔吧。"这毕竟不是库斯科娃"后来的讲演"，不是费洛索弗夫关于我的论文提要，也不是"编辑部敬献的花环"。

（清晨早早起床之后，12 月 9 日）

※ ※ ※

凡是存在的，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而凡是"不存在"的，我都觉得是真实的。

随便，苦恼和无用（指自己）就是由此而来。

（清晨早早起床后）

※ ※ ※

人在睡觉的时候，当然"没有犯罪"。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俄罗斯人的这条"生活之路"令人厌倦。

（在马车上）

※ ※ ※

给罪孽和罪犯预备好一种人们想像不到的死刑。

(在马车上：5 月 14 日——关于青年人的苦恼)

※ ※ ※

“真理愈辩愈明”，例如，尤尔凯维奇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争论。

普里什凯维奇和米留科夫的争论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程度：这已经是天国的真理。

(关于六十年代的一个公理)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船在下沉，而大炮还在开火。

第一次是在 1896～1897～1898 年：不可一世而又咬牙切齿的捷·伊·菲利波夫发动的检查，发表我的（保守的）作品而又拖欠甚至不付稿费的编辑部，老婆孩子，他们身边的“法律麻烦”，笼罩在心头的一团被愤怒之光划破的阴霾：我掉转船头，调整炮口，对准“自己的阵营”——对准所有这些吝啬鬼（不是指钱），对准所有这些懒鬼，对准所有这些窝囊鬼。

我把炮口对准所有“瘸腿的，寒酸的，攒钱的人”，对准没精打彩的，冷酷无情的，无动于衷的人。

…………

除了“朋友”和她永恒的祷告（主要的），我的“转向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娜·罗·谢尔波娃，弗罗伦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引起的。“这些人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从此我跟基督教实现了道德上的和解。不过主要的还是道德上的分歧——随后我又发现了形

而上的分歧。

(工作时)

※ ※ ※

人在退化，退化。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退化。每吃一小块面包，就有一小块新的肉体进入我们体内：我们不光是在吃面包，我们还在吞食我们自己，我们在自己消化自己，自己“排泄”自己……我们焉能“一如既往”?

星球在运行，越来越偏离直线，越来越偏离昨天的轨道。“在星球上运行的——还有人”。

我们弯腰屈身，我们缩成一团……只要我们还活着!

只有当我们死了，我们才会“不屈不挠”，“不会改变”……

(1912年12月13日)

是的，如果说种子① 是肮脏的，那么毫无疑问，是“他玷污了她”。

真的肮脏吗?

苹果的种子是苹果，小麦的种子是小麦，而人的种子自然还是人?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给了她一个人? 当然，这是他的孩子。那么为何还要说“这是肮脏的”，“他玷污了她”?

我不明白。

(1912年12月3日)

---

① 俄语中“种子”一词同时也有“精子”的意思。

※ ※ ※

我的上帝。我的永恒：你为何给了我如此多的悲伤？

※ ※ ※

为什么古币学能激发出这么多的思想？

它可以使你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当眼睛仔细察看钱币，在钱币旁边“挖掘”，“思绪”会像鸟儿一样飞得很远。这时，心灵是自由自在的，超脱的。“工作的机械”（钱币学的）消除了心灵的痛苦（永远是这样），心灵得到休息，不再烦恼。由于摆脱了压抑思想的痛苦，心灵便展开翅膀任意翱翔。

这就是我喜欢古币学的原因。我把最富有诗意的夜晚时光献给它。

（鉴定古币时）

※ ※ ※

我们的泥鳅总是在什么人身边转来转去，嗅来嗅去，甚至还偷听（弗·米·多罗舍维奇惊人的通报）。“敞开胸襟”，语调“冒充农民”或“冒充工人”——说粗话，开玩笑，插科打诨，“敞开怀吧，先生们”。但这不过是他的障眼法，他实际上是要找个地方钻进去，跟什么人交上“朋友”。而交朋友的方法只有一个：借讽刺挖苦之名，行阿谀逢迎之实。由此可见，民主派人士表面上是见谁骂谁，而实际上是到处被邀请吃早餐。吃饱了，喝足了，在体面场合也风光过了。啊哈，就连我都能让这“体面场合”给气疯。家里只有一间斗室，斗室中坐着自己的家人，但忙

碌的政论家却要去踩人家的高级地板，去坐人家的丝绸沙发，去跟银行家和银行家夫人或工程师和工程师夫人共进早餐。他们的帽子“好气派呀”，而妻子披的是俄罗斯披肩。

（弄脏了身子的民主派）

※ ※ ※

勒齐的肚子里是《费加罗》的咏叹调，而脑子里却是大斋期间的“哈利路亚”。这两种音乐合成了他的一生。

这是我见到的唯一能将生存，声音，图画，线条，阴影和理想，“备忘录”，梦想这些截然不同的因素集于一身的人（不带苍白的折衷主义）。就钟摆的“摆幅”而言，这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宽阔的人。

而他非但足不出户，甚至连屋前的花园都不去。

（写在文稿的背面）

※ ※ ※

多神教是人类的幼年，而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这是他天然的多神教。

所以，我们全都要经过“古代诸神”这一阶段，并通过本能认识他们。

※ ※ ※

真正道德的（不是书本和理论意义上的，而是生活和实践意义上的）并非总是挂在人们嘴上的东西，一如空气或血液循环，

你能说“它们没用”吗？可以否定它，但只能是在事情没有触及到我们和生活的时候。例如：所有的作家都对康·列昂季耶夫不好，都不想写他，不想提他：他会对此有何感觉?！他诅咒，痛恨这种不友善的态度，诽谤它（称之为“出于恶劣的私人动机”），厌恶它，呼吁以友善代替它，为了得到“对他的反响”。这是事实，列昂季耶夫的整个生平可以为证，他的所有书信都是由“人们的不友善”引起的，向所有人发出的哭泣和呐喊。怎么能指责依然处于饥寒交迫，内外交困状态中的人们呢，要知道，他们也在呼唤友善，诅咒不友善啊。从理论上讲，这是可以争论的，列昂季耶夫也确实提出了异议，但这同时也证明，他是个无以复加的理论家和标榜“自我”的“利己主义的”堂吉诃德，而绝对不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现实关系中的人。他也有“狡猾”的时候，然而，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在他特别喜欢并为其忠诚而沾沾自喜的仆人中，首先，有两个欺骗他，骗吃喝，骗钱花，而其次（这两个仆人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婚事是列昂季耶夫操办的），丈夫欺骗妻子，跟亚西比得似的，“堂而皇之”地到外边找情妇——列昂季耶夫会怎样？不用说，他会拍案而起，破口大吧，好像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就这些情况来看，“整个列昂季耶夫”其实只是“一些谈话”，而且我们得承认，这是“伟大的谈话”。但仅此而已。而“再好的谈话”也值不上复活节的一只甜面包。列昂季耶夫的生活和实际愿望跟一个“中等欧洲人”和“穿西装的布尔乔亚”没什么两样。

（写在罗达诺维奇的名片上）

※ ※ ※

就气候和历史状况而言，我们只有一个“公民主题”：

——工作。

顾不上栽花养草。

饥饿。寒冷。冰冻。哪里搞得成共和？只长马铃薯和胡萝卜。不，我赞成君主专制。在温暖的皇宫里统治“边远地区”是可以的。而在冰天雪地和自己的茅草房里——妄想。

共和只不过是那些“衣食无忧”者的鬼主意（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奥加辽夫）。

（卷烟时）

※　※　※

向Г打听《道路》和莫罗佐娃……

这是个头脑和品味令人惊叹的女人。原来，她并不是简单地“一掷千金”，而是精神饱满，富有朝气，亲自参加各种活动。这比医院，避难所，学校更重要。

文学的污染，文学的偏激和狂妄，文学的否定和诅咒——在俄罗斯是那么可怕，以致不战胜这些，就无从谈论学校，甚至无从治疗病人，救济挨饿的人。

灵魂都没了，还要肉体何用？

所以她要着手拯救灵魂。

当然，只要她从自己的百万资产中掏出一部分，打发一下那些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就会把她捧上天。

她没有这样做。

现在，有人骂她。但将来，他们会赞美她。

《道路》目前已经出版的书以内容充实，意义重大，价值久远而取胜，如《索洛维约夫文集》（这里也有“索洛维约夫小组”

的功劳)。但是，假如没有这位女出版家的慷慨解囊，所有这些书就不可能问世。就这样，一笔普通的财富，一件“身外之物”，通过一双智慧的手，似乎创造出“俄罗斯的又一位哲学家和作家，又一位索洛维约夫”。

令人惊叹。

写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不声不响的，谦虚而又聪明的安东诺夫神父所从事的同样的工作（《罗斯的宗教哲学》)。

茨维特科夫和安德列耶夫在那边站了起来。

积极的曙光从四面八方升了起来。

上帝啊，为我们生长粮食吧，
这是我的财富。

※ ※ ※

我身上的虮子多得可怕，它们盘踞在发根附近。

不容易发现，讨厌。

部分地说，我的深刻也是来源于此（我看得见事物的根，我人道，不喜欢责备人，有同情心)。

可这样活着太难，就是说，做一个这样的人太难。

※ ※ ※

基督的含义莫不是就蕴含在客西马尼和十字架里？就是说，他是现身说法，似乎想通过言语，或者指引，或者沉默，为我们

提供人类的一种受难方式：

——我的恰德查人啊，我不能够拯救你们（我毕竟不能！啊，这真可怕），然而，当你们看见我时，当你们想起我就在这里时，你们就会得到一些安慰，就会感到好受些，轻松些，因为我也受过难。

假如是这样：他来安慰正在忍受苦难——无法避免，无法战胜的苦难，首先是死亡以及死亡的临近造成的可怕苦难——的人……

那么，一切也就清楚了。那么，奥桑娜……

然而，是这样吗？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他对婚姻，对肉体的沉默还是明白的，“不需要行割礼”。

如果房间里躺着的是一个重病人，我们是否会说：“把裤子脱了，把阴茎的包皮去掉（割掉）”？

想都不会这样想。厌恶。

于是“旧约宣告结束”，“新约粉墨登场”。

然而，是这样吗？不知道。脑子里第一次现出一道亮光。

（1912 年 11 月 7 日）

※ ※ ※

如果说他能给人带来安慰，那么，我是多么需要安慰啊。只有给我安慰，他才是我的上帝。

真的吗？

让人高兴。但我还是不敢。难道我不应该害怕我现在怕得要死的东西？难道我应该想——“我们会见面！我们会复活！看吧，他——是我们的上帝！一切都清楚了”？

我忧郁的灵魂第一次站到了这一观点上。啊，它曾经那么忧郁，我的灵魂——自从迁居科斯特罗马：要知道，那时，我既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灵魂，更不相信上帝。

——奇怪得可怕。

就是说，可怕的过去了，而奇怪的正在到来。

难道真的可以说：我们都有一死——这没什么？

难道你真的要我们不害怕死亡？

上帝啊，难道这真的是你？你在夜间到来，在灵魂悲痛欲绝的时候到来。

※ ※ ※

临摹了埃及的一尊小型阿匹斯雕像（通过埃尔米塔什美术馆）。原件。青铜的。此乃犹太人在西奈半岛时所崇拜的"金牛犊"，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伯特利铸造的。一个想法。一个感觉。是以色列妇女热情地献出自己手上和耳朵上的"金首饰"，才换来这两尊雕像。

阿匹斯即健康。力量。火焰（男人的）。

而"朋友"的健康我却疏忽了。

我为什么总是这么愚蠢？为什么我的整个一生"缺少理智"，"缺少法律"？

※ ※ ※

她面如土色（无力，心脏），眼睛黯然无光（可怕！）：

——谁来的信？

——维拉·伊万塔芙娜来的（我有些疑惑）。说同意什么……

——是我给她写了信。塔尼娅学音乐的事。给她回信，就说“好”，谢谢她。

她在安排塔尼娅上音乐课。

塔尼娅背起书包就往学校跑。咖啡没喝。着急。迟到了。我转过身，冲着她喊：

——塔尼娅，劲头不小嘛。谢天谢地！

塔尼娅只顾着急，头也没回。

孩子们啊，将来母亲不在了，得有个人照料你们。你们自己什么也不会。

（11 月 7 日）

※ ※ ※

晃晃悠悠。要从我手中滑脱了。

——塔尼娅那屋生火了吗？

——没有。

——那怎么有烟？

——从来都是这样。这房子的设计真够怪的，不生火屋子里也会莫名其妙地冒烟。

完全滑脱了。踉踉跄跄走到塔尼娅房间门口。窗户是开的，风吹了进来。

——快回去！快回去，风！

不回答，只把我朝炉子那儿拉。炉盖是盖着的。

——看见了吧，没生火。

把我拉到炉子跟前。摸一下炉盖。摸一下炉子：是热的。早

晨烧过火。

回转来，瘫倒在床上。

我们在等卡尔平斯基：今天特别虚弱，浑身无力。站都站不住。眼睛黯然无光。

※ ※ ※

塔尼娅放学回来。

——见到维拉没有？

维拉身体不舒服，呆在家里。

——什么“见到没有”？我上哪儿去见她？你明明知道，她在家里。

老伴对我说：

——她没见到维拉，也没跟娜佳一起回来。

——没关系。娜佳下课晚，过一会儿自己会回来的。

——怎么不跟娜佳一起回来？没去找她吗？姐妹俩应该一起回来。

正在这时，娜佳跑过去洗手（饭前）。

——这不是娜佳嘛。她在家里。就是说，是一起回来的。(对娜佳：) 是一起回来的吧？

——是一起回来的。

放心了。她还在燃烧。但浑身无力。灵魂在燃烧，而肉体正在枯萎。

（11 月 7 日）

※ ※ ※

维尔堡（寄来一张苏沃林的照片）：

——寄上补充预算。

喀山来信：

——尼古拉……

——哪个“尼古拉”？

——她的儿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儿子，但是跟另一个丈夫生的。尼古拉收养了一个女儿。她的学费现在成了问题，也许，你们能帮忙？

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尼古拉”。没见过他的母亲。更没见过我从未见过的女人的从未见过的儿子的养女，也不知道，完全莫名其妙，他们的名字跟我的名字有何干系。

一位大学生的一封长信：说什么，他不忍心增加父亲的负担，“而学业——您知道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读了《隐居》，您在里面说您有三万五千卢布：因此，您能否分给我二千五百卢布，从而帮助我完成学业呢？”

“不忍心增加父亲的负担”，却“忍心增加别人的负担”——这是什么道理？他为何没有看到《隐居》里写的“我要养活十一个人”？现在的大学生真是除了自己，谁都不关心。

姓不是俄罗斯的，万幸，二千五百卢布不是用于付学费，而是为了不在吃住等方面“给父亲增加负担”。大概还要加上享受吧。

“老实的青年人”走得可真够远的。

（11月7日）

※ ※ ※

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生存的动物阶段，而是生存的石器阶段。

※ ※ ※

一张问卷：

…………

——谁是当代俄国文学界最高尚的作家？

“不知何处”冒出个奥尔德奥尔，说：

——我。

※ ※ ※

自由主义也提供了一些方便，没有它还真要犯愁。学校将很多，我的儿子可以有地方上学了。而且，在自由主义的学校里，我的儿子肯定不会挨打，肯定会学得轻松，学得好。本人要是生了病，就请一位受过教育的医生，他绝对不会像兹维亚金采夫给彼得巴甫洛夫斯基（已故）看病时那样，把心脏病和盲肠炎混为一谈。所以说，“进步”和“自由主义”乃是一只英国皮箱，“什么都往里装”，“找什么都方便”，就连非自由主义者在外出时，都乐意带上它。

自由主义者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会更漂亮。

但自由主义者永远写不出《战争与和平》：这就是他们的局限。自由主义者适合于“服务”，但不是灵魂。灵魂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热忱，信仰。灵魂是疯狂，是火焰。

灵魂是战士，哪怕他穿着自由主义者缝制的“皮靴”。对自由主义我们不可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把它带在身上，就像带一块擦鼻涕的手帕。手帕当然是有用的，可谁会用它来“祈祷上帝”呢？“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东西”——所以才把它放在屁股口袋

里，而且携带者从不看它。对自由主义也一样，永远不用看（注意）它，但不允许它存在同样是错误的（会让你“犯愁”）。

就拿我来说吧，我恨不得关闭所有的报纸，但允许高等学校自治，甚至允许大学生成立独立组织。哪怕是成立共和国。俄罗斯帝国应该允许内部成立二至三个共和国，例如维切格达共和国（在维切格达河流域），里昂共和国（在高加索的里昂河流域），还有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城市首脑”加市民议会制。何必“到处是省长”，不雅观！何况还要把他们派到边远地区。最好恢复大公爵位：特维尔大公；尼热戈罗德大公，穿降半格的皇袍，戴降半格的皇冠。“罗斯一望无际，应有尽有”。当然，皇上是至高无上的，英明无比的。沙漠。草原。北冰洋和（但愿手能伸到）印度洋（波斯湾）。极好的大公委员会——连同他们的降半格的皇冠和地方行政长官，下面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穷光蛋们。一切都好极了，圆满极了，一如萨德科的“水下王国”。

但这是怎样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啊，——“请把报纸丢掉”，因为这是卑鄙编辑和卑鄙文人的鬼把戏。甚至一切都可以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每个编辑手拎肩扛，给订户送《欧洲信使》”。而要通过国家邮局发行，“就得像寄私信一样，一洛特（相当于12.8克—译者）付七戈比”。我真想仿效民主派的口吻说：“为什么士兵在收到母亲来信时要付七戈比，而《欧洲信使》的订户，有钱人，在收到他并不需要的关于一个大学生被捕的故事时，一洛特只付二百分之一戈比？”由此可见，我要关闭期刊的愿望是符合自由主义精神的，是慈善的。“为了平等与博爱”——这是一个方面，“就连上帝也会赞成”——这是另一个方面。

※ ※ ※

假如提议在坦波夫和奔萨“选举一个喜欢的人当立法委员”，并且有个条件——只许用黑话（立陶宛的犹太和德国方言）选举，那么，奔萨选出来的肯定是一个犹太人。何以见得？很简单。俄罗斯人不能也不会，甚至不想“按照规定，即用黑话投票”。而能满足这一规定的只有十至十五名奔萨的犹太鞋匠。他们会把“人民的代言人”选进杜马。

杜马选举的规定对俄罗斯人来说，就是黑话。“既然天生不是维纳维尔”——你就只能承认甘拜下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到处都在选“接近维纳维尔的人”，“维纳维尔是俄罗斯的代表”。

“地地道道的俄罗斯的代表”。

可俄罗斯甚至不知道“维纳维尔”是何许人也。

不仅如此，俄罗斯其实连哪些人是自己的“代表”都不清楚。

为之奈何？俄罗斯的方法不是“公告”，不是“投票箱”，不是“选举前的宣传”。而是另外一种方法：

抽签——“听天由命”。

还有——打架：“看谁力气大”。

“沃尔霍夫桥”那儿就是这样选举的。当时伊凡三世并没想到“会打架”，所以才派人把一只招集市民会议的大钟送到特维尔一个“不很远的地方”。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令人伤心的。但要知道，整个罗斯都在伤心。“一切俄罗斯的都在伤心”，在此，你只能两手一摊——也是以俄罗斯的方式。

（第四届杜马选举：有选举权的人中，只

有不超过30%的人参加了投票）

※ ※ ※

七百万只胃和七百万只清醒的脑袋和手将战胜七千万只胃，因为这七千万中只有同样的七百万只脑袋和手在工作，而其余的六千三百万只知道消耗食物来要求“享受”。

要知道，我们这里干活的人与偷懒的人的比例是六比一。

这就是对可以有一千种解释的犹太问题的一种解释。

※ ※ ※

“祈祷吧！”康·列昂季耶夫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基督教，用自己的削发为僧，用自己同亚丰修道院和奥普塔修道院长老的关系说。

很好。我们明白。清楚。

然而，他是否听说过有这样的教徒：两眼注视着东正教神像，注视着仁慈的救世主和圣母庇护者，为“背信弃义”，为男女偷情，为欺骗敌人，为背叛妻子和列昂季耶夫－尼采哲学的其他章节祈祷？

没有。

人们永远是为与人为善，为“使我们的灵魂和肉体得到安宁的天使”，为宁静的死亡，为宽恕敌人，为“四季祥和”祈祷。唉，永远是借用“中等资产阶级的祷告”——“一个穿西装的欧洲人”的祷告祈祷。

列昂季耶夫是何许人也？

三十五岁时，他已经俨然一个长者和天才，轰动了欧洲。五十七岁时，他就像一个孩子，用一双小手抓住了那条支撑起地球

的鲸鱼。

这条鲸鱼就是良好的空气和“人人健康”。外加口袋里多些小钱。

鲸鱼绝对不坏，绝对不是“小偷”。列昂季耶夫希望它能长出獠牙，“眼睛能发光”。可鲸鱼回答他：“我不吃肉食。”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

还有：假设它得了霍乱，祈祷圣母，而圣母非但没有治好它的病，反而像美人鱼似的嘲笑它，让它染上瘟疫。“背信弃义”。有意思的是，对这种态度的可能性列昂季耶夫会说啥。

我的一个朋友（对列昂季耶夫）说：“布尔乔亚”是天国真理，“布尔乔亚”是上天预先决定好的。讨厌的十九世纪的布尔乔亚未必在此之列，这不是它的本质。在此之列的是奥·蒂埃里所描绘的迦勒底人，拿撒勒人，“法国公社”的“布尔乔亚”。他们热爱音乐，当然，为了保卫店铺和继续做生意。他们也不会惧怕一场骑士比武。

列昂季耶夫是何许人也？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他是个罕见的杰出的俄罗斯人，心地纯洁，襟怀坦诚，从不知奸诈为何物，仅凭这一品质，在相当虚伪和造作的俄罗斯文坛上，他几可说是位圣徒。善良的俄罗斯的上帝给了善良的俄罗斯文学一位善良的作家。仅此而已。

可他的思想呢？

他的思想是破绽百出的。他的洋洋洒洒的 opera omnia①，从头到尾尽是用蓝铅笔打的叉叉。读起来很过瘾，但没有什么发人深省的东西。

---

① 拉丁语：全集。

缺少建设性的意见和智慧的火花。

他是不是基督徒或多神教徒？这是一些人（如阿格耶夫神父）正在争论的问题。在他“互相排斥的两半”中，真正的和主要的当然是他“本性的”，“先天的”。有一种传闻（似乎是列昂季耶夫本人提起来的），说他的母亲身材高大，敢作敢为，堪称女中豪杰，却如痴如狂地爱上了一个迟钝无比，平庸之至的地主（列昂季耶夫本人也是这样评价他父亲的），并最后嫁给了他。儿子总是像母亲。这个充满激情和晕眩，幻想和梦呓的狂热的爱情故事铸就了列昂季耶夫的多神教天性。这种天性是那么真实和坦诚，那么优美和强健，在欧洲人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而他的“宗教性”就依附在这种多神教上面，尤如不可爱的，“循规蹈矩”的父亲依附在他母亲身上。在列昂季耶夫“强加给自己”的基督教中，有种令人厌恶的，不可忍受的东西：

老态龙钟的丈夫，
神色威严的丈夫，
我恨你。

从这个多神教的，真实的方面来看，作为历史上一个极其罕见的事实，一个令基督教无可奈何的人的诞生列昂季耶夫是耐人寻味的，就内心而言，他非但“对使徒保罗不理不睬”，甚至对基督的话也置若罔闻。

而且面无惧色。

列昂季耶夫在宗教上完全是个镇定自若的人，他要把战斗，骚乱，平息和不幸引向普天之下的民众。

果戈理毕竟惧怕过自己的恶魔性格。果戈理是介于多神教和基督教之间，既不信奉前者，也不信奉后者。列昂季耶夫的诞生甚

至超然于对基督教的预感。他的众神是完全清楚的:"打断敌人的脊梁骨,占领印度":"还有你,康比斯,——要刺穿阿匹斯的胸膛"。

形式的多样化和超强的扩张力(他的历史和政治理论的基础),不言而喻,是他的天性的真实表现。但有两个世界,且"基督的降临"就体现在这里,这便是自然世界和神赐世界。而"福音书的胜利",至少是理论上的和文字上的,"所宣称的",则可以概括为"在自然秩序中受尽苦难"的人们对神赐世界的向往受到种种矛盾情况的局限。所谓"基督教",就是在战争条件下寻找"和平",在可以甚至应该惩罚的时候"宽恕"。列昂季耶夫强烈要求回归"自然秩序",他要的是作为多神教徒的君士坦丁大帝,并将他同受洗的君士坦丁大帝对立起来。但这样一来,面对"君士坦丁大帝与李锡尼的战斗"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就会无所适从了,因为毕竟前者取得了胜利(基督的花字不仅写在天上,还写在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国旗上)。

然而,自然是不可征服的,而教会永远都在努力征服它;这是斗争的条件,也是基督教得以革新,使形式趋于丰富的条件。基督教的"英雄主义"没有消失,"伟大的东西"没有消失,只是已经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与从前判然有别。"进军埃及的康比斯"和"占领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确实与基督教南辕北辙,即便他们出现在基督教里,或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也不会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产生丝毫的影响,与其根本和实质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对不起:奥普塔修道院的阿姆夫罗西的生平难道不比恺撒大帝军队里的一名老兵的生平更绚丽多彩?教皇利奥一世,格列高利一世,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生活难道不比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和波尔的轻而易举和索然无味的胜利更瞬息万变,惊心动魄?总之,历史并未失去引人入胜之处,只不过是改变了音调和主题。音调确实不同了。"神赐的王国"确实不允许再出

现居鲁士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了；拿破仑显然是个例外，人们本能地给他取名为“反基督徒”并没有错（如今列昂季耶夫在重新呼唤这样的人物，他的呼唤产生的结果和给人的印象是滑稽可笑的）；但“神赐的王国”号召人们同“自己的精神的恶魔”作斗争，同至今依然存在且会永远存在于社会制度里和“神赐的王国”的高墙外的“魔鬼习性”作斗争，并建立伟大的功勋。

然而，列昂季耶夫历史性诞生的充分理由究竟何在？在于他恰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中等欧洲人”和“布尔乔亚”，但欧洲历史的整个革命后阶段已经蜕变得面目可憎。不是“布尔乔亚”讨厌，真正讨厌的是十九世纪的布尔乔亚，为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对历史上的一切辉煌心怀嫉妒，因而一心一意追求人人平等——在同一个泥坑中，在同一片毫无希望的沼泽里——的臭不可闻的布尔乔亚。“深刻之至，高明之至，”令人作呕的掌柜的用核桃大小的拳头敲打着生了肺结核的胸脯。“圣徒也好，英雄也好，魔鬼和神灵也罢，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显示不出丝毫田园牧歌的迹象；为了不要孩子，免受拖累，他竟然说服妻子同意他割除阳器，跟她在床上手淫。“永远被动”的女人听从了这个骗子，她的丈夫的建议。他们俩做些小生意，在犹太账房里开“账号”，经常去摩纳哥和里维埃拉海岸休闲度假，购买拉斐尔的复制品；“家庭的朋友”也插到他们夫妻中间来，因为据说三人手淫比两人手淫更有前途。

在实践中站出来反对这些先生们的是德国，正如一头强壮的水牛反对一群退化为狗的狼崽；而在理论上：“上帝派来了列昂季耶夫”。

“啊！啊！啊！要把这些令人作呕的家伙从地球上一扫而光！连同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漂亮词句。肩负这一扫荡使命的是俄罗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整个东方，哪怕包括波斯人，蒙古人，中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这就是列昂季耶夫的公

式和他整个一生的激情所在。符·索洛维约夫关于“蒙古将征服”面对反基督徒的“欧洲”的说法在此是异曲同工的，大概也是对列昂季耶夫的政治呼吁的效仿。笼统地说，二者都表现出对理想的伟大渴念。对理想生活，对理想人物的伟大渴念。

在拜占廷主义中，在宗教性中，在基督教中，吸引列昂季耶夫的不是那些积极的和善良的，神圣的和美好的，将扫罗变成保罗的，殉难的圣徒为之献身的东西。总之，他没有发现“福音书的珍珠”，更准确地说——他扫了一眼，然后无动于衷地转过身去，“正如什么都预感不到的居鲁士大帝”。基督教中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喜欢的。究竟为什么他要用一半的篇幅“赞美教会，亚丰修道院和俄罗斯东正教政策”？基督教对他没有吸引力（丝毫没有），但他却从中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可以用来“抗击十九世纪厚颜无耻的布尔乔亚”；发现了用之不竭的皮鞭，可以用来有力地抽打自以为是的小市民的科学，笨拙的毫无意义的实证主义，以及可恨的世纪，自然也是他所痛恨的世纪的所有“偶像”。实际上，他“比拜伦本人还拜伦”，但假如让他成长为一个基督徒，他会是一个怎样的“拜伦”呢？!!

从列昂季耶夫的希腊故事（《土耳其基督徒生活记事》）——他在那里描绘的生活相当绚丽多彩——来看，他对教会和基督教的态度远不及对理论（“东方，俄罗斯和斯拉夫问题”）更具热情。在那里，置身于土耳其人及其妻妾中间，讲述着那些“穿着漂亮长袍”的强盗和起义者的故事，他忘记了自己的理论的“老态龙钟的丈夫”，称赞起伊斯兰教，热情肯定古代多神教生活，甚至还有两三次从他笔下滑出了“基督教”，尤其是它令人厌倦的“女性化倾向已经有些过时”这类说法。布尔乔亚，法国人，欧洲人——太远了，列昂季耶夫要休息。他吸着水烟袋，心胸变

得异常豁达，语言不再激愤，思想趋向平和。蓝色的长袍和漂亮的菲士卡帽给他的神经涂上了清凉油，来往于巴夏[1]，年老的主教和换了衣服来小村过节的强盗中间，他以平静而宽容的心态向他们大家低声谈论着跳舞的乡村姑娘，保加利亚和希腊女郎：

——巴夏！你为啥要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藏起来？这是你们这儿唯一不合我意的法律。我是个心胸宽阔的俄罗斯人，希望一切都摆在台面上。假如土耳其女子也能加入到保加利亚和希腊女郎的行列中来，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跟公元前六世纪希俄斯岛上那些观看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在爱拉多斯永恒的天空下跳舞的希腊男人一样高兴……

※ ※ ※

“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斗争”，“工人的状况”：然而，不知为什么，坐下来打牌时，都喜欢跟将军结对。而且，“钱不够”时，都喜欢借将军的，说“星期三以前还”。可到了星期三，又偏偏稀里糊涂地给忘了。

（耳闻目睹的）

※ ※ ※

瓦西卡（杰尼舍夫学校三年级）叉开两腿，像个无赖似的盯着女教师，重复道：

——嗯……嗯……嗯，“幸福的谦卑者”。嗯……嗯……嗯……（忘了，可眼中一点愧疚也没有）。

暗地里与女教师针锋相对的他才不在乎这些“幸福的谦卑

① 土耳其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

者”呢。

于是我想：

——要把这句话藏起来，藏起来，砌到墙里，放到地窖里，在四十岁之前谁也不告诉，只有开始体验到痛苦，屈辱，生活的失败之时，才把“饥渴难奈者”领到地窖旁边，从那里远远地，给他看写在一张金纸上的几个字：

谦卑者幸福！

我的上帝啊：要知道，这句话其实就是对“谦卑者”说的呀，只是还没有人，没有人明白罢了，人人都觉得这句话“愚蠢可笑”，只有到了四十岁，一生已经过去的时候，人们才会领悟这句话的分量。为何要对叉开两腿的瓦西卡讲这句话呢，这不是“对牛弹琴”吗？

装腔作势的招摇撞骗者。

招摇撞骗者从来都是装腔作势的。这一点我直到老了才体会出来。

而且他们还要利用社会上的不容争辩的权威。

不，还不如指望二十号的“官僚”。他会满嘴唾沫星，但毕竟会做点什么。他会骂你，撒野，揪你脖领子，而不会把你抢光。

不会像《十二月党人》和《基督传》（上面印有一张雷南的照片，花了上千卢布）的出版人那样，残忍而又无耻地把几个文学家洗劫一空。

迈着德国人的脚步的装腔作势的招摇撞骗者，害了孩子的母亲。他自称（在《指南》里）神经科医生，给“神经有问题”的

患者看了五年的病，竟然没发现瞳孔扩张不均衡。看了五年，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为什么？

这双瞳孔见到过多少医生啊：梅尔热耶夫斯基（阿伦斯堡的），罗森布留姆（卢加的），纳乌克，赫德罗伊茨公爵小姐，拉伊维德；没有一个人说："您看见了吧，这是个大麻烦，需要治疗。"

老伴的病本来是可以治好的。

是卡尔平斯基第一个这样说的。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否定了别赫捷列夫的诊断（"我敢肯定，他的说法不对"），开始着手治疗被耽误了十四年的病。愿上帝保佑他万事如意。卡尔平斯基——在我的生平里，这是一个善良，美好的名字，是我们家的恩人。一如别赫捷列夫——是我们家的罪人。

※　※　※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芙娜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某某公爵夫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法政学校的学生还是武备中学的学生，我记不得了。反正不是高等学府的学生。常有一些同学到他家去，其中一个喜欢上了穿着华丽，个头高挑的大女儿。不过，尽管个头很大，她的性格却是文静的，不像她的瘦小的妹妹，容易冲动。据我观察（讲故事的人并不明白），性的冲动要么消解在成长过程中，将自己的精力耗费在"自己身体的发育上"，从而使躁动的心平静下来，要么相反，将它整个凝聚起来，形成一只性的箭——放在绷紧的弦上，射出去。母亲察觉了几乎还是一个少年的小伙子的感情。冬末，她把他叫到一边，问："您喜欢我的大女儿吗？"小伙子满脸通红，慌慌张张地说："喜欢……""看得出来，您是喜欢她，但还没到难解难分的程度。听我的：跟妹妹结婚吧。从年龄来看，她更适合您。"小伙子同

意了。“那好。现在谈谈具体问题。不举行结婚仪式吧，我不愿意。举行结婚仪式吧，法律又不允许，你们还在上学，年龄不够。不过别担心，我是公爵夫人；我有办法，有关系，一切交给我好了。”确实，作为中学生，他无论如何是不许结婚的。于是她出去求人。也许是说了句多余的话吧，比如女儿“怀孕了”之类，有关方面同意小伙子秘密结婚，保留继续学习的资格。母亲马上给他们办了婚事，接着，年轻的丈夫又回到学校，但要每个星期天和星期四（不知何故）回家一次。他们的住房很小——财产都被父亲变卖了——丈母娘腾出一个房间给新人，自己和大女儿住在另一个房间里。她对儿子说，他只能白天回家，晚上要住在学校里。“没地方住，让给新人了。”就是这样。“那么大女儿呢?”我问。“两年后也出嫁了。”但请继续往下听。婚后，瘦小的妹妹变得特别妩媚，丰满，善良，与婚前判若两人。一年后有了一个孩子，两年后有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个漂亮的男孩，生下来时很大。公爵夫人把孩子从他们的卧室里抱出来，给客人们看，嘴里不停地说：“瞧这小家伙！多漂亮！多亏了我的英明。他的父亲——精力旺盛，不知疲倦。我的女儿——心地纯洁，依然充满幻想。瞧，他们给我带来一个多么棒的外孙!”

无论是我们的政府各部，还是掌管宗教事务和婚姻事务的年迈的都主教们，都不可能有老公爵夫人这种上升到国家高度的高瞻远瞩。

因为问卷调查表明，大约从六年级开始，所有的学生便已进入与嫖娼现象相交替的手淫期。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然而，难道两者不是都很可怕吗? 假如国家机关能拥有这位公爵夫人所拥有的十分之一的聪明，男女中学生的结婚问题不但会迎刃而解，法定的结婚年龄也会改为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半（在幻想还未破灭的时候）：为了遵守这条规定，家长和学校领导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凡是不执行这一规定的学生，“一律不发给

毕业证书”。实际上，“幻想”和“浪漫”与婚姻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出现在“后来”，出现在夫妻生活中。要知道，结婚意味着献出整个身心。毫不保留。无怨无悔。另外，结婚时一定要有宗教界人士在场。只有“繁殖能力很强的宗教界人士”才能支撑起俄罗斯生育的荣誉。笼统地说：“浪漫”当然重要，我并不否定它，但我要的不是腾云驾雾的浪漫，而是开花结果的浪漫。“强暴”和“引诱”的诸多惊人实例几乎是在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姑娘对第一个让她“失身”的男人一生都会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依恋，即使她后来变得水性杨花，朝三暮四，这种依恋仍很难消除，她的命运多半会是悲惨的。实际上，“第一个”始终是她的丈夫，而后面的——没什么印象。这个规律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有必要以此为基础在国内确立夫妻生活准则：唤醒对“第一个”的爱，并使这爱保持一生，只要“是”这个词是真诚地，不带反感地发出来的，哪怕缺乏激情和“浪漫”。

叶列茨的米·阿·热-科夫（他有几个女儿）说：

——要在女儿还未开始选择的时候把她嫁出去。

都出嫁了。都生活得很好。即使这里也有悲剧，其可能性也只在百分之一二。这百分之一二至今仍在成年累月地“选择”美满的爱情。其实“浪漫”就是休闲，在夫妻生活及时到来时占一块空地。夫妻生活是上帝的戒律，是与祷告连在一起的。没有“上帝的鸟儿”也能过得去。

姑娘们啊，请三思。在你们成为母亲的时候，请三思。

谢谢瓦尔瓦拉·安德列耶芙娜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特别是对部长们和高级僧正们。她本人已婚，心地善良，娘家姓是格氏。

※ ※ ※

我的生活愚蠢吗?
至少不太聪明。

※ ※ ※

我想起什么作用吗?
一点也不。

人可以不起作用吗?
那是最可爱的生活方式。

※ ※ ※

我崇拜琐屑。琐屑是我的“神”。

“雄伟宏大”与我格格不入。

※ ※ ※

我整个在根里，在根之间。“树梢”——我一点都不明白(不明白这种情状)。

起风了。会摔倒。即使“能看见很多”，我也不会看一眼。

这是尼古拉·谢苗内奇（穆辛——科斯特罗马的俄语教师，一个极为高尚的人）说的：

——咳，你真是个傻瓜。竟然没看见市场上有没有干草。白白路过了市场上（去他家）。

路过干草街（巴甫洛夫广场）时，我确实没看见。

尼古拉·谢苗内奇的下巴和上唇刮过，头发花白，有一俄寸① 半长，中间一分为二，从上朝下流。不好看，但心地善良，“人好”。

他有个女儿，叫卡嘉，七岁，妈妈常打发我“到他们家去做客”。他徒劳地给我看一本带有族徽，皇冠和士兵的图册。德文的。我靠在椅子上直哭。

我受不了他们家那油漆过的地板和一尘不染。太漂亮了。我们家却冷得要命，很少打扫。我想回家。

见我哭个不停，他们只得让我回家。

家里肮脏不堪，乌烟瘴气，一股克瓦斯味，争吵声不断，妈妈愁眉苦脸，我们随时有可能挨打。

※ ※ ※

概而言之，文学当然是混蛋（弗罗伦斯基的看法），但就是在这里，“你也不能蔑视世界的任何状态”，即便是你，有时也能发现某种美。

我来到“剪报部”，递上十卢布。很年轻很可爱的部主任跟我攀谈起来：

——我的工作忙得厉害。您说，“攒成一叠”再给您一块寄去，这样节省邮票。可您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打电话找麻烦吗：“今天早晨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你们怎么还不寄来?”我解释说：“您将在明天早晨收到。”“不行。我今天要。你们应该每天

① 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厘米。

送两次。”

还有这样的。出门时，我说：

——而你们“剪报部”的工作也够恶毒的。说实在的，这是在没完没了地糟蹋文学，摧残作者的才华和尊严。他读了中伤他的那些胡说八道，会败坏情绪，一天也别想写东西。这不光关系到名誉，还关系到吃饭。我打算写篇文章，谈谈这个问题。呼吁不要搞这种摘录。

他害怕起来：

——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别写。我们部有四十名大学生搞“剪报”，而且是登了记备了案的，受皇后陛下保护……

我答应不写。

——这些人（即作家）特别神经过敏。一天清早就来电话。进来一位作家，垂头丧气，说他“没说过这句话”，是评论家无中生有，他说的是“那句话”，那人是存心歪曲，跟他过不去。说完拿给我看：“您说说！您看看！”

他微微一笑……

——我们才不读这些东西呢：顾不上！要知道，这里有上百份报纸!!! 只有打工的大学生看，但不是逐字逐句读，而是一目十行地浏览，只留意标题和姓名，一旦发现需要的文章，立刻剪下来。

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这些“激动不安的作家”，在我看来，神通广大，目中无人的“普通记者”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要在报刊上同部长谈话，不是“冲他打喷嚏”，就是拉扯他的后襟，好像一条哈巴狗在拉扯一只大狗熊……

我认为，作为一种纯粹的手艺，鞋匠的手艺，文学是有其优点和长处的，还没有丧失其人性的一面。我想起一个编辑部的接待室，那是在二十年前，我刚开始投稿的时候。我们等了好长时间，编辑也不接待。我们全都带了稿子（应该是这样）。我在墙

角踱来踱去，而那位“仪表优雅”，“头发卷曲”，“派头十足”的文学家则在椅子上正襟危坐，神色从容而又傲慢。

我走来走去，而在我的斜对面，一个头发很长，眼镜很破的人也在走来走去。

他个子矮小。破衣烂衫。寒酸得要命。看得出，他“喝过酒”。那是个激进的时代（很久以前）。看得出，那位仪表优雅的文学家的正襟危坐羞辱了他。

他肯定想对他“说点什么”。

他焦急地走来走去，终于，他掏出一支烟……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依旧纹丝不动，拒不理睬印度国王波尔。他强压怒火，浑身发抖（难堪，害怕以及对自己害怕的懊恼），硬着头皮凑过去——同时又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生怕遭到无礼拒绝——说：

——对不起，请允许我抽支烟。

他抽起来。又递了一支过去。笼统地说，我同意：“这个”波尔国王是不讨人喜欢，但我们这只可怜的俄罗斯公鸡……

我完全相信，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未对“诚实的文学”撒过谎，他觉得他要“报效祖国”，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揭露，抨击，要求说真话。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们，既然我们能尊重在路口“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我们又怎能忽视“这样一个为俄罗斯大地忍辱负重”，毕生都在写作，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的人呢。他在受苦受难，受苦受难，他在燃烧，确实在燃烧。生病，却“没有钱”，如今他只能眼巴巴地，悲哀地望着“别林斯基的像”。

这就是他，先生们。让我们放下傲慢，向我们的朋友，向善良的外省的保护者，向勇敢的抓小偷（官方的）者，伸出手吧。首都的专栏作家或自我安慰的进步人士的赫列斯塔科夫长袍确实把我们同真正的文学家隔开了，他可是一所地方大学的副教授

啊。别担心，“他们亡不了国”。文学中有善良，坚强和诚实，也有无穷的苦难（贫困)。这样的文学家是民众的老师，也就是说，是乡村或城市学校的劳动者。

让我们向他致敬吧。在罗斯，并非一切都是不可救药的。在文学中，同样并非一切都是不可救药的。

※ ※ ※

托尔斯泰寻找“苦难”，所以才要求到施吕瑟尔堡去，在莫罗佐夫身边坐一会儿。

——然而您，阁下，不就是一个莫罗佐夫吗？——政府回答，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高兴地对他予以保护。

不过苦难却要求进入他的皮包：这便是抖掉“流行”，拒绝作品的畅销，不理睬“报刊上的反响”。可没办法，多布钦斯基有时甚至会把手伸向苏格拉底，而神父在听罢受难的女人哭诉完漫长的一生之后，会把五十戈比放进口袋。托尔斯泰也会把五十戈比（流行）放进口袋。

※ ※ ※

一匹马，而且还是一匹不聪明的老马，拉着大车，而一打青年男女坐在车上，扯着喉咙唱歌。

※ ※ ※

歌声时而猥亵下流，时而垂头丧气。尽是“在罗斯好快活”和“罗斯会消亡”之类。尽是全部“欺负”俄罗斯人。

一旦步子放慢，他们就会大吼大叫：

——喂，快拉，老家伙！

于是老家伙又一次伸长脖子，绷紧腿上的青筋。

（我的祖国）

如今，俄罗斯的所有事情，俄罗斯的所有关系，都被“犹太人”搞复杂了。没有一个俄罗斯的生活问题不关系到这样的问题：如何对付犹太人，何处打发他们，“如何不得罪他们”。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在位期间，根本没有这些事。也许，罗斯没有成长，但犹太人绝对在成长。

※ ※ ※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在我的朋友的身上，落在肩膀上，头上……

她快冻僵了，快死了。

而我站在旁边一筹莫展。

（“应该让专家看看冬天：我们不懂这些现象。这不是我们的病，而是另外一种病”。她在坚持。不说她冻得有多厉害。吃午饭时还是不说。可吃完饭——终于躺在床上哭了起来。“都是病”，“病”。“本来经过治疗这边全好了，可突然——又恶化了”。1912年10月16日）

※ ※ ※

上帝会为我们而痛苦吗？上帝会为人而痛苦吗？上帝是否有痛苦：就“上帝的存在的属性”（经院哲学）而言？

（去借钱）

※ ※ ※

大地的各种声音渐渐微弱下来……
用不着了。
只有一个微弱和颤抖的声音将永远拌和着我的眼泪。
当它也止息时，我愿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
（深夜在别墅和永远）

第二筐

（第二筐也是最后一筐）

树愈老，叶落愈甚。我遗嘱在我死后所有与《隐居》和《落叶》相似的作品和后续作品，再版时必须焕然一新（亦即第一篇章的版式都要以新的面貌出现），为了保持版面的紧凑，自然也是为了加快《落叶》的印刷速度，我可以忍痛割爱，放弃从前的样式。

《落叶》出版于1913年，发表的篇幅只占1912年实际完成的手稿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鉴于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几乎未对这些“落叶”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便仓促付梓了。例如，所有注明的“叶列娜·巴甫洛芙娜诊所”的，均写于10月，11月，12月，故应该排在该版的最后。总而言之，今后的版本要将1913年的版本打乱，“洗开”（如同“洗牌”），使之各就各位，千万不能“依然如故”。

第二筐的落叶是根据记号和记忆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的。

※ ※ ※

“我们的时代”的土壤受到严重破坏和毒害。它只适宜形形色色的坏树根生长，并能使之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而好树根却无立足之地。

（凝视斯特拉霍夫的照片时：为何“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一无所成，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却培养出学校的老师，特维尔的缙绅和许多认真工作的——也有一些是夸夸其谈的——医生?）

※ ※ ※

可怕的生命的空虚。啊，它太可怕了……

※ ※ ※

如今的炉子与以往大不相同：将手柄朝一边一转——烟囱打开，朝另一边一转——烟囱关上。

这样不好。因为缺乏理智和关心。

首先是小风门，它应该既不用朝左边转，也不用朝右边转，而应该一次即可自动到位，这样才省心。其次是大风门——它应该像帽子一样盖在上面。

这样才好。

有一次我路过一片刚收割过的庄稼地，发现一个工人，而不是农民，坐在一架叫不出名的车上，这既不是四轮的货车，也不是别的什么车，而是一种由两匹马拉着的东西；旁边还有一架笨重的大马车，摇摇晃晃，坐在上面的一个农民也在摇摇晃晃。而在大马车的两端，不知是镰刀呢，还是耙子，不断地张牙舞爪地上下起落。我敢打赌，他们是在为十二个姑娘干活。只是这些姑娘此时正坐在树林后面跟小伙子们调情。工人在为她们挥汗如雨，她们却我行我素。

一旦嫁了人——还会变本加厉。

丈夫发现老婆有二心——也开始“拈花惹草”。

于是家庭分崩离析。

于是农村分崩离析。

而当农村分崩离析——城市出现了。

因为头脑，理智和上帝不在了。

他们拿来一些信件和神学杂志（我不订）。有一本叫什么《芋》……这是干啥？与我何干？

“请你看一看，增进了解。”

可我为什么要了解你们这些人呢？

※ ※ ※

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宝贵的：它如一根锋利的钢针刺透灵魂，留下印迹。萎靡不振的知识——没有价值。

※ ※ ※

胀鼓鼓的眼睛，老是舔嘴唇——这就是我。

不雅观吗？

为之奈何。

※ ※ ※

……有时觉得，文学，文学本身，正在我身上发生分解。而且有可能，这就是我的世界抱负。这既是我的（特殊的）道德，又是我的反道德。总之，是我的缺陷和品质。否则不可思议。我将最微不足道的，昙花一现的东西，将微妙的心灵波动，将日常生活的蛛丝，带进了文学。但无论如何不能想像，这一切之所以

成为可能就因为“我想要这样”。实际上要比这深刻得多，好得多，不过也可怕得多（对我而言）：令人感到可怕和伤心之至。当然，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要在宇宙中重现这样的情景也是匪夷所思，我不可能在同一瞬间，在泪水横流和心痛欲裂的时候，再一次以准确无误的耳朵谛听到它们文学般的流淌，音乐般的流淌，“哪怕是记录下来”：须知我正是因此才采用了记录的方式（《隐居》，——火车站上的小姑娘，风扇）。这是那么耸人听闻，恐怕连尼禄也会自叹不如；并且，这是可以谅解的，只因为天意如此。真的是可以谅解的吗？……让我们先放弃罪过这个话题；如此，则在我身上分明表现了文学的终结，文学性的终结，文学本质——一种对反映和表达的需求——的终结，表达的需求——的终结；此外还有什么可表达的呢？蛛丝，呼吸，最后的可以捕捉的东西。啊，还可以想像和编造，但文学的本质并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对说话的需求。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并且做到了。我时常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是最后一位作家，文学将同我一起走向终结，除了那些很快也将完蛋的破烂货。人们将开始单纯的生活，把文学视为可笑的，无用的，讨厌的活动。或许，正是因此我才意识到某种“最后的不幸”，且这种不幸又是同“我”联系在一起。这最后的悲剧使这个“我”显得恐怖，可恶，高大，悲壮，因为古老而庞大的文学的“我”在这个“我”身上辩证地“溶解和消失了”。

——呸，坏蛋！销声匿迹吧！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带着这样的感觉生活，多么痛苦啊。

（排队忏悔时。第一中学）

※ ※ ※

神父们（有时）都是些多么善良的人啊。伊万·巴甫利内奇

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只手搓着我的额头，说：“对我们的脑袋瓜儿（大脑，理智，颅骨），我们究竟能知道什么呢?”我把宗教哲学会期间产生的各种怀疑与困惑告诉他。非常愉快地吻了他的手，做了简短的忏悔。人们在排队等他。为人祈祷并获得收入。“日常生活”与天国的语言就这样混在一起——倾听天国的语言时，不要忘记日常生活，而目睹日常生活时，不要忘记，你也是在倾诉天国的语言。不过我要说，斯洛鲍茨科依是大公无私的。谢谢他。他是个可爱的人。可爱而又聪明（非常聪明）的人。

※ ※ ※

有的人天生“和谐”，有的人天生“不和谐”。

我天生“不和谐”，正因如此我才有了这么奇特的，带刺的，却又相当引人入胜的生平。

生来“不和谐”者，永远感到自己“如同外人”。我就是这样。

与我恰好相反的是孩子的外婆（阿·阿·鲁德涅娃）。还有她高尚的一生。这才是生来“和谐”的人。无论生活多么贫困，地位多么低下，她都不断地释放出光明。还有好处。而我，我想，没给人带来任何“好处”。我尽给人“添乱子”。

※ ※ ※

我可以让世界充满红色的烟雾……但我不想。

且一切会燃烧起来……但我不想。

就让我小小的坟茔寂然无声，退避一旁吧。

（《月光下的人们》，1912 年 3 月 22 日）

※ ※ ※

工作和痛苦——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唯一的安慰是能看到朋友在身边关心我。

不，不是在身边，而是在体内。“肖像的因素”超过了“工作的因素”。她的痛苦比我还深，她的工作比我还多。

当她的一只手已经不听使唤（1912 年春），她气愤地站在屋子的中央，连续几次做挥臂的动作：右臂活动自如，可左臂只能稍微抬起。她含着眼泪，跺着脚，对患病的手臂吼道：

——你怎么就不管用！你怎么就不管用！你怎么就不管用！你怎么就不管用！

她泪流满面。我惊呆了。既高兴，又心疼。

（左臂只有肩部和肘部可以活动）

※ ※ ※

“你伤及他的皮肉”，——撒旦引诱上帝去攻击约伯。

这“皮肉”人人皆有，但每人都不一样。那些特别宽宏大量并时刻准备为别人（人类）做出牺牲的作家，请你试试看，碰一碰他们的著作权，对他们说：“你写得不好，先生，读起来索然无味”。他们不剥掉你的皮肉才怪呢。慈善家们似乎很不喜欢“算钱”。至于“神职人员”，那当然是“无懈可击”。但你若从旁边用“棒棰”，“十字架或教士的法冠”碰一下他的卢布和奖金——节日来临之际，他准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好像俄罗斯人从来不曾在符拉基米尔时代接受过洗礼似的。

（收到阿尔波夫① 神父的信后）

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你的“皮肉”在哪里？

一时想不起来，但毫无疑问——我有。

令人惊讶的是，“朋友”② 和乌斯金斯基③ 没有“皮肉”。“朋友”大概没有，乌斯金斯基似乎大概没有。我从未见过“朋友”感到屈辱并恶语相向（问题全在这里，连撒旦也说过）。令人惊叹的是，她身上有一种彻底的，平静的，无言的高傲。她从来不放任自己，对别人以牙还牙（问题就在这里）。人家挤她，她就躲闪，人家下流地盯着她，她就避开。她从不跟人家争吵，总是给人家让路，给人家行方便。然而，令人叫绝的是，她给人家让路时，始终像个女皇，而那些“当仁不让”者，此时此刻看上去也“不过如此”，全无君子风度。是谁教的？

天生的。

言谈举止的美永远是天生的。是教不会学不会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表现心灵的美丑”。可惜，我的举止似乎丑陋极了。

※ ※ ※

一个四十岁的人对五十七岁的我说：“凡是您懂的，我们都懂。”不错，他们有“斯卡比切夫斯基颁发的文凭”（大学毕业）。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是的，我也只是念过大学，因为找不到地方深造。”但假如新闻检查官也跟我们一样，大学毕业便完事大

① 阿尔波夫，约翰·费奥多罗维奇，生卒年月不详，神父，洛扎诺夫曾与之论战。

② 洛扎诺夫对第二个妻子（事实婚姻，未经教会许可）的称呼。

③ 乌斯金斯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54～1922），诺夫戈罗德神父。

吉，那学问可就成问题了。

他们粗野，愚蠢，寡廉鲜耻。你无可奈何。

新闻检查官中只有一个人有文学修养——米·彼·索洛维约夫。可谢德林们一提起他就火冒三丈："他跟我们过不去！他是保守分子。"对整个新闻出版界来说，最好由巴巴莱金出任新闻检查官，他处事灵活，态度温和，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上台文学肯定会繁荣。

（彼得格勒的新闻检查机关下令收缴《隐居》）

※ ※ ※

我为什么要出版《隐居》?

需要。

还有一些次要的原因（主要和明确的是跟"朋友"的结合）。但凌驾于这之上的还是那个自发的，不可抗拒的原因：

需要。

仿佛是鬼使神差，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开始为稿纸编号，然后送到印刷厂。

不错，"自以为是"：可这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啊！

由此可见，《隐居》乃是一种尝试，一种从可怕的"幕后"走出来的尝试。实际上，并非我不愿意从幕后走出来，而是我无法从幕后走出来。

这不是一堵物质的墙，而是一堵精神的墙，——啊，它比物质的墙不知要可怕多少倍。

由此可见，这里还有我对“朋友”的眷恋，或者确切地说，是神秘的依赖。我在她一个人身上寻找我需要的东西……于是，“墙”的本质即在于“我不被需要”——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是那么恐怖，那么令人伤心，令人痛心，这是一种神秘的形而上的空虚，犹如二氧化碳，使人窒息，无法生存。

然而，我的“呼吸”还在。“朋友”给了我呼吸的可能性。而《隐居》就是我加强呼吸，投向我所深爱和挚爱的人们的一次努力。

我在爱，而不是感受。我在捕捉，但捕捉的是空气。我似乎想要说一句话，可空虚不传递声音。

要知道，我从来不会替读者着想（亦即未接受斯特拉霍夫的劝告）。我知道，他们在读我的书，但又好像没读。这“没读”，“没一个人读”比起很多人在读，更可信，更实在。

赶紧拿去出版。数钱。就是说，我知道，“有人读”。不过且慢：有什么东西在眼前，在思索前发生了改变，于是乎“有人读”成了——“没人读”，“什么都没有”。

好像我的眼睛（精神）跟桌面处于同一水平。且桌子是一张薄纸。抖动一下，桌面开启，于是我发现，桌子下面与桌子上面的东西全然不同。我眯缝起眼睛，仔细察看。“桌子上面”是我的生命，“有人读”，就是说，“我要忙碌了”；“桌子下面”则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 ※ ※

爱意味着“没有你我不行”，“没有你我难受”，“没有你我寂寞”。

这是外在的描写，但也是最精确的。

爱决不是火（像人们比喻的那样），爱是空气。没有它，就

没有呼吸；而有了它，“呼吸顺畅”。

就是这样。

※ ※ ※

我们的社会和历史事务令人伤心，令人摸不着头脑……我眼前总是浮现出我们已故的哲学家和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的面容。每当我瞥见这位影子般一闪即逝的人间过客的面孔，我总是不由得感到茫然。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无声无息，只因他不会大喊大叫，不会哗众取宠，不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只会悄悄伏案，默默笔耕……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和戈沃鲁哈－奥特罗克的命运……

这样的人不少。说实在的，哲学家，诗人，孤独的思想家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迎接我们的进步：“Morituri te salutante①。”“我们的进步”是在“必要”情况下进行的——正如警察局的规定和命令中所说——目的是要“打倒”所有喜欢思考，好奇心强，爱管闲事的人。

对陈旧的故土怀有陈旧的爱的人……

上帝啊！假如在俄罗斯能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怀着同样的兴趣和热情通读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他们的每个观点和每个艺术特点进行思考，就像他们对待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夫那样，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很快变得蔚为壮观。因为，即使不在学校里学习，不懂地理和历史，只要“反复琢磨”一下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可以成为苏格拉底那么聪明的人，或者成为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那些同样“不大懂地理”，“中学没毕业的人”。

① 拉丁语：注定死亡的人们欢迎你。

整个希腊和罗马都只是以文学为养料，我们的意义上的学校根本不存在。但却茁壮成长。文学可以说是民族的天然学校，而且可以成为唯一的和足够的学校……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要求整个民族都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而读高尔基的《马尔娃》和《三人》的只有专家和文学爱好者。

假如《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每发表一章，批评界和出版界都能像对待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的每一部只有四十页的作品那样，“激动得透不过气来”，那么，上述情形是不难出现的。

这种不平衡状态使俄罗斯的精神发展延误了一百年，就仿佛是一所中学，突然取消了高年级，只留下了低年级，只留下了初中。

然而何至于此？原因何在？

不言而喻：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都是“进步作家”，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孤独的俄罗斯天才。“天才总是凤毛麟角”。

陀斯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这种情况，他苦恼地写道：

“请看，在二十一世纪：一个身穿短衫，手持匕首的人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爬上楼梯，来到西斯廷圣母面前，为了普遍的平等和博爱，把她美丽的脸庞撕下……”“不要天才，因为天才是贵族。”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穷人和民主主义者：这段有关“平等和博爱”将取得胜利的文字，同时也是提前一个或两个世纪为这一制度的胜利唱的一曲挽歌。

※ ※ ※

让他唱一首歌或写出哪怕两行诗——我简直无法想像。

他身上没有一点音乐细胞。他的灵魂与音乐没有丝毫联系。

但与此同时，他整个又是喧哗与聒噪。只是没有音调，没有速度，没有旋律。

闹市。整个一个闹市，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赫尔岑。正因如此他才写了那么多的书：可没有一页能唤起读者的深思，没有一页能赢得少女的眼泪。不能催人泪下，不能激发幻想，甚至不能引发一声叹息。这太可悲了。赫尔岑既腰缠万贯，又一贫如洗。

※ ※ ※

“我不想过早打扰您，因为我想当场抓住他们。”

我喜欢这种民间口头作品。

我认为，小偷和警察的语言含有艺术的成分。

对达利也会不无裨益。

(布图尔林调查案中的一个小人物，模仿夏洛克·福尔摩斯跟踪奥勃里安-德-拉西和潘钦科)

※ ※ ※

整个“十九世纪的文明”乃是下等酒馆无所不至的渗透，这种渗透是缓慢的，成功的，不可抗拒的。

酒馆渗入政治——这便是“欧洲的（而非英国的）议会”。

酒馆渗入出版业。要知道，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没有报纸(有过什么东西)，只有文学。到十九世纪末，报纸在出版物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文学——几近无影无踪。

酒馆渗入“可爱的经济”，渗入“自留地”。这便是银行，财政部和社会主义。

酒馆渗入劳动：这便是工厂和机器。

我见到过一次“收割机”的工作。我当时就想：这里没有上帝。

“酒馆”里是没有上帝的。十九世纪的实质就是上帝抛弃了人。

※ ※ ※

伊兹麦洛夫①（批评家）不相信我“没读过谢德林”。我们这个圈子中的人认为，读谢德林是对自己的智慧不敬。

跟斯特拉霍夫相交六年，从来没听到一次他提谢德林的名字。这并非出于仇视。不过的确——“就是想不到他”。

勒齐，弗罗伦斯基和拉钦斯基也是：从未听他们提起过谢德林。

尽管大家都清楚他的实质，然而：

“我们毕竟念过大学。”

（1912 年 5 月）

※ ※ ※

所有跟“宗教”有关的东西中他最喜欢橡木的皮面家具。

还有出殡的程序。

夏初，他走进门，说：

——我被邀请去乘船游历北冰洋。航行两个月。可以欣赏风景，呼吸新鲜空气。是以客人的身分，免费。

——有什么问题吗？您就去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同意了。

① 伊兹麦洛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1873～1921），作家，批评家。

——太好了。

——是的。但我放弃了。

——放弃了?

——只好这样：要知道，我可不愿意生病死在海上。

——我们都有一死。

——对不起。你们是死在陆地上，而且你们的葬礼将严格按照东正教程序。唱经，祷告，一样不会少。可在船上就完全不同了：只是给人缝上尸衣，用一块木板放进海里，念几句“送行的祈祷文”。而且只有军舰上才有牧师，商船上没有，只好由船长代劳。这成何体统。我不愿意这样。

——可是且慢：那时您已经死了呀。

我害怕地说。

——算了吧……我才不愿意这样呢！所以我要放弃。这太不像话。

他的黑色的卷发和平常一样，在瑟瑟发抖。裤子像帆一样紧贴着两条细腿。半高腰的皮鞋的鞋跟是法国式的。

我产生一个错觉，好像看到伏尔泰的假面具正通过一个活人，亦即一个勉强还算活着的人，在呲牙咧嘴。

（我们的马德马泽尔金）

※ ※ ※

英国人的皮箱做得出色，而我们的谚语令人叫绝。

（准备去基辅）（斯托雷平去世）

※ ※ ※

只有当书被体验的时候，阅读才给人带来满足。为消遣而读

书是不值得的。甚至为“有用”而读书也未必值得。靠两条腿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只要活着，工作。

我体验过列昂季耶夫[1]，部分地体验过塔尔姆德[2]。现已开始体验梅特林克[3]：八页，我读了一个星期，几乎每读完八行就要陷入一次长达一小时的沉思（在有轨马车上读的）。这是一种绝妙的体险，但由于吃力，我最后只好放弃。

为何要读“其他的”——我不知道。没有一点新鲜和惊人之处。

普希金……我是在“吃”他。已经熟知他作品的每一页，每一个场景，还是要反复阅读，而且百读不厌。这是“食物”。它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血液中流淌，使大脑变得清新，使灵魂变得纯净。他的当喧闹的白昼为凡人而沉寂跟第五十首赞美诗（“饶恕我吧，上帝”）毫无二致。它是那么伟大，那么振聋发聩，那么富于宗教色彩。这就是真理。

※ ※ ※

性格懦弱是导致虚伪的最主要原因。虚伪（身不由己的）首先是因为害怕得罪别人。

这就是上帝不拘礼节的原因。我们全都彼此客套，也全都互相欺骗。

（鉴定古币时）

① 列昂季耶夫，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1831～1891），作家，批评家。
② 塔尔姆德，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犹太教义，宗教伦理和律法集等。
③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作家。

※ ※ ※

我为何总是攻击温格洛夫① 和卡列耶夫②？这简直是小题大作……

不用说，这里毫无“美德”可言。

他的著作让人肃然起敬。至于他毕生研究普希金，简直令人感动。在私人交往中，他给人的印象可以说是愉快的。但一看见他的肚子，我就不由得火冒三丈，对他进行口诛笔伐。

我的文学生涯中，大动肝火的时候颇多。且一切都是徒劳的。为什么我不喜欢温格洛夫？说来奇怪，就因为他又黑又胖（像个大腹便便的蟑螂）。

※ ※ ※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决定率三万人马征服波斯国王。这对我们俄国人来说无异于彼斯杰尔和沃尔康斯基决定率两千近卫军征服俄罗斯……

人们为这出滑稽剧的历史大书特书。连篇累牍的回忆录，形形色色的东施效颦者。还有涅克拉索夫率领“俄罗斯女性”……

（在轿式马车上）

※ ※ ※

“千变万化”，“反复无常”——人们抱怨。

---

① 温格洛夫，谢苗·阿法那西耶维奇（1855～1920），文学史家，文献学家。
② 卡列耶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50～1931），历史学家。

圆柱形的废墟……

——他们没有发现，这“反复无常”构成了世界的格局。事实上，所有的天体都在作椭圆形运动，越来越偏离直线，越来越偏离原来的方向。宇宙的平衡就建立在这上面。“狡猾的路线”带来的是永恒的稳定。君不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万事开头好……当教皇们急忙赶到匈奴人的营帐，面见阿提拉，对野蛮人以礼相待，想以此阻止潮水般的敌军涌进古老但又束手无策的意大利城市，他们的开头是好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也是令人激动，欢欣鼓舞。革命的初期——那是怎样的兴旺，怎样的曙光啊。所有的爱在开头都是好的。还有祷告，甚至还有战争。为了保卫祖国，浩浩荡荡的大军开赴边境，这是何等的令人感动啊。

但请设想一下，如果战争“没完没了”，如果恋爱拖到九十年，如果教廷不搞宗教改革，如果宗教改革没有受到特兰托公会议的反击——后果会怎样?

这就叫事物“偏离方向”（“椭圆”代替“直线”），“狡猾”，“颤抖”……事物在走向衰老！这是多么可怕！衰老多么可怕！但与此同时，又多么令人高兴——因为万物恰是由“衰老”而变年轻，没有“老年”就没有“青春”（椭圆的稳定性）。青春勃发的宗教改革运动脱胎于衰老了的天主教，青春勃发的基督教诞生于衰老了的多神教，青春勃发的，新的生命来源于没有牙齿的政治……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恬不知耻”，“厚颜无耻”（斯特鲁威对我的攻击，别人对我的指责）。然而，请回顾一下过去，请揣摩一下生命的根本。伟大的新生开始于伟大的背叛。

IN NOVA FERT ANIMUS（拉丁语：灵魂向往新的事物。）

只有出卖，背叛枯萎凋蔽的旧花园，才能欣赏到真正的新花园。请看一看，看一看历史的惊人之处吧：基督教战士“无耻地背叛了罗马的中流砥柱”，冷漠地把箭和盾丢在地上——路德“完全不把教皇放在眼里，蛮横地拒绝听命于他”……要知道，歌手永远都在“背叛政治”。怀恋过去的人总是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诅咒，抨击别人“反道德”，“背叛我们的传统”，造成“我们的世袭贵族阶层发生断裂”。多神教徒咒骂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咒骂路德教徒，最为深刻和基本的是，政治家咒骂诗人，哲学家，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拼命想把“不知羞耻”的人拉过去。无奈力气不够。是上帝“折断了历史的一条直线”，并将其两端抛入空间，命令天体，地球，月球，人类历史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运动。“我们全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只能按照他赋予我们的品质行事。”有真实，也有虚假，有优点，也有缺陷，否则椭圆就不成其为椭圆，而这又是它所“需要”的……这一切之中蕴含着一个伟大的真实，所以才说“我主荣光，永远荣光”。

（思考同斯特鲁威的争论时）

※ ※ ※

八岁。妈妈走进屋子：

——糖在哪儿？

糖罐里有五块糖。少了一块。

我不吭声。让我给吃了。

她气极败坏地抓住谢辽沙的白头发，使劲往下扯，疼得谢辽沙哭了起来。他六岁。我不吭声。

我为什么不吭声？多少年来（整整一生）我始终在谴责自己：太卑鄙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其实这里并无所谓卑鄙。就

像对别人的诽谤，可怕的卑鄙必须具有事实根据，而且需要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判别。可我是因为母亲大发雷霆吓得不敢吭声，而不是因为怕挨打，怕疼。疼是小事一桩。母亲经常发火（她命苦）；正如狂风能吹折树枝，大人的恼怒令八岁的孩子不知所措。我的舌头都不会动了。

不过我对谢辽沙还是很好的。有一次我们躲避大雷雨，而大雷雨好像是在追赶我们。常有这样突如其来的大雷雨。先是天色变暗，随即阴云密布。家远，但我们以为来得及。眼前是一片丘陵。突然打了一声雷，我们吓得撒腿就跑。

我们跑啊，跑，不停地跑。

跑，还在跑。我害怕极了。“闪电击中腰杆就完了。”谢辽沙跟在后面，离我四步之遥。突然他的脚步开始放慢。

我回过头。二话没说便停了下来。就这样，我们不再奔跑，而是手挽手，一路走回家去，“绝不把自己的兄弟出卖给闪电”。

※ ※ ※

精神振奋，语气坚定：

——哎，瓦莉娅，我要开始写作了。

——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你！

说完按照东正教的习俗，用三根手指在额头，胸前和肩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结果我的写作很顺利，很愉快（心情舒畅）。

（年年如此）

过了好多年，我才搞清她的习惯：比我早半小时起床，然后坐到桌前，将我夜里写的东西通读一遍。如果写得好（生动，真实，情绪饱满——“思路”和“论证”她不管），她就什么也不

说。如果写得懈怠，呆板，死气沉沉——她就会在白天做事的时候告诉我，说她“不喜欢”，当然，她有时会“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于是我就会换一种写法。可我误以为她是白天读的，所以对她的习惯一直不甚了了——直到三年前她最后一次生病期间，才终于搞清楚。

※　※　※

苦闷的人是天然的基督徒。幸福的人是天然的多神教徒。

这两个范畴似乎是尽人皆知的，也是极为原始的。它们不是从外部强加给我们，它们来自我们的内心。它们是处于不同状态中的我们自己。

左手健康，于是“祈求古代的神灵”。右手生病，于是寻找上帝。

我们要面对古代的神灵哭吗？“实证的神灵”，充满儿戏与虚构。可突然“脊背疼痛”，便顾不上虚构了，只能喊“救救我吧！帮帮我吧！”朱比特无论如何不会说：“帮帮我吧！”当人类遭遇巨大的苦闷之时：“帮帮我吧”，——基督显灵了。

在人类的痛苦“帮帮我吧！救救我吧！”之中有着某种更为重要，更为阴暗，更为深刻，或许还是更为可怕和凶险的东西，但痛苦要比一切快乐更为深刻，这是无疑的。无论诞生的秘密多么伟大，多么令人欣喜和兴奋，但假如我看到一个人得了癌症，而旁边是一个满怀希望，正在喂养孩子的“幸福的母亲”，我会奔向那个病人。不，相反：得癌症的是一个老头，或者更糟糕些——得癌症的是一个老太太，而旁边是一个临产的姑娘。假定突然需要作出选择：要么姑娘不分娩，让老太太痊愈；要么姑娘分娩，让老太太死去。这时，全人类的情感肯定会呐喊道：宁可迟一些分娩，也要让老太太痊愈。

这就是基督教的胜利。这恰好是对实证主义的胜利。整个古希腊世界，虽然极其美妙，但毕竟是实证的。然而疾病向实证主义发起冲击，使它遭到灭顶之灾："我要奇迹，上帝啊，给我奇迹！"这种冲击就是基督。

他哭了。

于是只有通过泪水人们才能看见他。谁从来不会哭，谁就永远看不见基督。而谁会哭，谁就必定能看见基督。

基督是人类的眼泪。这眼泪化作一个惊人的故事，一个惊人的事件。

谁能领悟眼泪的秘密？有的人即使大难临头也不掉泪。有的人稍遇不幸便会哭泣。女人的心整个浸在泪水中。这究竟是什么，眼泪的世界？这世界部分来自女人，部分来自痛苦。是的，这个范畴是永恒的。基督教也是永恒的。

基督教比多神教更温柔，更细腻，更深沉。所有繁殖力旺盛的"亚伯拉罕"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会哭的女人。这就是交替生育的拉希利伊与利伊的区别。有一种心灵的壮丽，它能铸就一切，铸就未来，"出生"，世界的本来面目。有一种心灵的"美"，它能使我们在它面前伫足，并说："我们不需要更多，不需要更好，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最好的，不可能再有更好的了。"这是完结，是句号，生育活动不再继续。

我记得这样的狂喜，我无法忘怀。

我有过非常幸福的时光（二十年），便不由自主地皈依了多神教。幸福的人自然要成为多神教徒，就像太阳自然要发光，植物自然要变绿，孩子自然是傻乎乎的，可爱的。

但他注定会长大。我长大了。

我会不会重新信仰多神教呢？假如我能彻底复原，并能永远健康，我会的。不正是因为我们有生老病死，我们才需要基督？也就是说，不正是因为我们有生老病死，基督才出现在我们面

前，好让人们与基督同在？

这些概念可怕地纠缠在一起。世界多么迷乱啊。这是一口深不可测的井。

（深夜）

※ ※ ※

勒齐[1] 经常出语惊人。有一次，我和达尼雅去他家。他穿着皮鞋和“敞胸的女短上衣”出来开门。这是一套新居。我四下打量着，跟他寒暄。他说：

——“您真年轻！您变年轻了，面孔也比从前好，——前所未有的好。”

我五十七岁。

——“现在您是处于焦点上，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您还能活很久。”他用手指做了个动作，好像是拍照，但又不是拍照（那会很冒失）。

——“面孔和生命跟‘焦点’有何关系？”我莫明其妙，却又感觉到了什么，就问。

他喜爱伦勃朗，也曾推崇马济尼，对其生平了如指掌。

——“有关系。我见过许多伦勃朗的‘自画像’，也见过不少马济尼的照片。当我反复观察，对比，我觉得：‘不，不……这还不是马济尼’，或者说，‘这已经不是马济尼’……‘不是那个我们在大剧院（莫斯科）屏住呼吸以整个身心谛听的马济尼，不是整个欧洲都在追随的马济尼。’终于，我找到了一张（他说了是哪一年的）：‘看啊，只有一张照片才是真正的马济尼，尽管他的照片很多；伦勃朗的自画像也一样，只有一张，还有俾斯

---

① 勒齐（1861～1913），作家，政论家。

麦：毫无疑问，只是在其生命的一个瞬间，一个时期，他才拥有自己的真正面孔，——这便是他大权在握，呼风唤雨，八面威风时的那张面孔；而不是他老态龙钟，像一只羸弱的猫，徒有虎气，没有虎威时的那张面孔。'”

我听着，感到惊奇。

他谈了他的想法，同时我也猜到了：一个人的生平和他的面孔——他的躯体和他的精神——是有焦点的。到达这个焦点之前，一切都在扩大和成长，超过这个焦点以后，一切便会缩小和死亡。这个焦点如果是在一个人的青年时期到来，他的寿命就不会很长；如果是在一个人四十岁的时候到来，他的寿命将是正常的；如果再晚一些，甚至在五十岁以后到来，他就注定会长寿。“生命有升有落”，自然也就有高潮和顶点。但这不能一概而论。生命是通过人的一系列变化着的面孔得到表现的，在这些变化着的面孔中，只有一个可以说，他是在此时此地“达到了自我”。

多么惊人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用说，这是一种境界，是对事物出神入化般的认识。

这里有家神，这里有林妖，
美人鱼坐在树枝上。
……一只博学多识的猫
为我们把童话故事讲。

头发灰白，其貌不扬——唉！——早已过了焦点的勒齐，对我来说，就是那只充满智慧的“猫”。

正因如此我爱他。

（这是1911或1910年的事）

※ ※ ※

要想停止相信现实，读果戈理。

从他身上倾泻出来的艺术之光，淹没了一切。你失去了知觉，视觉，只好乖乖地相信他。

（喝晚茶时）

谢德林在果戈理身边一站，活像亚利山大·马其顿身边的马夫。

果戈理就是亚利山大·马其顿，他征服的地域同后者一样辽阔。还要加上“重新发现的国家”。甚至包括“印度”。

（喝晚茶时）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家，也没有一个政治作家能像果戈理那样，在“政治方面”这么多产。

（喝晚茶时）

※ ※ ※

卡特科夫模仿马车夫说：

——吁……

而报纸和杂志方面的回答是对他尥蹶子。

这就是俄罗斯的保守派和自由派。

莫非熟读基佐著作的斯塔修列维奇是真的不懂，不知道“地理学”一词的来源，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过喝了二十年水的他确实不曾说过：“先生们，地理学还是有必要了解的。”

可他的杂志的评论家们只知道耸耸肩，说什么“这不是学问，而是制造分数”，“这里不是老师，而是捷克人”。如此，问题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火车上）

※ ※ ※

谁不懂得痛苦，谁就不懂得宗教。

※ ※ ※

民主只有一个权利，尽管这权利确实很大，是起源于饥饿。啊，这是一种令人骇人听闻的权利：它会导致凶杀，抢劫，遍地哀嚎。它有能力也有权利摇撼宗教。“挨饿者”是不应该受到审判的。挨饿者甚至不应该受到谴责，尽管他抢了你的钱包。

这就是革命的“地狱性的”基础。

然而除此之外，无论是革命，还是民主，都不再有任何权利。“不错，是你拿刀捅了我，但我不谴责你，因为你在挨饿。”“可你毕竟还在振振有词，你想夺走我的灵魂，探讨一些高级问题——既然如此，我只好把血喷到你无耻的眼睛上，因为你没有骗子饿得厉害。”

民主一旦具备道德形态和哲学形态，它便成为欺诈。

它的历史界限即在于此。

民主的最高界限实际上就在《约伯书》里。它不可能比这走得更远，过去不能，将来也不能。

但有《托维亚之子托维托夫书》。有福音书。有天空，除了乌云。且天空大于“在它上面”（部分）“匆匆掠过”（时间）的乌云。

茅屋和豪宅。茅屋里的人苦恼不堪：关于西顿的寡妇萨列普塔所说的全部美好的话（“烤完最后一次面包我们就死去”）都属于这间茅屋。

但豪宅里同样是宁静的。锁上门，主人开始核对账本，计算一个月的收入。待嫁的女儿纯洁无瑕，梦想着新郎。男孩们在寝室里睡着了。祖母在为孩子们明天的安排操心，对他们个个关爱备至。

这就叫富有。这就是“遇难前”的约伯。

那里是美好的，但这里同样美好。那里有虔诚，但这里也不是没有祷告。

为什么要说这些富人比那些穷人坏呢？

至于“花天酒地”，那又另当别论。

可要知道，即便是在穷人的茅屋里，也有可能传出霍霍的磨刀声。

但在犯罪之前——贫与富都是平等的。

但在犯罪以后——富应该受到诅咒，贫同样应该受到诅咒。

老实说，社会民主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古老的，简单的，平常的，鄙俗的真理，“你无法逾越它”：

即使你富可敌国，你也要纯朴为人，勤俭持家，仿佛你一贫如洗。

※　※　※

有一次：

——瓦莉娅。你怎么又戴那双露手指头的破手套？我不是给你买了一双新的吗？

她不吭声。

——瓦莉娅。手套在哪儿？

——我送给舒拉了。

舒拉只有十二岁。她可是“女士”和“夫人”啊。

就这样，她始终是一位“戴着破手套的女士”。

如今她卧床不起（二年了），双手缩成了小拳头。

※ ※ ※

以伟大的忘却忘却大地——这是好事。

（从区法院回来的路上——关于《隐居》，
日蚀）

※ ※ ※

政府是在利用出版物的崇高情感，每当需要对什么进行整顿（是动真格的吗？），它总是抓出一个三等文官示众，要么说他“营私舞弊”，要么说他“金屋藏娇”。于是报刊就得花上半年时间，为此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声讨和叹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雅布罗诺夫斯基“执笔记录”，巴扬“痛心疾首”，《俄罗斯言论报》将以新栏目赢得十万订户。

一旦完事大吉，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过两年还会“给（假装）受害的三等文官授勋”（说是“为祖国而负伤”），并宣布：“政府的怀疑是错误的。”

不搞这些花样政府就什么也不能干。难道做事非得闹哄哄的？

※ ※ ※

诗人迈科夫总是谦虚地乘坐铁轨马车。

我问斯特拉霍夫。

——是的！当然是乘铁轨马车。他穷嘛。

他做过“三等文官”（好像是），在新闻检查机关里担任过要职。

这都是穷大学生凭空想像出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涅克拉索夫给他们灌输的），说什么三等文官“真是活见鬼，全都是将军”，全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我在一首左派诗歌中读到过这样的句子：“当人民饥寒交迫，他们却在花天酒地。”）

※ ※ ※

使报纸和杂志变得有意思的并非“社论作者”和“专栏作者”。这些所谓的名人就像印地安人的公鸡——枯燥乏味。但在报社里，我喜欢到“消防队员”集中，即值夜班的地方去。有的人哈着腰，好像正在研究几何的阿基米德，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下棋。有的人好像阴谋家，在那里窃窃私语，讨论赛马（他们在赌赛马）。这里听得见最新的谣言，也听得见爆炸性的新闻。还有可能意外地碰到他们破口大骂施瓦尔茨。烟雾缭绕，粗话连篇。

※ ※ ※

戈耶①谈论叶甫盖尼·伊万诺夫②时说："这个人才是天然的大学教授。多少新思想啊，多少出人意外，振聋发聩的发现，观察和思考啊。"

当有人问杰里亚诺夫③，为什么符·索洛维约夫④不是教授时，他答道：

"他有思想。"

这位自己也不乏思想和机智的老头，并不认为他留在教研室是需要的。但更让人震惊的是，所有的教授都在千方百计地排斥有思想，有创造，有想像力，有悟性的人，不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子。

伊万诺夫也好，施佩尔克⑤也罢，他们甚至不能念完俄国的大学。

教授应该是"饶舌者"。这才是教授的风格。总有一天，公众会开口说：

"做个聪明人是与教授不相称的。他会成为开屏的孔雀中间的一只乌鸦。"

我的文学活动带来的最大好处便是——解决了十个人的吃饭问题。这是明确无误和坚定不移的。

而思想呢？

① 戈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31～1894），画家。
② 叶·伊万诺夫（1884～？），考古学家，记者。
③ 杰里亚诺夫，伊万·达维多维奇（1818～1897），俄国教育部长。
④ 符·索洛维约夫（1853～1900），哲学家，诗人。
⑤ 施佩尔克，费奥多尔·爱德华多维奇（1870～1897），哲学家，洛扎诺夫的朋友。

思想为何物?

思想是形形色色的。

（火车上）

※ ※ ※

这是一种令人苦闷，令人茫然的感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人人都觉得无所事事。有能力，有好心，有热情，就是没有用武之地。

如今只有等待。等待工作，等待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就是1905～1906年前后的“我们”。好像大坝决了口，日积月累的垃圾，淤泥，疾病被洪水席卷而去，一去不复返。

（与戈耶谈话之后）

※ ※ ※

永恒的婚姻的童年——这就是我要倡导的东西。夫妻应该是孩子，应该是小狗儿。他们应该几乎是舔舐爸爸和妈妈。人人都有责任喂养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他们呢，只须是幸福的，并为一个好社会生好孩子。在将来世纪，新婚第一年不应住在家里，而应住在黄金做成的篮子里。

（在马车上。苏沃林葬礼。阳光明媚的早晨）

※ ※ ※

所有的作家都是奴隶。自己读者的奴隶。

无论他是什么人，都脱离不了奴隶的本质。

这是靡菲斯特－古滕贝格做的好事。黑色的记忆。

（早晨8点，进城时）

※ ※ ※

我曾在弗罗伦斯基[1]那里听到过一个惊人的观点（1911年冬，12月）："他们在教会之外寻找基督"，"他们想在教会之外找到基督"，可我们不知道教会之外的基督。教会之外——"没有基督"。"教会给人类的正是基督"。

他说这话时声音有些短促，但效果却更好。他的意思大体上好像是教会诞生了基督，既然如此，怎能既爱基督，又放肆地攻击教会呢？

他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表达得更好。

这段话的新鲜独到令我折服。如今到处都在鼓吹把基督同教会分开，说什么只要基督，不要教会。弗罗伦斯基的见解，无疑是给自由主义基督教的当头一棒。

的确。见微知著。"好书就该有好包装"：为了将福音书放进半普特重的，金银铸成的封面里，教会要对这本书有多少体会啊。这是小事，但含义深刻。所有的"异教徒"每星期只读一次福音书，这是在他们心血来潮的时候。而教会在成立一千八百年之后，依旧不分白天黑夜，每日必读，否则便是"失职"。

① 弗罗伦斯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82～1937），哲学家，学者，洛扎诺夫的朋友。

教会用大写的字母写就了福音书。教会用珍贵的宝石装饰了福音书。

的确，正是教会把基督的名字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把基督敬若神明，坚定不移，甚至不惜清除那些对他动摇者，怀疑者，冒犯者。

显而易见，教会对神明基督的虔诚是多么持之以恒，所有异教徒，当然还有自由主义基督徒对基督的信仰是多么缺乏毅力。的确，教会有理由说："福音书有可能会像读者手中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一样，成为一本值得敬仰的书，却不是一本能够产生效用的书，说不准还会遗失和失传。须知屠格涅夫一生中从未读过福音书。他没读过，就有可能一代人没读过，最后还有可能导致下一代彻底忘记福音书，使之失传。是我们为人类拯救了福音书，而你们现在却要从我们手中抢走它，还放肆地撇开教会侈谈基督。我们把它交给人类：至于那些饥寒交迫者，那些受苦受难者今天是否需要它，明天是否需要它——这已经跟你们毫无关系。"

精辟。这么平常，却又这么新鲜。这无疑问，仅凭为人类保存了福音书这一点而言，教会不仅高于"当代"，也高于为人类拯救了维吉尔与荷马的整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 ※ ※

有些人胆小到了极点，他们甚至不敢从自己坐的椅子上下来。

米哈依洛夫斯基① 就是这样。

① 米哈依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1842～1902），民粹派，政论家，批评家。

（回味他的一篇同斯洛尼姆斯基① 争鸣的文章的奇特标题《梦是可怕的（!!!），上帝是仁慈的》时）

米哈依洛夫斯基是个胆小的人。这一点谁也没想到。他给人的个人印象也是如此（作过关于谢德林的报告，急急忙忙，左顾右盼，好像有人要抓他）。

※ ※ ※

我们在文章里表达的全是主观的信念。但用的是概括和命令的口吻。既然达尔文“主观上感觉”自己是猩猩变来的，——他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又为之奈何。

我是在法兰克福的动物园里，第一次看到猩猩的。着实吃了一惊。它能帮助饲养员收拾餐桌（早饭），打扫残渣，铺桌布。简直跟人没什么两样！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达尔文甚至有幸脱胎于如此聪明的猴子。他完全有可能脱胎于比这更低贱，更实证的物种。

（清晨）

※ ※ ※

不要忘记，冯维津进过宫，亲眼见到过皇后，还有她身边的“启蒙主义者”，可能还跟皇后交谈过。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恩宠。他受到的礼遇可以说相当于库图佐夫元帅或阿·康·托尔斯泰

① 斯洛尼姆斯基（1850～1918），政论家，《欧洲导报》编辑。

伯爵。他的描写才能（天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是不是由于居高临下的关系，促使他过于看轻周围的贵族，贵族的庸俗，乃至外省的生活，风俗和习惯呢?因此，说到作者文笔的鲜明和生动，他的《纨绔子弟》和《旅长》在基调，阐释和理解方面是否有失偏颇和公允呢?

俄罗斯偏僻外省的“纨绔子弟”曾在远征意大利时为苏沃罗夫背负行囊。曾和他一道征服波兰；而“旅长”们曾是这支大军里的指挥官。他们到底怎样?

该相信苏沃罗夫呢，还是冯维津?

※ ※ ※

技术进步是不可或缺的，但对灵魂却全然不是如此。

“完善的武器”，有绿条的皮靴，不冒烟的火炉是需要的。

但技术进步不会使灵魂健康成长，反而会使灵魂萎缩变形。

这就好比那个“火炉”，没有它，生活不便，有了它，我们又不得不经常为之付出灵魂萎缩甚至灵魂毁灭的代价。

于是，“主张进步的人”与“家庭系统的人”之间的斗争便十分经常地成为一种为灵魂或者为“午饭能吃上花菜”而进行的斗争，不用说，取胜的是“花菜”。

（早晨洗脸时）

※ ※ ※

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记录下来的，除非它具有音乐性。

《隐居》是空前绝后的。

※ ※ ※

每个感官中，除了它的“我知道”（看见，听见，嗅到，触到）以外，还有“我想要”。器官其实不仅仅是感觉的器官，也是欲望的器官。每个器官中都有对世界的渴望；人通过器官不但与世界发生联系，还可以通过感官进入（纳入）世界，与之结缘。又通过感官“吞食世界”，一如通过感官——“世界吞食人”。之所以发生这种吞食，是因为二者都能庄严地进入对方……

人能进入世界。

世界也能进入人。

这“门”就是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

（写在文稿的背面）

※ ※ ※

夏洛克·福尔摩斯破案易如反掌——只要罪犯说话，只要他能偷听到他所需要的内容。果真这么简单，我也可以当侦探了。

（夏洛克·福尔摩斯全凭运气）

每当检查尸体，总能在死者的手中发现“一根凶手的头发”。

※ ※ ※

我们同勒齐告别。他的家人站在前厅里。很挤。他说：

——一切都合规矩。

——什么？

——穆拉维约夫（《圣地旅行记》）临死时，神职人员给他举行涂油仪式。他闭上眼睛，躺在那里。听到“阿门”（最后一

声），他睁开眼睛，对神父和他的同事说："谢谢你们。一切都合规矩。"也就是说，该念的都念了，该唱的都唱了，没有一点遗漏，没有一点差错。

两眼一闭——死了。

勒齐的话含有明显的讽刺意味，他虽然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对死亡抱着肤浅，轻率的态度，以致紧要关头，面对死亡，他竟然什么也没想，只求给他穿上寿衣。他的死同伏尔泰的死庶几近之。

※ ※ ※

文学基金会的意思很明白："车尔尼雪夫斯基派系"，"杜勃罗留波夫特殊基金会"。这一切无人不知，除了"上流社会"。不过就是从"上流社会"那里他们同样能得到成千上万的捐赠。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刀子随时都会捅进你的心口窝。要是不想自讨苦吃，你得先预支我十戈比茶钱。"这是《群魔》中的流放犯费季卡说的。换了别谢洪诺夫，也会这么回答。正因如此柯罗连科才不会撰文予以"抨击"。不，先生们，休要再侈谈自己同唯心主义的联系了。

（火车上）

※ ※ ※

谁不喜欢快乐中的人，谁就永远不会喜欢人。

禁欲主义对这一想法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谁不喜欢人的快乐，谁就不喜欢人本身。

※ ※ ※

所有的批评家，只是片面强调聪明（确切地说是“才华”，亦即某种“无法想像”的东西；清晰，严谨，善于把握全局的“聪明”不是很多），而对心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断然否定。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家庭问题》和《教育的黄昏》，为妇女和学生而进行的两次伟大复仇，该是来源于什么呢？

谈起文学界的高尚品格更令人震惊：《俄罗斯的家庭问题》发表后，居然没有任何反响，只有拉津科夫（瓦西里·拉扎列维奇）的一篇书评，还是我让他写的。全都对《特莱赫穆勒》津津乐道，而对俄罗斯的家庭问题则不屑一顾。

※ ※ ※

你们没在沙漠上见过科曼契人首领吧？我也没见过，但在麦因-里德的书里读到过：他赤身裸体，皮肤是古铜色，骑一匹穆斯登马，奔驰如飞——鼻孔上插着羽毛，头上是孔雀尾巴，身上刺的花纹就像泥灰……

但请不要害怕，同胞们，即便是中学生，也请不要太害怕：这奔驰如飞的绝对不是一副张紧的弓，而只不过是一个与之非常相像的宗规法教授，例如扎奥泽尔斯基：他身上刺的是无所不能的希腊教堂的“法规”，好像老旧的泥灰，但却充满战斗热情，而且，他只要脑袋动弹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插在他鼻子上的“阿列克赛·康穆宁皇帝的补充决定”……就是他，将禁令和恐吓，打击和迫害集于一身的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弗拉基米尔·卡尔洛维奇，也没有注意到提示后者将使徒的决定丢到穆斯登马脚下的洛扎诺夫：

“如果通过守法（自然包括一切法规）人们能够向上帝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么基督就根本没有理由死去。”

可他毕竟死了——这证明我们无罪。

（关于女祭司问题。1912 年 3 月 24 日）

※ ※ ※

……姑娘们，不要相信你们周围的煽动，议论，手势，伪装，喧闹，神话……

要相信现在的就是现在的，将来的就是将来的，过去的就是过去的。

要相信历史。

要相信两只手是遮不住历史的，无论你“两手合十”，“两手交叉”，抑或“作恳求状”。

要坚定不移。

※ ※ ※

是的，很好，我明白——

起来，起来，工人弟兄们……

可为何您夫人的羔皮大衣不是像平常那样（1904 ~ 1905 年间），售价五百至六百卢布，而是七百五十卢布，并且皮子是她“亲自挑选”的？

（生活一例）

※ ※ ※

就应该这样对付报刊："你们要各司其职，少管闲事。"这样"不会得罪任何流派"，反倒能让他们明白，他们要把握的并不是政治尺度，而是文化尺度。

自从1893年别尔格删掉了我的一个长注（有一页），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挥之不去。这是拯救灵魂。总有一天这将作为历史的一声呐喊爆发出来。

报刊摧残灵魂。当灵魂不断地被什么东西撕扯，它怎能生存？

一旦"堤坝拦住小河"，水位就会突然涨高，就会形成一池静水。

星辰，天空就会倒映在水中。

作者们就会不必再为报纸，没用的社论，小品文，插科打诨，挤眉弄眼，报道谁家的狗被掐死了的新闻（把值钱的狗的尾巴剪下来的阿尔基维亚德已经成为名震雅典的报业大王）分散和浪费有限的精力。

所有这些人，这些灾难深重的人，就会能重新找回安宁，幸福和尊严。

书籍的数量就会增加十倍。

所有的知识领域就会发展壮大。

写作的质量就会提高。就会形成风格。

科学考察的人次，整个精神能量，就会增加十倍。还有词典。还有百科全书。还有洋洋大观的图书索引，"文献的祖母"。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果真能如此，就会对读者大有好处：他早晨起来做事时，就会头脑清新，心情舒畅。

就会不像现在：自寻烦恼，情绪败坏，枉然折磨自己的眼睛和注意力，做起事来没精打彩。

是的：我们现在做事全都三心二意。这是不是有点像酒精中毒呢？

…………

印刷品的伏特加。该死的伏特加。来了一百个混蛋，搞坏了我的大脑。

※ ※ ※

“这样的书不应该允许存在”（吉皮乌斯说《隐居》）。从她的角度来讲，此话并不错，而且交稿时，我个人也感觉到了。“我真想放弃，但却做不到”（交稿时的心情）。然而换个角度，反过来讲，绝对应该允许这本书存在，同样不错。我脑子里甚至还闪过这样的念头：说实话，所有的书都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不用梳妆打扮”，“不用穿衣戴帽”。就实质而言，凡是“穿衣戴帽”（比喻）的人，都是枯燥乏味的。

※ ※ ※

是的，再过三百年，将有一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在萨马尔堪德神学院写出一部《论洛扎诺夫有关旧约的若干思想》。

我缘何如此顽固守旧？

在我看来，神学家的一切论述就像我读大学时在旧书店买的那本《DE CIVITATE VETE RUM TARENTINORUM》(《论塔伦特人的古代文化》)。

※ ※ ※

显然，一定的百分比的庸俗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不可避免？是地球不可避免?)。唉，刚送走民主的庸俗，又来了贵族的庸俗。啊，它是那么可怕，比前者更加可怕!! 刚送走实证主义的庸俗，又来了基督教的庸俗。啊，它是那么恐怖!!! 这些瘸腿的，这些贫乏的，长着猎狗眼睛的……啊！啊！啊！啊！人们将“像基督徒一样”失声痛哭。呜！呜！呜！呜！

（路上）

※ ※ ※

隐隐约约地，脑海中闪现出这样一个结论：是的，他当然不可能成为杰加耶夫，然而，“他的前途难以预料”——他很有可能成为苏捷伊金……

至少在文学界没有人比他更接近苏捷伊金，虚荣心极重，权利欲极强，才华出众，“身居要职”。

（尼·米哈伊洛夫斯基）

※ ※ ※

《起来吧，沉睡的……》——要是我，我会换一个标题：《醒来吧，没良心的……》

（约纳·勃里赫尼切夫一首诗的标题，刊在
1905年的一本杂志上）

※ ※ ※

——拜伦是自由的——为什么我不能是自由的？我发表的也是铅字嘛！

阿尔志跋绥夫吼道。

不错，问题就出在铅字上。你们是为铅字争取自由，而不是为灵魂，为智慧争取自由。

要知道，先生们，某人可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会说："看吧，铅弹。上面甚至还印着古滕贝格的铅字N（拿破仑）……"那个铅字跟我在莫斯科武器库周围的法国大炮上见到的大字N一模一样。

（6月）

※ ※ ※

只要你们还未对学校唯命是从，只要你们还未被学校变成废物，就不会让你们去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任何地方接受你们，不会给你们提供任何职位，也不会让你们得到任何工作。

（俄国学校的历史）

※ ※ ※

缺乏"丑"的脸，同时也是一张缺乏美的脸。这就是大地的命运，与天空大相径庭的是——"我们全都有美中不足之处"。那里有雀斑，那里有粉刺，这里有浮肿。只有天空和大理石才是

完美的。天空的完美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它真实可信，而大理石的完美已经令人怀疑，至少我不喜欢。言归正题。我发现，尽管我几篇文章原来的标题不如佩尔卓夫给我改过的好（漂亮），但相对于写作这几篇文章时的情绪来说，却十分自然贴切。这些纠结不清的标题，恰好表达了头脑和内心的那种纷乱，模糊，摇摆，同时又很冲动和急切的状态，1889年，在经受了《论理解》(1886）一书的失败以后，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重新登上文坛的。一般来说，标题总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作者所有谈论的主题。如果读者觉得标题不好或不恰当，那么，这又一次证明，作者的行文未能紧扣主题。这些都是不完美之处，但不应该加以避讳。

（考虑佩尔卓夫出版的我的文集；他也许会感到失望，再版时我又将那些不太雅观的，"又瘦又长的"标题恢复了原状。它们是能说明问题的，也是需要的）

※ ※ ※

我们这里是 POLIXZIEN - REVOLUTION（德语：警察革命），大学生们也过来凑热闹。

这些可怜虫东跑西颠，忙来忙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 ※ ※

这位牧师靠宣传基督教工作者每年能挣几万卢布。他的住宅——永远是整个楼面（尽管他还没有家室）——每年的租金高达两三千卢布。室内摆满热带植物，墙上挂满贵重的壁毯。桌子上，墙上，到处是"自己的照片"——有正面像，侧身像，半身

像……“容光焕发”，两眼直视“前方”和“上方”……跟“他”（我和我们的“导师”）一模一样……不过他本人的衣着倒还寒酸，只穿一件破旧的长袍，神色严肃，不苟言笑。为此，我差点把他看成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笔下的“让·克里索斯托姆”：

对尘世的快乐无动于衷，
两眼始终注视着未来……

拿《戈培金大尉的故事》当《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世上确有这样的傻瓜。

（生活一例）

娜杰日达·罗曼诺芙娜临终时，执意要求丈夫不要给她立碑，只树一个木十字架即可。一定是木头的，而且只是一个十字架。这就是基督徒。

不光是“几乎什么都不要”（木头不值钱），而且是临时的（木头会很快腐烂）。

然后——再没有什么。可怕的沉默。脱离尘世。基督徒的精神就表现在这里：“我从来不是为尘世活着”。

基督徒的心就表现在这里。“我非但不想为尘世工作，而且不想让尘世把我记住。”可怕……可也有其壮烈和强大之处。

娜杰日达·罗曼诺芙娜整个都是美的。完全是美的。她身上有一种超验的东西。

※ ※ ※

…………

——也许，我们还是坐有轨电车好吧：它好像马上就要开

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它也去兹那缅斯卡雅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经验）

※ ※ ※

“淫荡”一词找不到相应的对象。它代表了一系列人类不能理解的现象。人类在一个不好的时候做了一个不好的梦，似乎所有这些现象——其实正如自然界的蘑菇，水草和树根——的确“不好”，尽管是“遮遮掩掩”的（婴儿索洛维约夫《为善一辩》中的思想）；人类缺乏远见，稀里糊涂地把这些现象带了过来。

（埃德库南到柏林的列车上）

※ ※ ※

我一生中有三次见到过（在远处，不是在近处）或听说过母亲为已出嫁的女儿拉皮条的事。好像她们非得把成群结队的畜生推给女儿不可，永远不会让她“从一而终”，永远不会让她“舒服自在”，哪怕是在不忠的基础上。

整个一幅“四处搜寻猎物”的图景。令人惊讶。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妻子的丈夫尽管对她们的事了如指掌，但却深深地爱着她们。他们哭，他们爱。爱到崇拜的地步。而妻子却跟丈母娘一样，对倒霉的丈夫心怀厌恶。这里有更多的形而上学。顺便说一下，大名鼎鼎的福斯蒂娜女士，虔诚的安托宁的妻子就是这样。她甚至跟一些平民百姓姘居。而丈夫在她死后竟然把她视为神灵，为她的贞洁和虔诚建了一座寺庙。

他是美德和哲学的鼻祖。

我认识两位有着同样遭遇的斯拉夫派人士。滑稽的是，他们其中的一位还带自己的大儿子（当然不代表他本人）去瞻仰米宁和波查尔斯基的纪念碑，并不停地给儿子讲解“俄国历史”。

（观看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翻译剧本的演出时，译者是叶·阿·叶戈罗夫）

※ ※ ※

这一切仿佛橡皮，可伸可缩，而且不具有丝毫个体意义。你只能看到一般规律（妓女）。

…………

——我们是一条马路。你究竟要在我们身上寻找怎样的字句？

（关于卖淫现象，去基辅，斯托雷平去世）

※ ※ ※

尽管卖淫问题不容忽视，但是，从一个我不甚了然的角度来看，她们确实是一些“毁掉的女人”，“熄灭的灵魂”。她们确实是“不存在了”，只不过是我们误以为她们“存在”而已。

（去基辅的列车上）

※ ※ ※

关于贞节，我听过苏沃林① 和卡尔塔绍夫② 的高见。

① 苏沃林，阿·谢（1834～1912），出版家，记者。
② 卡尔塔绍夫，安·符（1875～1960），宗教史家，宗教－哲学协会主席。

苏沃林有一次说：

——不，我发现，一旦姑娘失去贞节（在未婚情况下），她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她会变坏。

当然，他绝对不是在做通常的道德评判，他是在陈述他观察到的东西——“一般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会导致什么后果”。

卡尔塔绍夫的一番话是在我向他们谈起两位一直守身如玉的小姐时说的：

——要知道，她们永远不会嫁人。搞不清楚她们，或者说，她们这类女人，究竟为什么不肯放弃自己的贞节，把它送给随便什么人。谁得到不是一样呢？

我对此产生了哲学上的困惑。

他回答：

——她们（他好像在考虑如何归纳，竟一时语塞）从自己的贞节中获得滋养。不错，她们的贞节是完好的，似乎，还将保持完好。但要说她们不需要它，那也不切合实际，她们不但需要它，还缺它不可。她们靠它活着，靠保持它的完好活着。这是财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使她们获得保障。保障什么？保障她们的灵魂，她们的才华（这两位女性很有才华），她们的宁静和新鲜。

——有贞节性，她们便可尽管工作，举办画展（她们是画家），与人交往，结交朋友，读书，思考。

——失去贞节，一切都完了。因此，尽管她们立志保持贞节，不让任何男人占有它，但这并不等于她们的贞节形同虚设，是一种对世界而言并不存在的东西。对世界来说，它是不存在的，一如她们的才华，对世界来说是存在的；但作为肉体的一种

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对世界来说，对她们自己来说，它是存在的。

深刻极了。几个月以前我问过这两位姑娘中的一位，假如有个男子因“饥饿”而拿走了她身上多余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她会怎么办。

——我会把他押送到西伯利亚，她果断而又坚定地回答。

——你就不会网开一面？

——不会。

——可你并不需要它呀？

她不吭声了。

卡尔塔绍夫的分析可以说是用言语补充了她的沉默。她还没来得及理出个所以然来，却会凭感觉行事（“我要审判他”），这种感觉是无法战胜的，里面有真理。

那些强奸犯之所以被判处重刑，原因概出于此。

“除非出嫁，性交即意味着毁灭。它对社会无害，但会损害主体，当事人”。

于是乎当然要动用极刑！要以杀人罪或准杀人罪论处！除非那些说来话长的特别情况：不过，在我们的文明里，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恰好就是这些“除非”。

※ ※ ※

“您给自己的书定价太高。”我这是有意的：书不是便宜货，不是奢侈品，不是对“瘫倒的人”极具诱惑力的汤水。书不是马戏团的少女，以廉价招徕看客。

书应该受到尊重。这尊重的第一个表现便是——情愿为之付出代价。

然后，你也许会说：我的书是良药，而药的价钱总是高于伏特加。药的制作要复杂得多，药的成分（灵魂，大脑）要贵重得多。

（在林中散步时）

※ ※ ※

对那些学者，应该揪他们的耳朵……他们中的智者会赞成这样做，至于其余的人，即使他们暴跳如雷，也大可不必在意。

（在林中散步时）

※ ※ ※

我们的批评之缺乏洞察力，令人吃惊……我心地善良，或者说，至少不是一个坏人。就连给我制造了无穷痛苦和屈辱的人，——阿丰卡和捷尔提，——我也并不记恨，只是觉得可笑，“我不希望这样。”我从未想过冤冤相报。斯特鲁威，是的，我很想揍他一顿，但是善意的。上帝啊，假如我真的“揍了”他，我肯定会放声大哭，并说：“你加倍打我吧。”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曾有报复别人的念头。或许我仇恨过政府机关，国家，教会，但这都不是人，不是心。

就是这样，我的本质就是我的善良，——最平常不过的，没有半点“虚与委蛇”。我从来不曾把他人的痛苦当作我的欢乐，——问题就在这里，“恶魔性格”的本质就在这里。我身上没有一点恶魔的东西，我甚至不能想像别人有。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杜撰的，主要是一些贵族杜撰的，比如拜伦，而且是由于年轻的缘故。“本来是关于家神的故事”，后来却被杜撰得煞有其事，引人入胜——成了“恶魔”。“忧郁的恶魔”，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

然而，所有关于我的文章都是从这样的定义开始的：“洛扎诺夫的恶魔性格”。他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企图自圆其说。我读着，简直不知所云。“这不是我”。他们的印象与我本人如此风马牛不相及，以致让人莫明其妙，以致我的名字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明明写的是奶牛，却说它会“跳跃”，甚至悄悄地“跳舞”，更不可思议的是，它还长着一对“獠牙”，“一到夜里两眼就冒绿光”。这太奇怪，太荒唐了。这种荒唐在梅列日科夫斯基①，沃尔日斯基②，扎克尔热夫斯基③，库克利亚尔斯基④ 写我的文章里俯拾皆是（只有楚科夫斯基⑤ 有那么八行字写得还算独特，还算确切，关于我的血压，体温，多变的心）。至于我跟尼采——毫无相似之处！跟列昂季耶夫——毫无相似之处。我只是喜欢他。但喜欢和相似——风马牛不相及。

我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人。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全名：“舞文弄墨的六等文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洛扎诺夫”。

现在，我的这些文字……是的，我有过不少创见，称得上是发前人所未发，包括尼采和列昂季耶夫。就思想（观点，思想的肌理）的复杂性和数量而言，我认为我是首屈一指的。有时我觉得，我对历史理解得这么透彻，好像历史是握在我手里，好像历史是我创造的。我时常有这种亲缘感和彻悟感。但我之所以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全是“状态”（“朋友”和我跟她的故事）使然，且只限于思想，而这——并非我自己，我是个善良的男孩；设若“思想”确实伟大，他便不难发现太阳，星星和整个世界的秘密，

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作家。
② 沃尔日斯基（1878～1940），批评家，文学史家。
③ 扎克尔热夫斯基（1886～1916），批评家。
④ 库克里亚尔斯基，生卒年月不详，记者。
⑤ 楚科夫斯基（1882～1969），作家，文艺学家。

发现“苹果总是落在地上”(牛顿的发现),甚至最复杂最深奥的东西——第一声祷告。我就是这样一个“流着鼻涕的男孩”,——发现了一切秘密的男孩。这是我的状态,但不是我。由此我认为自己是在上帝之中……我深信:上帝之所以引导我(就像牵着我的手)跟朋友相遇,目的就是要让我用善良和天真的眼光目睹“丑恶与毁灭之海”。这是人间智者无法见到的,是愚钝的神父们想像不到的,就连他们的“圣徒”,也想像不到,因为他们把一切都视为“经验”,“偶然”和“常规”,尽管这是实质,灵魂,是来源于事物的根本。人们啊,请听我说:对我们而言,什么最可信?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亲自见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嗅到的东西。一句话:我知道——这就够了。对小偷来说,他用螺丝刀能撬开锁;对经纪人来说,不能在交易所出错;对马克思来说,需要使工人强大起来;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明白无误的。任何一个人活在世上,获得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这知识是他的生命,经验,痛苦,嗅觉和视觉的结晶。对我来说(我了解我的内心)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叶利察,1886~1891年间,我要完了,我没用了,我终于变得凶恶(此时倒是有过“恶魔”的一面),我整个在毁灭,可能,我会玩物丧志,自暴自弃,在一个可怜的边远县城了此一生,只留下一本人人嘲笑的《论理解》。

那时,我过着被人抛弃,没人理睬的生活。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过错。我开始对人冷淡,甚至损害别人。

突然,在一个外人(同事)死去的时候,我碰到了眼泪……我惊讶不已……“何为眼泪?”“我从来不哭。”“我不明白,没有体会。”

怨恨,冷遇和“纸牌”使我整个变得麻木。

哭,——在外人的灵柩旁,——对我来说,就好比苹果之于牛顿。“啊,原来世上还有怜悯和眼泪”……我惊喜万分(就像

当初的牛顿），开始回味，倾听，观看。

同样是命运，同样是被抛弃，但对恶作出的反应却是内心的哭泣，没有指责，没有困惑，没有丝毫怨恨，也不轻易断定世界上有怨恨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恶魔性格”，“魔鬼性格”。

我伸出手，这只由于缺乏自信而很久没被人握过的手。要知道，我在六月里还穿着长长的雨靴，活像一个“稻草人”。而且很“尴尬”（因为当局的关系）。但我很快便不再犹豫：发生了（由于神经质）一件不幸的事情（几个月之后才知是错觉）——“雨靴”把我领进地狱，搞得我“好不尴尬”。但为“外人”流的眼泪帮了我的忙：就在“天似乎要塌下来”时，就在世界末日将至，靠近我即意味着自取灭亡时（特殊的个人秘密），——我这里讲的全是实话，——我伸出手，并说“犹豫结束了”。光阴荏苒，突然，那些留大胡子的人说：

——站住！

我不理会，可那些大胡子中还有文化修养极高的人，比如拉钦斯基，他们也说：

——不行。

“怎么回事？”假如我是一个“穿裤子的男孩”，我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需要让幼稚的天性（我）不断地与事实碰撞，以便明白……“要知道，这是人为地让苹果下落，自然的情况应该是苹果留在空中，而既然苹果会从树枝上脱落，那它为何不是飞到天上，而是落到地上呢？这意味着，地球有一种吸引力。”我明白了（且我是第一个），问题不在于“横竖一样”的“铲子”，不在于虔诚善良的拉钦斯基，而在于拉钦斯基想要追究的东西，而“铲子”就靠在“这堵围墙”上。某个遥远而又遥远的人，某个伟大而又伟大的事物需要……

——需要什么？

“你就跟从前一样玩纸牌吧，——你早晚会毁灭，可毁灭的人

还少吗？你的这位‘朋友’(当时已经疾病缠身)也会毁灭……那又怎么样？这种事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什么死亡啊，疾病啊，堕落啊，生活和内心空虚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怨恨别人，迁怒别人，忘记了上帝，不再需要别人……而如今，我完全是你们的了，戴着圣像，举着蜡烛，皈依基督教，皈依基督，皈依教会……我是你们的。

“——你可不是‘我们的’，这样的人我们根本不需要，因为你们是合二为一的，连在一起的，只有你们分开，你们才能成为‘我们的’。”

——“分开”？就是说，再一次怀恨别人，损害别人，信仰无神论……

“——这已经是我们的事了，一切由我们负责。我们会为你的怨恨祈祷，驱除你的无神论，一切都会顺利和安静地过去。唉，即便是不损害别人的人，也未必个个信仰上帝。没关系。规矩会得到保留：如果你们分开后毁灭，那是因为不管是谁，总要有很多人不断地毁灭。没什么希奇的，甚至，请原谅，也没什么意思”。

当然，太固执难免吃亏，说不准还会干出蠢事，却不会有任何发现。然而我生性温和，一如我的天真或“本色”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我连续数年一无所获……好像经过好多年我才做出“牛顿的发现”；由于那个原因，“苹果很简单地落在地上”。

有一次我领着三岁的达尼雅站在魏金斯基教堂里。

没有人做礼拜，而教堂的门是永远开着的。这是在彼得堡，在老城区。这安静——很特别，一个人——很特别。我就喜欢领着这位达尼雅进教堂，她是那么清瘦，那么妩媚，我们一直为她的脑膜炎担心，怕她跟第一个孩子一样，“活不下来”。多么安静

啊，一切是那么美妙……当突然间，不知何处来的水滴落入这世界，打破这安静，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低语：

"——你们在这里是外人。你们为何要来这里？要找谁？没谁等待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作为'父女'一起来到这里，你们的行为就是正确的，'应该的'。你们是'捣乱分子'，你们的'捣乱'正好导源于你们是'父女"，而且如此放肆和'大胆地一起'来到教堂。"

圣像似乎受到了侮辱，脸色突然变得阴沉，难看……这是被我们刺伤……圣像回到自己的"正确"中去，当我们"不正确"，它们走了，跟我们远了……仿佛用手指着我们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位置，这里属于别人，真正的人，你们应该去另一个地方，这地方在哪儿，我们无所谓。"

然而，我重复一遍，小偷是清楚用什么能撬开锁的，而做祷告并感到幸福的人，也清楚他是在祷告，并感到幸福，感到心情愉快，感到此时此刻，或许，就在一生的这个瞬间，他是个好人。

我还是坚持认为，问题在于温和二字，我曾是且始终是一个温和的人，内向的人，谦和的人。"跟大家一样"。

这声音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不知来自何处"，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但却是第一次说出这样的思想，没有预告，没有准备。听到这个声音，我走出教堂。我突然觉得通体透亮，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是胜利者。我战胜了谁也没能战胜的东西，甚至战胜了谁也没能战胜的人。

——我们走，达泥雅，离开这儿。

——该回家了吗？

——对，该回家了。

我们于是走了出去。这里的问题全在于屡试不爽的"万能钥匙"和"我所知道的温和"。

我好像把温和，把对上帝的祷告，把达尼雅都随身带了出来，且有什么东西在我身边这样翻转过来，以致我觉得：

“——我这儿是温和，而你们——是墙。我这儿是祷告，而你们——还是墙。上帝和我在一起。宗教在我心中。在我的命运中。我的整个命运归结为这一个瞬间。要让神秘的和存在过的一切最终永远变成清晰的，可见的，可闻的，可感的。”

……“你们是残忍和傲慢的（我有‘万能钥匙’），你们是冷酷的。你们心里没有上帝，你们也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除了言语，许诺，希望，空虚和钟声。你们所有的人，连同你们全部的工具和手段，财富和书籍，学识和智慧，以及你们所说的‘神启的秘密’，创造不出一丁点儿生动的，现成的，真实的善来，如果它是永远崭新的，不是根据以往的样子复制的。你们‘非不能也’，——你们所有这些大胡子，或心地善良，或‘横竖一样’，——是什么东西拉你们后腿，使你们很容易制造新恶，就像彼得堡教区的神职人员，把不属于教区的东西也一扫而空，做出许多新的坏事，而你们做的好事，——也是新的，——是因为你们的手受到一种可怕的，不为你们所知的力量的驱使。这力量看不见，摸不着，既遥远，又无处不在的，就像牛顿的引力。这是我的发现，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新纪元。一切都是崭新的，即使你开始数‘第一年，第二年’。这，大概是在 1896 年或 1897 年。”

※ ※ ※

“莫非他积极为人类谋幸福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他不肯相信，上天给他预备了一个如此可怕的结局。”

“他想起加里·泰克森，想起许多意外的事，在他要把这个他所喜爱的，前途远大的青年从死神的魔掌中拯救出来的时

候……”

（《罪犯伯爵夫人》）

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被吊在一间挂满火腿的作坊的房梁上，面对死亡时的思想活动（一个歹徒先是用橡皮棍打昏了他，然后又用滑轮车把他吊起来），他已经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只等放烟进来，把他和那些火腿一道熏熟。

我觉得，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跟《阿马狄斯历险记》一样精彩。塞万提斯笔下来自拉曼却的主人公读这本《历险记》读得入了迷——毫无疑问，塞万提斯本人私下里也很欣赏这本书。耐人寻味的是，一位不知姓名的作者——大概是个因成绩不好和调皮捣蛋而被开除的五六年级学生——通过仿作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每本四十八页，定价七戈比）成功地找到了一种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方式，他很后悔自己在校读书时表现不佳，所写的几本书表达了积极向善的精神，对犯罪现象的深恶痛绝。他的书字里行间充满道德感，无懈可击，比起许多貌似正经的“文学－政治”类报纸和小说来，不知正派多少。

这几本书不乏引人入胜之处。其中一本讲的是“意大利第一神偷”的故事。显然，作者把手稿拿给了出版商，可出版商认为，“贼王”不够精彩，不吸引人，卖不掉，故大笔一挥，将“贼王”改为“贼后”。我读啊，读，就是不见“贼后”出场。原来，书里并没有“贼后”这个人物，只有一个堪称绅士的小偷。

还有一些非常感人，能够表现作品精神的地方：

“看到自己心爱的弟子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夏洛克·福尔摩斯顿时忘记了世上的一切。他扶起加里，把他搀到凉台上，然而，可以进入房间的窗户，已经被插上了。

…………

——这个受伤的年轻人是谁?

——这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年轻人，很像您，大人。”

（《只有一滴墨水》）

再看结尾：

“——您真的为自己的抱负感到幸福和满足吗?

——是的，对一个人来说，没什么比这更令我感到幸福和满足了。昭示真理，捍卫法律——这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抱负。

——为您的健康干杯……您给不幸的人带来安慰，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您让罪犯闻风丧胆。”

（《只有一滴墨水》结尾）

读这本书时，我特别留意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加里的关系——从“月光下的人们”的角度：正如作者所展示的那样，我们不能不发现，他们俩——他们自己并没注意到——在互相爱着。加里对福尔摩斯的爱，好比对自己年长的丈夫的爱，爱他的智慧，精力，经验，成熟。他形影不离地跟随着福尔摩斯，就像一头年轻的小母牛跟随着一头大公牛，对他绝对信任，绝对依恋。而福尔摩斯则把加里看成自己的爱子，看成一个很有女孩气的“小伙子”。无法想像他们俩是已婚的；加里从本质上说是个清教徒，福尔摩斯则完完全全是个清教徒：

对尘世的快乐无动于衷，
两眼始终注视着前方。

他们对物质享受，对美酒佳肴，锦衣华服不感兴趣。他们实际上是“循规蹈矩的苦行僧”，而且只有一个愿望——铲除人间的罪犯。他们是打击强盗，保护阿尔戈斯到雅典之间的道路，将

人类从罪恶和暴行的恐怖中解救出来的特赛。精彩的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加里与之斗争的犯罪行为无一不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这不是缺衣少食和地位低下导致的犯罪，而是人的内心的残暴造成的后果。罪犯中有子爵，有作为财产继承人的勋爵，有医学家，有富人，有放荡女人。到处都是维护正义的年轻人和丈夫，骑士和侍从与无法无天的恶人的较量。我本是为了“消愁解闷”才读这些书的，不料读罢，却感慨良多。我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CRIMEN（拉丁语：犯罪）。

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世界有其特殊和独立的开始，恰如一张特殊的字母表——“我们的书”就是用这个字母表写成——的第一个字母；而这个罪恶的世界，它的所有书籍“根本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写成的。

我记得,一路上,我始终在想:CRIMEN! CRIMEN! CRIMEN!

“从来没有想到……”

于是我第一次想到法庭，这一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东西。从前我曾认为，这是一些人在“作茧自缚”，自讨苦吃，是放着大事不管，专做鸡毛蒜皮的小事，认为只有从人类职业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才是有意义的。

不。

我发现，这是需要的。

这是大事。

※ ※ ※

只有人才会这样：只许开花，不许结果。

(少女在十三至十四岁“发育成熟”，而“夫妻生活”要推迟到二十岁以后)

※ ※ ※

……埃莱夫西诺斯神秘仪式至今仍在举行，只是人们在举行这一神秘仪式时，如今已经全然不知是为何物了。

※ ※ ※

该走了。孩子的妈妈说。

于是我们走进一个城市花园。我穿一套黑色礼服，披一件夏季的大衣。她穿一条白色连衣裙，还披了一样什么东西。时值六月初。考试结束了，心里了无牵挂。未来一片光明。

太阳很热。我们漫步在一条主要的林荫道上，当伊万·巴甫洛维奇的“耳房”的窗户被推开，他探出头来，“庞大的身躯”将窗户几乎整个挡住，我们已经走了两个来回了。他笑着朝我们点点头。

没过多久，他便跟我们走在了一起。人高马大，兴致勃勃。

——一切都好吧，伊万·巴甫洛维奇？

——那还用说！

我们又走了一个来回。“走，到我那儿去。”于是我们跟他进了一个院子。他走到看门人跟前，说：“这是某某（名字和父称），把教堂的钥匙给我。”

看门的老头交给他一把很大的钥匙，好像是开“堡垒”用的（我在一些教堂里见到过，“打开俄国军队攻下的堡垒的钥匙就是这样的”）。

——跟我来，我什么都给你们看。

一扇沉重的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我“迟疑了一下”……待我进去，他又把门关紧，哗啦一声上了锁。“这样就打不开了。”他脸上挂着微笑，还有一丝害怕的神情。我们俩拐到楼梯口：

我的瓦莉娅跪在地上……原来，楼梯——共有六级——口的墙上有一幅圣像；一见到圣像，瓦莉娅仿佛得到了上帝的庇护，扑通一声跪倒，虔诚地祷告起来。

我“没有什么”。也划了十字。

我们走了进去。

…………

※ ※ ※

……烟蒂我还是舍不得丢掉的。不是统统捡回来，而是专捡吸剩了一半的。甚至还有更长的。“应该变废为宝”（对残留的烟草进行再利用）。

我这样每年可以加工出一万二千根卷烟，——当然，我并不是缺烟抽。那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手不爱干净（童年）……甚至可能还有对儿时的甜蜜记忆。

我为何如此留恋自己的童年？充满痛苦和屈辱的童年。

（从烟灰缸里找出烟蒂，把残留的烟草剥出来，做成新的卷烟）

（写在奥尔加·伊万诺芙娜的信上）

※ ※ ※

可爱的吊儿郎当，游手好闲——几可说是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

※ ※ ※

我觉得，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我跟子女是没有联系的，只跟“朋友”有联系。

或许塔尼娅是个例外……

由此可见，通过生育建立起来的联系还没有将形而上学纳入自身。

我跟子女之间缺乏一种“起联系作用的秘密”。他们需要我——但这是经验。我（时常）欣赏他们——这也是经验。缺乏我与朋友之间存在的那种神秘和苦痛。她独自一人便构成了与我的形而上学联系。

假如她死了——我的心也会随之死去。一切都将变成累赘。或许我会写作（为了钱，“每天的生活开销”），但反正都一样：我不存在了。

酒的醇香将消失，只剩下水。这就是“我的瓦莉娅”。

※ ※ ※

孩子的妈妈从来不会区别烟团和气团，刚迈进热气腾腾的浴室（我在那里为自己放了一张蒸汽浴床），她就吓得大声叫起来：“什么东西着了！”她甚至不会开锁，只要不是钥匙朝右转才能打开的。当我告诉她，这个词给予格的词尾应该这样写，她就会不分青红皂白，不管遇到什么词的给予格，一律这样写。当我告诉她，什么地方最好那样写，她已经不愿意再从头学起了，仍旧保持老习惯。

她从来搞不清楚什么是奸猾什么是愚笨（都是小事）；她会用耳朵听，但绝不会去动脑筋琢磨。

然而对子女的入学问题她却丝毫不肯马虎。她探访了彼得堡所有最好的学校。她去找斯坦伯格（为了瓦夏）。对这位校长颇有好感。可是，离开校长室经过操场时，正赶上学生放学，于是她便跟在后面观察他们。回到家，把情况告诉我，说“什么都好，校长好，秩序也好，就是同学有点粗野”。她又去捷尼谢娃学校——这回总算下定决心：“就去那儿。”她为小女儿们选择的是斯托尤尼娜学校，而为脾气暴躁的塔尼娅和桀骜不驯的瓦尔瓦拉选择的是列维茨卡雅学校。确实，这些学校各自的特点很适合孩子们各自的特点。她选择学校不是凭想当然，而是经过了认真的调查，对比和分析。

一般说来，她办事情是果断的。没有丝毫的含糊不清，没有丝毫的犹豫不决。而且从不“当场决定”，“草率行事”，“心血来潮”。如果需要考虑，她总是考虑两三天，在这两三天里，她会全力以赴。

至于不会开锁，这确实是因为笨。她认为，不管什么锁，只有向右转动钥匙才能打开。否则就是“要滑头”。“要滑头”的事她不懂。

有一次我受到威胁，闲谈间不经意地流露出要买一把手枪的想法。傍晚，她面孔通红地突然来到我的住处（当时我住在罗加乔夫街），吻了我一下，马上开口说道：

——我告诉了吉洪（哥哥，律师）……他说这事散发着西北利亚气息。

——是西伯利亚。

——西北利亚。

她纠正我——她才不在乎形式呢，怎么听的就怎么说。她关心的是会不会被流放，而不是语法。

我抱紧她，不停地吻她。在我的记忆里，她对心上人的这种担心至今仍和“西北利亚气息”联系在一起。

她焦急不安，面孔涨得通红，坚决不许我买枪。其实我连开枪都不会。

她只读到三年级。她发现伊万·巴甫洛维奇给女学生讲解时总是喜欢两手撑在桌子上（他身材高大，肥胖），便每次都事先给课桌涂上墨水。这位老师自然总是弄脏手。自然也要怪罪一番。给她的品行打了个“四分”。妈妈（亚历山德拉·雅德里安诺芙娜·鲁德涅娃）认为“给女孩的品行打四分”等于是侮辱她，等于是在暗示“第七条戒律”，她愤愤不平地说：

“这学我们不上了。我要把你从学校领回来。看他们还敢不敢败坏闺女的名声。”

※ ※ ※

好——即使是别人的，也是好。坏——即使是自己孩子的，还是坏。

她十点钟以后起床。休息，要叫三次。

…………

（孩子们的假期开始了）

（我很生气）

补考时校长（萨多科夫）问科斯佳·库德里亚夫采夫：

——请问，您知道什么是“干亲家”吗？

科斯佳的脸胖胖的（脸型与众不同），头发像刺猬，目光蛮横无礼。

不过心肠很好。

他微微一笑，答道：

——不知道。

——请坐。没问题了。

他得了个一分。

科斯佳失望地对我说（我在门口等着）：

——他真卑鄙。他要是问我 KVUM，我早回答上来了。克列梅尔（语法学家）的书有三页是讲解 KVUM 的。可他呢，活见鬼，竟说了个什么 KUM！（这样说也对，只是不符合习惯。）我以为“KUM 是前置词 C”；除了“C 后面跟第五格”以外，还有什么好回答的呢？这个问题如此“不言而喻”，以致我认为回答它对五年级来说简直是耻辱。

他被开除了。当时正赶上他父亲去世。他只好参加工作（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起初是在警察局，给我写过几封绝望的信（“瓦夏，我们何曾想到，竟会不得不到该死的警察局工作”），后来，他又转到邮局，“如今我在分拣处工作”（把信件按城市分门别类）。

相反，认真而又可爱的男孩“谢辽沙·穆罗姆采夫”学习很好，校长经常抚摸他的头，毕业时得了奖章，上大学以后，还是得奖章，最后成为“持不太严重的反对派立场”的教授。真是应验了涅克拉索夫的话：

慢慢爬，你总会
混到一个好职位。

他果真成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团的成员。还发表过著名演说——《国家杜马不能犯错误》。换了我的科斯佳来参加这场国家考试，未必会不及格。

不错，他不知道什么是 KUM，可他灵活，强健，聪明，遇事知道“轻重缓急”。请看他是如何划船的！请看他是如何——偷偷地——喝啤酒，打台球的！他可以一边狂饮，一边读书。

这位可爱的同学如今在哪儿呢？

※ ※ ※

厌恶，厌恶人们，厌恶人的构造本身……上帝呀！当初（中学，大学）我对人是怀着怎样无限的爱啊。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是真的吗？

※ ※ ※

干巴巴的树根呆立着。曾是一株美妙的蒲葵。十三卢布。

我们也是这样……

光秃秃的原野，加上一些呆立的树根——这就是整个历史。

(花十三卢布在干草街买了一株蒲葵，外加一只木桶，一块洋铁皮；客人都说值三十卢布。头两年，赏心悦目；第三年，开始枯萎。九月里，在一个看门人的“柜台上”，也见到一只大木桶，里面放着一个古怪的树根)

我真的那么淡泊名誉（《隐居》）吗？有时我是怀疑的。不过每当念及人们的痛苦——那时倒完全是真的。

“名誉”和“知名度”就像生活中的杏仁冻，当大家都吃饱了——“再给我来点这个”。可刚一扎痛手指，你便会大喊大叫：“我什么名誉也不想要。”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公平的，即只有空虚的人才追求名誉。所以结论是：我渴望名誉，而且到了丧失

自我的程度。当然，人类有可能会“故意与你作对”，亦即“拼命”唾弃你。

※ ※ ※

“阿依齐雅塔身材高挑，皮肤像大理石一样白净”（果戈理）——只有没看过女人，甚至对女人没有丝毫兴趣的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

果戈理的性生活是个耐人寻味的谜。这个谜到底体现在哪里，决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他，勿庸置疑，“不了解女人”，也就是说，他对女人缺乏生理上的兴趣。何以见得？写起死人他妙笔生花。“棺材里的美女（女巫）”，——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坟墓中爬出来的死人”，这是布鲁尔巴什和卡捷林娜乘小船路过墓地时见到的，——令人惊讶。女溺水者汉娜——也是。在他笔下，死者总是过着双重生活，在他笔下，死者不“死”。可令人惊奇的是，他笔下的活人倒是更像死人。这是玩偶，概念，缺陷的比喻。相反，死者，如汉娜，女巫，都很美，很富个性和吸引力。这可不是“索巴凯维支”。我想，果戈理的性生活之谜要到“美妙的安息世界”去探寻，——借用福音书中的话：“何处有你的宝藏，何处就有你的灵魂”。令人惊讶的是，他描写的死者中，没有一个是男的，好像男人从来不会死。然而，他们当然是要死的，只是果戈理对他们不感兴趣罢了。他展出了整整一个房间的女死者，——没有老太婆（一个也没有），个个年轻漂亮。给布鲁尔巴什发现了，准会说：“看见了吧，土耳其人，想要干什么”。他准会改变信仰。

不过，不知为什么，我无法想像果戈理“改变信仰”。去巴勒斯坦旅行——他会的，做一个伪君子——他会的。但不能改变

信仰。那会非常可笑的。让果戈理划十字，等于让狗熊跳美奴埃舞。

他也从来不描写动物，除了用犄角顶撞波兰人的公牛（在杜勃诺近郊）。他笔下的狗有无名字，我不知道。令人叫绝的是，他的道德理想——乌连卡——活像一个死女人。苍白，透明，几乎不会说话，只晓得哭。“她好像是被人从水里捞上来的”，而她竟然复活了（为了满足果戈理）。不过，生命只表现为动人的眼泪，让人联想到她的溺水，她被救上岸时身上流下来的水滴。

深不可测的谜。

（在花园里，肚子疼时）

※ ※ ※

永恒的上帝啊，请站在我身旁。

永远不要离开我。

（经常，为了不犯下罪过）

※ ※ ※

我想通过写作取得什么样的影响？

使人的灵魂变得温存。

…………

※ ※ ※

我是一个高尚的作家吗？

当然。假如没有这个自信，我恐怕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为钱会的），也就是说，写不出一篇“由衷”的东西。

那么谎言呢？淫秽呢（“我鼓励”）？不时的怨恨呢（大多是装的）？

如何相容？如何协调，妥协？

不知道。只是我心中有个信念：我这是高尚的。

为什么？根据何在？——“法庭不接受没有证据的东西”？

对，——不过请问，究竟何为不高尚？

“阿谀逢迎”。

可我没讨好过任何人。

“溜须拍马”。

可我没吹捧过任何人。

“违背自己的信念写作”。

从来没有。

如果我写作是凭“心血来潮”（臆想的“淫秽”），那么，一旦我“心血来潮”，我该怎么办呢？

你们总不会因为母牛“心血来潮”，就把她拉出来绞死吧。

这不合情理。

不是很不合情理，甚至完全合乎情理。“我不想说真话”。你们怎么这么傻，连真话和谎言都分辨不出来。我凭啥要替你们花费精力？

就连那明确的谎言我也一点儿不记得。

是的，我曾在同一天里，撰写两篇不同的文章，一边同情社会革命党人，一边拥护黑帮分子。而且我对这两派都信服。难道革命中就没有百分之一的真理？难道黑帮的反革命中就没有百分之一的真理？

可为何既给“右派”刊物撰文，又给“左派”刊物投稿？

因为我坚信：政府连想都不敢想，该听右派的言论呢，还是该听左派的。我的口号是：“假如我是个大人物，我会下令一切刊物，包括《政府通讯》在内：

——别把这些传单拿到我家里来。

我会将《俄罗斯之旗》和《极地之星》一视同仁。

——我不需要这些传单。

怎么能靠“一百张报纸”来治理国家，而对一万万人（“一无所有”的男人，女人，心地纯洁的学生）的呼声充耳不闻？

可惜，能听到的，只有“文人墨客”的呼声。

我要打一个喷嚏，让他们胃口顿消。

政府应该是绝对自由的。特别要避免舆论的左右。显而易见，它同时也要极其严格地要求自己。

不过——必须合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否则：

——巴扬① 说。

——格利高里·斯皮里多诺夫② 希望。

——安菲捷阿特洛夫③在维苏威火山底下抱怨。

请问，这有多么重要吗？既然他们有墨水，且他们又识文断字，怎么能让他们不抱怨，不希望，不说话呢？

我想，我自己也并不比他们好。

——全是胡说八道。

这是谦虚。我这支“左右逢源”之笔（一贯是真诚的，就是说，每个思想观点中都有千分之一的真理）写出来的是最美的文字，是我最深刻的信念的标记：这都是胡言乱语，没人需要，政府（在我心里）已被严格禁止倾听这些言论。

还有一点狡猾或远见——也许这能解释清楚我认为自己身上有的那层伪装。我想讲个笑话来说明，就像有时我喜欢跟自己开玩笑一样。这个笑话确实在我头脑中闪现过：

——亨利四世和洛扎诺夫有何相似之处？

---

① 巴扬（1879～1920），作家，政论家。
②③见《隐居》注。

——一模一样。

亨利四世在同一天里，既做路德教的祷告，又做天主教的弥撒，对两个教派都信奉，都顶礼膜拜。可施罗塞尔，可车尔尼雪夫斯基，更不用说道布钦斯基－巴克尔，所有的化学家和博物学家，新历史的一切伟大人物——都异口同声地对亨利四世给予赞扬，称赞他为新的国家利益大胆牺牲过了时的宗教利益，从此“由感性时代进入理性时代”（德雷伯语）。好。全都赞成？

那么，你们也都应该向洛扎诺夫致敬，因为他，这么说罢，打破了各式各样的禽蛋，——鸡蛋，鸭蛋，鹅蛋，——立宪党人的，黑帮分子的，革命的，——把它们放进一只锅里，以便再也分不出“左的”和“右的”，“黑的”和“白的”——在那个其实是虚假和讨厌的背景上……然后，他呐喊道：

——上帝和我在一起。

这样的事没人能做到。即便能做到，也只能是假装的和失败的。我的成功在于我确实不会区分“黑的”和“白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愚蠢或幼稚，而是因为，在有“天使飞翔”的地方，确实看不见“何为喜马拉雅山，何为乌拉尔峰”，哪里是“里海”，哪里是“黑海”。

远方。无穷的远方。我早就说过，“我整个沉入理想”。任凭这理想，亦即幽灵，“化为乌有”。我无所谓。我既看得见党派，又看不见党派。我知道，它们既是假的，也是真的。“传单”。

“理性时代”（小市民道德）又一次转向英雄和神圣的“冲动时代”：在一个转弯处，魔鬼偷偷地抬出为王位而无耻践踏信仰的亨利四世，严厉的路德和伟大的格利高里一世在受苦受难，而在另一个转弯处，上帝派来一个人，他的心经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他的头脑那么善于分析（《论理解》），以致对他而言，“所有的政治真理都融会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注定要被付之一炬——对此他一清二楚——的有机体”。

※ ※ ※

我们缺少民族理想。

于是，在一片不毛之地，生长出世界主义理想。

希腊人有民族理想。罗马人有过。犹太人一直有。

法国人说“我的法兰西”，英国人说“老英吉利”，德国人说“我们的老弗里茨”。

只有念过俄国中学和大学的人才说——“该死的俄罗斯”。

任何一个俄国人，只要一满十六岁，便开始拉帮结党，立志“推翻国家制度”。这种事并不稀奇。

谢德林曾经对此予以嘲笑。“十六岁的小姑娘竟然筹划什么颠覆国家制度。嘻-嘻-嘻！哈-哈-哈！”

可要知道，彼罗夫斯卡雅① 几乎才十六岁便指挥了三月一日。这位讽刺作家对此一清二楚。“读罢您关于祖国的文学，十岁的孩子学会了爬墙”。

请看一看杂志的名称：《毒蜘蛛》，《黄蜂》。整整一个出版社——《天蝎》。还有一个中亚的昆虫（一本杂志）。《带刺的蔷薇》。

全都在“扎”俄罗斯。“只想把毒液注入她的体内”。

她变虚弱了，——还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这就是简单的“俄国虚无主义的历史”。

① 彼罗夫斯卡雅，索·利（1853~1881），民粹派女革命家。

可怜的俄罗斯，德国人扎她，犹太人扎她，亚美尼亚人扎她，立陶宛人扎她。乌克兰人冷笑着，过来趁火打劫。

不可思议的是，在所有人中间，就连“俄罗斯人自己”也放肆地用脚上的皮靴，拼命践踏，祖国－祖母的脸。

（跟孩子下跳棋时）

※ ※ ※

我曾在科斯特罗马中学念书。上一年级时，老师教我们：

“我是人，虽然我还小，但我有三十二颗牙齿，二十四根肋骨”，接着是脊椎骨。

只有上到六年级，我才有可能知道，历史上有过一个苏萨宁，在上学以前，我们还唱过（在家里和外边）关于他的歌：

……伸手不见五指呀！
……敌人鬼哭狼嚎呀。

死在波兰人手中的苏萨宁，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但我没能读到六年级（指在科斯特罗马）。有很多学生连四年级都没念完：他们全都知道，人有三十二块脊椎骨，却不知道，苏萨宁怎样拯救了皇室。

后来我又到了辛比尔斯克中学（二年级和三年级）——还是对辛比尔斯克，对伏尔加河一无所知（只学过“长三千六百俄里”，而且是在四年级）。我不知道，深受当地市民喜爱的，美丽的斯维雅加河流向何处，途经哪里。

后来我又到了尼热戈罗德中学。老师给我的拉丁语打两分，

而我醉心于巴克尔①！要将“米宁② 和波查尔斯基③”同巴克尔进行比较，我甚至会觉得莫明其妙：巴克尔声名远播，好比巴比伦，而我们的公爵，则是市井小巷中乏味的小市民。

我厌恶“米宁和波查尔斯基”，到了恶心的程度。为什么？说实话，就因为他们没有写出一部类似《英国文明史》的巨著。

后来我又上了大学。“他们已进行过宗教改革了，而我们这儿还是蓬头垢面的阿瓦库姆”。那里——是罗马人，俄国人这儿——是乞乞科夫们。

怎能不安放炸弹呢？怎能不追随“推翻现存制度”党呢？

这种教育简单说来就是：

求学于辛比尔斯克，可以不必知道斯维雅加河，不必知道这个城市，不必知道本地的诗人——阿克萨科夫兄弟，卡拉姆辛，亚济科夫，不必知道伟大而美丽的伏尔加河。

求学于科斯特罗马，可以不必知道这是一个名字，而且是一位多神教女神的名字，不必知道伊帕基耶夫修道院，不必知道当地灵验的费奥多罗夫圣母像。

求学于尼热戈罗德，可以不必知道“诺夫戈罗德的低地”，“集市的发源地马卡利亚”，乌恩热河及那里的守旧者。

从十岁起，这些东西成为天经地义：

“我是人，虽然我还小，但我有二十四根肋骨，三十二颗牙齿”。或者相反——统统见鬼去吧。

对了，还有，我们学过：胫骨之所以叫胫骨，就因为它是胫骨。

---

①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
② 米宁，库·米（卒于1616年），俄国抗击波兰人侵斗争的组织者。
③ 波查尔斯基，德·米（1578～1642），俄国公爵，统帅。

请设想一下，一个一岁的孩子，假如不给他母乳，而是给他椰奶，“以便使他尽快熟悉地理”，那会怎样？一个十岁的女孩，让她穿法国箍骨裙，以便使她尽快熟悉法国工业与艺术，那会怎样？“我的学生还不到十一岁，但已经通晓历史地理”。

到十五岁时，这些学生已未老先衰。

※ ※ ※

……暂时还是“一朵小花”：别着急，再过七十五年，小小的俄罗斯文学将硕果累累。

就是到了现在，“民粹派小说家”法列索夫还在提议，“良好的基督教家庭”应该尽快聘请那位德国保姆，以抚慰一颗伤痛的心。那位德国保姆是怎样一个人呢？夜里，她点蜡烛看小说，粗心大意失了火，当时年仅九岁的塔马罗奇卡·奥威尔身陷火海，而她却只顾往外抢救自己的衣服，对塔马罗奇卡见死不救。法列索夫，列斯科夫的传记作者，写道（《彼得堡报）：

“她，可怜的女人，已经惊慌失措。应该尽快使她得到安慰。”

我倒更希望他能够慷慨解囊，为这位女家庭教师牺牲二十五个卢布。我敢打赌，他肯定舍不得。

关于这位女家庭教师，塔马罗奇卡的表姨妈（瓦夏的老师）说她已经找到了工作，还获得了一笔保险金——她谎称自己的衣服被烧毁，而实际上，她的衣服是送去洗了，最后当然会完好无损地还给她，可她偏说是烧掉了。

是的，可她：1）是德国人，2）是劳动者，3）是有文化的人。而塔马罗奇卡算个什么？发现屋子着火了，她只会哭喊：

“可怜的爸爸！——全都烧了，等他回来（从国外），什么都不剩了。”

他没有找到女儿。抹不去的回忆。还有：就像一个不更事的孩子，她不止一次地吻过这位保姆的手，然而现在，她再也不能这样了。她对周围的人是那么温柔体贴。

她是五月被烧死的。她的母亲于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亦即五至六个月以后去世。年轻的鳏夫很快又结了婚。

※ ※ ※

当铁流和人流涌向对马岛时，整个文学界在嘿嘿窃笑，大学教授们也在嘿嘿窃笑：

——既然领受了海军上校的军衔，就应该能判断出船桅的高度（康·季米利亚泽夫反对丹尼列夫斯基的话）。

对此，可以这样回答教授们：

——教授的论文拿来了，就放在桌子上：请判断一下，它是由几块德国烂布拼凑成的？

※ ※ ※

我的文学活动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养活了十个人。这是明确无误和坚定不移的。

而思想呢？

思想是什么……

思想是各种各样的。

※ ※ ※

不奔往任何地方的人——是上帝的子民。

不抱定任何目的的人——也是上帝的子民。

（火车上）

※ ※ ※

高尔基言中了（在一封亲切的，善意的信里）：“您的《隐居》会被撕成碎片……”

不过，我很坚强。茨维特科夫① 写信说——“您被陷害了”。我丝毫不觉得，也就是说，我丝毫不觉得疼。“任凭你风吹浪打”，我潜心研究我的古币。我个人收集的古币（零散的），比基辅大学和莫斯科大学还丰富。尽管他们收集了上百年。

※ ※ ※

丈夫爱妻子，就会觉得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甜美。妻子爱丈夫，就会觉得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甜美。

（在马车上，苏沃林的葬礼）

（阳光明媚的早晨）

※ ※ ※

永恒的婚姻的童年——这就是我要倡导的。夫妻应该成为孩

① 茨维特科夫，谢·阿（1888～1964），文学家，洛扎诺夫的朋友和传记作者。

子，应该成为狗崽。他们甚至应该吮吸母亲的乳汁。所有的人都应该喂养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而他们只须生活幸福，并为良好的社会生育良好的孩子。在将来的世纪里，新婚夫妇第一年将不住在房子里，而是住在金子做成的篮子里。

（在马车上，苏沃林的葬礼）

（阳光明媚的早晨）

※ ※ ※

善心带来的成就和成就带来的善心……

他始终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并在最高程度上保持着朴素自然的本色。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半点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只顾自己”等办报人几乎普遍避免不了的毛病。我从未见过他“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躺在沙发椅上”（洋洋得意），这对作家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作家总是对自己的面子斤斤计较。

（苏沃林老人的命运和个性）

※ ※ ※

……是的，我认为，与其跟你们坐在一起共进“知识分子的早餐”，高谈阔论什么“我们这里糟糕到了何等地步”，“我们自己有多么好”，多么虔诚，多么诚实，而且“随时准备为真理赴汤蹈火”。还不如效仿警察站在街角上，那样更有“公民精神”，更有益，更高尚，更符合人的尊严。

我的上帝啊：我竟然与这些人为伍多年。竟然没憋死，也没呕吐。

然而，感谢上帝，这些年里我还是长了见识（在V女士家）。最主要的是，他们是那么“幸福”，那么“可怜贫穷的俄罗斯”。还有鱼子酱。还有两个卢布的波尔特温酒。

(读伊兹戈耶夫论苏沃林的文章时，《俄罗斯思想》：“一个愚昧无知的牧师太太和尼古拉二世时期一个伤痕累累的士兵的儿子”)

(我相信，这位不知何故从不敢正眼看人的伊兹戈耶夫是知道通往铁索桥的小路的)

※ ※ ※

犹太人善于在文学领域“制造成就”。他们由此成为文学界的“泰斗”。他们根本不会写作——不过他们也用不着会写作，只要有“当泰斗”的才能就够了。所有的俄罗斯人会替他们写的——随便他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 ※ ※

8月5日获悉舒拉的病情。

※ ※ ※

我为何如此不能承受死亡？不能承受尘世欢乐的短暂？

不断地有沙皇死去。亚利山大三世死了。我为何不能承受？

不知道。可就是不能承受。“我要死了”——这跟“他要死了”完全是两回事。跟“我要死了”相交叉的（单一性质的）只

有一死；甚至更恐怖：因为我是个罪人。

对了，我明白了：对整个世界来说，我也是——“他要死了”，也是——“无关紧要”。

每个人只有对自己而言才是“我”。对所有的人而言，他就是“他”。这就是伟大的个体。如此，又怎能不发出绝望的哀嚎呢？

（火车上，1912年8月9日）

※ ※ ※

教堂为死者说的话真是令人赞叹不已，我们为死去的父亲，儿子，妻子，女友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它对所有行将死去或已经死去的人都一视同仁，一样“感同身受”，这样的感情只有母亲对自己死去的孩子才会有。它怎能不为此抛弃一切……

（被人打断）

※ ※ ※

一直想（1899～1909年）买一件天鹅绒的连衣裙。也一直拖着。如今晚了。已经卖光了。

从前（在白城时）那件带银色装饰的浅灰色连衣裙多漂亮啊（边上有一根带子，——还有一些什么）。

（在塔拉庭那儿等着拿为孩子买的东西。
老伴儿在挑选）

※ ※ ※

所有的作家都是奴隶。自己的读者的奴隶。

不管他是谁，都免不了奴颜媚骨。

这都是靡菲斯特－古滕贝格一手造成的。黑色的记忆。

（早晨8点，进城）

※ ※ ※

姐姐维罗奇卡（十九岁时死于肺结核）总是把面包瓤掏出来给我。我知道她自己为什么不吃，（没有胃口）。我总是刹那间便将这些面包瓤咽到了肚子里，真是好吃极了。她总是让我去买面包，当我把面包买回来，她总是说："等等，瓦夏。"说完把面包从旁边掰开，掏出心子。

她有一头深色（但不是栗色）头发，而且发型留得很高，很靠前，上面系着一只窄长的，半圆形的发梳。她脸色苍白，身体瘦而苗条（家里只有我长得不好看）。当家里终于决定（没有钱）叫拉戈夫斯基来时，她已经在右边绿墙的房间（二楼）里卧床不起了。他一走进门，她马上从床上站起来。后来他当着我的面对母亲说：

——她这是故意逞能，想以此告诉我们她"没什么"。给她换个房间吧，绿色的墙纸对她有害。她的情况很糟糕。

她是怎样死去的，怎样被安葬的，我一点也不记得。

有一次她对我说："瓦夏，把剪刀拿来。"当时我恐怕还不到

八岁。我把剪刀拿来。她从一张印刷品上剪下一个窄条，小心翼翼地夹到自己的书里，再把剩下的扔掉。那条子上印着这样几个字：萨莫伊洛。“不要告诉任何人，瓦夏。”我点点头。

上中学后，有一次在自然史课堂上，我见到了站在讲台后面，人称“萨莫伊洛”的老师。高个，胡子刮得精光，略呈波浪式的褐色长发，总是穿着黑色礼服（或者蓝色燕尾服），异常庄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些冠冕堂皇，一本正经。他从不允许学生离开座位，擅自“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他身上没有丝毫民主和朴素的气息。在其他学识渊博的老师中间，他总是摆出一副无所不知和傲视群伦的架势。很有可能，他一年只笑一两次，是在碰上学生的回答特别荒唐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时他的嘴唇会微微收缩成一个“小口袋”，确切地说是裂开一条缝，那神态像是对学生的可笑很宽容，使人感到他这是在微笑。他说话时，亦即从嘴唇里放出少量词语时，总是尽可能让握着钢笔（他在纸上画“线条”）的手指离笔尖远些——我见过他那高贵的手指，留着又长又尖，一尘不染的指甲（指甲很小，很小，但还是剪成了一丝不苟的圆锥形）。

我们在拉多涅日斯基或乌申斯基编的教科书里学的是：“我是人，尽管我很小，但我有三十二块脊椎骨和十二根肋骨……”还有一些五花八门，令人厌恶的东西。他（萨莫伊洛）教过三年级（哥哥费奥多尔）植物学。这是一本厚厚的书——《格利戈里耶夫植物学》，令我望而却步。

※ ※ ※

总是担心发生不测。

（老伴的心情）

如今，当一切已经一清二楚——她显然已经抱病十五年了——却没人能为她治疗。

※ ※ ※

……最关心的是何处搞钱，如何通过茹科夫斯基得到宫廷的担保，如何把名气混得大一些，当上教授……

作为教授，他还是很可爱的。不知道讲什么，怎么讲，便捂着下巴说牙疼。他何必当那个教授呢。

是的，他需要长篇大论地教训别人。甚至还在县立学校读书时就给老娘写过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信。

他的全部活动，他的整个面孔，看不出丝毫的崇高痕迹。

干什么都缺乏激情（“崇高的激情”），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如龟爬蜗行。“你得靠肚皮走路啦。”

（关于果戈理）

※ ※ ※

——是痛苦压垮了她啊！（痛哭失声地）是的啊！！

（老伴说舒拉，1912 年 8 月 9 日，在马车上突然打断我的什么话）

※ ※ ※

文学界的记忆是最为冷酷的。在我所参加过的（我并不喜欢）为数不多的“文学界葬礼”上，那些走在灵柩后面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躺在灵柩里的死者如此不相干，简直让我震惊。互相交谈。“各忙各的”。“杰出人物”在冥思苦想，下葬时该说

点什么。

莫非为我送葬的也将是这些“说客”？令人毛骨悚然……

还不如简单行事：表示一下怜悯，掉几滴眼泪，也就够了。

我觉得，教会以及忠实于教会的人犯了个可怕的错误，选择书刊作为保护教会的工具和手段。教会是无言的。教会并不诉诸书刊或古籍。教会不需要说话。它要说的——全在弥撒中，祷告中。这些伟大的宝藏，教会语言的宝藏，早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就已被创造出来，一直供人享用。“说教”未必是需要的。要说，也只须三言两语，永远不要超过五分钟。教会应该少说多做。

难道临别时，吻一下病人不是做吗？这既是做，也是说。吻代替了语言，吻比语言更丰富，因为它就像音乐，比语言更绵长，更含蓄。抚摸一下别人的头发。拥抱一下忏悔的人，疲惫的人。这就是教会的“语言”。为何非说不可呢？

让文学家去说吧。

从这个角度看，教会所有的报章杂志——不过是一堆粪土而已。

※ ※ ※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哪怕是一个星期，甚至几年能让我睡着
一次，或者只是简单地躺着，让我走到跟
前问一声：“你是谁？”)

※ ※ ※

舒拉边走边说：

——她何时治过病？她从未治过病。

不错，每次纳乌克给开的那些溴剂，樟脑，毛地黄和奎宁之类，其实算不上什么“治疗”。

他是在“安慰”她，当她的脑物质日渐减少，心脏组织日渐纤弱。

※ ※ ※

我对琐碎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崇拜。“琐碎的东西”就是我的“神灵”。我每天都要跟它们打交道，日复一日。

如果没有它们，我的面前将是一片荒漠。我害怕荒漠。

※ ※ ※

在缔结婚姻（在国内）时要永远注意这是畜群（需要）问题，“大量的”，“黑压压的”牛群问题。无论如何不要考虑“我们的贵族”，那些享有城市特权者和例外者。他们自己会管好自己的。不过“要为成千上万的畜群打开大门”，而且，这门当然不能太窄，否则会被撞坏。

（鉴定古币时）

（希腊教会关于婚姻的）清规戒律通常针对的要么是皇族，要么是贵族。因而忽略了整个畜群。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们自然想显示自己比皇帝厉害（通过自己的“不允许”权），傲慢自大，随意处置下面提出的要求，“总算勉强同意可以结三次婚”。然而，在与宫廷争高低时，他们忘记了大吼“请允许我第十次结婚”的“瓦西卡·布斯拉耶维奇”，教他如何是好呢（情况跟他一样的人成千上万）；既然他死了九个老婆，且都不怪他，而他又

身强力壮。他只好令人啼笑皆非地叫喊：“总不能让我抱着枕头睡觉吧”，“总不能让我跟褥子结婚吧”。

牧首们（教会对拜占庭宫廷的傲慢）不是没有道理，但瓦西卡·布斯拉耶维奇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是民众（畜群，牛群）。

一个丈夫死了九个老婆，且都不怪他，这可能吗？首先，有位“萨马拉女人”先后嫁过七次，七个丈夫全都死了，或者离开她了，这跟九个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其次，巴克斯特给我讲过一个发人深思和令人惊奇的故事：“一个人坐火车，一天之内遭遇两次车祸，这可能吗？”我回答：“当然不可能！不可思议!!”“您想像不到，”他反驳说，“我的一个熟人从勒阿弗尔上车去里昂，先是乘坐勒阿弗尔开往巴黎的列车，不料中途脱轨。他大难不死，便兴高采烈地继续赶路，谁知从巴黎开往里昂的车又出事了。可惜，这次他未能幸免于难。一天之内两条线上发生两次车祸，当然是可能的，而且显然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总的说来，这样的事并非天方夜谭，一年总要发生几次。只不过在这完全可能的事故中，所发生的不幸是不可思议的；同一个旅客在一天之内连续遭遇两次车祸。凡是在第一辆火车上‘幸免于难’，随即又换乘第二辆也出了事的火车继续赶路的旅客，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不幸。”

不可思议。却是事实。“不可能”，却“发生了”。因为人太多，难以数计。在民间和民间的婚姻中也是这样。就是说，在掌握有关婚姻的法律时，各级教会应该“充分考虑到”一切最为不可思议的偶然因素。以便遵照上帝的旨意——“不要折断裂纹的手杖”，“不要熄灭冒烟的亚麻”。

蓝眼睛是这么看的。

但黑眼睛却不这么看。

※ ※ ※

当教会满足性爱（婚姻学院）时，显而易见，它满足的不是“自己的东西”。

它满足的不是“自己的人”。

于是，非“自己的人”纷纷作鸟兽散（十九世纪，以及此前的所有时代，“道德”）。

不能把马赶进牛棚，不能把牛赶进马厩，不能把狗赶进鸟巢，不能把鸡赶进狗窝。

就是这样。

（鉴定古币时，我们的婚姻状况，缺少离异）

※ ※ ※

凡是奔流向前，不可抗拒的东西，都令我们心驰神往。

爱情和文学也是如此。莫非真理也是如此？上帝啊，莫非“从来没人见过上帝”的宗教也是如此?!!

（吃晚饭和读福尔摩斯时，8 月 20 日）

※ ※ ※

我只把买我的书的人，即二千五百个人当做自己的读者，这是否是一种假像？确实，在报纸上是无法将“一般读者”同忠实于你的读者区分开来的。但我是否能通过来信判断出，即使没读

过我的一本书，也有可能忠实于我呢？果真能如此，“读者少”的假像肯定会立刻消失。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犹豫不决。每当我的书无人问津，我总是把原因归结为“我在俄罗斯还不够有名”，我还没有什么影响。

（深夜，读福尔摩斯时）

※ ※ ※

有缺点的人才是真挚的人。没有缺点的人是虚伪的人。

※ ※ ※

大约三年前，捷尔纳夫采夫发表了一个极其深刻而又充满忧虑的见解。当时，我好像是在谈论大学和教授们，也有可能是在谈论政府和部长们。他打断了我：

——空谈！警察局的分局长——这才是重要的人！

他用手左右划了一下，似乎是在指点周围，指点屋顶的上方（谈话是在夜晚）：

——这里的屋顶下到处都住着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如何？——没人知道。部长不知道，您的教授不知道。科学不知道，当局不知道。也没人感兴趣。然而，这里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如何，恰好又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此乃安危之所系，利害之所系。这个问题只有分局长知道——别看他不吭声，不报姓名；他的工作职责要求他什么都知道，“以备万一”，尽管职责并不要求他事无巨细，一律禀报。他知道谁是小偷，知道谁是妓女，知道谁是赌徒，知道谁的财产来路不明，知道谁对丈夫不忠，知道那些半上流社会的女人的一举一动。凡是

小说中推测的东西，高尔基在《底层》里反映的东西，阿尔志跋绥夫们以及其他作家描写的东西——这全部生命活动：骚动不安的和富于幻想的，隐秘的和罪恶的，可怕的和神圣的，“根据职责”，统统在分局长的掌握之中；而且，“根据职责”，这些材料，别人无权掌握。

他好像没把话说完，或许是我在心里替他说了：

——要工作就到这儿来。这里真实——有趣，这里真实——有权！

我不由得在心中惊叹：“确实如此！而且，谁也不曾意识到！”

他说的似乎更清晰，更深刻。大致是这个意思：所有的工作都是虚幻的，只有一个工作是实在的——当警察。

捷尔纳夫采夫本人就是个崇高的幻想家，哈姆雷特。却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

（8月20日，12点）

※ ※ ※

整人俄罗斯的“反对派”其实是奴才房间的反对派。这一点从说话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们总摆脱不掉那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这是后宫；摆脱不掉那种根深蒂固的痛苦——我们是“后宫的”；摆脱不掉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被他们批评的可人人都是贵族老爷。正是这种奴才腔调，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反对派。文学界最有独立性的人我觉得是斯特拉霍夫，他连提都不提“政府”二字，就这样生活，思考，最后在国家机构任职（一个低微而又偶然的职位，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年薪一千卢布）。他具有一种对“政府”绝对不感兴趣的才能或天赋，分寸感或灵

感。相形之下，有些人就不同了。奴才米哈伊洛夫斯基，就像中了普列维的魔法，对他百依百顺；“宫廷中人”科罗连柯，不让他敲打一下县警察局长或乡绅，不让他背地里（不敢当面）奚落一下“自己的波尔塔瓦省长”，他连一天也活不下去。“要不然——我找上面”，他心里想，两腿却直打哆嗦。“演唱会上来了个警长，于是安年斯基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并指着会场说：‘让那里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吧。’”柳鲍芙·古列维奇写道。指着会场，也就是指着警长，怎样的大无畏精神啊！斯特拉霍夫会无地自容，假如他不尊重自己。在具有文化意义的讲话中，竟允许自己哪怕只那么一瞬间，考虑到警长。即便是想到内务部长，他也会认为那是一种耻辱。在他的思想中，只有绵长的世纪和久远的历史。这才是绝妙的非激进主义者的自由。这自由，把人们引向他们，即引向斯拉夫派，引向思想中绝对没有“政府”，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既说“是”，也说“不”的俄罗斯人。当政府干得好——就说“是”；当政府干得不好，平庸——就是“不”。政府不过是人民与社会的喉舌，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一个作家，应该把它看成自己的奴仆，亦即跟他一样的凡夫俗子和公民的奴仆。如此看来，只有激进主义者才承认“权力的至高无上”，“我们的兄弟”绝对不承认。这便是人们没有搞清楚的地方，这便是人们没有加以揣摩的地方。恰是保守主义者才拥有政治自由和公民的尊严，而“反对派”有的只是奴才的阴险和“自己的卑贱地位”造成的苦难。

※　※　※

让婚姻服从爱情的法则。

似乎，基督教就包含在这里：一切都要服从和睦，和平，平

静的法则。然而，恰是基督教——不是伊斯兰教，不是犹太教……两千年来恪守的却是另一个原则：

让爱情服从婚姻的法则。

于是人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似乎，我们的婚姻既不符合福音书，也不符合圣经（毫无疑问）；这是古罗马的国家婚姻。教会的神父都是古希腊罗马帝国的居民，或者说，是纯罗马帝国的居民；关于“社会的基本细胞”的概念，他们是从外部生活中取来的。

正因如此，我才向往一种新的家庭，尽管看上去有些“大逆不道”，其实却是真正符合福音书和圣经精神的，它所反对的只是不慎被列入“教规”的罗马多神教家庭模式。

上帝创造了爱情。亚当和夏娃相爱——这是圣经唯一一次承认琴瑟之好，男女之爱。爱情比“婚姻的法则”古老。不言而喻，古老的和基本的东西不应该服从新的和附加的东西。

不是“名词”要跟“形容词”性、数、格保持一致，而是“形容词”要跟“名词”保持一致。

神父们啊，信奉这一点吧：即使不然，人们也不会听命于你们。

就是杀了他们，他们还是不会听命于你们。圣经中说：“爱情甚至比死亡更强大。”

※ ※ ※

少女失去贞节，等于失去自己的定义。

她并没有破戒（自然规律），她并没有得罪谁。她可以对全世界说："与你何干。"原来如此。

可是，当人们跟他交谈时，把她当成少女，当成"小姐"，而不是"太太"、"女士"，她可不会说：

我已经不是姑娘了。

她要加以掩饰。时刻这样。每天她都被迫撒谎。她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好像她出门时带的"不是自己的护照"，口袋里装的是"假身份证"。

处女的真实，处女的质朴，处女的坦率——荡然无存。如今（失去贞节以后），她不得不每天拿捏作态，假话连篇，责备自己"不够勇敢"。

这真是活受罪。

可更可怕的是，"在暴风雨的压迫下"，最后，她开始朝歪处长，"侧着身子长"，虚假地长。

她会逐渐失去光彩，失去活力，变得枯萎。这并不是因为"罪过"，性交本身绝对不是罪过，而是因为——失去"贞节"，其实就是"堕落"。从一般经验看，少女将从此走向"堕落"。在"职位"上堕落，在"劳动"中堕落，在"家"里堕落。

然而该死的（社会，长辈）：你们应该及时地，尽可能早地让你们的孩子出嫁，以此来避免这可怕的不幸。永远不许叫喊——"你堕落了"（父母对女儿），当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年，当她还在苦恼，还在期待。

（这里说的是“成熟”以后；应该在法律中确定“兑现支票”的期限，也就是少女“有义务等待”的期限。）目前，一切都交给社会，少女得不到任何保障。比如，法律应该说：“三十岁以后不要求保持贞节，生孩子不受指责，孩子合法。”

※ ※ ※

是的，我也认为，由被开除的警察和夜总会的赌棍造就的俄罗斯进步，会走得很远：

请播撒理性，善良，永恒。

请播撒。俄罗斯人民会真诚地对你说一声“谢谢”。

这数不胜数的“谢谢”，会把俄罗斯人民的脖子压弯。四面八方的将军，军人，每人要你鞠一个躬，还有文学将军，强迫你“永远鞠躬”。

人们对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已经鞠了五十年的躬。

※ ※ ※

我还是觉得日常生活中的罗斯更可贵，更可爱，更可亲，更有人情味。

彼此恩爱。男婚女嫁。生儿育女。

先让孩子学点文化，但不要使他们厌倦，然后，让他们结婚。“父母还身强力壮的时候，孙子们就应该做好准备”——这是我的信条。

只有死亡才令人恐惧。

（从斯维托扎尔·斯杰潘诺维奇的婚礼上回

来后）

※ ※ ※

托尔斯泰令人吃惊，陀斯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动。

托尔斯泰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座建筑。无论他写什么，甚至无论他开始写什么（“片段”，“开头”）——他都是在建造。到处是锤子，铅锤，直尺，图纸，“构思好的和设计好的”。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刚一开头，其实就已经全部构筑好了。

但这一切当中没有箭（实际就是没有心）。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沙漠中的骑士，背着一只箭囊。他的箭射向哪里，哪里便流血。

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来说是宝贵的。托尔斯泰身上则没什么宝贵的东西。他总是“说教”。让那些心悦诚服的人跟他去好了。“说教”并不能成就什么，除了一叠叠的纸张和收集纸张的人，以及图书馆，商店，报纸上的讨论，或者好一点——换来一个金属的纪念碑。

而陀斯妥耶夫斯基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音乐永远不会消亡。

（9月）

※ ※ ※

在那个世界，如果你能进天堂，你将得到西瓜的滋润，而不是水。

（吃西瓜时）

※ ※ ※

——假如给你塑像，你想要个什么样的？
——我只要求：上面的我在蔑视观众。

（紧张工作的一天）

※ ※ ※

请看，暴行如自由的歌声通行无阻，美德似送葬的队伍步履艰难。

何以至此？何以这般恐怖？

请看，但丁的《地狱》有多美，他的《炼狱》有多酸。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之间同样如此。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好像唯一的例外是品达罗斯的奥林匹斯颂歌，它们与寓言，笑话，讽刺风马牛不相及。

也就是说，基督诞生前四至五世纪的希腊人是幸福的，纯洁的。

（在离群索居的书房里）

缺点栩栩如生，而美德黯然无光。

这一切何以如此恐怖?!

（1912年8月20日）

※ ※ ※

赫尔岑为俄罗斯引进一条词句的大河，以为这就是“政治”

和“历史”……

他是俄罗斯政治空谈的始作俑者。这种空谈由两部分组成：1)“我在受苦受难”。2) 只要证明了这一点，你可以随便胡说八道，一切都将是“政治”。

由于所有的中学生在我们这儿都深受教师的懒惰和严格之苦，故从赫尔岑开始，任何一名中学生都可以成为“政治家”，于是中学生们便搞起政治。

不是说全都“这样”，但十个有九个是这样。

※ ※ ※

……真诚是无疑的，但还是有狡猾的成分。不管有没有表达出来。就是说，在我们的“突如其来”和呐喊中，我们始终难免要遮掩自己。“好冷啊。”“不雅观。”

我们多么怕冷啊，我们多么可怜啊。

（关于《隐居》，整理书籍时，1912 年秋）

※ ※ ※

“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评判一个人不是根据材料，也不是根据实绩，而是根据“规章制度”。只要他能恪守铺天盖地，堆积如山的“规章制度”，不敢越雷池一步，他的胸前就会挂满勋章。这样的人多了，便会形成“一个墨守陈规的祖国”。

一个缺乏爱的能力的祖国。

于是给爱也制定“规章制度”。

于是给教会也制定“规章制度”。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到门外去吸一会儿烟）

※ ※ ※

晚秋，迟开的鲜花……

——这句诗对我来说只是神话。秋天也好，秋天的树也罢——我从未见过（儿时不算）。

刚一出蘑菇，就得收拾好书本进城。“开始上学了”。蘑菇出在八月份，有时是在八月底：今年跟瓦夏只去采过两趟蘑菇，而且几乎是一无所获，只采到半锅，甚至不到半锅杂蘑——牛肝蘑，红蘑，杏蘑之类。白蘑只采到一只。而那个地方又盛产蘑菇。

孩子——所有的孩子——对森林都有一种神奇的记忆。六年前，在捷里奥基，我们翻山越岭，穿越沼泽，进入大山深处。突然——天黑了下来。我很害怕：老伴正等着我们吃晚饭呢，她会担心的。“孩子们，赶紧回家，天黑了！”大家立刻往回走。

我的记性差极了，只知道大致的方向，却完全不记得路，不记得经过了哪些地方。要知道，万一陷进了沼泽地，就是到天亮也不见得能挣脱出来。突然孩子们喊了起来。“爸爸，过来，爸爸，这边！”瘦小的瓦夏当时还不满七岁，就像一个国王和老练的山里人，自信地迈开大步。“看，白桦树，我们就是从这儿过来的，看，小山包，来时是在我们左边。”就这样，我们一路上几乎是跑着，而不是走着，尽管天已经黑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听到了仆人向我们迎面发出的欢呼声。

吓得有气无力的老伴说：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啊……

——没什么，妈妈！

我们的孩子简直就是山里人，随便把他们放到哪里，都不会

迷路。

塔尼雅，维拉，瓦莉雅——都是英雄。好像她们长成了大人，“把爸爸领回家”。瞧这些蘑菇。瞧这些篮子。马上——拿到厨房收拾干净（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是“真理的胜利”，是最好的“奖赏”）。

就教育方面而言，这样一个晚上是极有价值的，是下面这类知识无法替代的：

阳性名词
有很多：
Panis，piscis，
Crinis，finis①。

啊，真可恶！

但愿这残酷的开学时间是在十一月，十月，而不是在这样的时候：

森林脱下紫红色衣装。

是的，就连这句诗对我来说也成了神话。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我可怜的孩子们，个个聪明伶俐，学习却很困难的孩子们，永远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他们确实看不到森林这橙黄色的壮观。而谁又知道七至十一岁的若是看到了，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① 拉丁语：面包，鱼，头发，结束。

也许，儿时见过的橙黄色森林能使一个处于沮丧，苦闷，绝望中的老年人得救。能使一个无法无天的青年得救。能使一个意欲自杀的少年得救。

这一切完全被忽略了。我们的贫乏的学校。在贫乏中自以为是，安之若素。“我们已经学代数了”（可这些孩子还流着鼻涕，还不会擦鼻子）。

※ ※ ※

我国的“教育步骤”安排得甚好：八岁到二十二岁——刻苦学习。埋着头，“死记硬背”。二十二岁到三十五岁——老老实实工作，得到初步晋升和嘉奖。三十五岁——成为五等文官。结婚（有嫁妆），生孩子；看，这是“厨房和卧室”。成为五等文官之后——整天围着牌桌，变得浅薄，先是输给领导，然后再赢下属。这样他便可以晋升为四等文官。

然后一命归天。“妻子携子女”在黑框里泣告：伊万·伊万诺维奇“因病医治无效”，终于“不幸逝世”。

※ ※ ※

学生不肯学习，这是对“愚蠢”的正常反应。

——不要学习，先生们。让他们见鬼去吧。尽情地淘气，玩耍吧，去采花，去恋爱。只是要爱自己的父母，要尊重神父（悄悄地去礼拜堂）。考试时可以“打小抄”——满足教育部的贪得无厌。

到了二十岁，等你们当然要结婚的时候，再开始轻松愉快地读书吧，而且要读很多很多，直到死。

这样，死亡就会来得很晚，你们的老年也将是大智大慧的。

※ ※ ※

……否则他们会让你们未老先衰，会让你们到老了才结婚。“因为这时你已经变得聪明，能够担当教育子女的重任”——可这时你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

你们应该对他们这些成年人说：

——不，爸爸：我要到老了时再坐下来读书，伏案，做事。因为那时才会有“完成事业”的聪明才智。而现在我还很笨，我要跑到野地里去采摘鲜花，把它献给姑娘。

※ ※ ※

教会从耶稣基督“夫妻不得离婚，除非一方犯有通奸罪”这句话中发掘出来的结论比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阿尔泰的全部金矿还丰富。

尽管这里流淌着人类的血液和脑髓，然而对此，教会是不会做出新的解释，予以推行，使问题复杂化的，因为否则，产量丰富的金矿会被关闭。于是，在字面上恪守这句话所花费的力气，超过了捍卫整个福音书。

一个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家庭幸福，有什么不可以献出的呢？教会按住的恰是这个钮。

（纪念拉钦斯基）

※ ※ ※

是的，我也认为，被革职的警察和夜总会的骗子制造的俄罗斯的进步将走得很远：

播种理智，善良，永恒吧。
播种吧。俄罗斯人民会诚挚地说一声——
谢谢你们。

这一声又一声的“谢谢”简直把俄罗斯人民的脖子都给压弯了。四面八方全是将军，值得玩味的是，军人只要求敬一次礼，文学的将军却强迫人们“敬一辈子礼”。

人们向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已经敬了五十年礼了。

※ ※ ※

我还是更喜欢，更珍惜日常生活中的罗斯，她是那么亲切，那么富有同情心。

真希望人人都能得到爱，人人都能结婚，人人都能生儿育女。

让孩子们稍微念点书，不要加重他们的负担，然后让他们也结婚。“当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应该有孙儿绕膝”——这是我定下的规矩。

只是“死亡”太可怕。

（从斯维托扎尔·斯捷潘诺维奇的婚礼上归来）

※ ※ ※

苏拉米菲是谁？

从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夜间的每一个以色列女人。

《雅歌》应该同以西结书的第十四或十六章联系起来。在那里，主耶和华通过先知对以色列少女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至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我也将环子戴在你的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等等。“只是你……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和埃及人行淫……又与亚述人行淫……”

（早晨读报时）

※ ※ ※

这一段妙极了。所有的青年男女都应该背下来，把它当做自己生命的根本，权利的根本。

以西结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

“‘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初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作一件这样的事怜恤你；但你初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

“‘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至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

“‘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

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妆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经火归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

"'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作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

"'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众女"是"城邑"的意思。本章下同。），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

"'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迦勒底，你仍不满意。'"

"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作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

"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泄了，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尽了。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忿怒忌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

"'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与人。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忿怒，我的忌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所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你没有效法她们的行为，也没有照她们可憎的事去作，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

倒比她们更坏。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所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哪，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她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她们除掉。’

“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她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为义’或作‘当受羞辱’）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她们更为可憎，她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抱愧担当自己的羞辱。

“我必叫她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所多玛和她的众女，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她们得安慰，你就抱愧。你的妹妹所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所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她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 ※ ※

收到两封能够说明问题的信。

尊敬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我决定向您提出一个可能会使您觉得奇怪甚至过份的请求。我是神经心理学院三年级学生。自己不挣钱。靠父亲养活。

这些钱成为我的一个可怕的负担——简直“烫手”。

我真宁愿放弃这种资助。可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别的经济来源。靠当家庭教师之类挣钱——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决定，只要一有可能，就不再要父亲的钱。所以，我想向您要二千卢布。或许，我的想法过于天真，可是，当我了解到您拥有三万五千卢布（《隐居》的收入）时，我便断定，您完全可以分给我二千卢布。

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再学习四年（不能提前毕业），然后我会尽最大努力还您的。

如果您把我看成骗子，我会很伤心的。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下这个决心的。当然，我无法为自己的诚实提供担保——您可以相信我，也可以厌恶地将我的信丢到纸篓里。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的请求是严肃认真的，请您相信，这绝不是招摇撞骗。

盼您回信。

Г.Ш.

来信请寄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街某号

大学生 Г.И.Ш. 收。

1912 年 8 月 27 日

奇怪：写信人要求我关心他的困难，但他却没有关心我的困难：不错，《隐居》是为我赢得了近三万五千卢布的收入，但我要靠这笔钱养活十一口人，其中有五个年纪尚小的孩子，一个久病不愈的妻子。“您的事我不管”，可我的事您得管。

——这是为什么？

——我是大学生，是俄罗斯的未来，而您已经老了，不中用了。

真动听。

尊敬的先生：

我常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某某人投河自尽了，某某人开枪自杀了，某某人服毒身亡了，并在临死时留下一张字条：“没有饭吃”，“活不下去”。每当读到这样的消息，我总要想：“撒谎，不可能，一个有手有脚愿意工作的人不可能活不下去。这纯粹是为自己的早逝开脱。”我认为，这种人肯定有什么心事，承受不了便寻了短见。那么，字条怎么解释？字条只能揭示他精神状态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或者说是几种情况的简单巧合。

根据这种想法，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只要他能工作，想工作，他就永远能找到活干，永远能养活自己，永远不会仅仅因此而放弃生命。对于还是独身的人，我更敢说这话。

然而，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又不得不推翻我的结论。这回不是凭头脑推断，而是凭我个人的一次不由自主的体验。

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是个技工，毕业于一所初级机械技术学校，在校时，我的成绩名列前茅，这并不是因为我很能死记硬背，而是因为别人学起来吃力的东西我学起来总是很轻松。我白天在一个地方上班，晚上在家自学。一直想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可当我发

现，我的成绩很不理想——我请不起补习老师——我便毅然决定去彼得堡，我知道，在这里（彼得堡），我可以节省开销，将晚上的空余时间都用于备考。

我来了。起初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工作结束了，我开始到处求职，可怎么也找不到。转眼间，已经两个月了，还是没找到。我找过各种劳动部门：制图员，钳工，车工，木工，电工我都能干，还会维修蒸汽机，发动机或发电机。我到处求人，说随便给多少工钱都行，但还是被拒之门外。“我们这儿人员已满。”“我们这儿没有空余的位置。”这就是我从办公室甚或看门人那里得到的典型答复。我带来和挣的钱，全都花在生活和求职广告上了。如今只剩下三卢布——这样下去，非饿死不可。饿死！听起来多可怕啊。不！我绝不会走到这一步，我要自杀，自己给自己来个了断。

在俄罗斯，从来没听说过谁是饿死的。我绝不开这个先例。我要走别人走过的老路。

是的，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可以去乞讨，可以去给人当差，但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我做不到。

我想活着！我想工作！我能工作！我年轻力壮。当我得到的答复只是一句冷冰冰的：“我们这儿不需要人！”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人员已满。不需要人了。”

这里的生活热火朝天！这里的工作热火朝天！而我呢？我是个多余的人。可我毕竟还不至于如此多余，多了我这一普特搬运工就会背不动，多了我这个人船就得翻。给一个搬运工的背上额外多加一普特，他就会摔倒，结果什么也没能运走。给一只小船额外多加一个人，小船会沉，结果谁也不能活命。可我毕竟还不至于如此多余吧？您以为如何？

时光飞近。那一刻就要到了，世界上将少一个人。这就是生

活！什么都把我教会了，却忘记了最主要的，我能够做到的：“该如何生活?”“如何适应生活?”路灯给了很多，却不给火柴；路灯接二连三地全都熄了，便只好迷路。好黑啊，好黑！

如果我在此附上我的地址，我担心您会以为我这是在卖弄自己，或者更坏，以为我是在向您求助，所以我决定不留地址和姓名。这样要好一些！是的！

某某敬上
圣彼得堡
1911年10月11日

真是触目惊心。我为阻止不幸发生付出的努力——在报纸上发表的一封给匿名者的信——显然为时已晚。

※ ※ ※

写作的“轮船在奔走”——在痛苦中，在不幸中，在磨难中奔走。一直在“奔走”啊，“奔走”……校样，手稿……

（里西诺的一匹枣红马的故事）

※ ※ ※

把房门关紧，别让风吹开。
不要经常开门。不要到马路上去。

※ ※ ※

不要下楼——楼下有罪恶。
屋外有罪恶，因为屋外有冷漠。

（里西诺）

※ ※ ※

请看这形影不离的几个人：戈伦菲尔德为柯罗连科擦背，彼特里谢夫为柯罗连科搓腿——货真价实的一小搓①；这一小搓又为臭味相投的《现代世界》的一小搓擦背。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主要是互相惊叹，互相吹捧。可是，为什么俄罗斯要把这“文学的喧闹”当成“自己的进步”呢？

我不明白。无论是种田的，还是做工的，都不会明白。就连当官的也未必同意。“我也是一个纸堆的王国，”他会想，“我不明白，他们为啥要跟我分开。我们没有丝毫不和谐的地方。”

※ ※ ※

你，民主派，与其在门后偷听，还不如去跟看门人和厨娘握手，打招呼，那样更有成效。前者不会使生活变得美好，而后者却绝对可以让生活发臭。同时还要相当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这样才敢想当然地以为，你的握手会使厨娘受宠若惊。她有她的尊严，而且，不管看上去有多么奇怪，这尊严并不会拒绝你永远不会给予的十戈比“大衣钱”。

※ ※ ※

——不是，爸爸，你搞错了。是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两个礼拜的时候——记得吗，我们从高加索回来得很早——有一次我在

① 小搓，音同小撮。

厨房里拿了根胡萝卜，给她发现了。咳，不就是一根胡萝卜吗？我溜出去，还没吃完，就把它丢到了阴沟里。我害怕，就说我没拿。她一个劲儿地折磨我，折磨我。“你是个坏姑娘，塔尼雅，偷了还要撒谎。我要告诉你妈妈。”妈妈回来时，她真的告了我的状，说我撒谎。就为这一根胡萝卜。

（社会清教徒莉迪娅·艾拉斯托芙娜）

※ ※ ※

令人作呕的苍蝇——不是在牛角上，而是在驮着重物的牛背上——这就是我们的政论，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布拉戈斯维特洛夫；他们在咬牛的脊背。

※ ※ ※

俄罗斯有时就像一头庞大的水牛，专吃草地上的“杂草”，“败草”，一旦中毒，便四处狂奔。

（热利亚波夫和柯罗连科）

※ ※ ※

女儿在念高等女校。常有同学来找她。谈笑风生，窃窃私语，憧憬未来……

“我们将如何如何”；“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

她们要掉到冰窟窿里去了，却没有人告诉她们：

“只要你们一挣脱学校的魔圈，得到一纸‘毕业证书’，你们

就再也休想见到任何人，没有任何单位会向你们敞开大门，他们只会对你们说：‘我们不需要你。’”

这彻骨的冰冷——“谁也不要”——会把你们冻僵，甚至有可能冻死很多人。

但你们要忍耐。要斗争，要忍耐。每个人都回避不了这条冰河，只有游过去，才能爬上彼岸。

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吧，虽然不雅观，但能保住性命。

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为了“心中的真理”，决心在俄罗斯发动一场政变。

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并不知道，即使不发动“政变”，他们毕业以后还是没有饭吃。为了不被饿死，他们还得叫“先生”。

舆论界在给他们打气：“放手干吧！掀起一场风暴！”都是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伪君子——仅此而已。

（致柯罗连科和别谢洪卡）

※ ※ ※

人人都在为自己没有受过教育而汗颜，只有G把这当做骄傲和得意的资本。从前他自称是“社会主义民粹党人”（还加上了他的姓）时，他以社会主义者的口气说过，“尽管他什么也没学过，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要想让他明白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总是把“比利牛斯半岛”和“西班牙”混为一谈。如今，当他成为“民粹党人和国家主义者”，他认为了解欧洲地理与自己的“俄罗斯信念”不协调。有一次他平白无故但又踌躇满志地挑起话题，说什么他曾“向斯托雷平直言相告，他对俄罗斯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

——是亚历山大·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吗？

他像是嘴里含着杏仁冻：

——不——是。是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我告诉他，我绝对不同意他的观点。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我不知道，斯托雷平是否曾为能跟G说几句话而感荣幸，但G曾为能跟斯托雷平说几句话而感荣幸，倒是确定无疑的。

回家的路上，他肯定在想：

——此时此刻，斯托雷平会对我作何感想呢？

斯托雷平与G之间的彼此照应我认为是历史事实。“历史的石堆上应该处处有自己的一小块石头。”于是G顽强地扔出一块“自己的石头”。

（写在斯拉夫学会的“邀请”上）

※ ※ ※

没有权势——孜孜以求，有了权势（与之结盟）——高枕无忧。这就是俄罗斯虚无主义的历史，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的历史。

只要将处处受到排斥，家里穷得连一撮儿招待朋友的茶叶都拿不出的斯特拉霍夫的寒酸生活，同“甚至不屑于跟屠格涅夫交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轰轰烈烈，煊赫一时的生活对比一下，只要将与马车夫和妓女同住一条陋巷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贫困生活同娶了犹太百万富婆，身居豪宅，并把《欧洲导报》的“反对派编辑部”设在自己家中的斯塔修列维奇的生活对比一下，只要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和吉里亚罗夫－普拉东诺夫纯属痛苦和不幸的可怜生活同文学大王布拉戈斯维特洛夫（《事业》）的生活对比一下，最后，只要将官邸常有上百名“赫尔岑协会”会员和客人云集的班台列耶夫的生活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的生活，同喝茶时的

戈耶和伊万诺夫对比一下——你就会明白，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和否定者很清楚“虾在何处过冬”。他们扑向金钱，扑向富人丰盛的餐桌，扑向名贵的酒，无时无刻不在以无产者的迫不急待扑向有产者的怀抱。虚无主义早就开始舔富人的脚后跟了——问题就出在这里。虚无主义是大户人家的食客——问题也出在这里。每年冬天和春天，到“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家向尼古拉表示祝贺（他每年过两次命名日）的不光有彼得堡的人，还有远自莫斯科专程赶来的文学家，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有据可查），另外还有手持鲜花的女校学生，以及大学生们——可能还要发表一通自己的“反对派言论”和“贺词”。主人照例免不了要对他们的发言评论一番，或批评，或赞扬，像是在提拔谁，处分谁。我在苏沃林家听说过这位讨厌的虚无主义者布拉戈斯维特洛夫，好像是苏沃林本人讲的：他的工作室的门是用镶金的黑木做成的，门前还站着一个黑人仆人，那气派简直跟“王公大臣”没什么两样。这可不是可怜的勒齐和他的奥尔加·伊万诺夫娜的家，只能“凑合着住”。我们的容易轻信和天真幼稚的外省是无从知道这些“小事”的，只有来到彼得堡你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而一旦了解到真实情况，你准会大吃一惊。读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时，我曾对关心文化和文明的政府竟然允许如此恶劣，大肆谩骂现存一切的杂志存在而感到吃惊，我以为这是喝醉了酒，“毕不了业”的讲习班学员们办的杂志，以为他们只有喝得酩酊大醉，跟“女学生”搞过淫乱之后才写文章。然而我和我们所有尼日尼的人，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竟会有“黑门和黑人”。我们一直以为“虚无主义”只是一些“绝望的大学生”，至多不过喜欢搂着女学生睡觉，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全都“优秀”，全都“出色”，绝对与人民“心连心”，绝对朴素，贫穷。想不到会有“跟班”(黑人)。我们一直以为，“虚无主义”和“无神论”是苦难和贫穷的代名词，是为反对花天酒地，反对饱食终日，反对“骑在人

民头上作威作福”，反对压迫“我们穷大学生”乃至“处于最底层的我们中学生”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我简直惊呆了，当我来到彼得堡，突然发现“就连捷尔吉·伊万诺维奇也是反对派”，而他拥有二千“租金”（皇上的奖赏，可以年年享受，一直到死）的红人儿谈起炸药箱，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同情；当时我是头晕目眩，一股浓烟和烈焰腾空而起，好像要烧进我的灵魂。“啊哈，原来这就是反对派：胸前佩带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白鹰勋章，腰缠万贯，餐桌上尽是山珍海味。”“这跟想像中的完全是两回事。”后来我认识了斯特拉霍夫。他通晓五门外语，程度达到母语水平，通晓生理学，数学和机械学，程度达到专业水平，通晓哲学，是个体微思精的批评家，却无处发表文章，除了稿费很低的《俄罗斯导报》。后来，脱离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佩尔卓夫来了，他胸怀宽厚，乐意出版别人的著作（尽管他的财力并不算雄厚）……

我明白了，在俄罗斯“当反对派”就是要爱戴和尊敬国君，在俄罗斯“当造反派”就是要去望弥撒并能善始善终，最后还有，“像斯坚卡·拉辛那么做”，就是要把一年过“两次命名日”（佩尔卓夫挖苦他的话）的米哈伊洛夫斯基打个鼻青脸肿。我明白了，《俄罗斯信息报》其实就是一个“级别越来越高”的机关，伊丽莎白·库斯科娃其实就是一个“女官员”，人人都要巴结她，因为她出版的是一份级别很高的杂志——《无题》。我明白了，“身穿拖地长裙”的不是一生与乞丐和妓女为邻的高尚的敦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她的生平令人惊讶——见斯塔索夫写姐姐的书），而是这位伊丽莎白·库斯科娃，还有索菲娅·科瓦廖夫斯卡雅，以及走在她们前面的，以扎苏里奇和彼得罗夫斯卡雅为首的，在施吕瑟尔堡甚至连宽厚圣洁的敦杜科娃－科尔萨科娃都不肯“接见”的，“获得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妇女们”。我明白了，什么叫反对派，什么叫“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在一起”，什么叫

“同穷人在一起”。我明白了，什么是槽，什么是猪，什么是荆冠，钉子，苦难。

我明白了，为什么这白痴一样的新闻检查机关要从书中删除“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为什么我的《论君主制》一文通不过审查，把它与受到社会民主党保护的《事业》，《俄罗斯财富》相对照。我突然清醒了，明白了，俄罗斯正流行“大吃大喝和招摇撞骗”，俄罗斯正崛起一支左派“禁卫军”，它已经控制了整个俄罗斯，谁要是不投靠“花天酒地的反对派”，“纸醉金迷的反对派”，“库特列尔退休金达六千卢布的反对派”，它就把硫酸泼到他的脸上。

于是我也加入一个反对派，一个少言寡语，柔弱无力，确实有可能被一脚踩死，由下列成分构成的反对派：

1）祷告。

2）早起并工作。

（1912年9月15日）

※ ※ ※

然而，俄罗斯的事业，俄罗斯的精神是在何处丧失的？这一切（参看上文）是如何发生的？如何造成的？

是在讲究正式，追求隆重和随之而来的“嘉奖”中丧失的。

是在导致虚无主义走向毁灭（？）的那股“臭气”中毁灭的。

一切都可以通过哥哥科利亚（十七年前）在某个地方读到的一件事得到最佳解释。

有一次，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皇帝在宫中路过一个房间时，听到尚未成年的女儿们正聚在一起唱《上帝保佑沙皇》。他在敞开的门旁站了一会，等她们唱完了，他走了进去，和蔼而又严厉地说：

——你们唱得很好，我也知道，你们这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你们要注意：这是一首神圣的国歌，不是在随便什么场合想唱就可以唱的。“比方说”，在玩耍时，在练嗓子时就不能唱。只有在很少见的场合和很严肃的时候才能唱。

这就是谜底。

我们的中学，尤其是当年那所无耻的辛比尔斯克中学，在维施尼奥夫斯基和吉尔纠舍夫斯基掌权时期，特别讲究官场那一套，简直令人作呕，每个星期六都强迫全校肃立在皇帝像前，高唱《上帝保佑沙皇》，就是到了现在，仍然到处可见形形色色的人群大唱《上帝保佑沙皇》，全然不顾是什么场合。

唱得怎么样?

——当然是麻木不仁啦。

不应该每个星期六都体验一次爱国主义情感，我们全都清楚，是“吉尔纠舍夫斯基和维施尼奥夫斯基”需要这个，以便向省长叶列梅耶夫邀功请赏，而我们这些学生则成了他们向上爬的工具。

不错，我们是“唱”了，可一到星期六，每个同学的情感之树就会凋零一次；我们嘴上在“唱”，幼小的心灵深处却在滋生这黄色的，忧郁的，怒火中烧的虚无主义。

我记得，正是辛比尔斯克成了我的虚无主义的故乡。二年级和三年级我是在那儿读的，四年级时已经转到了尼日尼。

整个问题全出在这貌似庄重的，强加于人的“爱国主义”上。我有时这样想：“官僚机构”，或者更确切地说，各种“机关”，不妨保留，但要将那些滑稽可笑，生硬别扭的丝带和镶嵌之类从它们身上统统扯下。还有勋章，只保留几种最高级的。所有这些授予公务员的“十字勋章”不伦不类，早已成为公众的笑柄。“机关工作人员”应该穿着普通的黑色俄罗斯长衣——要保持严厉，严肃和朴素。如能做到这样，所有那些显然只会影响领

导休息，娱乐，“与家人美餐一顿”的“祝贺节日”之类就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被杜绝，所有那些手脚不干不净的坏蛋们就会被扫地出门。

爱祖国——应该慎言，应该少说，不能成天挂在嘴上，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为了出风头，“拼命挥舞双手”，拼命表现自己。

爱祖国——应该以伟大而热烈的沉默。

（9月15日）

※ ※ ※

现在，先生们，在你们自己的阵营里寻找马格尼茨基和鲁西尔，阿拉克切耶夫和法捷伊·维涅季克托维奇·布尔加林吧。

（致激进主义者）

※ ※ ※

整个“我们的教育”——不是俄罗斯的，而是当代欧洲的——可以这样概括：

——先生们！我提议全体起立，向死者默哀。

全体起立。

面对可怕的，无可挽回的，不可言说的，惊天动地的死亡事实，除了这种蠢笨的方式，我们的文明竟然找不到，想不出任何其他表达哀思的办法。

——“起立，先生们！”——这就是全部的爱。

——“起立，先生们！”——这就是全部的智慧。

达尔文，议院和拿破仑战争，对数不清的已经死去和正在死

去的人说：

——“我们起立。”——“你们死的时候，我们会起立的。”

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爱”，我们的“对人的尊重”，我们的……竟然到了如此地步，简直让人欲哭无泪。

真难以想像，我们还要凭这点儿才能去“改革教会”。

在我们整个文明世界，在我们当中，找不到一丝一毫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宣读悼词，唱歌和祈祷时表现出的爱，对人的无限尊敬。这一切仿佛是一份证明，留在人的记忆里。而我们的爱的证明是什么样的？

“起立！站一会儿！”

——蠢驴！

除了“蠢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 ※ ※

就是这“改革的重要尝试”——没心没肺的尝试，缺乏头脑的尝试——震撼了欧洲……这里有“颓废派”，有“我们”，有“自我未来主义者”，有形形色色的“革新家”，还有“杜马”和卡拉乌洛夫。

是的，我们也为卡拉乌洛夫“站了一会儿”。他应该从那个世界朝我们打个喷嚏：“太简单了。”

※ ※ ※

库斯科夫（普·阿·）讲的故事：

——人人都抱怨说，警察局欺负穷人，限制公民自由。“我们喘不过气来”。“抓住，别松手”。有一次，我顺路拐进一条偏僻的马路，木头铺成的人行道上，晃晃悠悠地迎面走来一个喝醉

酒的女人。可能是带子松了，裙子的前摆拖到了地上。她每向前踉跄一步，都要被裙子拌一下。她懊恼地想把裙子往上提。然而，裙子已经跟上衣分开了，她没发现，结果她扯起来的是衬衣。越走越利害：我看见她的肚皮都露出来了。她的裙子一个劲儿地朝下垮，都掉到了大腿上，可衬衣却越提越高。我惊呆了，朝站在旁边的一个巡警吼道：

——喂，老兄，别在那儿看着：快把她送回家或者带到警察局去。

巡警向四等文官（库斯科夫）行了个礼，回答说：

——绝对不行，先生。不行。她自己能走路，所以我不能把她带走，我们有命令，只许带走躺在地上的酒鬼。

库斯科夫退休以前从未离开过彼得堡，这件事是发生在首都。

去年我跟老伴去了一趟罗曼诺夫家——他们住在泽廖宁街心花园。途经好像是在西特内市场（彼得堡区）附近的一个小广场时，正是中午一点钟，春光明媚，气朗天清——突然，我惊叫一声，转过脸去。

与此同时，老伴也朝那边瞟了一眼。

——多年轻啊，也就十八岁的样子。

一群人在围观，漫不经心，不像是故意凑热闹。都是些小伙子和妇女。

就在众人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位“十八岁”的姑娘撩起裙子，露出光光的大腿，向大家展示“不应该暴露的部位”。

这就是首都。

（从面部表情来看，很难说这是一个妓女）

※ ※ ※

总想在什么地方钓到鱼：在一片浑水中钓一条死要面子的小

鱼。

无奈总是失败，不是鱼线不好，就是鱼钩太钝。

好在不泄气。这不，又把鱼线抛出去了。

（报纸上的渔夫G）

※ ※ ※

风格是事物的灵魂。

※ ※ ※

对他们吹啊，吹啊，吹得露骨……

对他们捧啊，捧啊，捧得肉麻……

（波古查尔斯基和格林斯基身边的革命家们）

※ ※ ※

你们这些十足的傻瓜啊，我的文章没有一个字是用水甚至油写成的，——它们是用人的精液写成的：你们还嫌价钱太贵吗？

（在马车上）（第一声自然而然的呐喊，但一度丢失，后来才在《落叶》的主题中找回）

※ ※ ※

孩子的妈妈容忍不了果戈理。她简短而坚决地说：

——我讨厌他。

作为一个教徒，谈起神职人员时，她也说：

——我讨厌神父。

——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您为什么要“讨厌神父”呢？

她不慌不忙地说：

——每次坐完车，下车付车钱时，他们总是撩起长袍，转过身去，取出钱包。看他们“撩起长袍”的动作，就像有人要抢他们的钱似的，——真恶心。而且，“五戈比”的车钱他们总是给“叶卡捷琳娜时期”的旧币，上面画一只很特别的鹰，折算成三戈比也不见得有人要。

——那讨厌果戈理是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可当我想给她读一段她表妹萨莎·日丹诺娃爱得发疯的果戈理的作品时，她客气地等我读完，然后说：

——最好读点别的。

我很惊讶。对我的提议，她是那么客气，却又那么无动于衷。

“——怎么了?！果戈理怎么了?！”——我不明白。

她时常莞尔一笑，这笑在她快活的时候，会变得很含蓄，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她的心境是开朗和善的（那时），见不到忧郁的影子（也是那时）。她不分析别人，似乎，她不允许自己分析别人。“我还年轻”（二十六或二十八岁）。她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从不偏心。实际上，她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好像她“既是这个世界的，又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中间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往前看——没什么，往周围看——没什么，往后看——第一次出嫁的罗曼史，持续了四年的幸福。

她是眼看着丈夫慢慢死去的，死因不明。他的双眼逐渐失明，接着，又经过一段短暂而严重的精神失常，最后终于离开了她。“有人给我做好了丧服，但我没穿，我跟平时一样，穿着花

裙子，送他”（去墓地；当时她已没有力气换衣服）。

这件跟在棺材后面的花裙子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她为什么不喜欢果戈理？容忍不了？”

她对谁都笑脸相迎，只对一个人不打招呼，这就是叶夫兰比娅·伊万诺芙娜·索－娃，一位宗教老师和教堂神父的妻子。

——为什么？

——她等着我主动打招呼，我装作没看见她。

除了这些她避而远之的傲慢的人以外，她对谁都“好”。她非常喜欢几位漂亮的亲戚：玛利娅·巴甫洛夫娜·格拉高列娃，丽莎·布加吉娜（已故），她童年的朋友，还有叔叔德米特里·阿德里亚诺维奇。

她对其余的人态度平静，或许，略带冷淡。对母亲很孝敬，很顺从，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特别的感情是后来，嫁给我之后才产生的。

究竟为什么她不喜欢果戈理？当你读给她听，她显然是“听而不闻”。“为什么？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不喜欢”。

——怎么能“不喜欢”呢？要知道，这可是真实的，比如，乞乞科夫。

——“乞乞科夫”又怎么样？

——是个下流坯。很卑鄙。

——那又如何，下……

她没把“下流坯”三个字说完。

——瞧，果戈理在挖苦他！

——这又何必？

——怎能说“何必”呢？世上确实有这种人！

——即便“有”，你也不认识。我若是碰到了，我会说：“下

流坯!”可我现在是跟您讲话，我们是在这里，读书，讨论问题，我又何必说人家是“下流坯”呢。“下流坯”这个字眼儿我怎么也想不到，因为我看不见我周围有“下流坯”，我看到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甚至还是讨人喜欢的人。坏印象——没有。

我将我的简短的，还不够充分的话语展开。她坚决拒绝阅读“下流坯”。这究竟为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她自己也不明白，或者最好说，她并不觉得“气愤”。

在她身上，见不到气愤。坏印象——没有。

与其说她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未来，勿宁说她生活在过去。她的生活，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笼罩着一层伤感的，灰朦朦的薄雾。

有一次，她差点说出口：

——我恨果戈理是因为他嘲笑人。

也就是说，他有嘲笑人的本性。

她说她不跟叶夫兰比娅·伊万诺芙娜打招呼，但仅此而已，并不添枝加叶，指责对方，更不说长道短，冷嘲热讽，恶语中伤。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她对人“评头论足”。尽管有过疏远别人的时候，有过两次“分道扬镳”的时候，但从来不说什么（跟汉布格尔一家)。

这时（1889和1890年)，我明白了，果戈理的嘲笑与她的灵魂的音色水火不相容。她的音色是悦耳的，纯净的，里面没有半点污秽和尖叫。视觉的垃圾，抗议的嚎叫——她不能容忍。

我把这一点写进了对果戈理的评价（《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我同意她的观点：嘲笑，笼统地说，不是什么体面的东西；嘲笑，是人类灵魂的低级范畴。嘲笑——来自“卡利班”，而不是来自“亚利埃尔”(莎士比亚《大雷雨》)。

妻子不明白这些，我也没跟她说。

后来，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她也是很不喜欢，——甚至到了谈“梅氏”色变，“很难坐在同一个房间”的程度。即便这时，她也不曾指责他们，讽刺他们，奚落他们。这种做法，和她的天性背道而驰。再后来，当我跟梅氏夫妇分手并开始对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进行恶毒攻击，口诛笔伐时，我本想，她会同情我的，或者至少，她会觉得“没什么”。谁知，由于我的嘲笑过于“尖酸刻薄”，我的那些文章，她连看也没看，或许，她压根儿就不感兴趣（最多只浏览到一半），只是说：

——别以为你会激怒他们。他们，可能正在嘲笑你呢。他们不承认你，你就生气，变得歇斯底里。你这是害自己，而他们——丝毫无损。

我终于没能用自己的“讽刺”把妻子吸引过来。于是我想，“讽刺”来自地狱，当我们还没有下地狱，还活在人间，亦即还活在中间层次，讽刺跟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智慧不相匹配。

但愿这能成为“妻子的训诫”。

※ ※ ※

“……是她的——也就是我的。”

“是他的——也就是我的。”姑娘心想。

罪恶的诱因和严酷的事实就建立在这上面。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为之奈何？“每个人都要征服属于他的乐土”。

（写在文稿的背面）

※ ※ ※

爱就是将自己完完全全地奉献给别人。
“我”已经不存在，“一切都是你的”。
爱是奇迹。道德奇迹。

※ ※ ※

离异是婚姻的调节器，是婚姻的灵与肉的调节器。要想破坏婚姻，却又不想声张，不想搞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只须破坏离异就够了。

“关于离异的学说（还有法律）”不光是关于离异的学说，这几乎同时也是关于婚姻本身的学说。里面已经包含了一切：智慧，意志。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这方面的学说中，却是什么也没有，除了愚蠢和滥用。

※ ※ ※

……活像个卑鄙的小偷，我把装着金表链（配 L. Ademars 表，编号 10165）的小盒子藏在口袋里，然后离开布雷商店。孩子们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老伴又疾病缠身，而我竟然不惜花费三百卢布，为自己买快乐。

晚上我没说，而第二天要吃早饭时：“老伴，我给自己买了样新东西。”全家人都很高兴。无论是老伴，还是孩子们。这块 L. Ademars 表是世界上最早的手表。制造于 1878 年前后（从专利证书上标明的该表所获得的博览会奖章推断），如今已经不再生产，而在钟表制造史上，始终无人能超过这位大师。这块表尽管

已经三十多年了，却很少使用（大概一直用作抵押）——所以才给我买来了，实属偶然。

※ ※ ※

一个女人和五个孩子被压死了。

于是我焦急不安地站起来。

很黑。我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只管自己享乐吧，别出声，别管他们（那六个人）。"

我打开灯，发现人间头号权威说的是"享乐"，是"离弃"。

这就是我的胜利和我的历史。我能不欢呼吗：

——我胜利了。

接着我又发现了远处的眠床。发现胜利者在像失败者一样死去，而失败者在像胜利者一样死去。

发现大雪纷飞，大地一片荒凉。

我说：上帝啊，驱除这一切吧。上帝啊，阻止这一切吧。

于是胜利在我心里变得苍白起来。因为——我的心变得苍白了。因为——人死了，就不打仗了。没有征服，没有逃亡。

然而，还是难免一死，尸骨被大雪掩埋。

※ ※ ※

我知道，我描绘的是那个"文学的吸血虫"，它牢牢地吸附在文学身上，把一切都注射到文学身上……

这是宿命。这是命运。

※ ※ ※

在文学方面，我丝毫不感到拘束，因为文学只是我的裤子。至于说还有“文学家”，且文学乃是一种客观存在，——这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 ※ ※

是的，基督说的对，人不应该“从血肉中”诞生，而应该“从精神中”诞生。我个人经历过一次“再生”，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我的诞生——三十五岁时，在叶利察，在现在的妻子身边，在她五十五岁的母亲和七岁的女儿身边。说实在的，“鲁德涅娃－布加吉娜一家”（女儿守寡）才是我的真正“父母”，我的灵魂的父母。

我记得，在一块石头上，我们交换了十字架：她把自己烫金的给了我，我把自己蓝玛瑙的给了她。从此，她戴上了我的蓝十字架，而我戴上了她的金十字架。

于是，她那颗温柔善良，富于同情的心走进了我的心，而我这颗（见到她之前）严酷冷漠，愤世嫉俗的心也开始神秘地走进她的心。

她变得一天比一天“嫉恶如仇”。我则变得一天比一天“宽宏大度”。但我的“宽宏大度”来源于她带给我的幸福，而她的“嫉恶如仇”起因于我带给她的痛苦和烦恼。

——你怎么在女士面前舔嘴唇?

讨厌。的确讨厌：男人这样去“接近女人的手”，其实是一种丑陋的表现。结婚前我从不这样（也许是我没意识到），而结婚以后——都是因为情绪好。

我摆脱不了这个毛病。摆脱不了诸如此类的毛病和争吵。这

使她很痛苦，很气恼。她自尊地说：

——你不理解我的感情。见你像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老是舔嘴唇，作践自己，作践自己的尊严和四十岁，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内心确有一个“小孩子”在作怪（有这样一种本性）……

——见人家像看小孩子一样看你——我心里不是滋味。

就这些。

我觉得，所有的人，无论谁，都是好人。因为我是幸福的。是她的金十字架给了我幸福。

我甚至吻过一位我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的手，当时我并没意识到，她是“何许人”。

※ ※ ※

我急急忙忙穿上皮靴，问娜佳：“是不是晚了？”“还不晚，十点半。”“已经晚了！我的上帝。要知道，九点钟开始。”“不是，十点钟开始。”我用两分钟时间打扮完毕（去教堂），在一张纸上写下“去为亚历山德拉老人灵魂的安息祈祷”几个字，随即又花十戈比叫了辆马车，迅速赶到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教堂。

拥挤。闷热。我问：“来晚了吧？”“不晚。”我掏出十戈比，放在写好字的纸上。“买两根五戈比的蜡烛。”接着便去祷告。

我是第一次为一个死者点燃蜡烛。我是喜欢祷告的，只是远远地，始终保持着距离。如今，我终于看到大理石板上插蜡烛的小孔，并能插上自己的一根蜡烛了。我鞠一躬，然后朝“救世主”走去，准备给他也插上一根，祈求他保佑我生病的妻子。

我在人群中挤着。汗气，闷热。一个女学生在随唱诗班唱“我主慈悲”。心想：“我要给救世主插上蜡烛，他能保佑我妻子。”事后才明白我写的是“为……灵魂的安息祈祷”……怎么是为“灵魂的安息”祈祷呢？这不等于是说，她还在，还活着，

正看着我这个坏人和罪人吗？这一切都是谁教的呢？

——教堂。

"教堂确实应该受到指责，受到羞辱，难怪报纸骂它，公众骂它，说'仪式太拖拉'，那里'有一股皮袄味'，'简直搞不懂诵经员念的是什么'……"

教堂教的，乃是柏拉图斗胆予以推测并用哲学思辨形式予以证明的东西。它直截了当而又令人惊讶地说：

——别再迟疑了！掏出十戈比！"我提取一小部分"，你的心里会好受些。她在那边看着你呢，你会感觉到她的目光。

"十戈比"——看得见，摸得着。就像用十戈比买来的两只面包，就像面包店里的面包——那么亲切，不容置疑，看得见，摸得着。

※ ※ ※

莫非她会相信她持之以恒的祷告具有这样的含义：

——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治病？

——开导开导他们！——指点指点他们。

在慕尼黑，在瑙海姆，始终是这样的情景（在卢加，在西维尔斯卡亚街，已经见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我在写文章。整个身心处于亢奋状态。文思如泉喷涌……我回头看身后……一次……两次……三次：

她抬起眼睛，朝我点点头。她正在读那本已经翻破了的赞美诗，读那篇《愿所有的伤心人快乐》。我对她微微一笑：

——读什么呢，亲爱的?!

她埋下头——只管读自己的。

一丝困惑和隐忧袭上心头。"她为何总是读那一首赞美诗呢？"我不安起来。

读罢，她站起来，开始做事。

对我的问题（关于赞美诗），她这样回答：

——它能使我得到安慰。

她从不跪在圣像面前读。她总是坐着读，而且总是坐床，不坐沙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记得她的腿是怎么放的，只记得她不是躺着。她好像是蜷缩着，不停地祈祷啊，祈祷，“愿所有的伤心人快乐”。

在卢加，她自己已经不能读，是我念给她听的。她躺在床上，我蹲在地板上，与此同时，我还必须侧转身子，让她和我都能看得见圣像和圣像前燃烧的油灯。

每逢星期天和节日前夕，这情景是那么美好。一只旧托盘（平时不用）上竖立着一排油灯。灯油饱满。这是在饭厅里，油灯闪烁着荧荧的火光，宛如教堂里祈祷仪式上的蜡烛……

然后，这灯光又被送进不同的房间，送进卧室，孩子们的房间，书房。

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房间（单独的），我们甚至实际上（多年）没有卧室：晚上睡觉时，就从前厅的箱子里取出一张床垫，在我的书房里搭地铺。

（9月24日）

※ ※ ※

革命建立在热情之上，王国建立在克制之上。

革命来源于年轻的“我”。王国来源于对命运的顺从。

他精力旺盛，风流倜傥，从众多的姊妹中娶了中学刚毕业的

小妹作妻子，此时正在大姨姐家作客。大姨姐的丈夫是个老公务员，整天咳嗽，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他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没病的：肝，肾，心脏，骨骼。他刻薄而粗鲁，但对这位年轻的连襟（他知道他是革命者），却极力保持谨慎，并用简单的搪塞与之划清界线：

——不清楚……

——随便吧……

他有意识地避免说得太多。然而，对自己的妻子就不同了，他动不动就破口大骂，粗鲁得让人受不了，完全不顾忌有从事革命活动的客人在场。

她嫁给他时二十九岁，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完成妇女的一切天职”。当时他已四十出头。如今他五十多岁，但已是一个全身是病的废物，说实话，他的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也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系。

他没多久就死了。由于印象中他总是骂人，我便问准备当美术教师的别佳（革命者的小弟弟）。听了我气愤的询问，他莫名其妙：

——不，他不是坏人。骂人？可那是因为全身疼得受不了。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在关心妻子，生怕她会“无依无靠”。尽管他没有干到退休年龄，但他预先提出了退休申请，并出示了医生的证明。还有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都给了她一个人，不让别的亲属插手。不，他是个好人，好丈夫。若说他老，那也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

沃洛加坐过牢，一直是妻子给他送饭。她很丑，还有几分男人相。他却漂亮得出奇，高个，匀称，细皮嫩肉，嗓音如少年。她自己没有钱，却不知从哪里筹集到了一千卢布，给他交了保释金，总算把他保了出来。

我是在他出狱后见到他们的。她对丈夫一往情深，而他的漂亮和她的丑陋反差如此之大，以致她无法跟他在同一个房间里呆上哪怕几分钟。我从没见过他们俩在一起——彼此交谈。

她只是从某个地方看着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听他的声音。但好像是害羞，始终避免呆在"这里"。

他和蔼可亲，对她如此，对别人也一样。总的说来，他是个很温和，很亲切，很善良，很文雅的人。

他是个出色的人。从小就出色。是恩爱夫妻的爱子。

我是从他那儿听到这一惊人观点的：

——大学当然属于大学生，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他们有权制定学校的章程，有权处理学校的事务。

这是针对我不满大学生造反，胡作非为之类说的。

他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后，被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开除，就因为他和其他同学在扎哈林走进教室时跺脚。扎哈林是贵族，只为有钱人治病，而沃洛加是穷人和民主主义者，希望扎哈林能为穷人治病。

因此，他（以跺脚的方式）要求领导赶走扎哈林，可领导宁愿赶走几个大学生，也不愿意赶走为整个俄罗斯治病的扎哈林。

他先是转入"非法组织"，后来又侨居国外。再后来便是坐牢，直到妻子把他保释出来。

他不久便逃跑了。但早在他逃跑之前，悲剧就发生了。

每次去拜访他的妻子，我听到的答话总是："沃洛加走了。"同时，从隔壁的小屋里会钻出来一个穿棉短裙和棉上衣的女革命者，肮脏不堪，简直惨不忍睹。

（写累了）（沃洛加抛弃了自己的妻子，跟
一个犹太女人好上了；我想，这个犹太女
人肯定跟他同床异梦，他肯定为此大为苦

恼。他的妻子去了里加附近的海边，日夜倾听波涛的吼叫——她是秋天去的，只带了一张他的照片。试比较：革命者们是为自己活着，而咳嗽不止的老公务员们是为妻子活着，他们约束自己，克制自己，不是像沃洛加那样摧折爱情的花朵，而是关心和爱护与他们共患难的人。）

※ ※ ※

一年过去了《隐居》中的很多内容我已觉得陌生：而我清楚地记得，我没有发表一个字“不真实的东西”（有背内心状态的东西）。我“好像是在飞”……

如今，这些内容恰似鸟儿飞过留下的“羽毛”。孤独地散落在原野上。空洞无物。没人需要。

不是“我们像换手套一样换思想”，而是我们的思想像手套一样戴在我们手上。过于肥大。套不住手。套不住心灵。

于是我们不是丢掉，而只不过是停止戴它。

我们停止思想，年复一年的衰老之思想。

※ ※ ※

浆果好，但烟卷更好。他吸卷烟，此时灶台上放着褐色的烟叶——干的（太阳晒过），就是说，现在就可以抽。

我和谢辽沙没有马上动手拿烟叶，而是用手一指，像老鹰见到小鸡一样，站了几分钟，才嗷嗷叫道：

——金币。

——威尼斯金币。

这是《塔拉斯·布尔巴》中对硬币的叫法（当然不能叫“卢布”，因为不吸引人，不浪漫）：可一旦找到一至二片这样的烟叶，我们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到栗子树下，把烟叶搓碎，用一张纸均匀地卷起来，做成一支标准的卷烟，然后你一口，我一口地吸起来——绝对不许一个人连续吸两口。

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沿着血管流淌。眼泪都呛出来了（吸得太深）。

吸烟的感觉真是美妙无比——胜过吃水果，吃糖。女人的滋味我们还未尝过。大概跟这些麻醉品差不多吧。不然，为何在七至八岁时，我们需要烟卷会超过面包呢？

※ ※ ※

没有两性的爱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像平常任由自己的天性对待异性那样，和颜悦色，温柔体贴地对待我们的同性呢？没有两性的爱就没有关系的深入，而没有同性的爱关系就不会完整。宇宙归功于大千世界的爱。但温柔的爱抚显然应该无所不至。这样，人类的确惊人的适应能力才会在事物的本性中得到解释。个体的肌体与人类的肌体保持着惊人的和谐。

（关于人类的有组织性和宇宙和谐问题）

※ ※ ※

有些谈论我的文章读来是令人愉快的——当然，我对那些对我予以细致分析的人是无限感激的（不管他们怎么看），如格里夫卓夫，扎克热夫斯基（基辅的），沃尔斯基。不过有一点令人极不舒服：他们竟然没有一语中的。忽而把我当成拜伦“捧上

天”。忽而说我是阴险的“撒旦”，恨不得一把火烧死。全然不是如此：我不过是个心地极为善良的小人物。我从盥洗室赶出去多少只黑色的蟑螂啊，为了不让别人偶然打开水龙头时把它们淹死。楚科夫斯基是唯一看破（准确地说是善于命名）我的“构造”，我的肌体，我的血液，我的气质的人。他的某些定义是惊人的。题旨呢？——题旨人人看得见，而且就实质而言，实在是活见鬼。“题旨是各式各样的。”这次我可以厚着脸皮说。但他没有看破我的隐秘的一面。这是我的痛苦，一种抽象的，没有理由的，几乎是持续不断的痛苦。我觉得，这是我最惊人的一面，至少是无法解释的一面。我觉得，我是带着痛苦降生的，我记得痛苦的第一次发作是在上中学前很久，七至八岁的时候：我躺在一些坐在床上唱“校园歌曲”的中专生的背后。我躺在那里，可以说是毫无印象，也可以说是“心情愉快”。突然我听到：

在炎热的刚比亚上空，
在塞内加尔河流淌的地方……

歌词的大意是：“在这些地方的上空”，飞过一只鹰，它飞向自己贫穷的女友，或者概括地说，是飞向自己思念的所在。不错，这首歌的调子是低沉的，可要知道，就是在从前，我也总能听出几分“低沉”来。一种荒凉感和单调感——大概是离愁别绪——袭上心头。这首歌的音符刚一触到耳鼓，我的整个身躯，我的全部血脉便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我用枕头蒙住脸，极力不发出声音，泪水却止不住夺眶而出。我是那么惆怅，那么苦恼，“一切是那么无聊”，我们的家，唱歌的人，妈妈，关于兄弟们和游戏——我就不说了：我真恨不得能“跟这只鹰在一起”，具体些说——我对这只鹰的思念是那么强烈，以至我要为之哭泣，哭泣，长久地哭泣。显然，我是将“人的灵魂”，“人的命运”同这

只鹰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次发生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特洛茨基死了，他是尼日戈罗德的医生，“皮匠的医生”（专为穷人治病），一个有教养的人，奇怪地成了我的朋友，跟我谈洛克，麦考莱，英国革命等等，还跟我一起借酒浇愁（真正的病）。死了，葬了。他是我嫂子的弟弟。如何葬的他，如何抬走的他，我全忘记了。然而，此时此刻我是站在我的一间由厨房改造成的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这里有死者的姐姐，有我的哥哥，他们都很爱他，尊敬他，为他的死而伤心。每当一人独处，想到自己的孤独，我便抑制不住嚎啕大哭，一哭就是半个多小时，谁也劝不住。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是一种极度可怕和悲观的精神状态，充满痉挛，苦涩和绝望。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的姐姐，都不曾像我这样哭。

这是一种神秘的眼泪——我找不到别的语言；我认为，这个定语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状态已经艰难到了极限，只要再加重一分，我就会活不下去，“身子”就会支撑不住。

这种感觉近乎痛苦。我的痛苦永远与孤独的，病态的，远方的东西有关。准确些说，是与我的孤独有关，与我远离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又处于痛苦中，或者是我处于痛苦中，而它又远离我有关。这里有“冲动”，也有“不可能”，有我自己，也有“不是它，不是它”的一切……

※ ※ ※

没有什么能比小时候不许我“独自”去小酒馆买克瓦斯更伤害我的自尊心。

——你盖不紧瓶塞。克瓦斯会淌出来的。等大人去的时候，

你再跟着去。

我等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焦渴折磨着我。克瓦斯吸引着我。凭什么说我“盖不紧瓶塞”？我肯定能盖紧。

※ ※ ※

弗罗伦斯基的“鞭子”数月来一直抽打着我的心。“教会必须举起鞭子，否则局面就会变得难以收拾。”可它不光要“鞭打”，有时还要“搜自家兄弟的腰包”，就像发生在彼得堡的二百名牧师身上的事。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局面就会变得难以收拾”，不过我敢说，教会之所以举起“鞭子”绝不是因为要保持“良好局面”，而是因为愚蠢，如果不是比这更坏的话……

这位教会的热心人或许真的能成为改革家。因为二十年后他会搞清楚的，教会之所以举“鞭子”，并不总是“为了维持良好局面”，有时纯粹是“为了钱袋”，“为了肚皮”，纯粹是因为“我们谁都不喜欢”。

（主张捍卫教规，维护教会威严的弗罗伦斯基；离婚，对离婚者的惩罚和非婚生子女）

※ ※ ※

我所有的缺点都是潮湿的。没有一个是干燥的。

无论是虚荣心，无论是权力欲，无论是妒忌，都不能焚烧我的灵魂。

既然我对付不了自己的潮湿，我又怎么能去评判那些对付不了自己的干燥的人呢（而我却在评判他们）。

※ ※ ※

书应该价钱昂贵。书不是烟草，不是伏特加，不是街头拉客的妓女。

书跟你推心置腹。书使你从中受益。书给你讲述今昔。

书应该价钱昂贵。

书不应该低三下四。书应该玉洁冰清。

书不追随任何人，不委身于任何人。书平放在那里，甚至“并不期待买主”，只是平放在那里。

书要找，书须淘；一旦得到，就要爱惜之，珍藏之。

书不能“外借”。书一经“外借”，便堕落为“荡妇”。书一经“外借”，便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质朴，自己的纯洁。

“阅览室”和“公共图书馆”（除了供全国使用的帝国图书馆），就实质而言，乃是“公共场所”，荒淫无度的城市，藏污纳垢的妓院。

※ ※ ※

我真恨不得咬掉所有伟人的头。在我心目中，我们家的侍女娜嘉比拿破仑更高大。她是那么温顺，可爱，脸上不时地绽露出微笑。

绝对没人对拿破仑感兴趣。只有傻瓜（集市，人群）才对拿破仑津津乐道。

（写在邮件收据上）

她坐在我们家喝茶。虽然患了癌症，依然妩媚动人。她妹妹对她说，好像三十年前我曾钟情于她；那时我们彼此还不认识，

如今这不，跟她妹妹一起来了，让“曾经恋过我的人”看一看。

但这是个错误。只不过是在穿越卡马罗夫街（布梁斯克）的时候，我路过科-基家的小屋，看见“他们一家人都在喝茶”。那时她很瘦，很温和，即使算不上漂亮，那也是接近漂亮。她那么谦虚，以致我大概“几乎爱上了她”。她妹妹当时在念中学。她刚刚出嫁不久，还没有孩子。他是军人，在军火库服役。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的将军。

她笑吟吟地坐着。她的两只乳房已经完全切除。两腋之间“一无所有”，几乎只剩下骨头。妹妹是外科医生，手术是她做的，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多次，每次“切除”一部分。

在她脸上，我看不出丝毫不幸的神情。“我希望能再活六年，把小儿子（十二岁）抚养成人”。她的妹妹，我们家的朋友（那时）转述她的话。

就是现在，她也是出众的。四十岁了。白净的脸，很耐看。同时，她身上还有一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优雅”，一种女性的魅力。

（1912 年 10 月 3~4 日《新时代》上的讣告）

永久的纪念。哪怕相逢短暂——还是要永久地纪念她。

（1913 年）

※ ※ ※

有时我觉得，我将瓦解整个文学。

并不是因为我强大。但“上帝与我同在”。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临行前打包裹时）

※ ※ ※

左派“印刷工”没有料想到，他们竟有机会骂娘——作为醉鬼，或者演说——作为大会上的奸细。

（俄罗斯自由的含义）

※ ※ ※

解释老年人的特殊的嫉妒。

Je ne puis pas tout a fait。（法语：我完全不能。）

于是只剩下叹息，星星，凋谢的花朵和……

一个穷人拿着一枝玫瑰花闻着：

这情景活像二十年前人们画的一个肥胖的圣方济派老修士，他也是把玫瑰花拿到鼻子下面闻：

——蛆！

真是“人吃了癞蛤蟆”，于是气急败坏，恨不得宰了往玫瑰花里放癞蛤蟆的人。

你不由自主地开始怀疑，注意，锁门。“以醋代酒终究危险”。让人发疯。

穷人很苦恼。

但这里需做一点修正。二十年前我听过一个奇怪的故事，说是一个中年人或是一个稍微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向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求婚，针对双方年龄上的差距，他是这样说的：

——您可以随便跟谁生活，只要嫁给我。我想做您的丈夫，想在您的身边，我决不会为难您，也不会勉强您。

我没注意这个故事，当时赶巧是在一个犹太女人（格鲁吉亚人齐南格兹瓦罗夫的妻子）的葬礼上，我因为太累，加之下雨，泥泞，便和一位来“送葬”的年轻女士一起叫了一辆轻便马车。对于我的询问，她说：

——我在读牙医学校。——不，我结婚了。——我将自己养活自己。——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兹拉托乌斯特，嫁给了一个军官……年轻……原来是个酒鬼。但我不是因为这个离开他的，而是因为他竟然对我说，“你怎么总是问我要生活费，我要把你丢给那些有钱的同学，这样你就可以永远不愁缺钱花了。”我受不了，就离开了他。

于是我明白了，“求婚”是以自由为条件的。可求婚时说的却是——“做我的妻子吧，守在我的身旁。”

当然，后面这位可怜虫要是知道妻子已经变心，肯定会捶胸顿足，“一个劲儿地揪自己的头发”。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给不给钱”。钱不过是一个借口，一个理由和“引言”。“一切都似乎跟大家一样”。但个人的细流在此却有助于理解家庭的最古老形式——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制主要不是建立在女人的本能上，而是建立在男人对“蛆”和“癞蛤蟆”的奇怪兴趣上。

一天晚上，我坐马车去编辑部，我对车夫说：听说乡下的姑娘和女人很容易跟人睡觉，只要三个卢布就够了（苏沃林告诉我的，他年轻时候的事）。车夫回答（讲他们村子，在诺夫哥罗德省）：

——别说姑娘了。结了婚的还不是一样。在我们村里，只要给三个卢布，随便找谁都成。就是找我老婆也成。

我甚至吓了一跳。竟然这么简单。他是个美男子，留着一撮小胡子，清瘦，年轻，大约二十七岁。

一点都不在乎。没有痛苦，没有羞耻。也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嫉妒。

顺便说说给弗罗伦斯基，给神职人员和教会法教授们提出的原则问题：是否应该解除婚约，也就是说，遇到“蹩脚的女牙医”这种情况时，或遇到丈夫要求妻子卖身，而妻子厌恶这种态度，厌恶这种家庭，希望找一个更好的家庭，因而要求教会解除她失败的婚姻并允许她再婚时，教会是否应该予以支持？

存不存在这种“通奸”？目前——不存在。也就是说，神学界——这件“自己的事情”的唯一裁判者所“诠释”的教会认为，此类婚姻还没到非解除不可的时候。“没有证人”，“丈夫没有起诉”，“丈夫没有不忠”。妻子不可能说：“丈夫背叛了我。”况且丈夫也没背叛她。而她呢？她也可以说她没背叛他。有什么理由离婚呢，哪怕是形式上的？于是教会要保护并下令保护这种恐怖的婚姻，视丈夫或妻子的偶然“通奸”，因控制不住感情而发生的“通奸”如同无辜的儿戏。

神学界的先生们啊，究竟是谁导致了家庭的破裂，是你们呢，还是像你们一贯懒洋洋地抱怨的那样，是“不听话的妻子”？依我看，从事实看，是你们。是谁在亵渎婚姻的神圣？是你们肮脏的目光，是你们玷污婚姻的法律。生“蛆”的，长“癞蛤蟆”的法律。

是的：冲你们对待家庭和对待有家庭的人的态度，人们肯定会乐意让你们尝尝“蛆”和“癞蛤蟆”的味道。

关于同车夫的谈话：

托尔斯泰（嫉妒心极强，而且鼓励嫉妒）天才地发现，农民的这种无动于衷乃是一妻多夫制的开端：

——傻瓜。我该拿走他的皮靴。

情夫从妻子身边溜掉了。丈夫直后悔，不该“打草惊蛇”，应该先拿走他的皮靴，这样他就跑不掉了。

丈夫是在离开不一会儿以后回来的。发现妻子在偷情，揍了她一顿，没有跟她睡在一起，而是爬到了火墙上。妻子半夜三更爬起来，走到他跟前。他还在生气，不想理睬她。可她对他说的话是那么温柔，动听。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一段真是令人叫绝。他抱起她。他什么都忘了，她也什么都忘了。这就是古代和现在的“一妻多夫制”。

（托尔斯泰《遗作集》中的一个短篇小说，
篇名我忘了）

※ ※ ※

反复翻阅科学院版的莱蒙托夫文集。想找到《萨什卡》的注释。没找到（真是个乱七八糟的版本）。“可能在第一卷里吧?”找第一卷，可只见书脊上写着：第四卷，第二卷，第五卷，第三卷。“第一卷哪儿去了？莫不是丢了?”我不安地寻找。只见到四本书。“丢了。”我越发不安起来。我发现，我在印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的“封套”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和“第五集”。我在认认真真地写上分卷的编号（能买到这套书使我很兴奋）时，怎么竟然没有发现我写错了呢？也就是说，我仔细检查过，但没有看出来。这是梦游症，是梦。于是，我对老伴的病怀有的负疚感——它折磨了我整整一个夏天——终于第一次释然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生来如此。”“天生有缺陷。”可怜的老伴就是这个命，她没找个浮士德，而是找了个八等文官。这毕竟是罪过和不幸，但——命中注定。

多少次，我手里拿着一张纸，坐在海边上，坐在高山上，计算债券上的利息。不知是一万六呢，还是一万八，反正是不够抚养孩子。我反复权衡，想卖掉一种，再买进一些。这是岁末，她

特别悲观，忧愁和烦躁的时候。我十分苦恼。我为何只是闲坐？假如我能体谅一下她的心境，假如我能替她分担一些忧愁，我就会去找出路，想办法，就会用心去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坏东西斗争，就会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最后及时找到和请来卡尔平斯基。她得的病就会治好。

至于我整天忙于搞钱，忙于古币，忙于写作，置老伴的健康于不顾，这正是我要写《隐居》的原因。一生的错误。

走完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的啼叫是那么疲惫无力。

※ ※ ※

不，我感觉到，我预见到——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在那里也别想有立足之地。诺沃肖洛夫可谓著作等身，但对我的那些令人苦恼的问题，他竟然只字未提（这样概括并不夸张）。难道他们（说来令人汗颜，痛心）需要的是我的文字，而非我的灵魂——最后一个乞丐的灵魂，而非一个作家的灵魂（让作家见鬼去吧）？莫非他，科热夫尼科夫，谢尔波夫真的不需要灵魂？弗罗伦斯基一声不吭，我感觉到了，他一声不吭。“不好意思。”“何必制造分歧，破坏好伙伴们的团结呢？”关于自己的妻子，某某只说了句：“愿她进入天国，她在那里会好过些。”而对自己的老爷子，他可谓关心备至，不光希望他“在那里好过些”，还希望他“在这里也过得好”。但基督教的——向来是“在那里会好过些”，而教士的法冠之类却“留给了我们”，要我们“在这里把它戴坏”，或者说是“在这里炫耀一番”。这最终将成为怎样的恐怖啊，而我就生活在这恐怖之中，这简直比世界末日还可怕。因为这是朋友，亲人，见到的最好的人，如果说他们那里“没有温暖”，那么究竟什么地方有温暖呢？所以我来了，来找他们——

他们这里看来有“温暖”，然而，这个特殊的地方也有寒冷。偏偏我的命运特别，促使我去寻觅，敲门，敲门，寻觅——寻觅这个地方特有的温暖。弗罗伦斯基为何主张“鞭打”某某，而对我的问题却“一声不吭”？这是个怎样的决定？

莫非不只是命运，就连上帝也在对我说：“出来吧，出来吧，这里同样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何处有我的“立足之地”？难道偌大的世界上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是的，我承认我有弱点，有缺点，但我觉得，我没有丝毫的害人之心，我不过是一个最最普通的人，平凡的人，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死无“立足之地”，生无“立足之地”：不，主要是——这一切竟然没有丝毫的斗争愿望。

※　※　※

——孩子哭了。你就起来嘛。就在你旁边，再说你也没睡。

——既然他要哭，我又有什么办法？就是抱在手上他还是要哭。得了，抱就抱吧。

（家庭何以会破裂；第一个娜佳）

她跟那个女人一样有文化（我没看出来，是那个女人偶然告诉我的）：

——请了奶妈（自己没有奶——说是因为那个，但我们和医生都不明白）以后，钱都花在了本应该由我做的事情上，没办法，只好辞退佣人，自己烧火做饭。

（家庭何以会巩固；孩子的妈妈）

（9月15日）

※ ※ ※

别赫捷列夫啊，别赫捷列夫，我所有的眼泪都是您一手造成的……

假如没有您在 1896 年（或是 1897 年）开的“处方”，我肯定还能过上十年幸福的日子，肯定能为五个孩子每年留下三千六百卢布——每月三百卢布，这已经够用——肯定能出版一本精美的希腊古币专集，一本图文并茂的古埃及画册，一部《狮子与羊羔》（手稿），还肯定会自己出版文集。

（10 月初）

※ ※ ※

我想到深山老林中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死在那里。祷告一番，然后死去。什么也不说，什么人都不告诉。

想听到什么吗？啊，太想了。但要跟我生前一样——“欲言又止”，“含糊其辞”。至于那些外人，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他们根本不受欢迎。

说来说去，其实我是什么也不想听到。

（深夜）

※ ※ ※

心寒。你知道什么叫心寒吗？

（忧愁中）

※ ※ ※

五十七岁时上帝赐给我茨维特科夫的友谊。

（忧愁中）（1912 年 10 月）

我多么爱他。多么尊敬他。

※ ※ ※

要是别赫捷列夫能看到我的躺在床上的老伴，看到她用右手握着有病的左手……

可他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丈夫。

他们没有心。怎能见死不救呢，既然科学告诉他还有救，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 ※ ※

我知道，这是物理学：左手比右手冷，所以她要不断地暖和它。可她双手贴到胸前的样子——拳头握着拳头的样子——饱含着怎样的要求，恳求，甚至绝望啊。

日复一日，她始终是这个样子。转过头去，走到桌前坐下，在屋子里走一圈；再返回原处：总能看到她握紧的拳头，握紧的拳头。每时每刻，每日每天。

（1912 年冬）

※ ※ ※

我们生下来赤身裸体，我们入土时还是赤身裸体。

我们的衣服是何物？

是官阶，门第，地位？

给我们散步用的。

天气晴朗，大家倾巢出动，来到涅瓦大街。可我们全都有“回家”的时候。这“回家”便是——入土。

（10月）

※ ※ ※

怎能不吻教堂的手呢，既然它把祷告的方法也教给了目不识丁者：一个老太婆点燃蜡烛，说：“我主慈悲”（在教堂里听来的，算是“无师自通”），接着——一躬到地。

“祷告一番”之后，孤独的老人得到了安慰。心中豁然开朗。

这是谁想出来的？毕达哥拉斯“发明”不了，牛顿“算”不出来。

这是教堂的作为，教堂的悟性，教堂的本领。

教堂教会了所有的人祷告。教堂的诵祷，是对基督的诵祷——“我主万福”。

※ ※ ※

……是的，骗子手——

以一种神秘的力击打每个人的心。

我们的文学史真有意思。

(格尔申逊论奥加辽娃；这个老太婆已被
抢劫一空)

※ ※ ※

1904～1905年，我想写一些《自由之歌》之类的东西……写了八行，再怎么也写不下去，我感到，我的文字华而不实……而现在……

…………

……真希望能像一头被刺的母牛，狂奔不已，横冲直撞，大声吼叫，吼叫，为自己吼叫，而不是为“政府不好”吼叫（驴的永久练习）。

（10月）

※ ※ ※

——您的文章太不像话。

——不错。但却用心良苦。

※ ※ ※

“基督教既不赞成性，也不反对性，而是把人完全转移到另一个层次。”

（弗罗伦斯基）

——主人既不反对修房子，也不赞成修房子；而是研究文献学。

我觉得，房子会倒塌。虽然“文献学”跟持家并不矛盾，但会吃掉它。

婚姻问题关乎每个家庭，你我的家庭。婚姻问题困扰着每个人，无法回避。“我并不禁止别人思考这个问题，只是我要去图书馆研究手稿。”——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0月8日）

※ ※ ※

皮萨列夫“没读过”普希金，这难道是普希金的错？毕希纳和摩莱肖特“不理解教会”，这难道是教会的错？我们“夸夸其谈”，这难道是基督教的错？

※ ※ ※

一旦灵魂打起寒战，那是非常可怕的。灵魂会冻死。

※ ※ ※

——瓦夏，你走吧，我要呻吟一会儿。

——呻吟吧，瓦莉雅，我不走……

——我怕影响你。

——瞧你，像个孩子，我要是走了，谁留下来陪你呢？再说，我也想留下来……

（舒拉再次离家出走时，10月23日；出书费用结算）

※ ※ ※

我依然会在彻底的，彻底的困惑中死去。在宗教的困惑中死去。

这主要是弗罗伦斯基的错。都怪他一言不发。

我永远不会同上帝分开。但其余的……

※ ※ ※

人们所期待，所盼望，所关注的彼得堡都主教的品质是——谦虚。

学问固然是优点，圣洁固然是美德，生活功勋和禁欲主义固然令人赞叹：但最重要的是谦虚。

沉默寡言，不声不响，再加上听话。

如果除此以外还具备恰到好处的身高，抑扬顿挫的嗓音和优雅得体的举止，那么，这样的"候选人"无疑会所向无敌，什么费拉雷特呀，兹拉托乌斯特呀，"三位高级僧正"呀——全不在话下。

(10月28日安东尼都主教去世前喝晚茶时所想)

※ ※ ※

半真半假——如今体现在教会的一切事务当中。

你要是说这是不真诚，那你可就错了。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向你显示他的慷慨激昂，他的无限喜悦，他的感动和忠心。

但请不要追问这种慷慨激昂：他会脸红，他会语无伦次，他

会支支吾吾，闪烁其词。

如今这年月，什么都是“一半”，没有一点“全部”。

（安东尼都主教去世前）

※ ※ ※

即便这个地方腐臭生蛆，我也不离开这里。

跟笨蛋在一起。跟滑头在一起。

为什么？

这里的人们谈论的是灵魂不死。是上帝。是永生。是赏罚。

这里是祭坛。真正的，人间绝无仅有的祭坛。

离开这里，我们又能到何处去呢？

（安东尼大主教去世前，10月28日夜）

※ ※ ※

也许，别人没有权利独自死去，但我有权利独自死去。

※ ※ ※

提林格也死了，她住院（危险的出血，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期间，他是福音书医院的院长。

罗歇在慕尼黑，纳乌克在国外的什么地方，如今又没了提林格（他可是个巨人），再早些时候，还有因出血而死的林特伦（吩咐做按摩，不拆除石膏），——一共死了三个人。假如涅美吉达……

罪过！罪过！罪过！！！

（10月28日夜）

※ ※ ※

在可能的情况下，请按以下方案出版我的尚未编辑成册的论著：

1）《在教堂的高墙下》，之三，论宗教，宗教管理，神学校。这全是“对神父们的帮助”，部分地是对我们可爱的神学界的帮助。别列多尔斯基称神学界是“上帝的亲戚”——可谓妙极。它确实如此：一千年过去了，它依旧毫不动摇地恪守着上天的理念，真理的理念，法庭的理念……但愿它能为上帝的不幸奴仆“瓦西里和瓦尔瓦拉”祷告一番。乌斯金斯基神父一直在为我们祷告。谢谢他，亲爱的。

2）《论作家和写作》，编成四卷。论文学。加上现成的序言，是从前写的，很有生气。这里还应收进未完成的文章（手稿）——《帕斯卡》，《基督教和语言》，《浮士德》等……

3）《教育的黄昏》——第二版，需做补充，主要是增加续论：《白昼的允诺》——此处收学校处于破坏，混乱和迷茫时期发表的一些文章。可以编成这样：《教育的黄昏》为一卷，《光明的允诺》为一卷。合起来是一个整体。这是献给可爱的中学生的。

4）《俄罗斯的家庭问题》，第三卷。这里只有一篇文章：《在爱情，惊吓和羞涩的世界里》。

这是献给善良的受苦人的。

5）《萌芽》。文章选自书刊，如《工商报》（《作家日记》版），《新时代报》（《短评》版），《公民》等。书的版式要跟《隐居》一样，每段语录都要另起一面。千万不能和《隐居》合在一起出版。《隐居》不需要读者。《萌芽》是写给读者的。

6）《德国印象》。瑙海姆，慕尼黑等。老实说，应该把《意

大利印象》的最后一部分《德国漫游》抽出来，放在这里。甚至《德国印象》（书）可以从这些关于柏林，凯泽和威廉皇帝的文章开始。

7）《高加索印象》。

8）《俄罗斯的尼罗河》（伏尔加河印象）。这里还要收入一组总题为《以色列》的文章和刊载在1907年194期和200期《俄罗斯言论》报上的《在当代情绪中》（因为这些都是《俄罗斯的尼罗河》，只不过是编辑把标题给改了）。

9）《官僚——俄罗斯国家特写》。发表在《俄罗斯言论》报和《新时代》报上的论官僚制度的系列文章。

10）《艺术论集》，收下列文章：《祈祷的罗斯》（论涅斯捷洛夫》，《青春的宗教究竟在哪里》，《莫斯科的果戈理节》，《彼得堡的西西里人》，《一个观众的断想》，《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果戈理纪念碑何以未能建成》，《演员》，《鲍特金》，《纪念科米萨尔热夫斯卡雅》，《戏剧与青年》，还可以加上《纯真之舞》（论邓肯），《森布里赫》。

11）《文学流放者》。《与列昂季耶夫通信集》（加注释）和《与拉钦斯基通信集》（加注释）。亲爱的斯特拉霍夫写给我的信（加他的照片——面孔清瘦，抄着手，在花园里——手术后在亚斯纳雅波良纳照的），勒齐（伊·费·罗曼诺夫）写给我的信（加我和教女索法的合影），施佩尔克写给我的信和施佩尔克临死时的照片（在哈里拉，与家人合影；请瓦·瓦·马泰刻出来，地址——美术学院；版面大约需要花费二百卢布，不过我想，卖掉之后还是合算的），弗罗伦斯基写给我的信（需要经他同意；地址：谢尔吉圣三修道院内，神学院，巴威尔·亚利山大罗维奇·弗罗伦斯基收），还有谢·亚·茨维特科夫写给我的信。可由弗罗伦斯基或茨维特科夫担任编者。他的地址：莫斯科，奥斯托任卡，牛奶胡同，2号，2室。

12）《生命之树与阉割教派思想》。论性。文章选自《公民》和《新时代》报（要特别注意《性爱与灵魂》一文）。

13）《黑火》。论革命和革命家。文章选自《新时代》，《俄罗斯言论》和《新言论》。

14）《在多神教徒的庭院里》。《文化与乡村》，《古埃及的方尖碑》，《论古埃及的美》，谢拉菲姆大主教的《预言家瓦拉姆》（简历），布特凯维奇的《论对种子的崇拜》——《十九世纪的不信教》（简历），《阿芙洛狄忒与戴安娜》，《论索洛维约夫的一次演讲》，《神话之国》，《东方》（署名欧里翁），《极其伟大的历史时刻》，《一场精彩的晚会》，《一个小小的历史修正》，《一系列误会（?）》，《生活中和历史上的奇迹》，《当代主题》，《希腊化时代》，《莱蒙托夫的〈恶魔〉与古代神话》，《亚特兰吉达——已成过去》，《选自东方主题》（即《星空》——这个题目不是我的，而是《艺术世界》编辑部给拟的），另外再配一幅精美的巴克斯特的画。

15）《狮子与羊羔》。一部未完成的长篇手稿，放在防火柜里。凡是空白的地方，都可以用省略号替代。这不会破坏意义和联系。可请弗罗伦斯基担任编者，如果他没有时间，就请茨维特科夫，如果茨维特科夫没有时间，就等一等。记住，“事业不是狼——不会跑进林”。

※ ※ ※

在宗教哲学大会上碰到费洛索弗夫① 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感到很友好。我们曾互相谩骂（笔战），他们俩还要求《俄罗斯言论报》，要么开除我，要么他们“隐

① 费洛索弗夫，德米特里·符拉基米洛维奇（1872～1940），批评家，政论家。

退”。

当费洛索弗夫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甚至还拍了一下他的“屁股”。纯粹的友谊。就像中学生。

我特别迷恋中学时光。愿意永远做一个中学生。“一本正经的生活——见鬼去吧”。

在报社一起共事时，我总是暗自发笑，总是想：“我们还要学生脾气呢”。

因此，我才不在乎写什么样的文章，“往右”还是“往左”呢。这都是胡说八道，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尼热戈罗德的一位中学生的瞎胡闹”。

（在黑水池塘上滑冰。10月29日）

※ ※ ※

10月30日

……一切实物偏离自己的定义，一切行星偏离“顺行轨道”……

这是什么?!

恐怖啊，恐怖……

也许，这种偏离的意思是，世界想要“系上所有的钮扣”，不让人家看到衣服里边的口袋，不管是记者，还是牛顿。

果真如此，尚可聊以自慰。“好黑呀。我看不见。”但愿双脚长进土里，走路像熊一样笨拙的维伊也这么说。

可万一事与愿违呢?

那又怎样?

我甚至不想说出来。我害怕。

※ ※ ※

我的所有的缺陷，要么归因于头脑好奇，要么归因于“放任自流”，而且，就实质而言，是无缘无故的。但我从来不“讳疾忌医”，也从不“使人昏昏”。

所以，对“世界的缺陷”，我知之甚少。所以，很有可能，我对世界的评判，尚欠深刻。月亮有缺陷时，才能让我领略到我从未见过的“月亮的另一面”。

※ ※ ※

《死魂灵》的提纲——其实是个笑话，一如《钦差大臣》的提纲——也是个笑话。一个贵族老爷想要收购死去了的纳税人口，并以此作抵押；另一个贵族老爷加赌徒在一个城市里被当作钦差大臣。果戈理的所有剧本，《结婚》，《赌徒》，以及中篇小说，《外套》——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彼得堡笑话。它们自身并不表明什么，也不揭示什么。

这种构思的简单和肤浅令人震惊。果戈理没有能力将提纲复杂化，感觉得出，他不善于在事件进程和激情发展中把握中长篇小说。这一点，从他的初稿中也能看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一种奇怪的内心的肤浅。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果戈理本人也不曾发展。他的灵魂没有改造过，他的信念没有改变过。从小俄罗斯故事过渡到彼得堡笑话，他只是把眼光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但这眼光还是依然如故。

※ ※ ※

佩尔卓夫① 的缺点在于个性不够鲜明，甚至不够明确。

上帝创造他时，好像陷入了沉思，手里的刻刀停了下来，于是他的整个脸变得暗淡无光。眼睛没有从大理石中“显露”出来，且嘴唇永远不会发出叫喊。上帝给了他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还有语言的精确中肯（从信上来看）。他的高尚和无私尤其讨人喜欢。然而，所有这些品质遮盖着一层迷雾——似是而非的行为，含糊不清的言语，一种“生存的嗫嚅”，而非生存的宣讲。

可他是个“诚实的骑士”，我们低贱的新闻界的诚实的老骑士（用模子铸造出来的）。

勒齐跟他恰成反照。上帝在加工好勒齐之后，由于厌恶而啐了一口唾沫，转身走开了。于是从那时起，勒齐便一直在后面追赶上帝，思念上帝，向上帝发出世界上最好的祷告（在自身中，在灵魂里）。

可惜，这些没有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笔只谈论吃的，谈论罗西尼，有时，也谈论一下教会的神父们。如今，穷困潦倒的他，已经没什么声音了。

※ ※ ※

何为文学的灵魂？

哈姆雷特。

寒冷和空虚。

（准备睡觉时）

---

① 佩尔卓夫，彼得·彼得罗维奇（1868～1947），政论家，批评家，编选过洛扎诺夫四卷集。

※ ※ ※

假如没有先见之明的恐怖，我就不会这么害怕，不会这么伤心。可我好像是生活在“天命”之中：因为，有一段时光，相当长一段时光，她总觉得，整个未来充满了令人惶恐的预兆。

我们坐在基斯洛沃茨基剧院里。演出的是《聪明误》。既不好，也不坏。一次幕间休息时，我琢磨着，有否可能给《新时代》搞一篇值七十个卢布的文章（两张剧票六卢布，正赶上手头拮据）。

——你看，瓦夏。

我抬起头，看着放下的帷幕，上面画着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女河神。

——不是那儿，上面。

帷幕是从拱门里边放下来的，拱门上画的是……大概是……古希腊的面具。

——看那儿，角落里……多可怕呀……我死的时候，脸会跟这一样。

这是一张“悲剧面具”，是一张因恐怖和绝望而抽搐变形的脸。

我突然感到浑身冰凉。我也不知道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句什么。她的声音是那么“震撼人心”，她的语气是那么肯定，以致我不寒而栗，以致我过了好久，仍然会从梦中惊醒。

有几次，我劝她到疗养院休养一下——（指望这能救她，指望那儿的医生能够确诊），她吓得浑身发抖，死活不肯。她就像一只躲在角落里的小鸟，害怕离开这个角落。

她老是猜疑，老是害怕。——“你们想丢下我”（她尽说傻话，不加考虑）。“你们不想要我了”……

我不再说话。

“——多么可怕啊……那时我以为，要把我送进疯人院呢。以为帷幕降下了呢。”

她浑身冰凉。我浑身冰凉。恐惧的中心就在“降下的帷幕”里。

而她心中的帷幕也在徐徐降下。她就像一颗原子，粉碎了，脱离了这个世界。

我的苦命人啊。她又在说：“我又梦见了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这么清楚。他问我：‘你就要到我这儿来了，瓦伦契克，是吗？我等着你。’”

这是她第一个丈夫。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我们的爱情本身就是开始于一曲神奇的哀歌，在这曲哀歌里，她讲述了她第一个丈夫不明不白的早逝。她二十一岁便开始守寡，跟两岁的女儿萨尼奇卡和母亲一起生活。

※ ※ ※

上帝赐给了我语言才能，却没赐给我任何其他的东西。正因如此我才这么不幸。

※ ※ ※

对青年时期来说，唯有贫穷才算得上体面。

但不要有虚伪的“漏洞”。

贫穷是纯肉体的。

※ ※ ※

我的灵魂是一根扯开的线。它甚至不是亚麻的，而是纸的。它在逐渐开裂，用它捆不住任何东西。

（夜间乘马车时）

※ ※ ※

我来自一片荒凉，所以，应该这样定义我："荒原来客"。

怎样的孤癖啊。

敌视所有的人。

就连邻居都不认识我们，一如我们也不认识邻居。也许只有街角的裁缝例外（他的小屋就在旁边）。所有的人都怕见我们，我们怕见所有的人。

我们都吵过架。美丽的维罗奇卡[①] 死得早（当时我才七至八岁），她一死，家里开始变得冷冰冰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我从不记得有谁关心过我，也不记得我关心过别人。我们是在"东游西荡"，而不是在生活，我们从未想到过应该干点什么。"应该"一词在我们的词典里找不到。在十四岁以前，我从未听见过这个词，即便是听到——"你应该温习功课"，我还是对这个"应该"听而不闻（就是现在我也讨厌"应该"）。全都根据"如何偷懒"和"如何讨巧"的原则打发光阴（因为连说也不能说那是"生活"）。直到现在（五十七岁），我才明白，科利亚[②] 是对的。他只呆了三天，便一言不发地走了，从此杳无音信。他以成年人的眼光，学识和经验断定，这里的一切已经死了，尽管还在

① 洛扎诺夫的姐姐。
② 洛扎诺夫的哥哥。

动弹，还在呼吸。要复活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随之沉沦。

（夜里躺在床上，回忆童年，十三岁以前）

※ ※ ※

何为“作家”？

被遗弃的孩子，被忘却的妻子，以及虚荣，虚荣……

有意思的人物。

（入睡时）

※ ※ ※

11月1日

教堂教会了所有的人祷告。

除了吻它的手，人们还能如何对待它呢？

东正教徒吻神父的手——多好啊。

神父就是父亲。天然的父亲。要知道，天然的父亲中也有不好的，可我们不对孩子说——恨他们，鄙视他们。这么说，意味着放纵孩子，扼杀孩子的灵魂与未来。正因如此，即使有道理，也不应该抨击神职人员。

※ ※ ※

什么更宝贵，是爱还是爱的历史？

啊，一万“爱的历史”也抵不上“现在的爱”之万一。

如今，我写的是“历史”，因为我的幸福已成既往。

※ ※ ※

勒齐前后有三个孩子死去——万尼亚，还有谢辽沙，还有……名字忘了。谢辽沙是后来单独死的。但三只童棺却是相继从巴甫洛夫街2号叶菲莫夫公寓二楼抬出去的。

这真令人毛骨悚然。人遇上这样大的不幸，怎能不“伤筋断骨”呢？他——一动不动，表情麻木，她——悲痛欲绝。赫斯医生说：“奥尔嘉·伊万诺夫娜（母亲）已经几天没合眼了。”

还有叶连娜·伊万诺夫娜……

他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苦痛。他们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苦痛。这苦痛压得他们的骨头咯吱作响，压得他们的心碎裂开来。他们究竟是如何挺过来的呢？

不挺过来又为之奈何？还得活下去啊。上帝总是要把一些人带走，把另一些人留下。谁被留了下来，谁就要活着。

从未见过他开怀大笑。始终入不敷出。现在——时常难以为继。不过，笑还是见得到的（比如给奥尔嘉·伊万诺夫娜过命名日时）。就是现在也能见到他微笑。不经常，但见得到。大家总谈起他。关心他。他一直在读使徒保罗。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深入领会。他每天只读使徒保罗和《新时代报》（了解当天的一切），有时也看一下《神学通讯》。

他念过高等法政学校（莫斯科）。是个聪明人。酷爱伦勃朗和罗西尼。喜欢写作。可还没搞出什么“名堂”。出生在发明印刷术之前并“鄙视生活在当今时代”。他没有现在，只有过去，遥远的过去。拒不接受未来。

他们就这样活着。

他们过的是一种消极的生活（遭受痛苦之后），当积极的生活成为泡影。

应该尊老，因为——“遭受痛苦之后”，人才会老。

这一点，在中学读书时，我们未曾意识到。

※ ※ ※

圣言

我对孩子的母亲的依赖乃是一个没有道德或道德观念淡薄的人对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依赖。

她总是停不下来，总想出去看看，自己走路都困难，却还要回过头来照应我。

她对我的这一份永远的关心仿佛天意。一想到会失去这份天意，我就胆战心惊。我害怕一人独处。

无论——去什么地方。

无论——在何处休息。

没有她，我会迷路的，像一只流落他乡的狗。

※ ※ ※

我对她的依恋基于道德。尽管我一直很喜欢她的身体，她的身材，她纤柔的小指（她的双手惊人地优雅），她脸上的“一只”酒窝（第一个丈夫死后另一只不见了），但这并不妨碍发展合乎道德的爱情。

在基督教世界里，只有合乎道德的爱情，合乎道德的依恋才被认可。作为圣物的肉体（旧约）的确已死，肉体之爱不复可能。肉体之爱只留给了街头，并具有街头形式。

我爱她，如罪孽爱虔诚，弯曲爱笔直，谬误爱真理。

正因如此，我的爱中才有一种奇怪的“分类”。它向她传递

我的大喜大悲。它使她永远感到饥饿，不满足。它给了她思念和痛苦，也给了她非同寻常的幸福。

如果是我们单独在一起，或者是她没跟我在一起（没和我说话），她几乎总要祷告。这在从前也有过，只是不像最近五至六至七年这样持之以恒。这么多年，耳濡目染自己身边的人在祷告，我怎能不习以为常呢？怎能不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并坚信——祷告是世间最优美最重要的东西呢？

（11 月 1 日夜，在床上，泪流满面）

※ ※ ※

我要回到我写作《神话》[①]（同瓦利雅相识）和《教育的黄昏》（同瓦利雅住在白城）时抱定的唯心主义。回到外省的沉寂。彼得堡给我的只有折磨，也许，还有堕落。起初我（厌恶身居高位的自由主义启蒙者和骗子手）是疯狂的保守派，后来又是如此放荡不羁的革命派，特别是宗教革命派，甚至还是反教会派，反基督派。我走到这一步全是由于我的家庭状况。但对此应该这样理解：如今的宗教界人士谦卑地意识到自己太不神圣了，太弱小了，因此，当那些从古代沿袭下来的确实神圣的生活方式，“规矩”和“律法”压在他们身上时，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假如保罗在世，他的所作所为还会一如既往，褒贬扬弃，全凭本心。缺少了这种“自身中的神圣”精神（现在），他们又如何动得了呢？他们只有死路一条。这不是保守主义，而是谦卑，不是僵化，而是害怕，害怕为别人，在另外一些不大清楚乃至不大光彩的情况下，破坏了某一条“规矩”，从而遗患无穷。规矩一旦被

① 指长篇论文《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

废除，便只剩下了良心。但假如这不是保罗的良心，而是安东尼们，尼肯们，谢尔吉们，符拉基米尔们，康斯坦丁们的良心，那么，它怎能担当得起世界的重负呢？“我还不至于被收买，可我的接班人会被收买”：于是世界开始服从收买，而不是“规矩”，服从许诺者，而不是形式主义。于是世界摇摇欲坠，于是世界走向毁灭。

所以我应该明白，我当然不会因……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教会也绝不会指责……把我同……拆散，教会害怕大张旗鼓，动用舆论这么做，因为，“近来已经没有保罗们了，只有尼康德拉和伊诺肯季们”。因为先知和教皇的才能百年不遇，在旧约时期是这样，在新约时期还是如此。

阿门。

※ ※ ※

11 月 3 日

全都毁灭了，全都毁灭了，全都毁灭了。

生命毁灭了。生命的意义本身也毁灭了。

没有料到。

※ ※ ※

我是那么爱她，以致我无论如何不能停止夜间吸烟。

（说真的，我尝试过，可她自己说：“你就吸一会儿吧”。于是，我又让自己吸了起来）

※ ※ ※

11 月 5 日

啊，先生们，先生们，假如我们知道，我们多么贫穷……

假如我们知道，我们多么寒酸，多么可怜……

我们算什么“达尔文主义者”；我们只不过是用来运水的劣马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门洞里的看家狗而已。

女主人丢给我们一块面包。

“我们是，斯宾塞①，是。”

“奥古斯特·孔德②，穆勒③ 和斯宾塞的著作，以及妇女问题（我念中学时读过）——这些统统都是。”

还有“蔡布里科娃④ 的前言。”

※ ※ ※

蠕虫生下蠕虫。

蠕虫在地上爬行。

然后便是死亡。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深夜两点）

---

①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实证哲学家。
② 孔德（1798～1857），法国实证哲学家。
③ 穆勒，约翰（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④ 蔡布里科娃，玛·康（1835～1917），俄国女作家，政论家。

※ ※ ※

……为俄罗斯大地挑选一个祷告者吧。不要寻找（挑选时）智者，不要寻找学者，不要寻找阴险狡诈者。要听一听，看谁的祷告更热烈，谁能将痛苦的俄罗斯大地所遭受的深重灾难秉报上帝，谁能为她的创伤祈祷，为她忍辱负重。

（在选举全俄牧首之际；各种派别）

※ ※ ※

生命——是理想的奴隶。

在历史上，真正现实的只有理想。它有顽强的生命力。无论用酸，还是用火，都毁灭不了它。它会四处传播，开花结果，“控制空气”，从一个脑袋钻进另一个脑袋。面对这顽强的存在，石墙，铁塔，良好的装备——全都不堪一击。理想——攻无不破，守无不固。

而事实——相形之下，总是黯然失色。

※ ※ ※

11 月 7 日

到上帝跟前我不需要“引导”：从大学二年级（或一年级）开始，我不但能感觉到他，而且能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我，从未间断过一时一刻。我周身“充满上帝”——始终是这样。

但到基督跟前我却需要“引导”。

这是否意味着我的整个生命——从 1889 年开始——就是被

"引导"到那里的过程呢？从 1889 年到现在的 1912 年，具体一些说是到 1912 年 11 月 7 日，当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

要知道，在 11 月 7 日以前，我是完全"脱离基督"的。脱离的程度无人能比。然而圣经中说："利剑将穿透你的心……"

这就是"引导"我的东西。

※ ※ ※

不是温顺者温顺，而是曾经温顺者温顺。

但我不想接受这个解释：我厌恶这个解释。不——是劫数。

然后才是——温顺。

※ ※ ※

灵魂在忍受煎熬。可怕的煎熬。

我的早晨没有光。我的黑夜没有梦。

是孩子的母亲发现了什么，指给我看："这是什么？说得对。"

我走过去读道：

"一个无路可走的人，一个被上帝用黑暗笼罩起来的人，要光明何用呢。"

这是约伯记中的话。于是我想："我可怜的人儿，我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这是大约十八年前的事。

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认为她可怜？我和她一样，总无缘无故地感到恐惧。现在清楚了（是她久病不愈）。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孩子都进了最好的学校，孩子的母亲似乎也"不要紧"，可心里就是要想："可怜的人！可怜的人！"这种没完没了

的苦恼和担心，可以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来表达：

我是否会走在漆黑的街上……

因为我时常去编辑部（校对文稿）。并且始终在担心，好像明天将是世界末日。

※ ※ ※

我身上的一些缺点只是让我觉得发痒，对我并不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

这是一只垃圾箱，里面虱子乱爬。至于暴躁——我从不知道我有这样的缺点。要知道，我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谦虚明智”的人。

坐在桌旁喝茶时，我经常注视我的客人们，心想，他们就没有这些缺点——我是怀着怎样的羡慕，怎样的感激（感激他们的纯洁），怎样的负罪感注视着他们啊。

尽管我只是勉强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是要主持大家讨论文学问题或宗教哲学会问题。

※ ※ ※

11月8日

我的一生是艰难的。内有罪孽。外有不幸。唯一的安慰是写作。正因为如此我才笔耕不止。

※ ※ ※

我的宗教信仰一度很高傲。我曾这样“评价”教会：它与我无关，我不需要它，因为我“跟上帝在一起”。

我记得，在布梁斯克，我曾高傲地说：“他是个教士”，或者还要加上：“不错，他是个教士，但这绝不等于他是个信教的人”……“我不是教士，但我是个信教的人”。

然而，该是毕恭毕敬地亲吻神父的时候了。该是投入“大地母亲”怀抱的时候了。于是，对教会的感觉被唤醒了。

教会——此乃“我们大家”。教会——亦即“我跟大家”。且“我们大家是跟上帝在一起”。

与高傲的“宗教信仰”不同，“教会”感是谦逊的，朴素的，民众的，全人类的。

※ ※ ※

哲学家们——也不是所有的——谈论上帝；柏拉图教导人们“灵魂不死”。还有一些人。教会不“教导”，不“谈论”，只是要求人们相信上帝，从“灵魂不死”中吸取营养。教会只有一个。它始终如一。它坚定不移。

它支撑着这个名字，这个信仰，这面旗帜，从古至今，坚定不移。对于怀疑者，它说：“你不属于我”。没有一个普通的诵经员会说：“也许，灵魂不死并不存在”。对柏拉图勉强想到和悟到的东西，任何一个诵经员都深信不疑。

跟柏拉图的体系相比，“教会学说的数目”不可估量。且一切是那么丰富，那么简明。教会关心产妇。教会关心死者。这是需要的。可柏拉图就不会用这“需要的”来补充自己的思想。

同教会相比，我们的大学和神学院里的“科学”算是什么？

森林里的一棵小草。不：世界（宇宙）里的一棵小草。

世界就是教会。

而科学，以及大学和大学生——不过是一棵小草，一枝小花：“镰刀一过，呜乎哀哉”。

※ ※ ※

是谁想到要去悼念死者？是谁想到要去关心产妇？

斯宾塞想不到。

巴克利想不到。

就连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也想不到。我不知道，波兰天主教教士想得到否，不过我知道，新教牧师大概是想不到的。产房里“太脏太闷”。

东正教神父就能想得到。

※ ※ ※

我在教堂里“长祷”的时候并不算多。我很少领孩子们进教堂。可这“很少”留给人的回忆却是那么幸福。这是光明。

这种光明充满了整个国家。“来吧，无偿地把它拿去。”只要腿脚勤快——全都来吧。不过，现在的教堂还没有普及到每一个村庄，还没能让那里的人在非礼拜日也做上礼拜，这是个严重的缺陷。这是失误。如果当初能想到这一点，那么，老太们也可以上教堂了，孩子们也可以上教堂了。这毕竟是受教化。

为什么要把繁琐的统计数字压在神父们身上？为什么老让他们不务正业，却无暇顾及他们的份内之事？

※ ※ ※

俄罗斯人缺乏祖先意识和后代意识。

“精神民族”……“绝少肉欲”……

我们的虚无主义由此而来：“在我们之前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且我们虚无主义一贯是激进的：“我们从头开始建设一切”。

※ ※ ※

我的日子即将结束……啊，我是多么不需要这些日子。对我来说，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时如年”。

※ ※ ※

我对教堂的思考越来越多。越来越经常。我开始需要它。从前只是观赏它，赞叹它，想像它。从它的好处来评价它。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需要它——一切从此开始。

在此之前，其实也不曾有过什么。

※ ※ ※

教堂建立在“需要”上。这全然不是文化影响。不是“为民启蒙”。所有这些范畴都将灰飞烟灭。虚无主义者才需要“启蒙”。

我需要的是：给教堂垫一块石头，使它的基础更加稳固。

※ ※ ※

我们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也曾宽恕我们。

（关于僧侣们，11月8日，深夜）

要知道，他们是一个阶层。他们几乎全是牧师，执事；既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难免有不争气的人，有时甚至还会有害群之马。东正教僧侣阶层的大门是敞开的，“来者不拒”，于是也就良莠不齐，有毛病的人随处可见。货真价实的僧侣百里挑一。这很自然。

我们原谅他们。我们原谅他们。我们原谅他们。我们原谅并放过他们。

他们毕竟代表我们祈求“留利克的恩典”。虽然态度冷淡，马虎，但这些话毕竟是托付给他们说的。

让我们保留这“毕竟”。世界如此弱小，如此悲哀，人的状况如此可怕，以致我们只能将自己局限并满足于“毕竟”。

“毕竟”谢拉菲姆·沙洛夫斯基和安夫罗西·奥普金斯基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毕竟他们不是“文学家”……

文学家没有“毕竟”。

文学家有的是自吹自擂。

※ ※ ※

11月9日

库兹涅佐夫，二届国家杜马议员，作为彼得堡诈骗盗窃团伙的头目被抓了起来。这太可怕了。

报界对此低调处理，全然不像对待“古尔科－里德瓦尔”，整整一个月，每次用三至四个版面，大肆渲染。给人的印象是，报界态度暧昧：当局才是小偷，而议员们是使俄罗斯免受其害的救星。

(偶然在报上碰到的。调查“马尔吉扬诺
夫案件”)

※ ※ ※

明天四位医生会诊：“送到国外是否可能，是否合理”。给塔尼雅买了一块白色的衣料（二十五卢布）。学校举行晚会，邀请熟人参加。可以叫上阿基莫夫家的男孩子，他们很有教养，也很可爱。

就这样，花开花落，花落花开。转眼间在《新时代》已经工作了十三年：我本来打算干十年，给孩子们攒够两万卢布。如今我可以“撒手而去”了。却于心不忍。精神遗嘱还没写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写。欠银行五千，“出国”要用大约三千。给孩子们剩下三万，外加刚出版的几本书，跟印刷厂结算后每本可收入六百卢布左右。

但光交学费每年就需要二千卢布。真要“撒手而去”，何处能搞到这笔钱呢？

我还得活两年（跟印刷厂结帐，还银行贷款）。

※ ※ ※

过度的担惊受怕害了我。

安菲莫夫（哈尔科夫的教授）的判断（1896 年）是正确的

(差不多)。我的双手耷拉着，不听使唤。而它们应该抬起来，应该工作。

若不是过于害怕，回到彼得堡以后，我肯定会马上开始治疗，根本用不着到别赫捷列夫那儿去复查。那样就不会有危险；既不会得心肌炎，也不会血管老化，更不会中风（卡尔品斯基说的)。

就不会有毁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三样东西。

家里就不会闷闷不乐，就不会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从与《新时代》合作（生活保障）开始，整个生活就会完全不同，就会进入一条更快乐，更开朗，更有活力的轨道。与人们的联系就会更紧密。

老伴就不会病倒，就不会这么害怕见人，这么“孤癖”，“难以打交道”，“什么人都不想见”，尤其不想见——高兴和快活。

(11月10日)

※ ※ ※

11月16日

始终在思考，感受和谈论教会，基督教的诺沃肖洛夫，弗罗伦斯基，茨维特科夫，布尔加科夫，对于婚姻，家庭和性的问题没发表过任何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后也不会发表什么看法。符·索洛维约夫写了《爱的含义》，可要知道，“爱的含义”本来就是个哲学论题，然而就连他也未曾在其十卷本的文集中，对离异，婚前贞节，背叛，以及家庭的障碍和苦难等问题说过一句话。这方面他没说一句话。我的两卷本《俄国家庭问题》出版后，非但没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就连一篇书评，一个简介，一句引文也没见到。

好像《俄国家庭问题》并不存在。所有的人，他们对家庭的

需要到了可怕的程度，然而他们——尽管拥有集体的民族的智慧，集体的基督徒的智慧，兼收并蓄的教会的心——对这本书的漠不关心同样到了可怕的程度。

这是警察局和宗教法庭的事——是贿赂，记录和可耻的命运的事。很清楚，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彻头彻尾的，真实具体的卑鄙无耻（“狼狈为奸”）——这一点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文章，从他们的沉默中不难看出。

弗罗伦斯基本来能够也有胆量站出来说话，可他越来越醉心于枯燥乏味，傲慢自大，残酷无情的教会事务。方济各的“花朵正在枯萎”。

（献给善良的尼·罗·安东诺夫神父）

※ ※ ※

任何攻击，一遇上我的懒惰，便都碰得头破血流。

比如，托尔斯泰的古典中学，圣经十诫，以及“如何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

一切都陷入了我的不拘一格，没有章法之中（就像猎人陷入了沼泽）。

※ ※ ※

心感到疼痛的时候，便顾不上多神教。请问，有谁会“怀着一颗疼痛的心”去关心多神教呢？

※ ※ ※

我跟所有的人握手，所有的人也都跟我握手。我睁开眼睛看

全世界，全世界也睁开眼睛看我。我拥抱紫罗兰，也拥抱玫瑰和水仙。我聆听树林的喧哗，大海的汹涌，也聆听贝多芬的音乐，俄罗斯伤感的歌曲。

卖淫现象无所不在！真正的“我属于人人，人人属于我”。除了一个器官。

这个器官就是生殖器。如果我把它还给了某个人，亦即给了不止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将向我投掷石块。

真是奇迹：就是说，我身上只有这生殖器是清白的？只有它“不允许”人人碰它，或者它碰人人；换句话说，只有它是不出卖的，保持着“自我”，保持着“本性”。

因为，大家之所以向我投掷石块，并不是因为我得罪了他们……并不是因为我剥夺了他们的快感。

而是因为——我得罪了生殖器的本性！神秘的“投掷石块”（确实神秘）作为世界性的“对放纵的谴责”，乃是一种象征，表明全世界都在捍卫我的生殖器，捍卫它的纯洁和完整。

怎样的奇迹啊！

要知道，生殖器一旦受到玷污和摧残，被处死的并不是生殖器：它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就像“纯洁无瑕的夏娃”；被处死的是生殖器的持有者，因为他没有保护好它的清白和纯洁。

这便是“世界的构造”为事物的本质提供的“cultus phalli①”的证明。

现在可以解释《塔木德》中那句令我震惊的话了：“石刑”是男女犹太教徒的一个特权，他们无权将这一特权扩大到其他部族的有罪之人，只要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或犹地亚。“石刑”与“割礼”不可分割。

① 拉丁语：生殖器崇拜。

※ ※ ※

书刊的丑恶或许也有伟大，神圣和有用的一面："揭穿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陀斯妥耶夫斯基）。——只是还嫌不够……不过，就"揭穿书刊的本来面目"而言，倒是成效卓著，这一点，从人们与日俱增的对书刊的厌恶中不难看出。不读。丢掉。没人援引它。没人迷信它。

"美妙的诱惑力宣告结束了"。

然而，这正是"古滕贝格① 的诱惑力，迷惑力"。歌德和莎士比亚发表作品时，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诱惑力还有"结束"的一天。"没有永恒不灭的王国"。

要让作家走向没落。要让他们成为垃圾。"啊，——这是事业"。"古滕贝格印刷机"的本来面目终于被揭穿。——"与其出版这些胡说八道，还不如什么都不出版"。到二十世纪末，所有的印刷厂都将被拆除，变卖。

谁也不会花钱买，
白送都没人要。

人们将再次摆脱"写作者"的束缚，——或许，那时他们将学会跳舞，举办招待会，喜欢上音乐，喜欢上弥撒，再次学会神圣和纯粹地去爱。人们将是幸福的和严肃的。

因为，有书刊在，人们自然无法看到幸福和严肃，"就像无法看到自己的耳朵"。

布道又将成为可能。还会有萨瓦那罗拉②。还会有圣徒保

---

① 古滕贝格（1394～1468），德国印刷术发明家。
② 萨瓦那罗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活动家。

罗。

果真会如此吗？这片曙光果真会升起吗？

这是美好和伟大的曙光。

崭新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 ※ ※

去吧，去吧，肩并肩地去吧，格利高里·彼得罗夫，还有安菲捷阿特洛夫，还有“科佩卡”，还有博博雷金，你们所有的人，一群鲍布钦斯基。去吧，去淹没一切。你们的时辰到了。各得其所吧，举杯庆祝吧。

你们的节日将是一场空欢喜。

你们很快就会说：“怎么烟雾腾腾。空气怎么有股苦味。恶心。想吐。”

是的，文学跟我无缘。

不，这是个错误——我成为文学家。

是的，跟我无缘。

(11月17日，想到没读过一篇《欧洲导报》，《俄罗斯道德》，《现代人》以及收到的其他刊物上的文章整整一年，就连前些年也没读过一篇……这只有铅灌的脑袋才能钻进去。对了，我还收到《当今世界》)

铅制的文学。由铅制的人写作。为铅制的读者而存在。

如此，岂有不灭亡之理。

不用说，这种文学，弗罗伦斯基不读。茨维特科夫不读。勒齐只读使徒保罗和《新时代》。

聪明人中没谁读。包括我。而其余的人——见鬼去吧。甚至还可以去见《隐居》中的那两个字母——新闻检查机关—见那两个字母，立刻感觉到，它已经失身。

※ ※ ※

我清楚地记得，1895~1896年，我没有题材可写。

有音乐（在心里），却没有饭吃。

炉火烧得很旺，可没有米下锅。

在此，我的家庭经历以及跟“朋友”的关系起了作用。对犹太教的关注，对多神教的兴趣，对基督教的批判——一切都是从一种痛苦，一个点生发出来的。文学的和个人的是那么水乳交融，以致在我眼里，没有什么文学，只有“我的事业”。文学甚至彻底消失了，“跟我的事业毫无关系”。个人的转化成了普遍的。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我在文学方面的不拘小节和不修边幅就是由此而来。难道在自己家里还用得着讲究吗？文学给我的感觉就像“我的家”。我无法想像，在这个“家”里，我“应该”干什么，别人“期待”我干什么。

※ ※ ※

在“那个世界”我会问：

——哎，怎么样，维拉，那双旧套鞋穿来了吗？

因为在这个世界她问我：

——老爷，您这双套鞋太瘦了，给我吧。

午饭后我正想睡觉，便说：

——拿去吧，维拉。

她又黑又瘦，毫无生气，四十五岁了，可服侍我却忠诚老实。

我没想到要送她什么礼物。没意识到（确确实实）。如今回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心里总不是滋味。这是二十三年前的事。

她平时少言寡语，从不顶撞主人。她腌了些黄瓜。九月份的时候拿出来给我们吃。硬得不能再硬。

——这是什么怪黄瓜呀，维拉？

——加了奶渣的。实诚些。再过两个礼拜，就全好了。

肉圆。还有——黑果！

——这是什么怪东西，维拉?!

——从前在那些商人家里，我就是这么做的。加了黑奶油。

的确令人愉快。

（在叶利察）

※ ※ ※

罗德泽维奇[1] 家里有个女佣人。非常可爱。而主人却很残暴（数学教师）。

于是我，斯特洛依科夫，扎波尔斯基，斯泰因（当时住在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那儿，楼上）决定报复他一下，因为他老给我们两分。

女佣人穿过底楼（教师住的地方）长长的走廊，双手捧着一只大碗，去给主人送汤。“真是天赐良机”：我们从三面杀出，将她围住，并开始……在她的上衣里搜索什么。她生起气来，直骂我们，但无济于事（手里有东西）。她又不能跑（会摔碎那只大

① 罗德泽维奇，尼热戈罗德的一位中学教师。

汤碗)。只有骂。我们几个人的手像蟑螂在她身上爬来爬去。不过并无特别的用意，还算是规矩。毕竟才四年级……“还不懂干坏事”。我们只想捉弄一下罗德泽维奇。

他是波兰人，天主教徒，伪君子，因参加“暴动”被流放到尼日尼。只要是波兰人，他一律肆无忌惮地给打三分以上（甚至包括一窍不通，随意旷课的戈尔斯基)。而对我们俄罗斯人，则几乎全给两分。

他身材矮小，跟侏儒差不多，一脸山羊胡子，很瘦，面相凶恶，而且，不知为什么，脖子上总缠着一根又脏又长的围巾。

说起话来跟打雷一样。活像萨蹄尔① 或魔王在世。

第二天，走进教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坐下，而是换了一副腔调，用低沉沙哑的声音（班级里谁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除了“我们四个”）说：

“——你-你-你们！——他嘟哝道……你们这些青-青-青年人——学坏了……你们当中有些人……竟敢……连自己的老师也不尊重……”

然而，他毕竟老奸巨滑，在这堂课上，我们四个人中，他谁都没提问（在黑板上证明定理)。

只是日后我们可苦了。

（在尼日尼）

※ ※ ※

可以标价出售的爱情似乎“很方便”：“谁有五个卢布，谁就进来拿去”。不错，然而：

① 萨蹄尔：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仙者，酒神的淫荡的伴侣，长着尾巴，角和山羊腿。

花儿已凋零，
火焰已熄灭……

他拿到的是什么呢？一块死橡皮。一只羊皮手套，而且是被唾弃被丢在地上的，他把它捡起来戴在自己的军官的手上或大学生的手上。“标价出售的爱情”绝对下流肮脏，应该将它千刀万剐，应该用大炮、用火药把它炸个粉碎（我学生时代的幻想）。应该像看待损害“国家信誉”的“伪币”一样看它。因为它，所有这些妓院，所有这些充斥街头夜间乱窜的妓女，会损害“家庭信誉”，会毁掉家庭，使婚姻成为“多此一举”（这一点感觉得到，看得出来）。然而，对一个民族来说，“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并不在国库和货币之下。

可卖淫现象却“当仁不让”，有历史为证。如此说来，“不妨让它存在下去”，但要以另外一种形式，要完全不同于现在；不能像肮脏的无家可归的狗那样，在马路上“来者不拒”，不能像“小卖店”那样，什么人都可以买“三戈比的瓜子”。要换一种形象：不让人感到龌龊，不让人感到淫荡。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晚上，从七点到九点（只是这段时间），所有自由的女人（没有丈夫的以及非“月光”下的），每人手拿一枝鲜花，穿着朴素，走出来，坐在自家房前的长椅上。她们的眼睛温顺地看着下面，她们不应该唱歌，也不应该说话。不能招呼任何人。一旁走过的人喜欢谁，就会在她面前停下来，礼貌地对她说：“你好。我跟你去。”接着，她站起来，也用不着打量他，就把他领进自己的家。这天晚上她将是他的妻子。为此，要把日子固定下来，比如一个礼拜里有哪些天，一个月乃至一年有哪些天。不妨让这些日子成为一种节日，在这期间，女人“破诫”可以得到宽恕。……

……全国，或全城，全村的妇女，凡没有能力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没有能力适应，保持和巩固一夫一妻制的，都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她们不应该受到指责，也不应该受到鼓励。她们——只是一个事实，但她们应该监督自己，保持身体的洁净，神经的健康（完全的）。她们应该保持清新：因此，不能一天晚上接待两个（如今是走马灯一般，一个接一个），不能在自己月经时接客，不能在“法定时间”以外接客，否则将被开除。这样一来，卖淫的“下等酒馆”便会自动退出，而“妓女的灵魂”（她们有）也会从污秽中挣脱出来。不言而喻，她们应该有孩子，她们应该有生育能力。她们是家庭妇女；只是从早晨开始“守寡”，到了晚上又“重新出嫁”（心理和自我意识仍然健全，没被扼杀，也没有萎缩）。

一个裁缝对我讲述了他的婚史：他“还未见识过自己的妻子”，一个大人物家的看门人的女儿。那时她才十七岁，父母嘱咐她说（这是他后来了解到的）：“你要知道你已许配给人家”（意思是“你知道以后该怎么做”）。她是个放荡的女孩，喜欢谁（“看上谁”）就跟谁睡觉。丈夫（是个愁眉苦脸的小市民，很勤劳，“就是乏味”）她一点也不喜欢，已经过门儿了，还对丈夫不理不睬，更不让丈夫碰她。“新婚第一夜她把她姨妈领到我家来，跟她睡在一个房间里。”五天后，她又回了娘家。天天领丈夫的表妹到她单身的表兄家去，跟他成了“露水夫妻”。父母已经灰心丧气，不再管她，——管也没有用。有意思的是，警察局也站在她一边（她很有魅力吧?），竟把可怜的丈夫关进“看守所”，或者把他“扣下”，不同意跟她分开就别想回家。在向我求教（当时我正在写有关离异的文章）之前，他没同意。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他：“教会是不会批准你离婚的（因为没有证人），你必须忍耐。”他最恼火的是，她妨碍他工作，妨碍他正常生活，使得他“无法安心思考问题”，——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不

是丈夫。这样的女人我还碰到过——受过教育，长相漂亮，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叶甫盖尼娅·伊万诺夫娜给我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我听了大吃一惊。叶甫盖尼娅·伊万诺夫娜最后还补充道：“我没法不喜欢她，她是那么可爱，那么赏心悦目。”叶甫盖尼娅·伊万诺夫娜本人绝对是纯洁无瑕的。你看，这全是事实。

※　※　※

活塞在抽水机的圆筒中是怎样工作的？——活塞下面可以形成真空。物体有害怕真空的属性，因而会努力填补真空。于是地下水位上涨，地下（土壤中的）水集中于一处，冲向提起的活塞……生命啊，力啊，血液啊，皆同此理。这就是“整个肌体”似乎会集中于一点的原因。实际上，此时此刻，这个点就是“肌体和生命的焦点”——跟镜头的“焦点”一样。

※　※　※

生儿育女能给父母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我牢牢地贴在了大地上”，“大地已同我血肉相连”，“如今没什么能把我和大地（地球）分开”，我不会被忘却，被消灭了。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各个民族，包括我们，结婚时都要举行仪式，唱歌，献花；新郎新娘要头戴花冠，身穿白衣白裙。

然而，往深些说，这还不是仪式；仪式是后来才有的，并显示了自己的重要性，而这重要性就体现在它依附的是什么。

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在古代，新郎新娘进入洞房（耶路撒冷叫“胡普”）时，众人要设宴狂欢，而新郎新娘就在宴会期间交媾。在我们俄罗斯，直到不久以前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新郎新娘交媾之后，要把新娘的衬衫拿出去，送到“宴会”上，给大

家看，以表明“他”的力量和“她”的纯洁。但这并不是“检查”：难道参加宴会者的心理就是要“审议借据上的签名”？起初这么做是因为父母高兴：两个家族——他的家族和她的家族的血液开始流入同一条河，交汇在一起，长成同一棵永恒的大树，“生命之树”将开花结果。他们要把自己的喜悦公之于众。安德列·波洛托夫的《手记》中，对展示新娘的衬衫作了详细的描述。在斯摩棱斯克省虔诚朴实的百姓中间，在普通市民和所有农民中间，至今仍保留着展示打湿的衬衫的隆重仪式。

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种作父母的感觉，仿佛他们在世上以更加充实的方式又出生了一次。对父母来说，儿女的交媾就是他们的再生。两个人的血液刚一突破肌体，流到一起，父母马上就会有一种形而上的认识：一根线脱离了他们，跟“另一个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我们家族以外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这就好比姬蜂，伸出输精管，在幼虫的身上刺个眼儿，把自己的卵子注入幼虫体内，从中孵出这只姬蜂的“我”，并靠幼虫的身体获得滋养。对一方来说，这是残酷和致命的，而对另一方来说，却是爱的表现，是为“输精管”的快感和“永恒的生命”做的一件大好事。古代的一些习俗就是由此而来。比如，腓尼基女人总是走到岸边，把自己献给从水里游过来的外国人，亦即“像幼虫的身体一样”，快活地“接受姬蜂的精液”，为了把它带进自己的家，在那里生殖和培育它。古代几乎到处存在的“家庭卖淫现象”也是由此而来。这其实并不是什么丑恶的金钱交易，而是把“精子”作为一种绝对的世界价值“接进自己的家里”。从本质上说，也的确如此。所以说，并不是“她”使谁蒙羞，而相反，是外国人，过路人或客人的拒绝输出精子使她蒙羞。这是一种侮辱，这是一种鄙夷，它使人们互相疏远，它使人们伤心流泪。反过来，如果“得到了精子”，她们就会兴高采烈，哈哈大笑，像下了蛋的母鸡。母鸡为什么要叫？因为她“给世界

带来了好处”，因为她再也不是“世界的局外人”了。母鸡叫什么？她叫的是：“世界是我的”，“我是世界的”，也就是说，“我”是世界上的一个物，一个人，“我”现在是“世界上的一种存在”——位于世界的“中心”，而不是“边缘”（角落）。

既然母鸡都有感觉，那么可想而知，人的感觉要强烈到何等程度！

孩子们啊，别相信父母：他们总是掩饰自己。

该死的忧郁让他们低下了头。但这是一时的苦闷，它很快会过去的。

抬起眼睛吧：太阳升起来了。

生命的太阳……

微笑的太阳……

（洛扎诺夫的发现）

※ ※ ※

皮萨列夫和《现代人》其实就是纳特-平克顿。如此的简单，如此的平淡，如此的“新文明”和“最新科学资料”附录。而且一切是如此坚决和大胆。不明白，楚科夫斯基有什么可吃惊的。

（叶·巴诊所；楚科夫斯基一年前就此做过一个报告：《他们缘何痴迷纳特-平克顿？》）

※ ※ ※

但愿墓门的旁边
活跃青春的生命，
无动于衷的自然
能保持秀美永恒。

有人听到这几句诗，感动得泪流满面。

皮萨列夫站起来：

——我－不－明－白。

公众中间充溢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兴奋。教授们，女校的学生们，全都跟着起哄，又是拍巴掌，又是哈哈大笑：

——愚－蠢。

且看如何为《诗人与平民》辩解。皮萨列夫始终反对普希金对农民的态度，尽管普希金从来就不理解农民。“平民”穿着溜光锃亮的皮靴，马不停蹄地到处做启蒙报告。

“平民”——这是格利高里·彼得罗夫，是博博雷金和拥有名誉院士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的科学院。

(在叶·巴诊所)

※ ※ ※

莫非走在马路上的那些人，全都难免一死？

太可怕了。

(穿越齐尼兹马戏团前面的广场时，在恐惧中)

※ ※ ※

她怜悯我，把我当孤儿。

我怜悯她，把她当孤儿（当时的故事）。我们俩都曾经是被欺凌的，被侮辱的。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爱。

教会说："不"。我对教会作个手势："没门儿"。

这就是我的全部文学。

（坐在孩子母亲的床边时，叶·巴诊所）

※ ※ ※

我偶尔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将以顽强的心理分析征服文学界。也就是说，"以后"他们都将注重心理分析，一如我和"我们的人"（勒齐，弗罗伦斯基，施佩尔克，还有几位，不多）。

这将是怎样的幸福呢。这些"蠢货"会统统消失。要知道，问题并不在于"左"，而在于他们是"蠢货"。

※ ※ ※

除了窃贼的出版物，再无别的出版物可言。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个"第六帝国"（拿破仑语）。

※ ※ ※

出版物的主要口号是：诅咒，仇恨和诽谤。

（回忆同苏沃林之死有关的一些文章）

※ ※ ※

人只配得上一个纪念碑：一座土坟和一只木十字架。
金质的纪念碑只有狗才当之无愧。

※ ※ ※

暗淡的星星，憔悴的星星，
你始终在我面前独自闪烁。
你疾病缠身，你浑身颤抖。
你就要彻底消声匿迹……

（叶·巴诊所，在吸烟的地方徘徊时）

※ ※ ※

为了深入灵魂，基督现在要征服的不是对他不置可否的渔夫的经验和大海的印象，而是要穿透“现代人”印象的厚墙，这整个的垃圾，以及善，要征服中学，征服大学，征服政府机关，对领导所负的责任，要征服打情骂俏，卖弄风骚，要征服熟人，朋友，书籍，毕希纳，莱蒙托夫……并使以养家糊口为目的的捕鱼业归于简单。这是否可能？如何把“垃圾人”变成“自然现象”？基督向来是跟“自然现象”打交道，而基督教（教会）则不得不跟垃圾现象，不良现象，堕落现象打交道——跟腐朽，越轨，畸形的产物打交道。这就是基督成就卓著，而教会收效甚微的原因——顺便说说。

基督教要比基督困难得多。现在的教会要比过去的使徒困难得多。

（在叶·巴诊所；1912 年 11 月 30 日）

※ ※ ※

年老的，可爱的祖母们——请珍藏俄罗斯真理。

请珍藏；除了你们，再也找不到能珍藏它的人了。

※ ※ ※

要感谢生活的每一个瞬间。要永远留住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我为什么写《隐居》）

※ ※ ※

意义不在永恒中。意义在瞬间中。

瞬间即是永恒，而永恒只是瞬间的“环境”。是居住者的房间。瞬间就是居住者，瞬间就是“我”，就是太阳。

※ ※ ※

世界生活在伟大的魔法中。

世界本身就是魔法。

还有历史的“循环”，还有行星的自转。

※ ※ ※

上帝欢喜世界。而世界欢喜上帝。

这就是宗教和祷告。世界在上帝面前“梳头”，而上帝说(创世纪，1)：“这多好啊”。每一样东西都好，每一天都好。

世界也对上帝略施“魔法”：于是乎，上帝便用自己的独生儿子来换世界。

这就是秘密。

不，世界并没有变冷，还没有变冷。这只是你们的错觉。热——是世界的本质，爱——是世界的本质。

还有这黝黑的颜色，丰润的脸颊。还有这世界的乳房，世界的怀抱的秘密。

还有渺小的洛扎诺夫，依偎在世界的怀抱里，永远地吮吸它的乳汁。我爱这世界的乳头，黝黑，芬芳，周围略微带点儿汗毛。我用双手把着柔软而又富有弹性的乳房，世界的格拉维兹那遥知我的存在，保佑着我。

它给我乳汁，智慧和火焰的乳汁。

因此，我爱上帝。

(1912 年 12 月 24 日，在诊所，孩子母亲身旁)